历史的拐点

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
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
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
以至于有人说
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
却拙于制度创新
真的是这样吗

马立诚◎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历史的拐点

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
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
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
以至于有人说
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
却拙于制度创新
真的是这样吗

马立诚◎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马立诚

简介

《历史的拐点》的13个精彩故事，悬念迭起，惊心动魄，内涵深远，影响至今。这13个故事，扇面般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3次改革进程，并且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和西方同一时期的改革对照起来加以比较。这一主题，在当前的“历史热”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

13个精彩故事连缀在一起，形象地描画出中国改革史的轮廓。动感现代的文笔、别出心裁的结构、突破陈规的解读和枝繁叶茂的细节，更增加了阅读的魅力。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当代中国改革大业，与历史中国的诸多改革息息相关，不论是发动时机、战略选择、机会把握还是难点所在，乃至改革哲学等各方面，都能从历史的观照中找出相应的影子。先行者的成功经验，更值得深思。

改革就是拐点，成功和失败都是拐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失败，我们已经丧失了太多机遇。

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方兴未艾，潮流涌涌。为了进一步摆脱羁绊，攻坚拔城，争取更大辉煌。比对以往的改革，举一反三，实为不可或缺的明智之举。

历史的拐点

作者：马立诚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出版年：20080101

页数：267

定价：29.0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213036774

作者简介

马立诚， 1946年出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政论家。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研究，撰写多种评论及文化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8年马立诚与凌志军合作撰写《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呼喊》，出版后连续两年成为当年中国最畅销书。《交锋》发行200万本，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

1999年9月，马立诚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

2002年12月，马立诚在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第6期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在亚洲引起轰动，在国内引起激烈争论。

1986年迄今，出版著作11本。

目录

代序 雷颐、马立诚对话录
子产支持舆论监督英雄出少年
铸刑鼎
郑国换了天地
子产不毁乡校颂
商鞅大变魔术记把绸子抖开
董事长秦孝公
改革研讨会
要大炮还是要黄油
镇压反对派
威猛新秦
改革付出生命代价
商鞅的“法西斯”行径
赵武灵王改穿“西服”四面楚歌
“西服”的优势
李鸿章怎样看服装改革
改革预热
服装激辩
改穿“西服”是历史转折点
乌托邦改革家王莽贵族里的孤寒
王门新秀
仕途重挫
儿子为奴隶偿命
王莽的“社会主义”
民选皇帝

两项重大改革
混乱导致败亡
旋风改革家元宏虎父犬子
迁都恶斗
改穿汉服
改说汉话
改用汉姓
唐代中叶的双星陨落历史这只大手
神童与帅哥
唐代宗：“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闪着金光的自由盐粒
市场之神
唐代中叶的格林斯潘
专案组组长得罪人
杨炎初试锋芒
两税法横空出世
刘晏屈死，天下喊冤
杨炎重蹈覆辙
“二王八司马”的146天毛泽东关注“二王八司马”
余秋雨做了一个梦
中唐两个奇人
新锐干将——刘禹锡和柳宗元
顺宗登基
改革出手
攻坚白刃
最后摊牌
宦官的清算

韩愈的刻薄和白居易的厚道
“八司马”的归宿
教训何在
范仲淹：一家哭还是万家哭贫困生范仲淹
宋仁宗决心改革
跑官买官的太多
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激进的欧阳修
王安石在哪里摔了跟头宋神宗头疼
变法，变法
千古三怪王安石
争论最大的三个法
全面出击
强兵和科举新政
恶斗与撕裂
恐怖的内讧
悲剧所在
今天又回到了南宋吗？
王安石时代的西欧
张居正的清凉界张居正的美学
铜墙铁壁：北部边防的黄金时光
金三角铸成一代权相
问责风暴和驿递改革
清查土地，推行一条鞭法
改革者的专制
入大火如入清凉界
洋务运动的是与非内外交困

“汉奸”魏源
马桶VS.洋炮
1861：洋务引擎开转
洋务派和顽固派
军事工业四大骄子
民用工业五大亮点
首派留学生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昭雪
建设近代海军
国有还是民营
菜市口喋血：光绪的“罪与罚”“腥气凝新鬼”
转石效应
“大事还是我办”
光绪和拉斯科尔尼科夫
剃刀边缘103天
惊心动魄白刃战
慈禧迫害名单
慈禧为何没有废掉光绪
光绪自学政治学博士？
“希望之星陨落”
中国首次宪政始末记艰难起步
康有为、梁启超和英敛之
潮流高涨
立宪派与革命派激辩
慈禧政治生涯的高峰
开天辟地的地方议会
四次大请愿

资政院：首次制约中央政府
自杀式爆炸：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
《十九信条》何不早出
参考文献

代序 雷颐、马立诚对话录

从历史冷到历史热

马立诚：改革开放初期是文学热，进入20世纪90年代是经济学热，后来又有一段政论热，现在是历史热，先后四个热。

到书店看一看，各种各样的中外历史著作满坑满谷，蔚为大观，中国大片也都是历史题材。

雷颐：历史热是正常的。无论美国、法国、英国还是俄国，每年的畅销书，历史著作都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历史热也反映了社会变化，20世纪80年代，历史很边缘、很冷。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期，发生了史学危机。当时愿意研究历史的人很少，读者也很少，称为史学危机。跟现在对比一下，这个变化太大了。

马立诚：从史学危机到历史热，你觉得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雷颐：过去，对历史的理解有些僵化，把很丰富的历史变成一种公式。比如，所有的朝代史，几乎都是讲统治阶级残酷剥削，激起了多少次农民起义等等。历史人物都给贴上了阶级标签，用这个标准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按照一个模式写，坏人也按照一个模式写，脸谱化、教条化。读者觉得很教条，很干巴，不愿意看。

中国原来的历史传统，比如司马迁的写法，是比较丰富的，充满了生动的细节。但后来，渐渐地公式化教条化的东西就多起来了。到“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发展到令人瞠目的地步。“文革”开始的时候否定一切，把历史上一切统治者都否定掉，到“评法批儒”的时候，又说法家好，把韩非子说成伟大、光荣、正确，历史成为“文革”工具。人们对这种历史讲述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这是史学危机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从这些误区当中走出来，解放思想，研究角度和表述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情况开始好起来。

马立诚：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一直很高。陆游有一首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争说蔡中郎。”蔡中郎是蔡邕，东汉才子，蔡文姬的父亲。到了南宋还“满街争说”，这不是热吗？在明末，专讲历史故事的说书艺人柳敬亭热的程度更令人大开眼界。黄宗羲、吴伟业都为他作传，张岱撰文称颂，南方大军阀左良玉引他为知己，让他参与军机要务。现在的历史热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延续。

雷颐：中国是史学大国，构成历史热的要素非常充沛，话题多到不可计数。美国才200多年历史，没法比。历史本来应该是热的。以前很冷，不正常。就我国情况而言，历史热应该是一种常态。目前我们称之为热，是因为从前的冷。

关注改革史

马立诚：当前的历史热，多是集中在有名的帝王将相身上，同一个帝王的历史，竟出了十几种不同的版本。但是，在人人说历史的大热中，对中国改革史的阐述极少，这是一个遗憾。我国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这场改革息息相关。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和思考，增进我们对今天改革的理解和把握，很有益处。葛兆光说，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也。"我同意他们的意见。

过去谈历史，总说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不提改革也是推动力。实际上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的洋务运动，对于走向工业化、发展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明摆着的。朱元璋是农民起义，上台以后对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什么贡献吗？农民战争迫使统治者休养生息一下，但这种恢复不可能使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力如浪潮般涌现出来。欧洲一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却较早进入了现代化。这些国家靠什么？靠改革。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历史上的改革，这本书就是我在这方面做的一个探索。

雷颐：写历代改革很有意义，温故可以知新。改革都有相通之处，历史经验可以提供借鉴。如果说到传统，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改革的传统。不论哪个时代，它的制度、文化、习惯、风俗，总是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不是大变，就是小变；不是变好，就是变坏；不是自变，就是他变；不是因变好而兴，就是因变坏而亡。总之，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变化史和改革史。

当然，这里包括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改革。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和平时期，社会矛盾的调和与解决，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改革。改革牵涉社会利益的再分配，触动部分人既得利益，因此改革遭到反对、阻碍，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研究历代改革的得失成败，研究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改革的发生条件以及策略与措施是否运用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无价之宝。你这本书里的文章我看过了，觉得不错，应该坚持写，坚持研究。

马立诚：我写这本书有两个努力方向，一是可读性强一点，把每一

次改革尽量梳理成一个故事，提供改革案例；二是尽量把中外历史上的改革结合在一起写，可以有个对比。

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有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十几次改革大都失败了，而十几次改朝换代都获得了成功。当然，在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努力远不止这十几次，但毕竟有这么十几次大成功。改革当然也不止这十几次，可是却大都失败。也就是说，你要创新制度不行，推翻却可以。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有人说，中国人屈从于暴力，但拙于制度创新。到底是不是这样？这是我这本书要探索的问题之一。探索这个问题，也是我的好奇心。都说改革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不行，但外国的改革同样也是触犯利益，为什么英国宪章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

林则徐、谭嗣同是汉奸吗？

雷颐：你说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的阻力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从某种角度来看，改革是利益调整，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这是各国都遇到的问题，不足为怪。但我们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其中的一些弊端严重阻碍了改革，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我们可以从林则徐的一些遭遇来看一下当时的文化弊端怎样阻碍改革。林则徐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这个大家都评价很高。但是他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同时，主张了解外国，学习外国的东西，这一下子问题就来了。其实林则徐的主张没有错。你跟谁打仗，你就要了解谁，就要借鉴和学习对方的长处，增加自己的本领，对不对？可是，对于林则徐这一点，清廷诸多官僚不以为然，甚至声讨林则徐，认为林则徐破坏中国的文化安全，说林则徐是汉奸。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用外国的东西来改变中国。

林则徐在禁鸦片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时候受了很多委屈，当时就有一些官员为林则徐叫屈。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在莫须有的“汉奸”罪名上，替他辩护。林则徐到广州去的时候，广州有一个姓梁的比较了解各方面情况，热心帮助林则徐。但是这个姓梁的说什么呢？说林则徐什么都好，就是主张学习外国这一点不好。这对林则徐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想一想，这是不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弊端？就是封闭性。这种情况，今天还有。

马立诚：这种情况令人痛心，也很可悲。从骂林则徐是汉奸这件事

上，折射出当时朝野在改革问题上的被动性。谭嗣同在他的代表作《仁学》中说，幸亏清朝的兵不够强，假如清朝的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那么君主专制的祸害将会更大。谭嗣同也被骂为汉奸。康有为、梁启超要求按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改造中国，当时更是被骂为汉奸。福建巡抚徐继畬写了《瀛寰志略》一书，介绍英美等国情况，也被上上下下诬为汉奸。在近代欧美各国，我还没听说哪个人因为写了一本客观介绍别国情况的书，而被称为“美奸”、“英奸”或是“意奸”的。这个问题反映了文化当中的一种惰性，这是中国改革者要特殊面对的一种压力。这种惰性，使得制度创新除了要解决利益纠葛之外，还遇到巨大的道德阻力，结果难上加难，在很多时候几乎不可能。

妥协与暴力

雷颐：我想，与制度创新相关联的问题之一，还有妥协和暴力问题。英国的改革者或者说反抗者，与国王的博弈过程很值得思考。通常的情况是，他们没有把国王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他们杀掉。当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推进创新。

我们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国也有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相持阶段结束，新皇朝建立起来了，还要用很长时间彻底清算，甚至用几十年时间追杀早就下台的皇族。你死我活到这种地步。

项羽进入秦首都咸阳，不但杀了无数人，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李自成攻入洛阳，也把统治洛阳的明朝福王宫给烧了。福王都杀掉了，为什么还要烧王宫呢？你住进去不就行了？留下来不是一处很好的文物吗？不行，要用这个方式表明不但要让你死，连你的房子都要烧成灰。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社会上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葬送在你死我活当中了。

马立诚：改革恰恰需要妥协，利益相关方要互相让步。这种妥协是一种智慧，是长远眼光，同时也是大局意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什么呢？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都不让步。改

革者觉得积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然就没机会了。

比如唐代中期“二王八司马”的改革，主角王叔文不懂得妥协，没有一个缓冲，也没有利益上的赎买。改革派宰相韦执谊劝王叔文作一点妥协，王叔文竟想杀掉韦执谊。王书文丧母回去尽孝之后，又轮到韦执谊不妥协。改革的后台唐顺宗身体不行了，已经让位给太子了，而太子是反对这次改革的，韦执谊面临的情况非常危急。韦执谊的老丈人，也是唐朝有名的官僚杜黄裳，给韦执谊出了个主意，说你最好妥协一下，主动率百官迎立太子，早一天让太子做皇帝。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功，太子当了皇帝要报复，也要看这点情面。韦执谊斥责了老丈人，说你怎么说这种话？结果宪宗上台就开始报复，报复非常之惨。刘禹锡和柳宗元也不妥协，两人掌握权力之后，史书称他们“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当然，如果妥协，一时看起来进步不是那么大，但是要保持改革的力量，从长计议最要紧。

北宋欧阳修也是太急，毫不妥协，孤军深入，硬干到底，写《朋党论》迎面挑战支持改革的宋仁宗。结果是形势急转直下。

雷颐：妥协主导面是权势者。因为在传统中国历史上，相对于强势政府和庞大的守旧势力，改革者往往是弱势。

比如清代立宪改革，立宪派主要是各地商会的力量。商会理所当然希望社会能够稳定，所以他们提出的要求，与当时革命派相比，应当说是比较妥协的，还保留朝廷的位置，保留皇帝的位置嘛。但是朝廷不妥协，连温和的要求也不接受。这是与英国不同的地方。再比如，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开始他只是提出来对行政机构做一些改革。因为当时建立了总理衙门等新的机构，传统的鸿胪寺等都没有用了。没用的机构还养了大批官员，使得财政很紧张，但统治者还是不妥协。

这怎么办呢？最后必然走到暴力的路上去。传统的朝廷迷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那么，你对我使用暴力，我也谋划暴力。秦朝的时候，张良只有一个人，也策划暴力，弄一个大铁锥，远远地朝秦始皇的车队扔过去。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马立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成功，贯穿了妥协精神。用柏杨的话说，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赵武灵王下个死命令不就成了？他不是这样，而是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主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做了这些工作，才把换衣服的

事情推展开。

换衣服还这么难，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清末统治者的眼光有毛病，对于利益的计算太短视了，付出的代价我们都看到了。从妥协的角度讲，中国的改革，势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渐推进，在各方主动妥协或是不得不妥协的情势下慢慢推进，积土成山。

不能坐失改革时机

雷颐：讨论中国历史上改革，还有一个时机把握问题。读读晚清史，就会了解到，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利益的纠葛，清廷一再延误改革时机，结果被推翻了。清廷的命运，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关系很大，值得说一说。晚清的社会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们今天读史看得很清楚。可是当局者迷，还在那儿感觉不错，这么混下去没问题，一百个不愿意改。戊戌维新提出来的要求是很温和的，可是掌握大权的人一点变动都接受不了。拒绝改革，对维新派采用那么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是清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廷把国事和家事搅到一起。国家发展大纲和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母子关系、母子争端搅在一起，这是利益纠葛。家族利益之争比维新更重要。这些利益之争，也是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采取仇视态度的原因之一，结果是利益之争耽误大局，失去了改革的时机。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搞改革必须有两点，一是要有足够的权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没有办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权威不够，就得有足够的补偿，我剥夺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给你补偿。当这两点都没有的时候，就麻烦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这两点都没有。从这里看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应该是改革的好时机。

马立诚：北宋也是延误改革时机。范仲淹搞改革要裁撤冗官，宋朝冗官之多，高于历代。结果那些人都跑到宋仁宗那里去哭，说范仲淹派出的三人考察干部小组是三只可怕的老虎。仁宗耳朵根子太软，犹豫来犹豫去，他对范仲淹讲，你不要搞三虎了。范仲淹的确有点急，但宋仁宗头脑也不清楚，结果是北宋丧失了改革的好时机，积贫积弱下去。

再说清末，义和团失败之后，慈禧逃亡，一点面子也没有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想政治改革了，提出9年立宪。有一种说法，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断送了中国的立宪进程，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雷颐：不是这样，实际是清王朝自己一再延误时机，断送了立宪的前途。关于9年时间是长还是短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评判，要按照当时形势来判断时机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当时形势实际上是很急迫

的，清廷对此估计不对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的5月份出台的内阁，还是皇族内阁，这时候已经是火烧到眉毛了，清廷还在那里短视，他们的措施违反最基本的立宪原则——皇族成员不能充任内阁成员。这下子，连立宪派都失望了。其实，清廷开始说准备立宪的时候，全国欢欣鼓舞，张灯结彩，这说明民众对清廷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理解。但是清廷没有重视民意，觉得民意算什么？看不到民意民心的力量。结果是，应该在上一阶段做的事，总是拖到下一阶段才被迫做。可是，要命之处在于，当你在下个阶段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的时候，实际形势却要求你做得更大更多，他又不愿意。总是慢一拍，从不主动，总是在巨大事件发生之后，实在不行了才做。这样，就延误了改革时机。你刚才也说，恐怕不止清朝这样，其他朝代也发生过把握改革时机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史写作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很小吗？深入分析，就会有大的收获。

要看到纸面背后

雷颐：写改革史和其他历史，都应该透过纸面，看到纸面背后的东西，不能仅仅根据纸面上的资讯写文章。我看到有些学者只凭借文本写文章，不下功夫研究文本之后的实际历史是怎样的情况，这种风气很可怕，也很可悲。

比如，1958年的报刊，曾经发表过很多文章介绍各地粮食亩产节节升高的情况，有很多具体数字。当时还有不少文章说农民要求建立人民公社的情绪非常高涨，十分迫切，各地人民公社普遍兴办了托儿所、公共食堂、幸福院等，一些地方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等等。20世纪60年代初，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人民生活十分幸福。“文革”当中的报刊，也说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人民生活大为改善。

有些学者就以这些文本的资讯为依据写文章，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不容抹杀，20世纪80年代解散人民公社的决定错了。我觉得这样搞不行，研究历史一定要了解真实情况。

马立诚：中国历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是挨骂的，史书纸面上的不实之词很多，这就要辨析材料，多方研究，寻找历史的真相。

子产支持舆论监督

英雄出少年

《诗经》用了极恐怖的8个字形容春秋时期（前722～前481）的翻天覆地：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原先高高在上的忽然跌落到谷底，原先在谷底的忽然升到峰巅。形势反复无常，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哪一天完蛋。

这个时期，齐、晋、楚、秦、吴、越六个大国互相争锋，攻城略地，此消彼长。最难过的就是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了，怕得罪这个大国，又怕得罪那个大国，成天惴惴不安。小国之间也是攻伐不断，彼此侵夺，是一幅活生生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图景。

不幸的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子产就出生在一个小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郑国。郑国一直是晋国和楚国拉锯争夺的对象。

公元前565年，郑国的司马（军队统帅）子国，率领军队进犯楚国的附庸小国蔡国，获得大胜，把蔡国军队的主帅也俘虏了。

郑国人非常高兴，张灯结彩，大肆庆祝。子国更是居功自傲，手舞足蹈。这时，有一个人提醒子国：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这个提醒者，就是子国的儿子，年仅十七八岁的子产（名公孙侨，字子产。约前583～前522）。

子产对他父亲说：“我们郑国是个小国，国家的内政一团乱麻，没有搞好，却热衷于讨伐别的国家，抢立战功，恐怕要带来灾祸。如果楚国人为蔡国报仇打我们，我们能够不顺从楚国吗？假如我们顺从了楚国，晋国肯定不高兴，也会发兵来打我们。如果楚国、晋国交替发兵来打我们，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一席话，把热昏了头的子国噎在那里。可是，堂堂军队统帅哪能在孩子面前丢了面子？子国说不出理，只得摆架子训斥：“国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执政长官）子驷先生做主，哪能听你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说，要砍头的！”

子驷当然和子国是一头的，但他们的好梦不长。

第二年，即公元前564年，楚国、晋国及其他诸侯小国都找理由攻打郑国。郑国只得分别向两大国讨饶求和，吃了不少亏。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由于子驷在分配土地、战车等国家资源时有偏

向，得罪了国内五个大族，国内政治力量分裂了。结果五大族的头头在公元前563年铤而走险，纠集起来发动叛乱，冲入朝廷，杀死了子驷和子国等大臣，只有担任司寇（司法部长）的子孔事先听到风声逃走，郑国陷入巨大的政治危机。

郑国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产言中了。

子驷的儿子子西听到噩耗，带着少数人冒冒失失地闯出家门，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追赶叛军。叛军已然挟持着郑国国君跑到北宫死守。子西见状，又折回家中调兵。但是，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家中的臣属、武士和奴婢见势不妙，已经逃走大半，兵也调不成了，子西无奈，只得叹息。

子产却临危不乱。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门，再聚齐了家臣属吏和武士，指挥他们封闭府库，布置防守，然后率领17辆战车列队出发，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攻打叛军。别的贵族这时也闻风出动，前来支援，很快就把叛军全部消灭。

从此之后，郑国官员对子产都另眼相看了。

这之后，子产又历经几番大难，终于在公元前543年上台执政，这时他40岁左右。

铸刑鼎

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罪犯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举措。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隐蔽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愚昧，他对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在这个基础上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将其公之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的反对。

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子产顶着晋国压力，给叔向回了一封信说：“我为的是救世啊！”他表示要坚定不移地公布法律。结果呢？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再说，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国家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

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的气势减弱了，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20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

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追求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承受巨大压力。

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高度肯定子产“铸刑鼎”，批评了叔向和孔子，他说：“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为法治。”

在现代社会，大众见惯了公布的法令，殊不知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

郑国换了天地

子产知道，因循守旧的郑国，如果不经一番革新，万难应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产不回避争议，不压制争议，也不怕争议。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比如他改革军赋制度，增加税收，充实军饷，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就遭到一些人的咒骂。

有人说："子产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子尾巴了！"

子产还主持全国农业普查，整顿三农。他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归还所有者。在这个过程中，子产承认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以增加国防开支。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若干家为一个互助单位合作生产，并共用一口井等等。这些措施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烦。

一时间，全国广为流传一个凶险的段子：

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划界，取了我的衣冠给藏起来，谁能够杀了子产？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了这个地步，子产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我下决心不改变了！"

子产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宁肯撒手，也不迷恋高位。有一回，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子产不批准。丰卷大怒，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子产得知，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马上辞职，并声明要离开郑国，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过排挤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表态支持子产，驱逐丰卷，子产才复职。复职之后，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过了3年召丰卷回国，又把田产还给丰卷，连这3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子产并没有因为丰卷企图造反而没收他的田产。这是子产的宽容，也是他得到郑国人心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过综合改革，过了3年，郑国人又唱道：

我有子弟，子产给他们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想办法让地里丰收。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德政呢？

郑国处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不得不讲究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不

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善于措辞；裨谌最富谋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最善决策；游吉一表人才，举止温文善于交际。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然后和裨谌一起在郊外找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仔细筹划；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最后委托游吉执行。

子产代表郑国参加国际会议，言辞慎重得体，既维护了郑国利益，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孔子曾称赞子产的外交，说子产的言论传播远近，无人不晓，这是因为子产经过充分的准备。

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20多年（前543～前522），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产也是命蹇时乖的中国改革家中少有的幸运者，他虽然也经历几番磨难，但直到公元前522年去世之时，还掌握大权，并在临终之际将改革大任委托给他的继任者，隆重有如国家遗训。

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孔子含泪叹道：“子产啊，你是古之遗爱也！”

子产不毁乡校颂

如果说，以上强国富民的改革措施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的话，那么，作为改革家的子产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贡献，就是他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在野蛮残暴的春秋时期，仅此一例，千古流芳。

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就像北京“的哥”开出租车喜欢和乘客议论国家大事一样。北京“的哥”是在小车里议论，范围很小。郑国很多人聚在学校里议论，影响就大了。他们议论什么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以论执政”，就是议论国家大事。当然，有赞扬，也有批评。

在春秋时期的国情下，子产此举引来的争议可想而知。《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把乡校封闭或是毁掉，怎么样？

然明知道，子产曾说过，只有德高望重的圣人执政，才能靠宽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则应实行猛政。因为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而水性柔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会因此淹死。然明觉得子产既然要实行猛政，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当然不会客气。

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料。子产说：“为什么？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做药来吃吧。”

然明非常佩服，他说：“我现在才认识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这样的小人实在没出息。要是照您的办法实行下去，郑国就有希望了！”

既实行猛政，又容纳人们的反对，这看似对立的宽严两面，在子产那里得到了统一。子产在春秋时期首创了多元局面。

这件事，孔子倒非常赞成。比子产小30岁左右的孔子在鲁国听说子产不毁乡校，极力称赞说：“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会相信的！”孔子这样称赞子产，说明儒家有赞成舆论监督的一面。孔

子虽然轻视法律，可他是主张仁爱百姓的，因此赞成让老百姓说话。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上，面对诸多君主闭目塞听的弊政，子产不毁乡校成了人们往复谈论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韩愈狂妄自大，很少说人家好话。比如他的朋友刘禹锡、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韩愈就出言不逊，咒骂刘、柳是“小人”，刻薄之极。可韩愈在《左传》中读了子产的事迹，心向往之，特地写了一篇名文《子产不毁乡校颂》。

大概韩愈被感动得可以，这位以卫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笔竟如梁启超一般情溢笔端：

我好思念子产啊！要知道，舆论是很难用势力彻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听不到批评，就很难检点自己的过失，这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

想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驱逐出去了。

可惜呀子产，生不逢时，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那该多好！像子产这样贤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谁能够继承并且光大子产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2006年末，笔者参加一个舆论监督座谈会。会上，一位大学教授发言说，他的苦恼是，舆论监督这个东西是舶来品，缺乏本土资源。面对我们的传统，提倡舆论监督，似乎不怎么理直气壮，缺乏说服力。

谁说舆论监督只是西方的产物呢？子产的政绩，孔子的支持，韩愈的赞颂，充分说明舆论监督有着悠久的本土资源，这也是我们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

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产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辉煌政绩。仅此一端，就值得写一篇大文章。

在子产大刀阔斧改革之际，古希腊雅典的著名改革家梭伦稍后也登上改革舞台，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改革的竞赛。

贵族出身的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雅典执政官，随即着手改革。

当时雅典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债务奴隶。农民破产，要把土地拿去给贵族做抵押。如果过一段时间仍旧还不了债，不但会彻底失去土地，而且自身和子女也都会沦为奴隶，被送到市场上卖到国外，这就是债务奴隶，从而造成雅典社会关系极其紧张。

梭伦上台，颁布“解负令”，下令禁止一切“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

并下令赦免穷人的所有“公私债务”。被卖到国外的奴隶，由国家负责赎回。梭伦还下令废除贵族的世袭当官特权，担任官员的资格改为以现有的财产数目为依据，并根据现有财产状况把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承担不同义务。这样，就使非贵族出身的商人和平民有了仕途机会。恩格斯曾评价说，这就在制度中引入了一个全新因素——私有财产。梭伦还规定雅典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创设400人会议。四个等级之中，除最低等级之外，其他三个等级的公民都有当选资格。梭伦的改革意义极为深远，可以说是奠定了雅典式民主政体的基础。

在这场竞赛中，子产改革和梭伦改革，堪称双璧。可惜的是，子产的改革方向，后来没有被继续开拓下去。

商鞅大变魔术记

把绸子抖开

柏杨说，秦国商鞅的变法，是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魔术。

此话有理。这一场变法可谓惊天动地，中国历史上只此一回。

商鞅的主张太吓人了，他无比激进。激进到什么程度呢？在他那里，“从容易改的地方着手”等等，全是废话。他绝对没有“增量改革”的计划，丝毫没有考虑过“渐进”这个字眼，也不需要论证什么“社会承受力”。商鞅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家庭生活等所有领域全盘出击，一个也不落下，齐头并进，锐意突破，争取在最短时间内，通过上述所有方面，把秦国全盘改变，彻底改变，变出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秦国。

如果有谁出来阻挡，对不起，大刑伺候！你跳出来说不好，当然没好果子吃。你如果称赞他的改革，也不行。《史记·商君列传》说，改革进行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有一帮人聚集起来前往京师献辞说好。结果，这些唱赞歌的人全家都被发配到边远地区。

为什么呢？商鞅说：“唱赞歌也是捣乱！”他要你彻底闭嘴，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说全盘改变，就马上全盘改变，一个字也不许议论，说好说坏都不行。全国所有臣民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哑巴一般地沉默执行，而且要全盘彻底。

我们中国人如今也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见过很多世面，可是你能想象商鞅这样的改革吗？你吃得消这样的改革吗？

话说也怪，商鞅历时19年的改革，竟然成功了。怪不得范文澜说，秦国旧势力比较小，所以商鞅变法成功，这与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变法时遇到极大阻碍很不一样。吕思勉则说，“秦国开化较晚，所以风气朴实”，民众比较听话。

不管怎么说，魔术师上台的时候，用一幅宽大的绸子遮住旧的秦国。旧秦国是什么样呢？地处偏远，默默无闻，落后而贫穷，再加上长期内斗，“兵弱而主卑”，就如一个侏儒，不时受到强邻魏国和楚国的欺负，谁都不把它放在眼里。中原各大国谈到秦国的时候，竟称之为“夷狄”，这是蛮荒不开化的同义语，秦国人怎能忍受？

19年之后，那幅绸子一抖开，你可要揉揉自己的眼睛了——侏儒变成了巨人！一个崭新的秦国，军事实力强大的秦国，出现在战国舞台上。19年，在历史上算起来，可称为一瞬。你说是不是魔术？在这个意

义上，称商鞅为魔术师不为过。

董事长秦孝公

魔术表演常常有两个人，一个是主角，另一个是配角。这次秦国变法的魔术，也有两个人，一个是商鞅，另一个是秦孝公。商鞅名气太大，时常把秦孝公遮挡住了。我们这篇文章的题目为突出重点，也只标出了商鞅的名字。实事求是地说，商鞅固然功劳甚巨，但实际的主角是秦孝公。他是董事长，商鞅是CEO。所有的事情，最后都由秦孝公拍板；所有的压力，都经不同渠道传递到秦孝公那里，一切后果也都由秦孝公承担着。

秦孝公不是一般的君主。他父亲秦献公就有志于振兴秦国，可惜壮志未酬。公元前362年，孝公继位，遭人白眼，大受刺激。他立下宏图，不管遇到多大阻力，遭到什么风险，也要实现霸业。

继位一年，孝公向全国发出征求人才的布告，用词极其沉痛："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然后说，不管是谁，"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其恳切的承诺，甚至超过了今天延揽诺贝尔奖得主来本国发展科技开列的条件。

出生于卫国，后来在魏国干点小差事的商鞅（约前390～前338），闻声而至。此前，商鞅觉得自己怀抱绝世之学（刑名之学），却一直不得志，所以投奔秦国碰碰运气。他原名公孙鞅、卫鞅，后来由于在秦国立功，被封为商君，人们又称他为商鞅。

商鞅来到秦国之后，与孝公几经磨合，终于得到充分信任，君臣一心，准备变法。

改革研讨会

魔术上演之前，孝公想试试水。由他亲自主持，在高管层挑了几个人，小范围地召开了几次改革研讨会，结果遭遇强烈反对。

孝公说："我想变法，可能会有许多人反对，你们看怎么样？"

商鞅说："旧制度已经证明不能富国强兵，应该废止。高出常人的举动，本来就会遭到世人反对。事情已经发生了，愚昧的人还看不明白，而智慧的人在事情还没萌芽时就观察到了。因此，不能和民众讨论事情的开端，只能和他们享受成功的结果。成大功的人决不能老和民众商量来商量去。"

一切时代、一切民族和国家在改革时必然遇到阻力和咒骂，孝公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甘龙就是贵族保守主义的代表，他说："官员和老百姓对于传统很熟悉，如果硬要改变这一切，就要大乱，恐怕天下人都要反对。"

商鞅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代代不同，却都创立了王业。春秋时期的五霸也各有各的法度，却都能称霸。有头脑的人应该创新，只要有利于国家就可以，不必法古。"

另一位保守主义代表、大臣杜挚说："我听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换器具。我看不出我们的制度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为什么要大动干戈，自找动乱呢？遵守先王法统，慢慢来没有错，君主请三思！"

商鞅说："先王法统？是哪个先王的法统？商汤、周武兴起，正因为他们不拘守古法，而殷纣、夏桀的灭亡，正因为他们不改革旧例。君主不要再犹豫了！"

几个回合下来，孝公下了最后的决心。这位好学的君主说话还颇有点哲理："我听说，穷僻的胡同里，遇到事多觉得奇怪；头脑僵化的学者，对变化常常看不惯。愚昧的人喜欢的事情，聪明的人觉得悲哀。情绪化的主张，贤明的人觉得伤痛。你们所说的那些拘守古法的话，我听不下去了。"

不管甘龙、杜挚他们的脸色如何难看，孝公要变法了。他封商鞅为左庶长（中级官员），直接对孝公负责，草拟变法方案。

要大炮还是要黄油

若要揭开两位魔术师在绸子后面的倒腾手法，你可能会全身冒冷汗，好在这已经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了。

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变法分成两步推进，其内容优劣互见，不过，方向所指倒是十分集中，就是“农、战”两个字，实质是一个“战”字，就是一切为了战，为了最后的霸业。要大炮还是要黄油？商鞅要的是大炮。下面把变法措施总括起来披露一下。

政治与军事方面：

一、实行残酷的连坐制。一人有罪，父母妻子连坐（连带受罚）。5家互保，10家相连。5家连在一起称为“伍”，10家连在一起称为“什”。一人有罪，伍什连坐。在伍什之内，大家每天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如果发现“奸人”而不告发，判处腰斩重刑。告发者与斩首敌人一样重赏。隐藏“奸人”的，与投降敌人同罪。

二、组建地方政府系统。把小的村落、乡邑聚集起来，设立县。全国共设41个县（一说31个县），县直属中央。每县设置县令，全面负责。这是秦国实行郡县制的开端，创造了崭新的政治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三、废除以前的贵族、官员级别，重新制定二十级爵位。第一至第八级为民爵，比如一级叫“公士”、二级叫“上造”等。第九级以上为官爵，第九级叫“五大夫”，第十九级叫“关内侯”，第二十级叫“彻侯”等。

四、对敌作战杀死敌人是第一等功劳。在战场上斩敌人脑袋一颗，授爵一级，可担任50石的小官（1石等于10斗米）。斩首两个，授爵二级，可担任百石之官。立了战功，还赏赐田地。

五、用最大的力量奖励战功。凡是没有立过战功的贵族，一概废除名位，废除级别，不能做官。按照战功确定级别，然后根据新的级别，规定应享有的土地、住宅、奴婢数量。范文澜说，这一条激起了贵族领主的反抗，但它是变法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许多靠世袭、资历、行贿等途径成为贵族的人失去了特权，变成民间富户。有军功的贵族宗室，最高待遇就是封侯，封侯之后只是收取食邑内的租税，不管理民事。领主制度的秦国从此变成地主制度的秦国。

经济方面：

一、推崇农耕，打击商业和知识分子。一个家庭生产的粮食和布帛

超过一般产量，可免除徭役。另外，商鞅认为商人是“游民”，助长奢侈。民间凡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全家一并逮捕，收到官府里做奴隶。凡是无业、懒惰而贫穷的，也收入官府做奴隶，或押送边疆垦荒，这是强迫每一个国民都要有职业，主要是务农。各国“文学游说之士”，也归入“末流”、“游民”一类，不许入秦。商鞅这些措施，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产生了重大影响。

众所周知，与商鞅同时的古希腊罗马，虽然农业也是经济的重要成分，战争亦很频繁，但工商业得到很大发展。政府对此采取鼓励态度，民间的制造业、金融业、内外贸易、航运业欣欣向荣，颇具规模，这是早期中国与西方的一个巨大区别。

二、开疆垦田。把原来田里用土堆成的疆界和供战车奔驰的道路，都破开（战国已开始放弃兵车，大量用骑兵），辟成农田。当时还推行授田制，国家授给农民田地，鼓励耕种。同时，也号召民众到荒野上开辟新的农田，承认个人新辟土地的所有权，允许土地私人买卖。秦国地广人稀，商鞅挖邻国的墙脚，对山西、河南、河北的人说：“到我们秦国来吧，你们开荒的土地，三年不收税。”

三、统一度量衡。划一并制作标准的斗、桶、丈、尺等等，以利于全国交易。

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以及家庭生活方面：

一、私人之间的争执，必须诉诸法庭裁判，严禁私人殴斗。私人殴斗，不论有理无理，一律严厉处罚。当时秦国私人决斗很普遍。

二、改变秦国落后风俗，强迫民众学习最低限度的礼仪。父子兄弟姐妹，不准同睡一个炕。过去，因冬天严寒，一家男女老幼都睡在一个火炕上取暖。

三、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强迫分家，否则重罚。这是为了增加生产和税收。

四、按照等级尊卑，规定穿不同的衣服。

五、焚烧儒家的《诗经》、《尚书》等经典，禁止战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游说活动，以彰明法令，树立法令的绝对权威。后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已经由商鞅开了头。

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当时秦国还处在半野蛮状态，落后、穷困、一片混乱；也可以看出变法是要全盘地改，彻底地改。明眼人不难感觉到，这样的变法难度太大了。

聪明的商鞅何尝不知？他知道，即使把法令颁布出来，人们也会疑惑：这么多严厉的举措，贯彻得了吗？他心生一计。改革正式开始之前，商鞅先在陕西临潼的南门立起一根木棍，下令说：“能够把木棍拿到北门的人，赏10斤黄金。”这么简单的事情，赏金这么重？当大家惊疑不定、议论纷纷的时候，商鞅又把赏金骤然提高到50斤，简直是开玩笑！远远近近都轰动起来了。

一个争强而又好奇的青年在众人怂恿下，不管那许多，把那根木棍移到北门去了。结果，这个青年竟然立即如数得到赏金。人群惊叹不已，商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是第一步，商鞅要通过这件事让民众信任他。等到人们都相信他令出必行之后，就开始颁布改革方案。

镇压反对派

当然，要让全国所有的人一起变成哑巴，毫无声息地贯彻改革措施，这是不可能的。

反对派给商鞅出了一个十分为难的题目，那就是唆使孝公的儿子、11岁的太子驷窝藏罪徒，触犯法律。如果惩处太子，孝公这一关不好过还不说，太子将来继位，肯定不会放过商鞅。如果装聋作哑，新法的权威就被减弱。

商鞅的处理算是很机智了。他对孝公说，太子年幼，又是王位继承人，不便施法。可是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对此负有重要责任。君主把教导太子的重任交给他们，这不是玩忽职守吗？

孝公下了台阶，同意处理公子虔（太子的生活老师）和公孙贾（太子的学问老师）。商鞅判决，在公孙贾脸上刺字（在脸上刺上难看的花纹，涂上洗不掉的黑色，为终身极大耻辱），割掉公子虔的鼻子。商鞅还训斥太子，烧掉了太子所藏的儒家著作，此事为商鞅留下了后患。

这件事传遍全国，引起极大轰动，那些反对变法的贵族，气焰顿时受挫。商鞅又逮捕了触犯法律的贵族祝欢，以及其他700多个反对变法的贵族，全部在渭水边上斩首。

威猛新秦

魔术发生效力，秦国大炮日渐威猛。孝公提拔商鞅当了大良造（总理兼军队最高指挥官），两位魔术师的地位日渐接近。

商鞅掌握大权之后，一直寻找机会攻打东邻魏国，为秦国报仇。先前，魏国实力强过秦国，夺取了原属秦国的黄河以西地区，压迫秦国。再说，商鞅来秦之前，在魏国一直屈居人下，长期不受重视。魏国相国（总理）公叔痤临死前，曾郑重其事地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魏惠王只是一笑了之，根本看不起商鞅，商鞅为此也衔恨魏国。

公元前354年，秦国军队夺取了魏国的少梁（陕西韩城）。公元前352年，商鞅又率领军队包围魏国旧都安邑（山西夏县），迫使魏国守军投降。此为锋芒初试，表明秦魏力量对比开始逆转。

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军队大举讨伐魏国，这一次是真正的争雄。一年前，魏国与齐国大战。齐国以孙膑为军师，田忌为大将，杀了魏国大将庞涓，取得胜利。商鞅向孝公建议说，魏国惨败，人心不稳，力量疲弱，应该趁机进攻魏国，孝公极力支持。

魏国派出公子昂迎击秦军。公子昂是商鞅在魏国时的熟人，商鞅给公子昂写信说："我们是老朋友，阵前相遇，实在令人为难。不如我邀请你到我这里来相会，饮酒结盟，让两国永远和好算了。"傻乎乎的公子昂信以为真，前往秦营拜会商鞅，当然他也不想打这个仗，梦想和为贵。结果，当即被商鞅拿下。秦军立即出击，大破魏军。魏国被迫把河西大部分土地割让给秦国，为了躲避秦国锋芒，把国都也迁到了远离秦国的大梁（开封）。这一仗，向各国显示了一个经变法之后日益强大的新的秦国。从此，魏国完全拜了下风，直到被秦国消灭。

孝公雪洗了祖上大耻，无比高兴，亲自出来迎接商鞅，并把商、于（陕西商县到河南内乡县之间）地区15个邑封给商鞅，赐给他一个称号叫商君，商鞅的级别也成为二十级中最高的彻侯。

改革付出生命代价

魔术演到尾声，主角孝公的身体病危了。

公元前338年，秦国上层都能预感到形势即将发生变化。此际，一个颇有点背景的人突然拜访商鞅，他叫赵良。

赵良对商鞅说："你这么多年蛮干，用严刑峻法处罚贵族，杀人如麻，积怨太多。你每次出门，彪形大汉在车上护卫，全副武装的人跟在车旁奔跑，没有这些安保措施，你绝对不敢出门。为什么？不就是怕人报复吗？现在国君身体堪忧，我建议你利用这最后的机会，主动辞职，把封地还给国家，劝国君重新起用那些被压制的贵族，然后找个人烟稀少的地方，隐姓埋名，种地过日子。这样的话，某些大人物也许能够让你活下去。否则，国君一旦去世，想想后果吧，想要你命的人还会少吗？"

商鞅觉察到了赵良背后的势力。但是，即使按照赵良的建议去做，公子驷这些人就能善罢甘休吗？再说，自己毕竟让秦国强大起来了，新的国君恐怕也得顾及这一点吧。倔强的商鞅回答道："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后悔。当初秦国多么落后，父子男女同室而居，是谁改变了这些陋习，是我。再说前些年，我指挥迁都咸阳，扩大了旧城，建成了比鲁国宫殿还要宏伟的宫殿，这些你都没看到吗？"

这一年，孝公因病去世。

公子驷继位当了国君，是为秦惠文王。蛰居多年的公子虔、公孙贾等人立即活跃起来，指控商鞅图谋造反。商鞅跑到魏国边界，被魏国拒绝入境，他又跑回自己的封地，仓促组织了一支小军队抵抗前来捉拿他的秦军，结果兵败被捕。秦惠文王判处商鞅车裂大刑，用几辆马车拽住手脚向不同方向奔驰，把他的身子拉裂成几大块。商鞅的家人也都被杀死。

魔术表演虽然落幕，但19年变法已经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制度基础，而且这些措施也收到了奇效。所以，秦惠文王杀商鞅报了私仇之后，从国家利益考虑，还是沿着惯性往前走。"商鞅死，秦法未败也。"除了后来秦庄襄王用商人吕不韦为相，停止排斥商人和游说之士的法令以外，其余也都相沿不变。这就最终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商鞅的“法西斯”行径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提到商鞅的魔术，都是全盘肯定，赞誉有加。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峰。“文革”后期，为了配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的政治需要，把商鞅抬到吓人的高度，甚至于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今天纪念商鞅，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商鞅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成就已如上述。但是，如果只用单一色调涂抹他，则有碍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毋庸讳言，商鞅的措施当中，也有一些很不足取。

古人与今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对于愉悦和痛苦的感觉有相通之处。商鞅实行“法西斯”连坐制，试问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中？

商鞅彻底压制任何不同意见，要全国人都变成哑巴。为了不让人说话，甚至将赞扬改革的人也发配到边远之地，岂不是一种病态？司马迁批评商鞅这种政治风格是“刻薄、少恩”。联想起早于他200年的郑国子产“不毁乡校”，支持舆论监督的改革，不禁令人感叹。商鞅的病态作为，对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四人帮”神化商鞅，就是例证。

商鞅主张愚民，不许老百姓听音乐，也不许自由迁徙。他说，假如人民愚昧，不追求知识，就会一心一意种地。商鞅烧诗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自由黄金时代开始沉没的先兆。后来发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国人思想空间几乎丧失。从长远效果来看，这是中国长期停滞不前，创造力贫弱，现代化进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商鞅变法中的税赋改革，主要是把按田亩征税改为按人口征税，并加重徭役和兵役负担。《商君书·垦令》说：“收取人口税，加重他们的徭役，那么懒惰的人就没办法了，必须尽力开荒种田。”

关于当时秦国人生活的状况，一直存在着不同说法。《中国秦汉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于商鞅改革之后秦国的赋税有一个计算，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当时实物剥削量（商鞅时期秦国还未使用钱）占农民总收入2/3，劳役至少占农民劳动时间的1/7，全部剥削量约占农民总劳动量的4/5。所以当时国家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但农民日子并不好过，不像“四人帮”在“评法批儒”中所宣传的那样，人民“发家致富”了。商鞅的目标，是为了实现霸业而建造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一点，他做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没多久就覆亡了，为什么？根本原因是人民承受不了秦朝统治集团残酷的压迫。

赵武灵王改穿“西服”

四面楚歌

《东周列国志》这样描写赵武灵王赵雍：

身长八尺四寸，龙颜鸟喙，广鬓虬髯，面黑有光，胸开三尺，气雄万夫，志吞四海。

《东周列国志》是小说而不是信史。再说赵武灵王并没有留下写真集，他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有待考证。

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知道，诸多古典小说描写武士，大都套用这些词汇。古人写文章的缺点之一，是不顾及细节，只图省事，《东周列国志》中赵雍的外貌便是个例子。

不过，龙颜其实并不好看。按柏杨的说法，“跟虾米差不多”。鸟喙呢，大概是嘴部向前突出。晚上见到这样一个人，你也许吓得半死。这副尊容，也未必是小说作者愿意见到的。

首府设在邯郸的赵国，是公元前403年从春秋时期的晋国分出来的一个国家。同时从晋国分出来的还有魏、韩两国。赵、魏、韩原是晋国的三家贵族。三家坐大了，根本不把晋国国君放在眼里，斗来斗去，晋国的国君竟然要去朝拜三家贵族。

到公元前403年，奄奄一息的大家长——东周周威烈王发挥最后一点作用和余热，在接受三家大笔贿赂之后，干脆封三家贵族的族长为国君，于是三个新国出现了，晋国淡出历史。

史学界多数意见认为，从“三家分晋”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就进入了战国时代，直至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为止。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就从公元前403年写起。

赵雍于公元前326年登基，是赵国第六任国君。

赵雍闲不住，身体也棒，喜欢深入基层调研，体验风俗民情。好在赵国并不太大，大体上是今天河北中南部到山西东部，以及山东西部这一片地方。按地盘来说，赵雍的管辖权限，相当于今日的省委书记。赵雍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跑了一圈，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原来70多年前赵国建国之初，是三国中最强大的，魏、韩都差一点。后来南面的魏国重用李悝、吴起，实行变法，逐渐强大，实力超过了赵国，并多次攻赵。赵国西南是摩擦不断的韩国，西边是虎视眈眈的强秦，东边则是强邻齐国。齐国经常攻打赵国，还怂恿小国中山国从东

面骚扰赵国。赵国北面是时战时和的燕国，西北则是林胡、楼烦等胡人部落。胡人部落是游牧民族，不时袭击赵国，掠夺民众、粮食、牲口和土地。

当时人称赵国是“四战之国”，意思是环绕赵国的都是战争。

赵雍望着国家残缺的边境，想起前几代赵国君主耽误的时间，心情越来越沉重，实在不敢再往下想了。

“西服”的优势

从“战国”这个称谓不难猜出，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国之间关系的主旋律就是战争。天天战，月月战，年年战。正如唐代诗人王维所作《夷门歌》：

七雄雄雌犹未分，

攻城杀将何纷纷。

秦兵益围邯郸急，

魏王不救平原君。

翻开战国的古史记载，每一页都是兵戈相向、攻城略地，每一页都是血肉横飞、肝脑涂地。

这就是赵国面临的最大压力。比如中山国的国土从东面深深插进赵国国土，几乎将赵国裂为两块。这个小国丝毫不把赵国放在眼里，经常袭击赵国，使赵国如鲠在喉。赵国如果想在诸侯中确立大国地位，首先要平定中山。

公元前307年，赵雍正是怀着这个雄心，亲率大军进攻中山。出乎赵雍意料的是，赵国的兵车和步兵很快被中山军队击败。赵国不但损兵折将，连边境一些重镇也被中山占领。赵雍垂头丧气，连小小的中山都对付不了，遑论其他？

谈起战争中各国战略以及兵器的优劣，赵国诸大臣滔滔不绝者比比皆是。但是，赵雍偏偏把目光牢牢盯住了与赵国交战并不多的西胡——地处赵国西北的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很令大臣不解。林胡、楼烦等部落，没有和赵国打过大仗，属于“打一把就跑”的鼠窃狗偷之辈，因此很为赵国大臣看不起。

其实这正是赵雍的过人之处。

赵雍看中了胡人什么呢？胡人和赵国军队作战，都是骑在马上。胡人身穿短衣长裤，总之是一身短打扮，动作灵活，上马下马十分方便，开弓射箭运用自如，往来奔跑也很迅速。

赵国就不然了。赵国军队的武器比胡人精良，但绝大多数是步兵和兵车混合编制的队伍。官兵都是身穿长袍，甲靠笨重，结扎繁琐。这样的服饰很有威仪，检阅的时候耐看。但要想骑马打仗，就不便了。

当时中原各大国都是以“带甲”的步兵和兵车为主，动辄几十万，甚

至上百万，而骑兵则很少很少，最多也不过五六千骑。

战国时的兵车，既不是今天的坦克，也不是罗马帝国的两轮一马式的“驰车”，而是四个轮子，用一匹马或两匹马、一头牛或两头牛拉的方形车。车上面站着两排兵。

进攻时千车启动，黄沙滚滚，势如排山倒海。防御时则成为一个营垒。这是兵车的优势。但是，一遇到胡人的骑兵部队，毛病就暴露出来。兵车笨重，运转困难。追击时像一群乌龟，心急如火，却无论如何追不上骑兵。还没追几步，敌人早已无影无踪。退却时也像一群乌龟，只有身陷重围，被动挨打的份。还有，兵车只适宜在平坦地方作战，地形稍微复杂一点，有个沟坎什么的，就全完蛋，更不用说翻山越岭。而骑兵呢，攻势迅猛，运转自如，速进速退，动静也轻，一般的小山小河不在话下。

再说步兵。众多步卒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无须论证。以人的两条腿，要想跑过马，那是妄想。因此，说到捕捉战机，长途奔袭，速战速决，只好甘拜下风。

赵雍对此考虑了很久，颇想采纳胡人的骑射战术，进行军事改革。要想学习骑射，首先必须抛弃长袍，像胡人一样短装打扮。短装打扮不但骑射自如，就是在劳动与生活中也很方便。但是，中原各大国是看重礼仪的国家，服装乃礼仪的重要标志，能说改就改吗？

李鸿章怎样看服装改革

赵雍遇到的阻力有多大，今天的人也许难以想象。这里且先不说赵雍，只说比赵先生晚了约2000年之久的李鸿章。2000年可不短啊，想一想，跨越2000年，人们的观念应该发生多大的变化？至少对服装变化这样的事总可以接受了吧。可是，请你看看李鸿章对服装改革的态度。

1875年11月，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来到保定，拜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们两人的谈话，有一段涉及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服装改革的问题，颇为有趣。下面是这段谈话的记录：

李鸿章：对于贵国近来所举（指明治维新）很为赞赏，独对贵国改变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有礼：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到的，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适合，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对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鸿章：衣服旧制是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有礼：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1000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有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鸿章：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的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花费。

森有礼：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改穿欧服，对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是觉得费了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源。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轻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图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鸿章：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采之用于我国。

李鸿章：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有礼：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400年前（指清军入关之前的明朝），也该没有人喜欢现在（清朝马蹄袖等）这种服装。

李鸿章：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

森有礼：然而变革总是变革，特别是当贵国强迫做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和反感。

（《明治维新的再探讨》，1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这一场唇枪舌箭的论争说明了什么呢？从李鸿章谈话可以看出，当国权臣对服装改革至为反感，甚至有不共戴天之势。2000年之后的人竟然对服装变化还抱持如此僵化的态度，就可以想象赵雍当时面临的困境了。

改革预热

赵雍知道，改穿胡人的“西服”，是移风易俗、更新观念的重要事件。一下子要改变全国的生活方式和军事制度，阻力不会小。他虽然手握君主大权，也不便轻举妄动，于是先找他所信任的大臣暗中商量。第一个召见的就是楼缓。

赵雍说：“赵国四周都是危险的敌人，如果没有强大的战斗力保护自己，只有灭亡。”

楼缓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沉默着点点头。

赵雍说到主题：“怎么加强战斗力呢？咱们打仗都靠步兵或者是马拉车，但是不会骑马打仗，结果吃了不少亏。我准备干一件大事，改穿胡人的衣服，学胡人那样骑马射箭。我知道这件事将会有很多人反对，可是我不怕。历史上有高度美名的人，当时大都是受到世俗的谴责。你看如何？”

赵雍停下来，看着楼缓。

楼缓兴奋地说：“我过去听你提到过这个意思，也想了好久，觉得这个主意有道理。咱们仿照胡人的衣服，也就能学到他们打仗的本领了。我赞成！”

赵雍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召见元老重臣肥义。他对肥义说：“赵氏先祖创下的基业，我们要很好地发扬光大，不但要保卫好我们的国家，而且要开疆辟土才是。为此，我打算下令全国，一律抛弃传统衣冠，改穿胡服，加强骑马射箭的训练，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我知道，一旦这样做，就会遭到强烈反对，上上下下闹翻了。你看怎么办呢？”

肥义要比2000年之后的李鸿章更有眼光和魄力，他说：“我听说，做事迟疑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对自己的行为如果总是疑虑，也不可能成名。你既然决心要移风易俗，就别考虑那些人怎么议论了。凡是要建立大功业的人，从不拘泥于世俗。成就大功业的人，也从不跟成群结队的人磋商。愚昧的人对已经成了的事情尚且愚昧无知，聪明人在事情萌芽的时候就已经看清楚了。愚昧的人安于现实，聪明的人才能瞻望前程。你主意已定，别再犹豫了！”

赵雍高兴地大笑起来，说出了一番颇具叔本华哲学意味的话：“我不疑惑穿胡服这件事，我是有点担心天下人耻笑。唉，你说得对。痴汉子高兴的事情，聪明人替他哀伤；愚蠢人所讥笑的事情，贤明人却仔细地

审视它。世上人如果都顺从穿胡服的决定，赵国将会得福。算了！即使全国都反对我，我也这样定了。西北诸胡部落和中山的国土，我一定要得到！”

赵雍得到两个重臣的理解，心里多少有了点底。一天上朝的时候，赵雍竟穿着胡服出来。大臣们见到他短衣窄袖的打扮，一时惊呆了。

赵雍问众大臣，新的打扮怎么样。大臣们觉得这件事未免太丢脸了，没有人吭声。赵雍环望一周，他的叔叔公子成没有来，心里立刻明白了。原来公子成听说赵雍要改穿胡服，认为是奇耻大辱，干脆称病不上朝。

服装激辩

反对的情绪在德高望重的皇族前辈——赵雍的叔叔公子成身上集中表现出来了。守旧势力自然奉公子成为首，坚决抵制胡服。

赵雍先是派了侄子王绁前往公子成家里，做说服工作。

王绁拜见了公子成，对他说："大王已经穿上了胡服，多么希望您和他一起穿胡服会见群臣啊。在家里顺从父母，在朝廷顺从君主，这是古今的准则。现在，叔父大人不肯更换胡服，大王担心天下人将会议论纷纷。改穿胡服的目的，不是为了换个花样娱乐消遣，而是为了迎接艰苦的战斗，建立救国救民的不朽功业。我听说过，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是好的行为。任何一项事业，有皇亲国戚鼎力相助，就一定能够成功。大王想仰仗您的支持，来完成胡服骑射的伟大事业，恳求您改穿胡服吧！"

公子成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知道君主改穿了胡服，恰好我有病在身，不能行动，因此没有去朝拜。现在国王派了你来，我正好也有话说。我听说中国是聪明才智的人居住的地方，是万物财宝聚集的地方，是圣人推行教化的地方，是仁义道德的地方，是最讲究诗书礼乐的地方，是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方，也是远方外国最向往的地方，是蛮夷作为楷模的地方。现在大王舍弃这一切，却效法蛮夷，穿他们的衣服，习他们的战法，改变传统文化，违背固有风俗，远离中国习惯，已经激起百姓的愤怒。这是一种叛逆行为，愿大王三思。"

王绁无功而返，回报赵雍。赵雍叹道："我知道叔叔不是真病了，他害的是政治病。"于是，赵雍亲自出马，到公子成家探望，亲自做细致的说服工作。

赵雍对公子成说："穿衣服是为了保护身体和实用，讲究礼仪是为了有利于事业成功。圣人因地制宜制定礼节，是为了方便国人有利国家。南越的风俗是什么呢？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在身上和胳臂上刺上花纹，衣服大襟开在左边（传统中国服装大襟开在右边）。吴国的风俗是什么呢？把牙齿染黑，额上刺花纹，用鱼皮做帽子，用粗针粗线缝纫。各地风俗虽然不同，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做事利落。这些例子说明，背景不一样，使用工具也不一样；面对的困难不一样，制度也会有差别。"

赵雍看公子成默不作声，又接着说："这就告诉我们，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就要去做，不能僵化固执。不同区域的服装变化很多，就算是圣人也不能使他们完全统一。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不要忙着否定

它，要看看它有什么道理，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如今叔叔坚持的，是固守传统；我所追求的，是要发扬传统。我们赵国，东有黄河、漳河，虽然与齐国、中山处于同一流域，却不擅长水战。从恒山到上党，东边有燕国、东胡，西边有楼烦、秦国和韩国。这些边界地带的部队，使用的是传统武器，缺乏现代化骑射装备，怎么保卫国家？所以，我要采取两项重大措施。第一是建立水军，严密防守黄河。第二改组陆军，穿上胡人那种利于作战的紧身服装，练习骑射。这样，就可以保卫上党，平定中山。”

赵雍最后又警告道：“现在叔叔为了固守习俗，违背了赵国先祖要我们保卫和拓展国家的遗训，而且忘记了我们至今还屡屡被人侵略的耻辱，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这里介绍的只是谈话要点，实际上当时的辩论进行了整整一天。一天下来，公子成被说服了。他终于接受了赵雍的决定，第二天就穿着胡服上朝。赵雍于是下令全国改穿胡服。

但是，反对的浪潮并未完全平息。皇室贵族赵文、赵造、赵俊、赵燕等人又出来阻拦改穿胡服。这大概就是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了——传统决不可改变，否则跟你纠缠个没完。

限于篇幅，不再列举诸位的反对理由。总之，少不得赵雍又一一做工作，劝告他们说：“拿古代学说衡量今天的人，不懂得形势变化。效法古代的规则，不可能治理现代。”说到后来，赵雍实在口干舌燥，简直要昏过去了，不得不大叫一声：“传统那玩意儿，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世界，你们怎么这样不通达？”赵雍气急了，要治赵燕的罪，吓得赵燕赶快穿上胡服。

在赵雍严厉警告下，保守势力退缩了。

改穿“西服”是历史转折点

赵军改穿“西服”并加以训练之后，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公元前306年，即改穿“西服”之后第二年，赵雍就率领着新军——现代化骑射部队，向西出击。几年之内，征服了位于内蒙古中部的楼烦和更远的林胡部落，解决了长期困扰赵国的胡族侵扰问题。赵雍在北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开发了边地。接着又在北方修筑长城，派军队防守，实行民族和睦政策，巩固了北方边疆。

从公元前305年起，赵雍又向中山国开战，几年之内灭亡了中山，使赵国合为一体。10年左右，赵国国土扩张了两倍，兵强马壮，成了能够与秦国抗衡的举足轻重的强国。

梁启超曾说，商周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世为中原之患。能够有力抵御并取得胜利的，仅有赵武灵王、汉武帝等四人。梁先生甚至称赵雍是黄帝以后第一人，这个评价表明赵雍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赵雍改穿“西服”之后，胡服的优点日益被中原地区民众接受。赵雍倡导的胡服骑射对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方式影响甚巨。在此之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一般都采用马拉车。胡服骑射之后，中原的骑兵发展起来，兵车时代转型为骑兵时代，马也渐渐用于骑乘。这就加强了各地区的往来，促进了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所以，赵雍改穿“西服”，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可惜的是，赵雍的雄心壮志，因为选拔接班人出了差错，尽付东流。不但事业全付之东流，还搭上了一条性命。赵雍因为宠爱妃子吴娃，就废掉了早先已经确立的太子赵章，立吴娃所生的儿子赵何为太子，并于公元前299年传位给赵何，赵雍自己成为太上皇。这一切当然引起赵章极度不满。公元前295年，赵章发动叛乱，赵雍在离邯郸不远的沙丘宫被围饿死，赵章也在混乱中被杀。赵国人亡政息，逐渐衰落，最终在公元前228年被秦所灭。

2500年之后，在亚欧交界处的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赵雍，这就是凯末尔，他建立了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推行“胡服骑射”——淘汰传统衣冠（宣布戴土耳其帽是违法犯罪），改穿西服；淘汰古老武器，重组军队。他还废掉了学起来比较困难的阿拉伯文字，改用罗马拼音。凯末尔的改革使土耳其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时隔古今，地别东西，两位改革人物却同为国家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凯末尔的魄力大到难以想

象，而赵雍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没有被传统力量绊倒，反而挑战成功的君主。

乌托邦改革家王莽

假如有一个地方，把人和牛羊关在一个栏里，随便买卖，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你觉得如何？无疑这是非常残酷的制度。

假如一个人上台，下令不准买卖奴隶，这是不是改革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命令朝着人权方向前进了一步。

可是，下了这个命令的王莽，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

2000年来，围绕王莽所作所为，史学界分成红蓝两军，争论不休，闹得面红耳赤。古代史学家一提王莽就破口大骂，“乱臣贼子”不绝于耳。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当时上海京剧名角周信芳自编自演京剧《王莽篡位》讥刺袁世凯。把王莽作为反派代表，就是受了古代史学家正统观念的影响。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王莽是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他的改制是倒行逆施。

胡适则撰文称王莽是1900年前的一位社会主义者，应该替他申冤。柏杨也说王莽提前800年搞了社会主义。他说：“王莽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新写过。”史学家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莽呢？

贵族里的孤寒

公元前45年，古罗马恺撒大帝经过东征西杀，摆平了战场上所有对手，凯旋回到罗马。此际，他的声誉达到顶峰。罗马元老院为他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恺撒以战利品的形式，给他的士兵分配了土地和金钱。其中分配土地最引人注目。因为长期以来，罗马一些改革派领导人为了解决土地过度兼并问题，展开了反复激烈的斗争，这和王莽所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

这一年，正是中国西汉汉元帝初元四年，王莽出生。

王莽生在一个显贵的外戚家族。他的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皇后，但不受宠。王莽14岁的时候，元帝去世，王政君的儿子刘继位，是为汉成帝。王政君成为皇太后，王家立马显赫起来。成帝登基没几个月，王莽的五个叔叔就在同一天被封为侯（仅次于王的贵族爵位），此事打破历朝纪录。“五侯之家”权倾朝野，位极人臣，腐败丛生。《资治通鉴》说：“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王家子弟个个作威作福，盛气凌人。

但王莽却例外。他父亲王曼很早就去世了。孤儿寡母，没有享受到封侯待遇。王莽一家在王氏家族中被边缘化了。

一位作家曾略带浪漫地描写了王莽幼年的困境：

一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站在墙角，因为大司马（总理级）王凤家门口已被拜年的车马围了个水泄不通。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提篮子的小手已经快握不住了。篮子里是一份贺礼：一坛宛城名酒。

终于出现了一个空隙，孩子钻到守门人面前：“我叫王莽，是大司马的亲侄子。”

守门人打量打量这个孩子，不屑地说：“是吗？大司马没空见你！”

“我真是大司马的侄子！去年过年我也来送礼，那时看门的不是你。”说着举起篮子。

守门人看了看篮子，哈哈大笑：“说瞎话不带脸红，你有事以后再来吧！”

孩子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啪”地把篮子摔在地上，一转身跑了。

王门新秀

一个有志气的孩子，如果遭到歧视和压力，更能激发他拼搏上进的竞争欲望，王莽正是如此。

像所有的单亲妈妈一样，王莽的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母亲把王莽送到著名学者陈参门下学习儒家经典，她要王莽争口气，在学业上出人头地。王莽果然不负母望，小小年纪，就抑制着贪玩的冲动，勤奋钻研，在佶屈聱牙的文字迷宫中苦苦探寻，一点一滴增加理解。他对母亲至为孝顺，对同学和朋友出手慷慨，对老师十分尊重。每次去见老师，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更衣，带上礼品。路上碰到对面来的人，他也常常躬身礼让。王莽周围的人无不夸赞这个懂事的孩子。老师和同学们也一致认为，王莽是“克己复礼”的模范人物。与他那些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表兄弟们相比，王莽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备受瞩目。

成帝阳朔三年（前22），大司马王凤病重，偏瘫在床。王莽的表兄弟们不得不来探望，但往往站一站就走，弄得王凤心里发凉。王莽就不然，他代替了护士和仆人，亲自给王凤端屎端尿，还替王凤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王凤见状，大为感动和愧疚。这个平时没怎么关照的侄子竟对自己如此尽孝，即使《孝经》上古人复出，也不过如此。弥留之际，王凤郑重地把王莽托付给皇太后王政君和汉成帝。王政君和成帝也早就风闻王莽卓尔不群，于是封王莽为黄门郎（随侍皇帝左右的秘书类小官），不久升为射声校尉（相当于首都警卫部队特警支队领导人。射声，表示闻声而射则命中），此时王莽23岁。

王莽精通儒家典籍，学问渊博，对人和和气气，谦恭有礼，并且廉洁自律，处事公道。他的表兄弟则四处封官许愿，乌烟瘴气。朝廷官员提起王莽，有口皆碑。老谋深算的王政君看出王莽是王氏家族真正有出息的新一代，心中暗喜王氏有人。

成帝永始元年（前16），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是为王莽讨封。当时朝中的大名士金涉、陈汤也上书颂扬王莽。于是，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1500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随时出入皇宫，参与决策的部长级官员）。

王莽官做大了，却更加谦逊，他把封地上的贡赋都拿来资助穷困的儒生和名士，把家里的车马、衣服也都送给需要的朋友，弄得“家无所余”。同时，他通宵达旦全力投入工作，不仅效率很高，一举一动也都符合儒家标准。对王莽这些作为，朝臣交口称赞，太后和皇帝也都庆幸选

对了人，不断委以重任。此时王莽的声誉已经高过了他的叔叔们。

成帝绥和元年（前8），37岁的王莽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汉成帝末年，大司马的地位超过丞相，成为皇帝之下第一人。

史书上说，王莽担任大司马之后，克己不倦，更加节俭。他的母亲病了，达官贵人前去看望。出来接待客人的一个女子穿着粗布衣服，贵客们都以为这是王家的佣人，介绍之后才知道竟然是王莽夫人，一时引起轰动。王家的简朴作风立即传遍长安，那些穷奢极欲的贵族人家不得不收敛了一些。

仕途重挫

王莽担任大司马之际，面临两个社会焦点。

一个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贵族、官僚、豪强霸占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这个问题西汉初期就已经产生，丞相萧何就曾以极低的价钱强买关中民田，是为早期兼并。汉武帝时，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到成帝、哀帝的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更是发展到疯狂地步。汉哀帝一次就赏赐给宠臣董贤20万亩土地。

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或横死道旁，或沦为奴隶，或铤而走险。

第二个问题是残存的奴隶制过于残酷。西汉还有生产性奴隶和非生产性奴隶。奴隶命运至为悲惨。《资治通鉴》载王莽的话说：“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当时奴隶主要来自于失地农民。《汉书·成帝纪》说，失去土地的农民“饥饿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不卖身为奴，怎么办呢？《汉书·贡禹传》说，贵族之家，连狗和马都因为吃得太多，“苦其太肥”，必须“日步作之”。天天牵出去溜达，以免影响秀美。

这两大问题互相牵连，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众揭竿而起，烈火四处蔓延，王朝风雨飘摇。

当时危险的状况，从汉成帝一个诏书中可以看出端倪。在这个诏书中，汉成帝坦率承认现实极为严峻，已经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

王莽当然十分忧虑，但是他刚刚上任，还没来得及解决问题，就因成帝之死遭受挫折。

成帝绥和二年（前7）三月，45岁的成帝去世。成帝在位26年，无子，按预定方案，18岁的定陶王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

哀帝上台，大搞裙带关系，祖母家的人、母亲家的人，很多都封了大官。哀帝还把自己的祖母傅氏封为恭皇太后，与王政君并尊。在宴会时，傅太后座位与王太后座位平等摆放。王莽大怒说：傅太后出身不正，怎么能与至尊的王太后并排坐？立刻命令搬走傅太后的座位。傅太后咽不下这口气，拒绝出席宴会，结果王莽被罢官，回封地南阳闲居。

哀帝当政不久，几个有远见的大臣如丞相孔光、大司空（副丞相）何武、左将军、领尚书事（高级将领兼皇室办公厅主任）师丹试图解决

两大社会问题，提出建议说，要限制私人占有田地和奴隶的数量。诸王、列侯、公主占的田应该有个限度。关内侯、官吏和民间富人占田不许超过30顷。诸侯王的奴婢不超过200人，列侯、公主的奴婢不超过100人，关内侯、官吏和民间富人的奴婢不超过30人。

哀帝却不是很支持，于是批示说，过一段时间再议吧，没有下文了。这就是西汉历史上胎死腹中的“限田之议”。

儿子为奴隶偿命

哀帝爱上了一个叫董贤的帅哥，两人搞起了同性恋，形影不离。一次睡午觉，董贤的身子压住了哀帝的衣袖。哀帝醒了，为了不惊动董贤，自己把袖子割断了轻轻起床。哀帝还封22岁的董贤为大司马，并且一度想把皇帝的位子让给董贤。

哀帝胡来，西汉的衰败与混乱更加严重，有识者都觉得大汉王朝的终结为期不远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哀帝时的博士弟子秦景宪受西域大月氏的使者伊存口授佛经，中国知道佛经自此开始。中国经学界著名的今文古文之争，也从哀帝时开始。

王莽隐居期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对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冲击。他的二儿子王获因事一怒之下，打死了一个奴隶。这在贵族之家本属平常，王莽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经过痛苦思考，王莽命令王获自杀以赎罪。

王获贵为皇帝外戚，怎能为一个奴隶偿命呢？经过几天争执，王获终于拗不过，自杀了。这件事成为了当时的社会焦点，消息四处流传，王莽此举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和好评。不少奴隶也因此提升了安全感。

哀帝元寿元年（前2）正月初一，发生日食，哀帝惊恐。大臣们说这是因为错待王莽，上天降罚。哀帝无奈，只好以侍候王政君为名，让王莽回到京师。

王莽的“社会主义”

哀帝元寿二年（前1），25岁的哀帝突然去世。此前他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亲丁皇后都已去世。王政君又成为最高权威，她立即恢复王莽的大司马职务。

王莽复职第一件事是罢免董贤，并选立中山孝王9岁的儿子即位，是为汉平帝。王莽命令平帝的亲属一律不许进入京城，以杜绝新的外戚之患。接着，他把傅、丁两氏外戚全部赶出京城。王莽复出执政，得到全社会欢呼，臣民们觉得汉朝振兴有望了。这一年，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实际总理国政。

平帝元始二年（2），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带头捐款100万钱，捐地30顷，救助穷人。230个贵族跟进，捐出大批粮食、土地，分给弱势群体。民众捕蝗虫，按多少给钱。全国无灾地区凡是财产不满2万钱、受灾地区财产不满1万钱的贫民，免交租税。发生病害的地方，腾出大房子给病人医治。一家死6人以上给葬钱5000，4人以上给3000，两人以上给2000。

王莽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迁移穷人去住。沿途饮食以及到达之后所需的田宅、器具、耕牛、种子等，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

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5个里共200个廉租房小区，供贫民居住。权势开始向民生倾斜。

王莽努力解决教育难题，扩大太学招生，太学生数量破纪录超过1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

《汉书·王莽传》说，王莽在京城为学者盖了1万间房子，成立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对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召到京师做研究，前后来了千把人，每天讨论儒家学问。

王莽还大抓意识形态建设，根据《周礼》精神，重订车服制度，分等级确定国人的着装、住房、器用、婚丧式样，接着又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

一时之间，社会风气大为好转。逢到灾害，王莽自动吃素，并赦免囚徒。

这些改进或改革措施，大概就属于胡适所说的“社会主义”。

平帝12岁时讨论结婚，成千上万的士人百姓涌向政府大门，不肯离

去，要求平帝必须娶王莽的女儿，以王莽之女为国母，别的女子完全丧失竞争力。王莽女儿当然被选为皇后，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赐给王莽的2.56万顷土地，王莽都退回了。聘皇后的礼金2亿钱，王莽接受6300万，其中4300万周济刘氏宗族中的没落穷人，剩下的钱大部分孝敬王政君使用。

众大臣感念至深，先是提议把新野、召陵、新息、黄邮聚等4个地方的土地赐给王莽（王莽退掉了新野、召陵、新息3个地方），接着又提议加封王莽为宰衡（高于所有诸侯王公之上的职务官名，为西汉末年新创），后又奏请加封王莽九锡（自古以来视为最尊贵的9种物品，如最高级的车马、衣服、弓矢、乐器、仪仗队、武装卫队、天子祭祀天地用的酒、朱红大门、能罩住台阶的屋檐等，只有新皇帝登基才用）。

加封九锡意味着地位离皇帝不远了。

王莽不受新野田的消息传出，朝廷收到48.7572万人上书，恳请王莽接受封地。有人统计，当时全国人口5000万左右，以明朝识字率不超过人口的5%计算（北京大学研究成果），汉朝识字者最多200万左右。长安及周边地区能上书的知识分子也就是48万多人，也就是说几乎所有能上书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行动。

如果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当在99%左右。高层官员当中，支持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902人，几乎百分之百。

民选皇帝

平帝元始五年（5），汉王朝为王莽加封九锡。一个推举王莽代替刘氏当皇帝的运动开始兴起。为什么无能的刘氏后人永坐江山，而这样的圣人却不能当皇帝呢？当时绝大多数臣民一致认定，只有王莽才能让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强壮起来。

地球气候也在帮助王莽。王莽执政之前的几十年，夏天降霜，冬天打雷，地震陨石，日食月食，灾异频频发生。老天爷装神弄鬼，忙得不可开交。

时在远古，每逢“诡异”，总不免有人添油加醋，煽风点火，闹得气氛十分紧张。可是王莽上台之后，灾异大为减少，人们舒了一口气。与此同时，“祥瑞”、“神迹”却接二连三出现了。

早在元始元年（1），就有南越人进贡白雉。儒生们一查《尚书》的记载，周朝时候，越裳氏曾向周成王进贡白雉。此时白雉重现，显然是“周成白雉之瑞”。

公元5年12月，14岁的汉平帝去世。同月，长安附近一个井里发现一块白石，上面刻有红色文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政君即刻下诏让王莽摄政，朝臣称之为摄皇帝（摄即代理之意，摄皇帝为代理国政），又有人称他为“假皇帝”。王莽居摄元年（6）三月，王政君宣布，立汉宣帝玄孙、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

王莽当了摄皇帝之后，一个最基层的官员——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向朝廷报告说，他梦见了“天公”。“天公”在梦中告诉这个亭长，“摄皇帝当为真”。为了表示灵验，“天公”还说，早晨醒来，将会看见亭中有一口新井。亭长早晨起来跑到亭中一看，原来的平地上果然出现了一口新的深井。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络绎不绝地给京师送来载有“天命”信息的奇石铜符。这些信息的内容，都是王莽应该即位称帝。

在诸多“神迹”面前，王莽却是一个劲推辞。形势演变到了非常迫人的地步：他越推辞，臣民就越急；他越展示出无私，臣民就越狂热。全国推举他做皇帝的势头已经汇成汹涌大潮，“祥瑞”和“神迹”每天都大量出现。臣民们也每天都在议论和催促，不容王莽后退。历史上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记载：王莽前往未央宫观看各地送来的奇石时，突然天风大作，烟雾弥漫。雾散之后，石头前面出现了帛图：“天告帝符，献者封

侯。承天命，用神令。”

王莽居摄三年（8）十一月，一个叫哀章的人向朝廷进献了分别放在两个铜盒里的“天帝”和“赤帝”降下的“符命”，“符命”的内容是王莽该当皇帝。

到了这个时候，王莽终于顾不得王政君的劝阻，在这个月即位当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王莽废掉刘婴的皇太子名号，封他为定安公，赐给他一块方圆百里的地方，把汉朝的宗庙放在那里。西汉214年历史就此画上句号。

有研究者说，王莽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民选皇帝，此话有理。王莽当皇帝之后，当时的学界领袖杨雄写了一篇《剧秦美新》献给王莽，说王莽“配五帝、冠三王”，“奉若天命”。

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祥瑞”不过是王莽自导自演的“劝进”丑剧罢了，益发暴露出王莽的“篡位”野心，诸多东汉学者就说这是王莽命令地方官搞的阴谋。其实，就当时形势来看，更大的可能是各地臣民主动所为。这里既有拍马屁成分，又有进献者获益的盘算，也有真心的期盼。不妨说，王莽正是利用了弥漫全社会的真心期盼。这种期盼是哪里来的呢？是长期以来王莽的所作所为激发的社会心理。

在历史上，一些宗教创始者或改革者，大都有一个伟岸的人格。信仰他们的人，为他们的人格所折服，常常把他们的弱点忽略了，遗忘了。比如一些人看见大海汪洋的气魄，就情不自禁赞美起来。在那个时刻，他们没有想到海里什么肮脏的东西都有，这海水也不能饮用。在西汉末年那种颓废沉闷马上要完蛋的时候，看看大海还是十分必要的心理调适。臣民们会被大海的宏阔壮观所荡击，从而产生出一种期盼。这种期盼如能实现，那些沉闷自然就会被荡到乌有之乡去了。

这是王莽的作为和臣民期盼之间的互动。所以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两项重大改革

上面提到，贵族豪强大肆兼并土地不独中国为然，古罗马亦如此。马克思曾说，共和时代的罗马，“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贵族和富人大肆侵占土地，导致小农破产和大量流民出现。

贵族出身的改革家提比留·格拉古说：“栖身在意大利的野兽还有他们的洞窟和巢穴，可是为意大利而战斗献身的人们，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

比王莽稍早些，公元前133年，提比留·格拉古当选为罗马保民官，提出了限制占地的改革法案，规定罗马公民每家占有土地不得超过1000尤格（一尤格相当于三亩多），超过的一律收归国有，按30尤格一份，分给穷人，可以世袭，但不准买卖。这当然遭到贵族反对，然而在公民大会的表决中，土地法案获多数票通过。当年夏天，在选举下一届保民官时，元老院贵族造谣说提比留·格拉古想当僭主（通过不正当手段篡夺罗马国王王位），煽动一伙人袭击改革者，将提比留·格拉古用棍棒打死。

但改革并未中止，提比留·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在公元前123年和122年连续当选保民官，他恢复了其兄的土地法，又提议在北非迦太基设殖民地，动员罗马公民移民到那里，每人分配200尤格土地。公元前122年，盖约竞选下一年保民官落选。公元前121年，贵族势力再次挑起武装冲突，盖约被迫自杀，改革失败。但盖约的改革方案有些内容得到保留。在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冒险中，罗马共有8万公民获得了土地。

王莽的改革比格拉古兄弟要激进。他的理由很充分，他说：汉朝减租，三十税一（三十取一）。豪强侵占土地租给农民种，却要收百分之五十的租。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太不像话了。

新始建国元年（9），王莽一纸令下，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如果一家男子不满8人，田超过900亩，应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者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人给田100亩。私自买卖王田治罪。这个措施，是王莽搞“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其实，就当时情况来看，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每人百亩以及8人不超过900亩一类的标准是哪里来的呢？来源于《周礼》所说的井田制。王莽的智囊班子是一帮儒学专家，一天忙到晚。他们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觉得“井田制”最理想。王莽正是按照《周礼》记载，试图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

《周礼》等著作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又是哪里来的呢？都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说，一块极其广袤的平地，按“井”字的样式，划为9块，每块100亩。四周8块分属8家私有，“井”字中心那100亩则是公家的田。8家人先在公家那100亩地里忙活，完了之后才到自家100亩地里干活。《周礼》、《韩诗外传》等著作就根据孟子这段话，对井田制大加发挥，说得更为详尽。

孟子说得若有其事，但朱熹就对井田制是否存在过提出怀疑。他说，周代陕西一带，哪来的几千里平地？很多地方都在山谷之间，又很多小溪沟，怎么安置井田呢？（《朱子语类》卷86）

胡适在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也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孟子实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不过从一句诗里推想到井田制。”如果孟子时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滕文公就不必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如果周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战国离周代并不太久，一种制度的废止，绝不是突然的，尤其是实行了许多时候的田地制度，总会有遗迹，何至于到《诗经》里去找一句诗来说事呢？再说，王莽时代的耕地，也根本不够全国这样分配的。

柏杨说，王莽准确地诊断出社会疾病，认为只要吃下儒书上的古药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问题，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秦晖说，王莽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井田制社会主义”。

这些话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应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中国历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原则”。

采取如此激进而且大面积剥夺利益的措施，马上就把一些拥戴者驱赶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到王莽当政晚期，南阳豪强樊重以及阴子方家中都有几千亩地，谁也没有分掉，证明土地国有化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再说王莽对残余奴隶制的改革。古希腊的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改革，禁止买卖奴隶，并下令由国家出钱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奴隶，取得成功。

《罗马法》也明令禁止虐待奴隶，并规定了给奴隶自由权的程序，

分为“主人解放”（由奴隶的主人宣布解放）和“法定解放”（根据相关法律解放奴隶）两种，促进了罗马的进步。

但王莽的命运没有这么好。从王莽强令儿子自杀以抵偿被杀死的奴隶性命来看，王莽的确想尽最大努力改善奴隶的悲惨状况。有些古代史学家说王莽让儿子自杀也是“作伪”，未免太过苛刻。王莽下令民间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官奴），就是说，每一个奴婢在主人家中，占着一个成员的地位，并禁止所有奴隶买卖。这样，奴隶的地位相当于准自由民了。王莽用意是起码要冻结奴隶制度，使其不再扩大，最后自然消灭。这进步的措施，自然也遭到奴隶主抵制。

混乱导致败亡

就在实施激进改革的同时，王莽采取了一项错误的金融政策：在很短时间内改革币制5次。

先是从周代寻找钱币图案，废除汉朝使用已久的五铢钱，发行刀币形大钱。

后因刀币犯了繁体字“刘”字的忌（有刀做偏旁），又废刀币，发行小钱。

最后另造28种货币，称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连乌龟壳、贝壳和布也都成了货币，混乱至极。老百姓必须按照王莽命令一次又一次兑换新钱币，使用旧钱治罪，结果“农商失业，贸易俱废”。这是在激进上面又加一个大混乱。

吕思勉说王莽为人迂阔不切实际，随意乱改币制不合经济规律，“致祸速亡，莫甚于此。”王莽还大幅度改变官制和更改地名，于事无补，徒增烦扰，可谓雪上加霜。

新始建国二年（10），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管”法，实行计划经济。内容包括：

一、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供过于求时，政府按成本价买进；求过于供时，政府平价卖出。

二、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从前自由经营，现在政府征收10%所得税。

三、实行专卖制度。盐专卖、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以前大富豪可以自铸钱币）。

四、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

五、首创政府贷款。老百姓没钱祭祀丧葬，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商贷款，收10%利息。这些重大改革措施，也是胡适等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这些举措，意在抑制豪强巨富，避免因贫富不均爆发动乱。可是，一来改革规模过大，急风暴雨，齐头并进，很难奏效；二是当时土地私有化乃大趋势，国有化行不通；三是政府经商的重大弊端使不少措施反成了害民之举，以致加速了起义爆发。

土地国有化和禁止买卖奴隶的政策实行了3年，困难重重。新始建国

四年（12），王莽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两禁令，准许买卖土地和奴隶，这标志了改革失败。后来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学乖了，把改革的开口缩小，单只就解放奴婢一项连下六道命令，收到成效。

王莽的另一败笔，是在平安的情况下，无端向周边少数民族诸国寻衅开战。比如贬西域诸国的国王为侯，把赐给他们的金印缩小，随意发兵攻打诸国等等，导致周边战争连年不断。王莽企图以此向国内民众显示威武，结果又适得其反。

国内民众不堪重压连连造反，刘氏贵族势力反对王莽“篡位”企图恢复汉朝，两者合流，给王莽造成巨大压力。王莽派兵镇压，但遭到失败。新地皇四年（23）十月，起义军攻入长安，杀死王莽。新朝15年历史结束。

王莽其人其事颇多争议。东汉迄今，不少人受“刘氏天下”的“正统”观念影响，把王莽问题的焦点完全放在“篡位”两字上，其他则不值一提。尤其是东汉史学界，情绪化十分严重。吕思勉指出，汉朝人对王莽的所作所为，“悉以一‘伪’字抹杀之”，缺乏客观态度。其实，王莽改革的情势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柏杨说，王莽夺取政权的目的与诸多只想当皇帝的人不同，他有远大政治抱负，获取权力是为了实践儒家学说，缔造一个理想世界。吕思勉论王莽说：“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尔。”两位的意见，很值得参考。

旋风改革家元宏

虎父犬子

“虎父无犬子”这句话，用到北魏孝文帝元宏（原名拓跋宏）身上，就是莫大的讽刺了。

元宏是中国历史上了不得的人物。10岁的时候，他就能用手指弹破羊的髆骨，骑马狩猎，箭无虚发。

如果说这还算游牧民族看家本事的话，那么他涉猎诸子百家，擅长诗词歌赋，在马上口授文章一字不改，实在就是鲜卑族中的出类拔萃者了。

他的长子元恂却全然不同，其实父子俩年龄才相差16岁。元恂得了幼儿肥胖症，从小就非常懒惰。骑马打仗这样吃力的事情，自然叫苦不迭，敬谢不敏。书呢，也是一页不看。成天吃喝玩乐，茶来张口饭来伸手，十足的纨绔子弟。

儿子如此不争气，元宏心里老大不快，父子俩少不了拌嘴。好在元宏年轻，自信来日多多。再加上平时没什么需要太子参与的大事，也就得过且过，一切推到明天。

没料到，在迁都这件大事上，元恂却充当了改革的绊脚石，令元宏进退失据，难过万分，父子俩矛盾总爆发。

把北魏都城从平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加速鲜卑族和中原汉族融合，是元宏改革的重大举措。这个计划自公布之日起就遭到诸多显贵抵制，尚在元宏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反迁都的中心人物之一，竟然是14岁的太子元恂。

迁都恶斗

鲜卑族早先生活在大兴安岭北段东麓，如今的呼伦贝尔东部、齐齐哈尔西北一带。当时大兴安岭又名鲜卑山，鲜卑族由此得名。鲜卑人的生活曾长期停顿在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射猎为业，生活简朴，也没有文字。

后来鲜卑族日渐强盛，收了一些中原降人，造些兵器甲盾，学习汉语和兵法，逐渐在“五胡”（匈奴族、羯族、鲜卑族、氐族、羌族）中占了上风。

新兴的鲜卑族由拓跋氏领军，向南扩张，屡战屡胜，占领河北及山西，公元386年建立北魏，公元397年定都平城，接着平定了柔然部落以及夏、北燕、北凉等国，于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北魏的贡献是，将西晋八王之乱以来“五胡十六国”分裂扰攘的局面，合为一个北方的中国政权。

由此，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令人炫目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史学家许倬云说，东汉末年至“五胡十六国”，天灾人祸，北方汉族人口减少了一半。各种胡须样式和蓝绿眼睛的胡人大规模进入北方，填补人口空间，一些汉人则向江南流亡。“这一次为时200年的人口大变动，在中国历史上实为规模最大的一次。”

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北方胡汉文化大融合。胡人定居，渐渐汉化。汉族中的大族也参加胡人的政权。汉人同化胡人，胡人同化汉人。这个过程不免反复冲突，痛苦多多，元宏家中爆发的冲突即是其中之一。但总的来说，是一步一步熔铸了中国北方新的华夏文化。

元宏所作所为，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元宏自幼饱读汉族诗书，对当时发达的中原文化心向往之。北魏扩张之际，吸纳了很多汉族士人担任官员，并采用了汉族政权的典章制度。鲜卑人当中的改革者还开设学馆，让鲜卑贵族子弟研习汉族的诗书礼乐，祭拜周公、孔子，提倡农业。

旧史书说：“魏之儒风始振”，这是指鲜卑族吸纳了大批汉族官员学者之后，提升了本民族文化。两种文化互相激荡比较的结果是，元宏立下一个誓愿：一定要彻底改革草原游牧民族的原始习俗，使鲜卑族尽快融入发达的中原农业文化，成为“诗礼簪缨”之族。

从塞北平城迁都中原重镇洛阳，就是改革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也是拓跋氏部族从草原文化过渡到农业文化的象征。

据《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转》载，平城这座城市是“胡风国俗，杂相糅乱”。既有中原文化的特质，也保存了草原文化的色彩。

元宏登基时，北魏在平城已经建都百年。一开始，元宏并没有积极南迁的意念，只是想把平城改造成为中国文化式的都城。

他在这里大兴土木，建设了孔庙、祭祀寰丘等一系列具有中原文化象征意义的建筑，并且进行了有关礼仪、祭祀问题的讨论与决定。换句话说，他要在平城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造。

年轻的元宏这些“汉化”改革，遭到了为数众多的鲜卑元老贵族坚决反对。

这些元老贵族认为，拓跋氏之所以能够征服中原地区，完全靠那种“马背上生活”的草原习惯，这种生活习惯与他们剽悍的战斗方式是一致的。如果改变原有的游牧生活方式，强悍善战的性格也会随风消逝。其结果就是，不仅不能统治汉族，反而会被汉人同化，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战斗力优势也就完蛋了。

显然，这种舆论在保守的鲜卑部落里占了上风。随着意识形态转型逐渐深入，元宏以及他周围一批二三十岁的鲜卑族精英，越来越孤立了。

种种强大的阻力，迫使元宏不得不放弃了以平城为基础进行改革的计划，另外寻找适合实现他的理想的环境。既然在旧势力钳制下无法施展，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他们。

当时选址方案中还有邺城（河北大名），这里物产富庶，形势险要，安全系数高，而洛阳在黄河以南，做为国都则显得过于突出，洛阳南方很少有可以据守的天险重镇，在与南朝对峙的形势下，容易出事。

可是，元宏选择新国都的动机，重点在于文化，所以他看中了洛阳，洛阳正是中国农业文明比较优越的地方。

洛阳曾是东周、东汉和西晋的都城，是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那段历史时期，洛阳的地位有如今天的北京之于中国。

北魏时，保定才子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描述洛阳往昔景色，有“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的句子，可见都城的文化涵蕴与繁华盛景。

元宏曾多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迁都问题，元丕、穆真、陆睿、穆泰等重臣坚决反对，吵得几近分裂。

人的习性大都安于现状，因循苟且。看看目前东邻韩国正在策划的迁都遇到多少障碍，就能明白迁都不易。北魏开国百年来，鲜卑族王公贵族世世代代在平城累积了大量动产和不动产，要说搬家，一百个不愿意。元老贵族们又说，鲜卑族到南方，水土不服，一个个闹起病来死于非命，该谁负责？

元宏迫不得已，在公元493年春天精心导演了一出以假乱真的危情大片。

先是，元宏命令太常卿（负责教育、礼乐、祭祀的部长）王谌就迁都一事占卜，得到吉利的“革”字卦。元宏兴奋地说：这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

于是，元宏召集文武大臣，一句不提迁都的事，只是宣布要攻打南齐。

元宏的堂叔、任城王元澄不赞成。原因是，公元450年时北魏曾发大军攻打南朝，结果严重受挫，死伤甚重。从那以后，鲜卑人害怕同南朝作战。一些官员们也附和元澄。理由是北魏多年来戎马倥偬，元气损耗，应该喘一口气。

元宏大怒，斥责元澄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这样讲，难道想要破坏我的大局吗？”

元澄赶紧说：“社稷的确是陛下所有，臣是社稷之臣，但是我看到了危险，所以才讲。”

元宏寻思了一会儿，缓和下来：“各言其志吧，也没有关系。”

退朝之后，元宏把元澄召进宫来，屏退左右密谈。元澄在辈分上虽然是元宏的叔叔，可年纪跟元宏一样大，而且一直是元宏的心腹助手。

元宏说了真话：“刚才怕群臣非议太多，所以话说重了，叔叔不要在意。讨伐南齐是大仗硬仗，有不同看法也正常。其实，我以用兵为名，真意是想迁都。平城这个地方，地处边塞，气候严寒，交通不便，打仗倒是个重要关口，若要论到文化建设和国都气势，就不理想了。我想把国都迁到中原文化的中心洛阳，你看怎么样？”

实际上，元宏并非是跟元澄协商，他只是在给元澄做工作。至于迁都的策划，早就由另外几个智囊在幕后沙盘推演完成了。鉴于迁都问题在当时极富爆炸性，元宏的操作十分秘密，就连元澄也没有事先告知。

元澄这才恍然大悟，连连点头：“陛下要定都中原以经略四方，这正符合周、汉两代兴隆的大道。我赞成！”

元宏又说：“咱们北方人安于现状，不图进取，这怎么办呢？”

元澄说：“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办非常之事。陛下就是非常之人，大胆放心地干吧！大伙尽管不愿意，也只能服从。”

元宏高兴地说：“你真是我的好军师啊！”

过了不久，元宏命令在黄河上架桥，声言大举南征。公元493年9月，元宏率领20万大军，浩浩荡荡抵达洛阳。

他巡视了战乱破坏之后的洛阳，看看那些曾经富丽堂皇的一座座旧宫，不禁感慨系之，朗诵起《诗经》中的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诗倒是确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

当时正值秋季，阴雨霏霏，官兵们一个个在秋雨中发抖。元宏身着盔甲，跃马扬鞭，下令大军南下。大臣们悲从中来，纷纷跪在马前，叩头哭劝，请求不要再攻打南齐了。

元宏见时机到来，就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不去南方打大仗，那么就迁都到这里，你们看怎么样？元宏还当众宣布：这件事不容迟疑，马上就得决定。这样吧，赞成迁都的站在我的左边，不赞成的站在我的右边！

大臣们以安定王元休为首，绝大多数都站到了元宏的右边。显然，大家不愿意迁都。

另一个皇族元祯见势不妙，赶紧说：干大事的人不必跟大众商量来商量去，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这句话总算替皇帝找了台阶。

大臣们见状，都不说话。有些大臣顾及到和皇帝的关系，不情愿地站到左边来——迁都总比到南边打仗送命要强点。

公元494年11月，北魏正式迁都洛阳。

就当时情况而言，如果鲜卑族还像祖先一样活动在北部大漠，那么，坚持草原文化形态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现在已经占领了广袤的中原，并建立起各级统治机构，在这种情形下还要保持草原文化的边际形态，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元宏认为，必须放弃原有的文化成见，进行一次文化大调整、大改革，与中原文化融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胡汉之间的隔阂，巩固政权。元宏颇有远见，这也是巩固统治唯一的必经之路。元宏的决策，得到了鲜卑族年轻精英和中原人士的支持。

元宏迁都之后，北方剩下了保守势力。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成天咒骂。为了缓和保守派的激愤，元宏做了一定的妥协。他规定，一时不习惯洛阳生活的官员，可以“冬则居南，夏便居北”。这些官员当时被称

为“雁臣”，像候鸟一样，每年更换栖息地。

太子元恂对迁都非常反感。洛阳夏天热，肥胖的元恂热得嗷嗷叫。元宏赐给他汉人宽大的衣服，他也扔在一边不愿意穿，私下里还是穿胡服。元恂手下有个官员叫高道悦，高先生屡次苦劝元恂要带头遵守父王的法令。元恂听了只是哼哼两声，私下恨上了高道悦。

虽然元宏做了让步，仍然不能得到谅解。

保守势力暗中策划，甚至企图发动政变，推翻讨人厌的元宏。他们早已侦知太子元恂不满迁都，于是元丕等人阴谋截留元恂做为人质，选择时机宣布北部独立。

另一个方案是，把元宏诱到北方来加以逮捕，然后利用北方军事力量消灭迁都集团。

但是元宏身强力壮，文武兼备，既有聪明的谋士，又统率着精锐大军，更重要的是他是皇帝，所以保守势力顾虑重重，意见不一，迟迟不敢举事。

不久，保守派领袖元丕、陆睿利用太师冯熙（元宏舅舅）之丧进行试探，他们上书要求元宏亲自到北方奔丧。

元宏心里明镜一样。他不去，派了元恂等人作为代表前往参加丧礼。保守集团在犹豫之中未敢发动，元恂等人参加了葬礼从北方回来了。

公元496年8月的一天，元宏出发巡视河南嵩山。

忍了很久的元恂见父亲走了，就和几个亲信密谋调动骑兵部队，回平城老家。

事情往往是这样，该做的时候不做，不该做的时候又特别想做。元恂如果执意要留在平城，那么，赴北方治丧的时候脱离元宏，是最佳时机。现在已经回到元宏手心，再想动作就不容易了。

高道悦出来劝阻，元恂竟然“手刃高道悦”，然后带领心腹和少数骑兵仓皇出城，却不料半路遭到将军元俨率领军队拦截。元恂自知理亏，半夜里讪讪回到宫中。

第二天一早，尚书（总理）陆飞马出城，向元宏报告这一消息。元宏大吃一惊。他明白，太子身后是一批反对迁都的权贵，如果太子到了平城，肯定会造成国家分裂。

元宏马不停蹄赶回洛阳，召见元恂，痛责一顿。痛责还不算完，元

宏和咸阳王元禧拿起棍子，两人轮流动手，打了元恂100棍。元禧是元宏的弟弟，有资格参与杖责。这一顿棍子打得太重了，元恂过了一个月才能坐起来。

教训了元恂之后，元宏召见诸大臣，讨论废掉太子的事。两个辅佐太子的大臣都脱下帽子，承认教导不力，跪下请罪。

元宏说道：“你们以为这是一家子内部的事情吗？我要你们讨论的事关乎国家成败！大义灭亲，是古人崇尚的美德。现在元恂企图背叛皇帝逃走，在某些人支持下回到北边去搞分裂，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罪恶吗？如果不废掉他，将来一定是国家的祸根！”

元宏当即决定，废掉元恂的太子头衔，贬为普通老百姓，囚禁起来。每天供给元恂的食物，仅能勉强维持生命。

这个时候，叛乱爆发了。穆泰、陆睿、元丕、元隆、元业、贺头、乐平、元拔等一大批北方的文臣武将，拥立阳平王元颐为帝，公开谋反。元颐表面答应了，暗中紧急报告元宏。元宏派元澄率大兵讨伐，很快就平定了叛乱。穆泰问斩，陆睿、元隆等100多人被判处长期监禁。留在北方的勋戚贵族，都牵连进事变当中，这一次是把保守势力一网打尽了。元宏推进文化转型的阻力基本消除。

又过了几个月，元宏得到报告说元恂仍旧不肯悔过，密谋作乱。于是，元宏在公元497年3月下令元恂饮毒酒自杀。

粗笨的棺材，平常人的服装，元恂就这样被草草埋葬了，此时他才15岁。

元宏为了推进文化改革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他始终不悔。镇压叛乱和杀掉元恂，震撼了满朝文武。朝野内外都掂量出了元宏钢铁般的改革决心，不敢再跟他较量了，这也是元宏后来的改革不断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改穿汉服

与赵武灵王赵雍改穿胡服相反，元宏下令鲜卑人改穿汉服。

形式上虽然相反，实质却是相通的——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补己之短。赵雍改穿胡服是为了打仗实用。元宏改穿汉服，是为了尽快地把游牧民族融入到更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当中。因此，如同迁都一样，改穿汉服也是整个改革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元宏性子急。公元494年12月，定都洛阳刚一个月，众人正忙着搬家折腾，很多人还没房子，元宏就下令士民禁止穿胡服。

鲜卑人为了适应游牧生活，习惯于披散头发，服装开左襟，妇女戴帽子，穿小袖短袄。进入中原之后，统治区域越来越大，鲜卑人这套打扮与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很不协调。

在街上，鲜卑人的打扮和服装，是一个显眼的符号。代表了什么？代表了生疏，代表了隔离，并且隐含着“占领军”的敌意。元宏看到这景象，心中很是忧虑。

一次，在光极堂会见群臣时，元宏当场将汉族的衣冠赏赐给鲜卑贵族官僚，要求把鲜卑的官服改为汉官服。穿上汉服，就改变了符号，这是融入中原文明的重大象征。

为了检验服装改革的效果，元宏时常到街上巡视。有一次，他在街角看到有的鲜卑族妇女仍然我行我素，身穿胡服，十分生气，立即训斥手下干部，要他们严加管束，把改穿服装的决定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过了不久，洛阳街头再也见不到穿鲜卑族服装的人了。

改说汉话

和服装改革相比，改变语言要困难得多。虽说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靠拢是古今皆然，但语言的力量根深蒂固。五四之际，鲁迅、钱玄同等人想废除中文，改为拼音文字，结果闹了场笑话。谁都知道，绝改不了。但是元宏居然破天荒做到了。原因之一是中古时代北魏皇帝残忍粗暴，威权很大。一声令下，谁个不听，是要灭九族的。二是鲜卑族毕竟人口不多，改革基本面不大，成本相对较低。

其实，鲜卑人开始崛起之际，要求汉官讲鲜卑话，因为那时候所用的汉官不多。即使如此，朝廷上也是汉话和鲜卑话杂用，障碍极大，朝廷不得不设置名为“译会使”的翻译，行政效率打了一半折扣。后来北魏扩张成功，疆域辽阔，鲜卑人成了少数，从上到下语言不通的矛盾日益突出。头脑清醒的元宏力主改弦更张，废弃鲜卑话。

当然，元宏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我们在迁都一幕中已经看到，在导演才能方面，元宏比目前国内某些大片导演的本事更大，能把假戏演真，不至于在演出过程中穿帮露馅，让观众发出不齿的笑声。除此之外，元宏还是一位刚柔相济的思想工作者。

服装改革之后半年，公元495年6月的一天，元宏又和他的大臣聊起来了。

元宏问：“你们是希望我远追商朝、周朝呢，还是希望我连汉朝、晋朝都不如？”

大臣们回答：“臣等愿意陛下超越所有前代君王！”

“既然如此，那么应该移风易俗呢，还是因循守旧呢？”

大臣们听出点音来了，不知元宏下一步又要干什么，只好惴惴不安地回答：“愿陛下圣政日新。”

“那么，是只图当前混得下去呢，还是要传给子孙万代呢？”

大臣们面面相觑，答道：“愿百世相传。”

“好，大家思想统一了。既然如此，必须加快改革，谁也不能违背！”

大臣们众口一词：“上令下从，谁敢违背？”

元宏把锅盖揭开了：“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兴。我今天说一说‘言’的问题。现在我决定禁止说鲜卑话，一律改说中原汉

话。”元宏看看大臣们惊愕的表情，慢慢说道：“当然喽，30岁以上的人，改起来也难，可以放宽要求。但是30岁以下的，必须马上学习说汉话，不得有误！如果故意违背我这个命令，就要降级或者撤职。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臣们已经被元宏旋风式的改革弄晕了，多少也习惯了。他们知道这位年轻的君主志远气高，说一不二，只能顺着来。于是都低声回答：“一定贯彻陛下的指示！”

元宏又说：“我曾和李冲商量过改说汉话的事。你们猜猜李冲怎么说的？他说，四方之人，口音不同，没法说谁的好。干脆，皇帝说什么话，就作为正音好了。李冲说这话不动脑子，光拍马屁，一点不负责任！”元宏把头转过来冲着李冲说：“应该叫御史把你拉出去！”

李冲吓得连忙摘下帽子：“臣罪该万死！”

元宏说：“如果谁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当面提出来讨论。我最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朝廷上遵旨，私下里抗旨！”

元宏的改革，促进了鲜卑人对汉语的研究。在鲜卑人陆氏家族（由鲜卑族“步六孤氏”改成的汉族姓氏）中，出现了一位颇有建树的汉语声韵学者陆法言。同时，鲜卑族的民歌也译成了汉语，收集在《乐府诗集》中的大部分北朝民歌，就是在元宏下令改用汉语之后翻译的。

改用汉姓

改说汉话之后半年，急性子元宏又发大宏愿，要鲜卑人改用汉姓了。

鲜卑人的姓氏多为复姓，如拓跋、独孤、贺楼、步六孤、丘穆陵等。

公元496年正月，元宏颁布诏书说："北方人把土称为拓，把君主叫做跋。我们北魏也是黄帝的后裔，以土为最尊贵，所以叫拓跋氏。土为万物之元，拓跋氏改姓元氏。诸位大臣的复姓都要改为单音汉姓。"

元宏首先带头，将皇族的拓跋氏改为元氏（元宏原名拓跋宏。本文使用的元宏，即为改用汉姓之后的名字，其他皇族的姓也改为元姓），定为最高门第。

接着，把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把独孤氏改为刘氏，把步六孤氏改为陆氏，把贺赖氏改为贺氏，把贺楼氏改为楼氏，把勿忸氏改为于氏，把纥奚氏改为嵇氏，把尉迟氏改为尉氏。以上八姓是北魏功勋之家。

当时北方汉族有四大高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元宏指定，鲜卑族的八姓与汉族四大门第地位相同。

元宏将鲜卑族的100多个姓氏改为汉姓，改姓后的地位与汉族的不同门第互相对应。元宏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他带头将汉官李冲的女儿立为皇后，还让自己的弟弟娶汉族世家女子为妃。

元宏这些眼光远大的举措，有利于巩固北魏政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鲜卑族和汉族的双赢。就促进中国北方各民族大融合而言，元宏真可以说是千古奇人，居功至伟。元宏的改革内容不止于此，限于篇幅，不能尽述。但上述几条改革措施，有一条能做到已属不易，元宏却能在较短时间内一一实现，惊心动魄，势如破竹，若有神助，可谓奇迹。这是很难为后人复制的。

公元471年，元宏5岁时就受父亲禅让，当上了皇帝。公元490年，担任监护职责的冯太后去世，24岁的元宏开始独立执政，这以后，掣肘不多，元宏大权独揽，天资聪颖，文武兼备，意志极为刚强，这些都是他推动改革的有利条件。

元宏的改革范式是威权高压，破釜沉舟，你死我活，立竿见影。这也打上了北魏皇帝威权独大的印记。

公元499年，元宏病重去世，年仅33岁，至为可惜。元宏的继任者北魏宣武帝及孝明帝宠用奸佞，荒淫贪婪，国事日衰，这是后话了。

普列汉诺夫说过，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和民族，一定会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和民族产生吸引力，反之则不然。面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对象，不同的人会采用不同的对策。元宏是见贤思齐，奋力改革，结果使北朝文化日渐发达，黄河南北摆脱了西晋末年以来战乱频仍、停滞衰败的局面。就近代以来各国改革的情况来看，日本明治维新有一点元宏的气魄，堪与元宏的改革相比。

唐代中叶的双星陨落

历史这只大手

历史有时候异常神秘。

一只无形的大手，在唐代中叶撮合了一个难得的机遇，让中国古代史上最杰出的经济改革家、理财家刘晏和杨炎同时登上安史之乱刚刚结束的政治舞台，为破解时代困局大显身手。

在中国古代，像刘晏、杨炎这样的奇才，一段历史时期出现一个已属不易，两人同时理财，甚至有一段时期是一个衙门里的同事，岂不堪称美谈？

然而，这只大手又是这样捉弄人，让刘晏和杨炎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成为捉对厮杀的死对头。特别是杨炎，不置刘晏于死地决不罢休，而杨炎整死刘晏之后仅一年零三个月，自己也死于别人的阴谋构陷，令人扼腕慨叹。当然，这绝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剧。

神童与帅哥

刘晏（715～780），字士安，比杨炎大12岁。史书上说他个子矮，又黑又丑。唐玄宗开元三年（715），这只丑小鸭出生于曹州南华（山东菏泽）。刘晏家世如何？新旧《唐书》语焉不详。《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刘晏的先祖从江苏徐州迁来曹州，世代为文官。他的祖父做到县令。他的父亲大概是一介平民，史书只字未提。刘晏兄弟三人，他排行最小，三兄弟都受到精心的培养。

史籍大书特书的是，开元十三年（725）十月，刘晏8岁时，唐玄宗李隆基率领朝臣浩浩荡荡来泰山祭天。这个胆大的小童居然采取了一个破天荒行动，径直前往警卫森严、威势逼人的皇帝驻地，献上他所作的赋《东封书》，请玄宗阅评。这样一个身居外地的寒门小童，携带自己文章上门，直接要求与皇帝对话讨论文章的事，历史记录仅此一次。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毫无疑问背后应有一个操盘炒作集团，但史书没有提及刘晏家长精心策划以及相伴同行的事。我们猜测，这些环节恐怕必不可少。骗到皇帝头上的后果相当严重，刘晏一家通晓官场规则，对此应该很清楚。由此可见，丑小鸭刘晏不但具备了相当的学养，而且在自信和应对方面也应该是大大出人一头，否则扣上“欺君之罪”的大帽子，刘家人掉脑袋的概率很高。

即使如此，风险也相当大。古代没有火车汽车飞机空调，一切全凭畜力。从长安（西安）到泰山这么远，玄宗整整走了将近一个月，难保没有点小灾小病什么的，秦始皇不就死在东游途中的河北了吗？再说皇帝脾气大，旅途上生点气也常有。

当时刘晏的运气实在好，正如晚唐罗隐诗句所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这首诗还有下一句：“运去英雄不自由”，刘晏晚年则跌入第二种境界。

碰巧玄宗那几天心情相当不错，听说这么小的孩子进献词赋，并未斥之荒诞不经，也没有以政务繁忙为由拒绝接待，连有关部门的“审查”都省去了，传旨立即召见。

小刘晏不慌不忙走进帐殿，跪伏在地，以稚嫩的语调流畅地背诵起来：“吾皇英主，封祀东岳。告成功于昊天上帝，为万民祈福。开元之礼，仁及天下。人情所望，人心所归……”玄宗既欣喜又惊讶，听完了，他还存有一点疑虑：是不是大人写好了让小孩来背诵呢？于是，玄宗命著名宰相张说亲自面试这个8岁的孩子，验验真假。

考场上，众多大臣兴趣盎然地围观。张说临时以围棋为试题，出了“方、圆、动、静”四个字，让刘晏对赋。张说先吟诵道：“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

刘晏一点也不慌，略作思考，立即奉答：“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才，静若得意。”大臣队列里发出了不绝的赞叹声。

欣喜的张说向玄宗汇报说：“真是国家之福！”

玄宗当即任命8岁的刘晏为秘书正字（皇室掌管图书的科级官员）。

玄宗对人才的渴求以及他“不拘一格”的施政魄力，在这件事上体现得很富有戏剧性。他被后人称为“唐代三君”之一（另两位是太宗和宪宗），有些道理。

公卿们争着邀请刘晏，“神童”自此起家，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刘晏后来一路从县令做到侍御史（监察部处级官员），再升州刺史（地区级一把手）、京兆尹（京师一把手），49岁时升为宰相，负责全国经济工作。

玄宗那一天不经意的宽容，日后挽救了濒临崩溃的大唐基业，这大概是他没有想到的。

杨炎（726～781），字公南，也是了不得的人物。他生于凤翔（陕西凤翔）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杨播被玄宗封为谏议大夫（专门考察天下得失，向皇帝提出建议与批评的局级官员），但杨播淡泊明志，弃官回家，修身养性。

杨炎年轻时就潇洒出众，是远近闻名的帅哥。更重要的是，他不单是唐代有名的美男子，而且文采斐然，名满天下。唐代宗李豫大历年间，朝廷的重要文件有一半由他起草。当时的太子李适也是杨炎的“粉丝”，把杨炎在大历三年（768）撰写的《李楷洛碑》碑文贴在墙上，每天反复吟诵。

多才多艺的杨炎还是一个素养很高的画家。《太平广记》载，杨炎“画松石山水，出于人表”。他曾花了一个月时间用心画了一幅山水，送给一个曾经帮助过他的朝官。据说这幅画“松石云雾，移动造化”，“其迹妙上上品”，在朝官中引起轰动。

杨播去世后，孝顺的杨炎住在坟墓旁的草屋里守丧，长时间哭声不断。为此，朝廷特地颁布诏书表彰，杨炎成了全国闻名的道德模范。

杨炎之所以后来在仕途上崛起，还有一个大背景：他和大历年间位高权重的宰相元载不但是老乡，还有血缘关系。元载对杨炎悉心培

植，“亲重无比”，提拔他当了吏部侍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希望他将来接自己的班。

但祸事就从此发端，这也是元载没料到的。

唐代宗："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到代宗广德元年（763）的安史之乱，持续8年，拦腰斩断了大唐黄金盛世。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血流成河，民不聊生，经济彻底摧毁。

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764），京城米价飙升到每斗1000文。据《通典·食货七》载，大乱之前的开元十三年（725），每斗米才13文，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一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应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

更恐怖的是，皇宫警卫部队一度断军粮饿肚子，竟想造反。急得代宗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坐立不安。幸亏江南未经战火，唯一的希望，就是以长江中下游的物产接济京师。

于是，唐朝恢复经济的命运就寄托在漕运（水路运输）上了。代宗急切下旨，要宰相元载解决粮食漕运问题，元载推荐不久前刚被罢免宰相职务的刘晏担此重任。代宗立即任命50岁的刘晏任御史大夫（监察部长），兼安徽、河南以东税赋、运输及粮储的最高经济负责人。

都城长安附近地区产的粮食，远不能满足当时京城上百万人口和大量驻军需要。如何把粮食运到京城，是一件重要大事。用马车牛车陆路运输，不但载重低而且牲口也要消耗，而一艘大型木帆船能运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粮食。因此，漕运成为重中之重，不然皇帝也要饿死。幸好隋朝开发大运河，为唐代漕运创造了条件。

当时漕运过程复杂之极，先是组织几千艘船只，把长江中下游产的粮食经长江运到扬州集中，再从扬州经运河进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汴河，再进入黄河，入黄河之后西上，经三门峡之险，再转入渭河，最终到达长安，水路蜿蜒超过三千里。

刘晏受命危难，脚踏实地，亲自沿着漕运路线，从江苏到安徽，再赴河南，最后到陕西，细致考察一遭。

映入刘晏眼帘的，是安史之乱之后的惨状。兵乱以来，很久没有整治河道了，到处泥沙淤积，河床堵塞，千里河道变成了浅水滩，水路运输犹如旱地行船。再有就是百姓死伤流亡过半，人工奇缺。三是盗贼蜂起，沿河两岸到处是匪徒巢穴。四是沿岸驻军多为骄兵悍将，粮米经过，马上截留。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漕运谈何容易？河道两岸，到处都

流传着一个说法：一斗钱运一斗米。运输成本已经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刘晏心里沉重至极，他在写给元载的报告中说，洛阳附近“百户无一存”，宜阳、荥阳一带，五百里之内，居民不过千户，整个地区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也看不见炊烟，简直是一个“兽游鬼哭”的世界。正如杜甫创作于此时的《无家别》所云：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在这种情况下，漕运当然无法正常进行。

刘晏在报告中把困难向元载和盘托出，请求全力支持。《资治通鉴》说，元载“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

刘晏得到元载全力支持，自代宗广德二年（764）开始，在解决漕运问题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他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

他首先是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哪里有困难，刘晏就出现在哪里，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终于顺利通航。

在运输方案设计上，刘晏有两个突破。一是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二是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他认为，漕运全程过长，不同地域的地貌、水道、安全、人文因素差别极大。过去一只船从头运到尾，历经风险，到达目的地时，粮食还剩八成就算优等了。改为分段接运之后，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为了降低风险，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送，一站接一站，到达目的地时，100万斗米没有1斗损失。至于将散装大米改为袋装，更是一个减少消耗的创举。

在运输工具方面，刘晏经过缜密研究，拨付大批资金在扬子（江苏仪征）开设10个船厂，建造2000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每艘船给1000缗（缗，穿铜钱的绳子，每缗1000文），用以支付材料和人工。有人质疑说，每艘船500缗足够了，投资那么多，不是浪费国家开支吗？刘晏说，办大事的不能在小地方克扣，应该选用上等原材料，并且让工匠们不愁衣食，这样造出来的船才能坚固耐用。如果处处卡钱，船的质量不好，麻烦就大了。果然，到后来宪宗、懿宗时期不断压低造船经费，物料次等，工钱极低，造出来的船薄脆易坏，漕运渐渐就废了。

再说漕运最后一关三门峡。这里水流湍急，常常浪激船翻。刘晏参与设计了一种超大型的“上门填缺船”，还研究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

制成坚韧的纤绳，减少纤夫伤亡事故。每船配备30人拉纤，5人撑篙，解决了船只通行的技术难题。

在人力使用上，废除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用制。利用盐税雇工，减轻对农民的征调劳役。这样一来，就充分保证了漕运所需的人工。漕工则采用特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纪律严明，责任到位，堵塞了可能发生的跑冒滴漏。

由于综合治理措施得力，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彻底解决了关中粮荒。关中即使遇到灾害，物价也不至于飞涨了。

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他派警卫部队带着乐队到长安东渭桥迎接刘晏，元载和文武百官亲迎救命粮，向刘晏转达代宗的问候："你真是我的贤相萧何！"

闪着金光的自由盐粒

漕运需要大量经费，每年用度几十万缗，钱从哪里来？

难不住刘晏。他还兼任盐铁使（管理盐、铁、茶的专卖），这位经济大家在食盐专卖方面展开改革，既方便了百姓，又提供了巨大财源。

唐初对盐的税收不太重视，安史之乱发生后，朝廷财政困难，一个名叫第五琦的高官开始推行食盐政府专卖制。办法是，所有盐户都到政府注册，由政府确定生产计划，生产的盐全部由政府购买，私自卖盐给商人的，抓起来坐牢。然后，政府官员把盐运到各地，由政府开店把盐卖给民众。总之，官产、官运、官销，各级盐吏大包大揽。政府这样做，虽然筹措了部分资金，但是产生了三大弊端。

一是各级官员上下勾结，贪污腐败，这是官商一体的通病。二是政府直接从事商业，效率奇低，百姓大吃苦头。比如销售点少，不管老百姓远近。再比如盐多卖不出去，硬把盐摊派到老百姓头上，盐少又不见踪影了。三是由于上述种种弊端，税收难以持续增加。

刘晏把官产、官运、官销改为民产、官收、商运、商销，这就变成间接专卖制。他撤销了很多基层监管生产的小吏和冗员，百姓生产食盐的环节放开，但生产的盐仍由政府统一收购，储存在盐场里，然后向商人批发。商人买到了盐，自由运往各地自行销售，不受限制。这样，产、运、销三环节全部由私人进行，国家只从购销的差价中获得税收，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刘晏还奏请罢免了各州县设置的对食盐的“过境税”，使食盐的生产和流通蓬勃发展。

另外，在距离产盐区较远的地方，刘晏下令设立常平盐仓，平时备盐，应对盐荒，避免盐商囤积居奇，哄抬盐价。他在主要产盐区设立13个巡院，在其他地区设立10个盐监，专办盐务，负责调研和执法。另外还在各交通要道设立几千个盐仓，储备食盐，哪个地方盐脱销，可以就近调运供应。

由于他的措施适应市场需求，唐朝盐税从第五琦时期的60万贯急剧上升到600多万贯，税收增加10倍，超过唐朝所有税收的一半。漕运经费、宫廷费用、军费、官员工资，都仰仗盐利所给。

刘晏创设的食盐间接专卖制，为以后各个朝代采用。从五代到宋，直至明清，虽有部分变动，但实质上一直是这个办法。

市场之神

刘晏在各地都设立了巡院，作为经济信息基地，并以高报酬招募大批善于奔走的信息员（当时叫“疾足”或“驶足”），传递经济信息。为此，还在巡院和京师之间设立了专门的驿站，负责接应信息员。此前，邮递由富人把持，送信算服徭役。穷人在服徭役期间送信，邮递效率很低。由巡院、驿站以及专业疾足送信，是刘晏对唐中期通信制度的改革。

各地生产态势、物资余缺、物价变化、气候异常、市场心理等等信息，都要通过疾足上报，以便采取措施，调剂余缺。刘晏据此发布命令，再由疾足传回各地执行，以保持供求平衡，物价稳定。

古代交通不便，不少地方和京城距离遥远，再“疾”的“足”，往返也要十天半个月。遇到粮食收获季节或灾害突然发生，政府买进卖出机不可失，怎么办呢？

刘晏自有奇招。

他责成交通方便的产粮州县，统计出最近几十年粮食的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的历史数据。然后，把收购价格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为5等，把收购数量按从多到少的顺序也排为5等，这样产生了两排数字。这些数字上报议定之后，就作为各地政府收购粮食的依据，以便及时收购。

具体做法是，价格最贵的一等价格的粮食（高价），按收购量最少的第五等数量收购（少收）；反之，价格最低的第五等价格的粮食（低价），按收购量最多的第一等数量收购（多收）。第二等价格按第四等数量收购，第三等价格按第三等数量收购，第四等价格按第二等数量收购。收购要抢时机，不必等候批示。这样一来，在那些粮价低贱的地区，就能够把粮食尽量多收购到手。

这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模型在经济上的应用，有如后来华罗庚运用数学模型创立的“优选法”、“统筹法”。

这个在经验基础上产生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不但简洁明了，避免了繁复不清的讨论，而且符合地方实际，也有利于政府以最小的成本平抑物价，调控市场。

刘晏要求各地把收购数量逐日上报，由他汇总之后，按“避贵就贱、取近舍远”的原则调节安排。如果收购量不足，就让价低路近的地区增加收购。如已够数，就命令价高路远的地区停止收购。这样做，既掌握了

市场规律，也能有效地保持物价（主要是粮价）稳定。在刘晏主持下，当时农产品市场大体实现了“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

由于刘晏及时地掌握市场信息和各地气候情况，所以他常常能走在市场大波动和大灾害的前面，事先就采取了预警和救助措施，布置到位，使灾难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被当时人尊称为“神”。

唐代中叶的格林斯潘

所有沉迷于自己专业的天才人物，在冥思苦想中容易出现某种奇迹，刘晏也是如此。

他自称每时每刻都看到地上流着钱。他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钱引导到应有的归属方向，产生效益，利民利国。每当骑马上朝，他都利用路上空闲，用马鞭子指指画画进行筹算。天刚亮就开始办公，到深夜才停下来，放假也从不休息。

刘晏讲求效率，不管是紧急的问题还是不那么迫切的问题，都是当天处理完毕，绝不拖延积压。

刘晏慧眼识才，他提拔重用的大批人才如戴叔伦（唐代著名诗人）、包佶、陈谏等人，在经济上都能独当一面，颇有建树。

《旧唐书·刘晏传》说："晏没后二十余年，韩洄、元秀、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继掌财赋，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其中，陈谏机警聪敏，过目不忘，后来成为顺宗时"二王八司马"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陈谏撰文推崇刘晏是管仲再现，称赞刘晏在极为混乱的局面下，细心研究每州每县经济状况，每当一个地方的灾情刚露苗头，就详细测算。结果，老百姓还没到最困难的境地，政府救灾措施已经下来了。刘晏的办法叫"常平法"，即丰年大量收购粮食，灾年以贱价在灾区出售。同时大量收购灾区杂货，再把杂货运到收成好的地方营销，而不是单纯采用无偿救济手段。这样，政府和民间都得好处，唐朝的经济复苏并发展起来了。

安史大乱，货币紧缺，金融一塌糊涂，京师几乎"人人铸钱"，恶币充斥，国家财政破产。刘晏掌管货币铸造发行权之后，允许江南人以物购物，然后把这些物品置换为铜，在当地监督铸钱。铸出来的钱成色非常好，大量运往长安及重要城市，增加了货币供应，币值稳定，物价下跌，良币驱除了恶币，刹住了民间私铸钱币之风。

刘晏的同代人陆羽写了《茶经》，但促进种茶业发展的却是刘晏。茶有丰厚利润，刘晏当政时却始终没有收税，除了少数官营茶场之外，大量民产茶仍采取间接专卖方法，搞活流通，刺激了茶叶生产积极性。刘晏死后，一些恶吏开始征收茶税并不断增税，不仅摧残了种茶业，而且逼得走投无路的茶农起来造反。

刘晏说："理财须以爱民为先。"他在接掌经济大权之后，陆续免除

了农村一些不合理的赋税。对于城市工商业，也实行减税政策。过去工商业的户税都要加重征收，刘晏在大历年间取消了这个规定，让工商业者和其他人户税税率相等，扶植了工商业发展。至于做好粮食储备调剂工作，平衡物价，防止谷贵伤民和谷贱伤农，更是他著名的功绩。安史之乱，人民死亡众多。从广德二年（764）刘晏接手办漕运开始，到大历末年（778），刘晏管辖的地区增加了90万户人口。那些不属于刘晏管辖的地区，户口就没有增加。

代宗广德二年（764），刘晏任户部尚书（掌管财政和民政事务的部长）。代宗大历四年（769）升任吏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员的选拔考核，相当于中组部部长），并与第五琦分别兼任不同地区的经济领导人。刘晏管辖8个道（地区建制，每一道相当于现在好几个省），范围超过大半个中国，为唐朝经济最发达地区。

刘晏的经历，既不是刀光剑影，也没有风花雪月，有人也许觉得索然。但是刘晏的一举一动，活生生地渗透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生活，决定着民众的饥饱贫富，因此又是那样具有生命力，并且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境界，闪耀着经济之美。

刘晏如同亚当·斯密一样，非常重视“看不见的手”。在盐务活动中，他放弃了强制性的官产官销，而是更多发挥私人和市场的作用。在漕运事业中，他不赞成强制性无偿劳役，把雇用制引入到国家经济事务当中，建立劳务市场，这在当时堪称慧眼独具。

刘晏更接近著名的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即更重视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刘晏没有留下什么专门的经济著作，他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经济措施当中。就刘晏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格林斯潘在任期间对美国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专案组组长得罪人

刘晏身居高位，朝中许多官员都是他的门生弟子或被他提拔起来的，可是他住的房子很小，没什么装修，家里也没有婢妾。当刘晏被诬陷致死，杨炎派人去他家抄家的时候，结果只有杂书两车，粮食几斗。满朝文武听说，不禁欷叹息。

刘晏被诬陷，还要从元载说起。在肃宗、代宗两朝连任宰相15年的元载，口才上佳，能力很强，可也贪欲无度，横行霸道。他搜刮民财，残害百姓，受贿卖官，贪污腐败。代宗大历五年（770），元载帮助代宗密谋剪除了大宦官鱼朝恩，自恃有功，更加恣意妄为。他包庇奸邪，陷害忠良，越玩越大，甚至发展到对代宗也时常欺负耍弄的地步，结果导致代宗痛下杀手，于大历十二年（777）三月逮捕了元载及其党羽，并任命刘晏为专案组组长。

办案结果，元载及其妻、子赐死。此时任吏部侍郎的杨炎，因与元载“亲重无比”，坐贬道州（湖南道县）司马（辅佐官员），这就与刘晏结下了梁子。

过去，刘晏和杨炎同在吏部，刘晏是杨炎的顶头上司。两人都是才子派头，盛气凌人，谁也不服谁，关系搞得很紧张。刘晏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排挤杨炎，也是两人结怨因素之一。

其实，代宗任命刘晏审讯元载，是借重刘晏的威望，并非刘晏与元载私人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实际上，刘晏在工作上还得到元载不少支持。但刘晏既受命担任专案组组长，不能不秉公办事。

史书称，刘晏担心元载势力庞大，特地要求代宗加派皇族李涵等5个大臣共同参与主持专案工作，以免将来落下什么后遗症。刘晏多了这个心眼完全必要。

代宗诛杀元载，本意要尽除元党，而元党名单中，杨炎赫然在第一位。正是由于刘晏上书代宗，建议分清首犯从犯，不能都处死刑，杨炎才得以活命，不然杨炎早就身首异处了。尽管如此，也没有防住杨炎日后的报复，这是后话。元载一除，朝野欢声雷动。当然，贬官途中垂头丧气的杨炎就不这么想了。

杨炎初试锋芒

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刘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他对当时混乱异常的赋税制度，并没有提出改革。也许他办公桌上的问题堆积如山，顾不过来；也许他筋疲力尽，对赋税改革产生了畏难情绪？不管怎么说，这就为有志者进行改革留出一个巨大空间。而这项工作正是由杨炎完成的。

杨炎在新皇帝上台之后翻身。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去世，太子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八月，由于宰相崔甫力荐，杨炎在道州司马这个小官任上直接被提拔为宰相，这是历代都很罕见的事。

原来，在大历年间，代宗因宠爱独孤贵妃，曾企图废掉李适的太子地位，改立独孤贵妃所生的儿子李回为太子，因遭到元载极力反对，李适才保住了太子地位。李适当了皇帝，饮水思源，对元载充满感激，一上台，就破格提拔元载的亲信杨炎，后来还为元载平反。当然，李适在当太子的时候对杨炎的才华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是提拔的重要原因。

此时刘晏已升任尚书左仆射（唐代以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掌中央大权。中书省定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实施，三省平级。尚书左仆射是尚书省最高负责人，下辖吏部、礼部、户部、刑部等六部。唐中期之后，尚书左仆射地位降低，被排除出宰相行列）。杨炎出任宰相，刘晏见势不妙，提出辞职。德宗鉴于刘晏的能力及威望，竭力挽留，并扩大刘晏在经济上的管辖范围，刘晏实际上统管了全国经济工作。

杨炎一上台，初试锋芒震动朝廷，他的矛头首先指向皇宫内库的问题。

原来，我国自西汉以来，就建立了国家经费与皇帝私人费用分开的制度。唐朝初年也是如此，国家财赋都归入国库——左藏库保管，掌管国库的太府寺每季上报账目，由刑部下设的比部司进行核对，一点弊病也没有。

但安史之乱发生，全国一片混乱。当时第五琦负责经济工作，京师一些有实力的将领毫无节制地向国库索取财物，第五琦挡不住，就把国家财赋都运进皇宫里的大盈内库保存。皇帝觉得这样用钱很方便，也就没有再交出来。从此以后，国家财赋变成了君主私产，政府主管部门无法计算库存，而在大盈内库当差混饭吃的宦官却达到300人。

杨炎对德宗说：“财赋是国家根本，百姓的咽喉性命。代宗时期出于

权宜之计，让太监掌管。结果太监就操纵国家权柄，大臣谁也不知道库存虚实，怎么能研究利害并制定政策呢？目前最急迫要解决的弊端就是这个。请求陛下把国家的税赋交出来，仍归有关部门掌管。至于皇宫所需费用，可以估计一下每年所需，照数供给就是了，绝不会少一星半点。现在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才好谈别的事情。”

刚上台的德宗颇想有一点作为，立即批准杨炎的奏请。

如此敏感棘手的问题，竟如此顺利解决，朝臣们吃惊的同时，都期待杨炎多干点好事，成为贤相。

两税法横空出世

杨炎受到鼓舞，第二天再次上奏，提出两税法，代替行之已久的租庸调法，这是牵涉千家万户的一件极重大的事。

唐初开始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至此已经150多年。

均田制：

16岁以上男丁每人分给100亩田。宅基地另按人口批给。

租庸调：

“租”就是地租。按男丁计算，每个男丁每年交玉米20斗或稻米30斗。

“庸”是劳役。每个男丁每年服劳役（无偿劳动）20天，闰月加2天。如果不去，可以交实物相抵，每天折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

“调”是缴纳手工业品。如蚕乡，每个男丁缴纳绢、绫、粗绸各2丈，棉3两。非蚕乡缴纳布2丈5尺，麻3斤。皇室贵族勋臣免交租庸调。

除租庸调之外，还有其他税费：

一、户税。唐初，按每户资产不同，把天下户分为9等，按等缴税。如大历四年（769），“上上户”每年交4000文，“下下户”交500文。

二、地税。每亩交玉米2升。

三、“杂徭”，又称“色役”、“资课”等。即为各级政府做各种杂务劳动，也可以用交钱替代。

四、代宗时还增设“青苗税”（田里冒出青苗即收税）。

五、各地政府及军阀巧立名目收取的税费。

租庸调的特点是“以丁为本”，不问资产。如果人没有了，就不好办了。

安史之乱导致农民大规模死伤逃亡。据《中国经济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大乱之前的玄宗天宝十四年（755），政府管辖人口5292万。到大乱尾声的肃宗乾元三年（760），管辖人口1699万，人口减少了3600多万，其中逃亡人数众多。均田制破产，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

杨炎的两税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来的。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政府量出制入，根据支出额度确定征税额度，一改过去一直是量入为出的财政制度，确定全国税额，摊派各地征收。

二、不分原住民和移民，一律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根据每家资产多少定出不同等级的户，确定应该缴纳的“户税”；再根据拥有多少土地，征收“地税”。各地田亩数字，大致以代宗大历十四年（779）的数字为标准，进行征收。

三、租庸调和所有其他税费全部废除。流动商人按其经营所在地，收1/30的税。

四、每年两次纳税，夏税在六月之前缴纳，秋税在十一月之前缴纳。正因如此，所以名为“两税法”。

五、两税一律用钱缴纳，个别情况也可以折收实物。

六、除两税之外，严禁另立名目征收其他税费，否则以“枉法”论处。

应该特别标举的是，在中国财政史上，杨炎之前和杨炎之后（直到近代），都是实行量入为出，只有杨炎提出了量出制入即量出为入。经济学界认为，像杨炎这样实行量出为入，才算是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财政制度。因为随着国家机器日益庞大，量入为出的原则无法适应实际需要。

有人说，对杨炎的评价要慎重。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国家直到19世纪末期才出现量出为入的原则，中国一直到近代的财政思想基本上也是量入为出，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换句话说，是杨炎的措施太超前，带有临时性。但是，毕竟杨炎在世界上最先提出了这一原则。

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评价说，仅这一点，就可以使杨炎在世界财政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杨炎提出的两税法，德宗又是立即批准，宣布自德宗建中元年（780）正月起，正式实施两税法。

两税法收税对象是资产，扩大了纳税范围，减轻了农民负担，简化了税制，集中了纳税时间，方便了民众，增加了政府税收，政府也省去了一年四季不断催索，因此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新唐书·杨炎传》称赞两税法说：“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另外，杨炎主张，除了“田亩之税”仍以谷物缴纳之外，其余各税一

律改为以货币缴纳。这说明，杨炎对货币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深刻认识。

当然，秦晖所说“黄宗羲定律”（简化税制之后再度发生乱摊派），这里是存在的。比如两税法实行3年之后，淮南（扬州）节度使陈少游在本地征收两税钱的时候，下令每1000文多收200文，其他地方纷起仿效。从此各地“悍将猾吏”老病重犯，乱摊派之风再度刮起，繁重徭役也重新抬头。德宗时期的大臣陆贽后来就曾批评两税法带来的弊端，但由于两税法较租庸调毕竟胜出一筹，所以从唐朝到明朝，大体上一直实行这个税收办法。

刘晏屈死，天下喊冤

一个平素还算理智的人，假如被复仇的欲望攫住了身心，那么他也会失去理智，陷入狂热。这种狂热又会导致他费尽心机，不择手段，玩弄诡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哪怕是既害了别人，又伤了自己，也管不了许多了。正如培根所说："复仇之心胜过死亡。"

杨炎回朝，内心煽起的正是这样一种复仇的狂热，杨炎要收拾刘晏为元载报仇。但是刘晏政绩显赫，声望卓著，廉洁自律，怎样下手呢？杨炎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阴损的招数。他知道，德宗的心理痛点，就是他当太子的时候差点被废掉。早先朝内外曾传说，刘晏也参与了废太子的阴谋，但无实据。而只有抓住这一点，才能击中刘晏要害，使德宗对刘晏产生怨恨。除此之外，在政绩和道德上，做不了什么文章。

于是，在建中元年（780）正月，杨炎回朝仅4个月之际，他就布置心腹，在朝内外散布刘晏曾参与废掉太子阴谋的流言，作为铺垫。

当时，朝廷正乱哄哄地闹着为德宗寻找生母的大事。原来在安史之乱中，德宗与他的生母沈氏离散，沈氏后来没了下落，德宗一直记挂在心。登基之后，便派出诸多使臣四处寻找生母。一时间，颇有几个贪图富贵的老太太假冒沈氏前来相认，当场被一一识破，弄得德宗心绪不宁，神情黯伤。一天，杨炎上朝，正碰上寻找皇太后的副使、工部（负责重大工程营建及农林牧渔事业）尚书乔琳（相当于部长）向德宗汇报寻找沈太后的工作进展情况，德宗听得泪流满面。

杨炎见到机会来了，先流下两行泪水做忠厚状，然后跪下奏报："想想陛下一家的事情，真是令人感叹万分！靠了祖宗神灵保佑，先帝和陛下的关系才没有被贼臣的阴谋所离间。现在有关贼子已经伏法，可是当初参与废掉陛下的刘晏依然还在。我身为宰相，没有让他得到应有处罚，真是罪该万死！"

德宗素好猜忌，这一下正好碰痛了他的旧伤，一下子沉默起来，面有怒色。

此时亏得几位大臣一个一个出言力争，劝德宗不要听信流言。他们说："此事本系流言，况且时隔已久，陛下早就宽恕了流言牵涉的很多人，现在更不宜以飞词虚语定大臣之罪。请陛下明察是非，继续信任劳苦功高的刘晏。"

杨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随即上奏："尚书省（刘晏负责的部门）

是国家政治根本，近年来添了许多专使职务，分散了它的决策能力，现在应当恢复旧制，把盐铁、转运等事务划归到户部来管。”杨炎的真实意图是想逐步削减刘晏的权力。

德宗当即同意，就在正月里下诏，罢免了刘晏所兼的转运、租庸、盐铁、常平等诸使。刘晏从此不再负责经济工作。

杨炎又接着耍花招，他派人去查刘晏的经济账，借口有些账目对不上，在这一年二月，通过德宗，把刘晏贬为忠州（四川忠县）刺史。

杨炎为了置刘晏于死地，一不做，二不休，特地委派一向与刘晏不和的司农卿（掌管中央农业机构的高级官员）庾准担任荆南（地跨四川、湖南、湖北部分地区的行政区）节度使，当刘晏的上司，并授意庾准给刘晏罗织罪名。

庾准本来就投靠了杨炎，立即会意。他在荆南节度使任上向朝廷报告说，刘晏在忠州暗中交结一些谋反者，又企图扩大忠州军队，策划造反。

接到密报的德宗在这一年七月，秘密派遣宦官到忠州，绞死了66岁的刘晏。但德宗畏惧刘晏的声望，犹犹豫豫，过了19天，才下诏书公布刘晏死罪，并下令刘晏的妻子李氏、长子执经、次子宗经充军岭南。

就在6个月之前，德宗挽留刘晏时，还下诏表彰刘晏“久勤元老，集我庶务，悉心瘁力，垂二十年”。现在却给刘晏扣上一堆空洞的大帽子，诬称刘晏“性本奸回”，“恶迹彰闻”，“结聚亡命”，“力行无度”，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还有一件事，颇出乎德宗和杨炎意料之外，就是上文提到的抄家时，刘晏家里只有杂书两车，粮食数斗。刘晏长期主持全国经济，每年过手的钱物何止亿万？杨炎原以为通过抄家可以揭出刘晏腐败，没想到事情竟是这样，反倒证明刘晏是个清官。

刘晏屈死，全国震动。“朝野侧目，天下以为冤。”

诸多官员纷纷抨击杨炎手段狠毒。淄青（地跨山东、河南的行政区域）节度使李正己带头上书责问朝廷：为什么这样仓促地杀掉刘晏？刘晏的罪名是否经过仔细核实？现在全国都替刘晏喊冤，希望把他的家人迁回都城。

杨炎重蹈覆辙

李正己可不简单，他当时实力强大，朝廷颇有点怕他。唐中期之后，一些强悍的节度使寻找理由讨伐朝廷的事屡见不鲜。杨炎一见李正己的上书，六神无主，生怕李正己和其他节度使借此向朝廷兴师问罪，一旦事情闹大，自己难免会被抛出来做替罪羊。于是，杨炎扣下李正己的上书，在头脑昏乱之中，未经仔细考虑，就急忙派心腹到各地活动，对各地节度使说是德宗主谋杀刘晏，我杨某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

德宗马上就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即派太监到李正己那里核实。太监回报说，杨炎确实是把责任推到了皇帝一个人身上。德宗大怒，觉得杨炎不忠。《资治通鉴》说："上闻而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

德宗怎么处置杨炎呢？他先是提拔了一个叫卢杞的奸人当宰相，分杨炎的权。卢杞的祖父卢怀慎是玄宗时期著名宰相，父亲卢奕在抗击安禄山的战争中英勇牺牲，这是卢杞的政治资本。卢杞本人则极善于揣摩主子心意，因而被德宗看中，把他从御史中丞（监察部司局级官员）的位子上提拔为御史大夫（部长），10天之后提拔为宰相。

卢杞这人面貌奇丑。铁青脸又宽又短，微呈蓝色。鼻子扁平，鼻孔朝天，双眼距离超长。平常人两眼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眼睛的长度，他的双眼距离足有两个半长。卢杞眼睛的另一大特点是上眼皮和下眼皮几乎挨上，看上去只有一道细缝。你看不见他的眼神，他却能把你看个清楚。这一副尊容，真能把女人吓死，人们背后都称他为活鬼。再加上他没什么学问，不会写文章，大帅哥兼大才子杨炎两眼都不瞧他。

原来，自崔甫病重去世之后，杨炎一直独揽宰相大权，现在卢杞横插进来，指手画脚，自作主张，心高气傲的杨炎哪受得了这份气？仗着自己当朝元老、才大气粗，不时跟卢杞争吵干仗。

但德宗此时已经失去了对杨炎的宠信，两人恶斗的结果是，建中二年（781）七月，德宗罢了杨炎的宰相职务，调他任尚书左仆射这个虚职，跟刘晏死之前的官职一模一样。杨炎又重蹈刘晏被排挤、被诬陷的覆辙。这样的巧合，难道不是历史的捉弄吗？此时距刘晏被杀才一年。

卢杞是什么人？《资治通鉴》说："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谁要是稍微不附和他，就整死谁。这样一个巨奸大恶，身居高位，又有德宗宠幸，哪里放得过杨炎？

卢杞摸到了德宗的底牌，使出手段，查出杨炎曾利用宰相地位，迫使下级官员用高价买下自己的旧住宅，多拿了房价。这件事其实不至于判一个宰相死罪，但卢杞逼着判案官员无限上纲，对杨炎做出了“监主自盗，罪绞”的判决。

另外，更为险恶的是，卢杞还查出杨炎在长安曲江（西安市东南）建了一座祭祀祖先的家庙，这座家庙所在地是唐玄宗曾到过的地方。卢杞重点向德宗讲了后一件事。他说：“杨炎建家庙，专门看哪里有王气，这小子暗中是想当皇帝。”

卢杞这一番话，再一次触动了德宗的痛点和软肋。德宗立即贬杨炎为崖州（海南琼山）司马同正（不任司马实职，享受司马级待遇）。

杨炎还没有走到崖州，德宗的诏书就追下来了：“罪臣杨炎缢杀之。”55岁的杨炎就这样结束了生命，这是建中二年（781）十月的事。杨炎死后，就没有替他喊冤的了，这是作恶的报应。

余秋雨曾著文论述中国历史上的小人。卢杞自不用说，杨炎是不是小人呢？诸多古代史书说是，这些著作指杨炎除了提出两税法之外，其他“乏善可陈”。

当然，杨炎与卢杞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极大区别。杨炎对唐朝经济复苏做出了划时代巨大贡献，世界经济史上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卢杞呢？成天只是揣摩主子意旨，内斗整人而已。

杨炎的确是罗织构陷，报复心强，有小人的品性，他的道德规范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要杀一个四朝元老、总理级大臣和指挥国家经济运行的台柱子，岂能私下个人说了算？在这个案子中，最大的责任人是德宗，最后赐死刘晏的命令就是德宗下发的诏书。德宗一时起杀机干掉刘晏，紧接着又杀杨炎，为什么？他是以此向天下做个交代，平息众怒。两次杀掉大臣，理由都不充足。中国历史上两个天才的宰相理财家，就这样草草死于非命，岂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应该说，德宗才是罪孽更大的小人。

德宗杀刘晏和杨炎，都是根据传说和虚报，这两个传说和虚报，恰好击中了德宗的痛点。这说明杨炎和卢杞这两人，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和精细的揣摩术，平地起惊雷，一发必中。同时也说明，心胸狭隘的德宗对于自己皇位的稳固性，有着超乎一般人想象的敏感。唐代安史之乱中，争夺统治权之战异常残酷，德宗的过敏，也是时代的产物。

唐代最高领导人产生机制的缺陷，导致了君臣两方面的人格变异。

余秋雨说，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

是体制的产物。正是专制的皇权，源源不绝地大批制造着小人，连皇帝本人也概莫能外。

历史这只大手，正是这样捉弄着人们的命运。

“二王八司马”的146天

毛泽东关注“二王八司马”

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为首的永贞革新，或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是一次彗星般耀眼而短促的改革。由于两位旷世文豪刘禹锡和柳宗元深深卷入，使这次改革更加令人瞩目。

毛泽东极为赞赏“二王八司马”中的柳宗元。毛泽东曾把郭沫若和柳宗元相比，认为郭沫若远不及柳宗元。

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史稿》说，1973年5月，毛泽东读了郭沫若著的《十批判书》之后做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8月，再做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这两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子厚是柳宗元的字。《封建论》是柳宗元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该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封建制（家族成员分封为王，统治各地）和郡县制（中央派出官员管辖各个地区）的利弊得失，认为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打破周代的封建制，实施郡县制，是很大进步。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则猛烈鞭挞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秦实施郡县制评价也不高。另外，这本书还赞扬孔子进步，“代表人民利益”。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毛泽东认为，秦始皇（祖龙）虽然死了，郡县制等规制却留了下来，焚书坑儒也需重新评价。孔子仰慕周代，是开历史倒车。毛泽东劝郭沫若不要从柳宗元的立场倒退，跟着孔子颂扬实行封建制的周代。

在随后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郭沫若为此大吃苦头。

其实，柳宗元的《封建论》也抨击了秦始皇强迫民众服苦役的暴政。

由于毛泽东对柳宗元情有独钟，1971年特别批准章士钊研究柳宗元的巨著《柳文指要》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选集》等少数著作外，出书审查极严。据章士钊女儿章含之《十年风雨情》一文回忆，《柳文指要》“在成书过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阅修正”。《柳文指要》长达100万字，毛泽东完成此项繁难的阅校，殊为不易，这

与毛泽东对柳宗元的高度关切有关。

毛泽东倾心柳宗元，自然对柳宗元积极参与的重大事件——永贞革新十分关心。毛泽东对“二王八司马”是同情和支持的。由此，“二王八司马”的另一重要人物刘禹锡在“文革”中也走了红，被列为“历史上著名的法家人物”，各种版本的刘禹锡诗文集纷纷问世。

其实，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与他的秘书田家英就多次谈论过“二王八司马”事件。流风所及，“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在天津作“评法批儒”报告时，也大谈“二王八司马”事件。不过，江青欠缺历史知识，错把“二王八司马”的对立面韩愈也算在“八司马”里了。

“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是一场非正常的运动。毛泽东发起这个运动，有他的复杂的政治意图。柳宗元和刘禹锡被抬出来为运动服务，也并非这两位先贤的意愿，这些都不在本文议论范围。此处引证这段历史，不过是为了说明毛泽东对一般人感觉冷僻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投入了长期关注，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的影响。

余秋雨做了一个梦

余秋雨散文《柳侯祠》的开头写道：“客寓柳州，住舍离柳侯祠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

梦中的荒芜生态和灰黯色彩，正是“二王八司马”结局的写照。

余秋雨梦醒，参观柳侯祠，接着著文描写了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贬官湖南永州和广西柳州，“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高峰性构建”。

正是在柳州，柳宗元低吟着“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的诗句（《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以47岁壮年，郁郁而终。

打开《刘禹锡集》看看，“一坐飞语，废锢十年”、“失意多病，心如寒灰”的句子，比比皆是。

与柳宗元、刘禹锡同时的名流如韩愈、白居易等人，都从不同角度描述过永贞革新。唐代作家李谅创作的传奇《辛公平上仙》，则影射了支持改革的唐顺宗被宦官杀害一事，可见当时此事影响之大。

可惜，对这一重大改革事件，历来研究不足而非议不少。《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著作，对“二王八司马”均持贬斥态度，乃至目为“邪党”。

古人局限自不必论，近来有人说“二王八司马”事件“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有人把王叔文推进改革说成是“秘书干政”，多此一举。理由是：“王叔文职务仅是一个翰林学士（皇帝机要秘书），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由翰林学士担负这么重大的革新使命，自然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失败也就理所当然。”

假如这种逻辑成立，那么同样是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宋代，贵为宰相的王安石发动改革为什么也会失败？而唐代诸多太监连翰林学士这个名分都没有，废立7个皇帝都能成功，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唐两个奇人

王叔文（735～806）和王（？～805）堪称唐朝一对奇人。

两人都是浙江人。王是杭州人，唐德宗李适（742～805）末年任翰林待诏（尚未安排正式官职称待诏），写得一手好书法，被德宗派去教太子李诵（761～806）写字。至今，一些文物拍卖会还有王的书法传世。王叔文是绍兴人，原任苏州司功（苏州地区辅佐官员），下得一手好棋，经人推荐进入东宫，教李诵下棋。

恰好，李诵也爱琴棋书画，师生相得益彰，其乐融融。

王这个人，《旧唐书》说他“貌寝陋”。人长得丑，但他心思活络，幽默诙谐，喜好杂耍，颇讨李诵喜欢。

王叔文是整天蹙着眉头，庄重严肃，智谋突出。刘禹锡在《子刘子自传》中说王叔文“能以口辩移人”，口才极佳。

二王性格恰好互补。王常常哄太子玩，而王叔文则“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李诵与王处得最亲热，对王叔文更敬重。

因缘际会的是，二王心思很大。两人不但洞彻时局，而且颇有文武谋略。特别是王叔文，政治才能更为突出。李诵对父亲种种作为也很不以为然——德宗心胸狭仄，贪婪成性，重用宦官，纵容藩镇，加重了唐朝危机。对此，40多岁的李诵忧心如焚。

就身边事而言，李诵最难过的是宫市和五坊小儿等弊政。

宫市是皇宫采购，宦官买东西不按规矩付款，少付多拿。后来，连少付也不愿意付了。宦官们干脆在长安东西两市安排了几百名白望。所谓白望，就是站在市场上左右张望，见到好东西就说皇宫需要，白白拿走。白望就是白拿。还有许多小偷窃贼也扮成“白望”，真假莫辨。因此，东西两市的店家们见到“白望”出动，吓得纷纷闭门谢市，长安日渐萧条了。

与刘禹锡同岁的白居易实在气不过，曾冒风险写了《卖炭翁》一诗揭露宫市黑幕，沉痛至极。这首诗多年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读者想必对宫市已经有所了解。

五坊则是饲养5种动物的地方，称为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这是宫中专门捕捉动物供皇家玩乐的处所。五坊小儿（唐朝对宫中服役的人多称为小儿）简直就是一批流氓，倚仗皇宫权势，故意将网张

在人家门口或者井口。有人走近，就诬称惊动了朝廷需要的鸟雀，一阵痛打，直至拿钱来才肯罢休。

事情还远不止于此。五坊小儿没事到外边闲逛，进饭馆吃饭不给钱。不但不给钱，还在饭馆里留下一筐毒蛇，叫店主好好饲养。店家无奈，赔钱赔礼，千求万求，这帮恶人才肯把蛇筐带走。

一次，李诵与王叔文等人聊到宫市弊害，痛恨不已。他说："此事弊端太大，我想进言，要求罢免宫市。"大家都赞成，独王叔文一言不发。

李诵等众人走后，问王叔文："先生刚才一言不发，是为什么？"

王叔文说："本朝规定，太子要好好学习，侍膳问安，不要多过问朝政。评头品足多了，会引起疑心。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买人心，那怎么解释？"

李诵听了连连点头。原来，德宗猜忌心强，常常不计后果轻举妄动。先前就曾发生一件大事。那是德宗登基不久的贞元三年（787），曾因宫里一件案子，差点废了李诵的太子地位。李诵一度企图自杀，幸亏宰相李泌拼死力谏才保住太子地位。李诵想起往事，不禁后怕。从此，李诵对王叔文格外器重。

王叔文在没掌权时倒还沉得住气，掌了权之后就变了一个人，干什么事都急切万分，此为后话。

李诵与王叔文、王"二王"相处十几年，除了琴棋书画之外，日常议题，大都是继位之后如何改革政治弊端。一个小小影子内阁大体成形了。

新锐干将——刘禹锡和柳宗元

当然，影子内阁并非只有二王。为了实现预定目标，二王在朝廷里先后物色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知名人士，最著名的当推刘禹锡、柳宗元，所以后人又称改革集团为“二王刘柳”。二王对刘禹锡更为欣赏，密谋将来掌握大权之后，让刘禹锡担任宰相。

刘、柳两人是光耀千古的大文学家、思想家。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祖籍河南洛阳，生于苏州。21岁到23岁连登三科。贞元九年（793），21岁中进士。同年又考中博学宏词科（每次仅取三五人，韩愈考3次都没考上）。贞元十一年（795），23岁应吏部取士科考试合格。刘禹锡诗名满天下，与白居易齐名。白居易称刘禹锡为“诗豪”，对刘禹锡极为倾服，称自己写诗不敢与刘禹锡争锋。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盖乐天（白居易）平日之蕲求（追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臻（达到）其理想之境界也。”刘禹锡很多诗句，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及《陋室铭》等散文，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刘禹锡曾任管理太子图书的小官，又任淮南节度使（扬州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杜佑的掌书记（秘书），后于贞元十八年（802）调任京兆府（首都地区）渭南县（陕西渭南县）主簿（相当于县委办公室主任）。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山西永济县，生于西安，比刘禹锡小一岁，亦为贞元九年（793）进士，后又考中博学宏词科。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当时文坛评价他的文章是“精警绝伦、灿若珠贝”。柳宗元学问渊博，韩愈称赞说：“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柳子厚墓志铭》）。当时长安的政治、文化沙龙，柳宗元一到，便光彩照人；柳宗元一开口，满座皆惊服。一时间，公卿政要都想让他当自己的门生；青年才俊都以认识柳宗元为荣。柳宗元的政论、哲学论文、史学论文和散文的代表作，都是唐代290年的巅峰。柳宗元担任过国家图书馆管理员和编辑，后调任京兆府蓝田县（陕西蓝田县）县尉（县公安局长）。

贞元十九年（803），31岁的刘禹锡从渭南县主簿的位子上直调中央，担任监察御史（相当于中央监察部处级官员）。30岁的柳宗元从蓝田县尉任上调任监察御史里行（见习，与御史职权相同，薪水少一点）。

两人来到中央，和韩愈正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35岁的韩愈中进士比刘、柳早一年，任监察御史也比两人早一点。三位文豪很快成了朋友，一起讨论文学，亦为一大乐事。韩愈后来写长诗《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也说：“同官尽才俊，偏善刘与柳。”

但是刘、柳两人到任不久，韩愈突遭重挫。原因是韩愈上书抨击宫市弊端，揭露京兆尹（首都一把手）李实的罪恶，并且要求减免老百姓租税，结果触怒德宗，被贬为广东阳山县县令。韩愈一度怀疑刘、柳两人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为刘、柳当时深受太子信任，在朝廷里很红，说话有影响力。另外，刘、柳在县里工作时，是李实的下级，李实也很器重他们两人，所以韩愈产生了怀疑。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误解。韩愈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上面没有后台。刘、柳两人目睹韩愈此番遭际，暗暗庆幸自己能够得到太子李诵的信任，都觉得这个后台够硬，从此益发充满憧憬，真个是“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于是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激情与抱负，积极参与二王的秘密政治谋划。

韩愈后来写《顺宗实录》说，王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二王看中的其他干部还有凌准、韩泰、韩晔、陈谏、程异、陆质、吕温、李景俭等。这些30岁左右的才俊，基本是御史台（监察部）和六部衙门小官，他们在吏治、军事、财经等方面各有所长。

凌准是史学家，著有《汉后春秋》。陆质是经学家，著有《春秋微指》。韩泰、韩晔、吕温也深研先秦经典，并有经学著作。陈谏曾跟随刘晏工作，是理财家。柳宗元称韩泰“历庄端毅，高朗振迈”。风度翩翩，又严肃端庄。但这些青年才俊有个特点，就是除了韩晔之外，大都出身低微。

韩晔是宰相韩休、韩幌的家族后代。在德宗时期出任宰相的韩幌还是大画家，其名作《五牛图》流传至今。

王叔文和王就是寒门了。刘禹锡的父亲刘绪是给地方官当幕僚的，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做到殿中侍御史（处级监察官员）。凌准等人也没有显赫家世。这个特点，使他们与朝中显贵产生了天然隔阂。勋老贵族蔑视他们，称他们是“躁进之徒”。

革新集团还需要在资历较深的要员中寻求支持。李诵和王叔文的目光瞄准了德宗十分欣赏的才子韦执谊。韦执谊出身世家大族，少有才名，考取进士之后任右拾遗（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翰林学士、吏部

郎中（相当于中央组织部部长助理）。韦执谊从20多岁起就因文采斐然受到德宗宠爱，出入皇宫，充当顾问，是德宗晚年最信任的六大红人之一。

有一次，在德宗生日宴会上，李诵敬献佛像作为贺礼。德宗非常高兴，当场下令韦执谊为这个佛像写赞语，并且让李诵赐给韦执谊贵重的丝织物作为稿酬。韦执谊得到李诵赏赐之后，特地前往东宫拜谢。李诵郑重地向韦执谊推荐王叔文，称赞王叔文是个伟才。韦执谊知道李诵将要登基执政，哪敢怠慢？从此与王叔文结交，日益密切。

顺宗登基

不幸的是，就在德宗生命渐近尾声之际，李诵身体状况突然急剧恶化。贞元二十年（804），就在登基前夕，李诵中风躺倒，体力衰竭，失去说话能力，成了哑巴。这对改革集团是一大重击，也为永贞革新的短命埋下了祸根。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德宗去世。二十六日，45岁的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

顺宗正月掌政，二月就任命韦执谊为宰相，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为左散骑常侍（属门下省，负责政策研究的高级官员）。三月任命王为翰林学士。后又任命凌准为翰林学士，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工部中级官员，负责农田建设及粮食调配），韩泰为度支郎中（财政部中级官员），陆质为给事中（属门下省，审议机要文件的中级官员），韩晔为司封郎中（中央组织部中级官员），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掌文教外交的中级官员）等。影子内阁成员都得到重用和提拔。

当时，翰林学士负责起草机密诏令，轮流在宫廷值班以备皇帝随时召唤。翰林院直接隶属皇帝，翰林学士是除宦官之外唯一能自由出入皇宫内廷的官员，与皇帝的关系自然比其他朝臣更亲近。王叔文取得翰林学士职位后，看到顺宗身体不行了，急迫感涌上心头。时不我待，迅即着手改革。

顺宗卧病失音，只好挂起帘子处理政务，由宦官李忠言和妃子牛昭容左右侍奉。

当时施政操作的路径是，王叔文坐镇翰林院处理政务，提出建议告诉王。王入宫见李忠言和牛昭容，李、牛两人再转告顺宗。顺宗点头之后再返回来，由牛、李传话王，王出宫找王叔文。王叔文斟酌之后，再会商宰相韦执谊贯彻执行。整个改革操作的关键是王叔文。他虽然官虽不大，却握有实权。这一点，朝臣心里也都清楚。

朝廷百官汇报请示工作，也是先经韦执谊，再经王叔文，三经王，四经牛、李，最后到顺宗。

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除忙于本人负责的日常工作之外，还要逐日收集朝廷内外信息，归纳整理，研究对策，随时与二王密商，提出施政大计。

一个以顺宗为总后台，王叔文为总指挥的革新集团正式形成。

改革出手

二王刘柳在顺宗支持下，短时间出台诸多顺应人心的重大举措。改革从最容易取得轰动效应而又不至伤筋动骨的措施起手。

一、二月，罢去宫市和五坊小儿。京师百姓“人心大悦”。

二、同月，罢免大贪官京兆尹李实。

李实这个人不好惹，他是皇族，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封为道王，残暴贪婪至极。早年，他曾经克扣军饷，引起兵变，但他是皇族，别人奈何不得，也就益发猖狂起来。顺宗上台前一年的贞元二十年（804）春夏，关中大旱，颗粒无收，李实却虚报丰收，竟向德宗报告说：“今年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此，老百姓租税一点不减，逼迫百姓卖房卖地、典押青苗交租交税。有个叫成辅端的艺人编了顺口溜讽刺李实，其中有一首说：“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听了之后大怒，竟然给成辅端扣上“诽谤国政”罪名，用棍子活活打死。前面说到韩愈上书揭露李实遭贬官，也是李实报复的结果。二王刘柳一上台，立即罢免李实，罢去宫市，说明他们与韩愈有着共同的认识，也说明刘、柳并没有因为曾和李实关系不错而以私害公。

顺宗即位之后，下诏历数李实罪状，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史（辅佐官员）。诏书一出，“市井欢呼”。众多老百姓袖子里藏了石头，围在道路两边等待这个贪官，李实从后门走小路才躲过一劫。

三、同月，放还宫女300人，教坊女乐600人。家属来宫门迎接时，哭泣声和欢悦声响彻街道。另外，德宗时经常从民间选一些有姿色的青年女子入宫当乳母，顺宗下令禁征乳母，也为百姓除了一害。

四、三月，调整干部政策。德宗执政后期，在干部问题上率性胡来，群臣因微小过失贬逐者，永不起用。顺宗改了这个章程，下令把长期贬到远方的陆贽、阳城等召回录用。陆贽是唐代名臣，声望崇高。他任宰相时因直言，被德宗贬为忠州（四川忠县）别驾（副职，为养老闲职）。阳城也是有口皆碑的正直官员，因提意见贬为道州（湖南道县）刺史（地区一把手）。可惜，顺宗的诏书还未抵达忠州和道州，陆贽和阳城就病故了。

有了这几条，人心振奋，为改革开了个好头。但这几条尚未触动最根本的节点，保守势力不便妄动，因为他们还没有被逼进死角。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措施中还有一条，就是裁撤了专门研究和宣

讲“阴阳、星卜”的翰林院待诏，表明了革新集团的无神论倾向。这与柳宗元的《天说》、刘禹锡的《天论》等重要论文表达的思想相一致，而与韩愈认为老天有眼，能够审查每个人的善恶并进行赏罚的观点，则完全不同。

攻坚白刃

改革当然不能就此止步。二王刘柳预感顺宗可能不久于人世，想抓住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从经济、军事、政治几方面深化改革。这一来，就碰到了宦官和藩镇这两个黑暗势力的命根子，双方逐渐撕破脸。

这一年三月，顺宗任命与刘禹锡关系密切的宰相杜佑任度支、盐铁转运使（最高财政长官），王叔文为副使。朝里谁都看得出来，杜佑实际上是听喝的，王叔文才是掌财政实权的当家人。接着顺宗又任命刘禹锡、程异、韩晔、陈谏、凌准为度支盐铁判案（财政长官助理），协助管理财政，其中刘禹锡是主要助手。

《云仙杂记》一书说刘禹锡每天席不暇暖，处理大量公文来信并接待各种来访，解决财政问题，当机立断，才干卓越。

改革者掌握财政大权颇有作为，不但豁免了民间对官府各种旧欠，而且停止了正税以外的各种供奉，大力减轻百姓负担。

德宗时期，各地节度使多以“进奉”名义拍皇帝马屁。节度使额外盘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自吞，进奉只是十之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竟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德宗每年收进奉多则50万缗，少则30万缗，成为制度。

顺宗下旨罢除各种名目的进奉，接着又罢除盐铁使的月进钱。盐铁专卖是政府重要收入，盐铁使每月向皇帝进贡现款专供私用，不仅苛敛百姓，而且影响国库正常收入。与此同时，免除了百姓积欠各级政府的税赋总计价值52万6814贯（钱）、匹（绢）、束（丝）。

二王刘柳的改革措施，在朝内外获得诸多好评。

保守势力沉不住气了。他们看出王叔文手里有了财权，就可以交结大臣，交好军队，扎牢改革营盘。于是，一个叫窦群的侍御史首先跳出来叫阵，上书控告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

这一波攻击，虽然给刘禹锡造成了压力，但当时改革派正在风头上，自然告不下来。王叔文火了，要拿窦群开刀，立即罢了窦群的官。韦执谊出面力劝，说窦群这个人素有耿直名声，罢了他有副作用，先留着吧。

这个回合，保守势力碰了钉子。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此时朝廷氛围紧张起来，刘禹锡“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二王刘柳初战告捷，不免头脑发热，彼此之间互相吹捧是周公、管仲再世，豪壮得意。

有一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当时王叔文炙手可热的威势。

当时朝里有个规矩，诸位宰相每天中午在中书省一个专用餐厅见面，共进工作午餐，商量一些大事。此际，文武百官不许闯入宰相专用餐厅要求晋见，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不知趣的人敢这样做。

可王叔文不管这一套。一天中午，他有事要和韦执谊商量，于是来到中书省，让值班工作人员进去报告。值班人员非常为难，就把这个规矩告诉王叔文。王叔文大怒，大声斥责起来。值班人员无奈，只好进去通报，弄得韦执谊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好起身到门外相迎。餐厅里另外三位宰相杜佑、高郢、郑瑜都放下筷子等着。过一会儿，值班人员进来，告诉各位宰相说，韦大人已经跟王学士到别的地方吃饭去了。杜佑和高郢见王叔文如此咄咄逼人，心里非常不快，但他们俩畏惧王叔文和韦执谊，不敢说什么。郑瑜仗着自己老资格，把筷子一扔，说道："这样子没规矩，我这个宰相不做了！"说罢，起身就走，从此不来上班了。朝里的官员听到这个事情，议论纷纷。

但是，有一个情况对二王刘柳产生了致命威胁，那就是顺宗的病情越来越重，只能偶尔由人扶着上殿坐坐，让群臣从远处瞻望。

当时医疗条件很差，人均寿命也不长。朝臣们见到顺宗这个身体状况，私下里不免掐算着皇帝驾鹤西去的日子。这时，朝内外就起了一种议论：假如顺宗突然咽气，朝廷岂不要陷入混乱？议论的中心，就是要尽早确立太子。

老谋深算的宦官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利用顺宗病重无暇顾及宫内其他事情的当口，在大内展开了政治活动。宦官们探知到顺宗的长子广陵王李纯（778～820）对二王很不感兴趣，于是就拉拢李纯，谋划让李纯尽快取代顺宗，以便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打倒二王刘柳。

三月末，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召来德宗时的元老郑、卫次公等入宫商议此事。不赞同改革的元老们对宦官的提议心知肚明，商量了一会儿，写下四个大字"立嫡以长"呈上。病入膏肓的顺宗在各方压力下，于三月二十四日同意立长子李纯为太子，四月六日为李纯举行了确立接班人的典礼。

聪明的王叔文立即看出了这是企图取代顺宗、铲除改革者的第一步，但他又能说什么呢？预感到山雨欲来的王叔文，这时不停地吟诵杜甫的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大有英雄末路之

叹。

宰相韦执谊当然也有点慌，他想摸摸李纯到底是什么态度。四月中，他让陆质去做太子侍读，想模仿当初二王陪李诵下棋写字的模式，向李纯施加影响。

谁知陆质见了太子，刚议论朝政几句，就遭到李纯斥责：“陛下让先生为我讲经，为什么说其他事？”吓得陆质赶快退出去了。

最后摊牌

五月，得知这些消息的二王刘柳决定绝地大反击，痛下杀手，企图一举谋夺宦官兵权，以便制服宦官。

宦官掌握军权的重大弊政，自肃宗时代就开始了，德宗更将其制度化。德宗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中央左右神策军（中央警卫部队）中尉（最高指挥官），宦官掌握军权制度从此确立，至唐朝灭亡终没有改变。此后，各地驻军为了获取特殊待遇，也请求隶属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都归宦官统帅，神策军扩大到15万人。这是宦官集团肆意妄为，左右朝政的根本。

中唐以后，宦官之所以敢于任意杀害皇帝和大臣，也是凭了这一条。其实，宦官们此时急切要拥立的李纯（唐宪宗），后来也是由于不中宦官的意，被宦官杀害了。

宦官手中掌握的神策军当时猖狂凶恶到什么地步呢？白居易《宿紫阁山北村》一诗作了形象具体的描绘。这首诗明白如话：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

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

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

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

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

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白居易是著名官员，见到神策军的附属机构的小卒子，也是两股战战，大气都不敢出。

王叔文力主改变这一极端黑暗的制度。为了夺取宦官兵权，他通过顺宗，任命老将范希朝担任左右神策军及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最高军政长官）。范希朝是当时最具威望的老将军，功勋卓著，人称战神。派范希朝接掌神策军，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同时，王叔文又委任韩泰为

行军司马（军政长官助理），到军中协助范希朝统率神策军。这一来，实际权力就落在了韩泰手里。王叔文这一计谋，宦官当然看出来了。

二王刘柳想把军权从宦官手里夺回到政府手中，是一种制度进步，不能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这样含混的话一笔抹杀。

这就要了宦官的命了。一些将领对俱文珍说：“范希朝统兵以后，就没你们的事了。”俱文珍暴跳如雷，决定拼了。他对宦官们说：“王叔文的阴谋如果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手里！”

宦官们马上秘密通知各地将领，不要听范希朝的，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范希朝带领韩泰到奉天（陕西乾县）视察军队，军队将领竟然没有一个出来见的。战神碰到宦官大权也不灵了。韩泰见到这种情况，大惊失色，飞马回来报告王叔文。王叔文无计可施，叹气说：“这怎么办哪？”

此时，宦官们突然以顺宗名义下发了一个文件，文件中虽然明确了王叔文仍继续担任度支、盐铁副使，但削去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如果没有这一职务，就不能到翰林院议政，更无由入宫。显然，这个文件并非出自顺宗本意，而是宦官自己做主发下来的。

这是宦官准备对顺宗下毒手的一个前奏。要想谋害顺宗，当然是越秘密越好，尤其不能让王叔文知道丝毫风声。因此，取消王叔文自由进入皇宫的权力就十分重要。

王看出了这里面的风险，非常着急，四处活动，多次要求恢复王叔文的学士职务。最后，总算争取到王叔文每隔三五日可入翰林院（设在宫内）一次。不过，翰林学士之职却永远失去了。

六月，又一严峻考验来到。剑南西川（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想扩大地盘，派副使刘辟携重金出差到长安，要求朝廷把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四川绵阳）和山南西道（陕西汉中）这三个地盘都划给他，并传话给王叔文说，如果批准，定当厚报；如果不准，必将报复。

韦皋口气为何如此之大？原来，唐朝中后期，不少节度使（藩镇）仗着兵强马壮，天高皇帝远，割据独立，子袭父职，坐地为王，甚至公开向中央政府宣战，自立为皇帝。韦皋就是强势藩镇的代表。

王叔文虽然身处逆境，但他断然拒绝了韦皋这一非分要求，并准备处死刘辟。韦执谊露了点口风，刘辟听说，腿快逃走。

除此之外，王叔文还建议顺宗下诏免去浙西（从江苏苏州到浙江杭

州一带）观察使（地方军政长官，低于节度使，高于州刺史）李兼任的诸道盐铁转运使（全国盐铁运输长官）职务，以震慑各地节度使。

李是个贪官。他兼任盐铁转运使，专断“榷酒漕运”，把盐铁之利收入自己口袋。有人向朝廷举报，他竟把举报者活埋。

韦皋果然来报复了。他与宦官通气之后，以顺宗身体不支为名，竟然上书要求顺宗靠边站，让太子亲政。看来，光是当了皇帝还不行，还要有“势”。顺宗虽然还是皇帝，但他的“势”失去了。

韦皋犹嫌不足，还要进一步惩戒皇帝。他单独给太子李纯写了一封信，告皇帝的状。信中说：“当今皇上把大权交给王叔文、王，这些人任意胡行，唐朝基业要毁在他们手里，希望太子努力斥逐群小。”

不少节度使对二王既恨又怕，现在有人出头，正中他们下怀。于是，荆南（湖北荆州）节度使裴均、河东（山西运城）节度使严绶这两人相继跟进，也上书朝廷请求太子执政。一时间，宦官势力和藩镇势力合在一起，在朝内外互相呼应，造成了极大压力。

打击接踵而来。这个时候，另一位元老宰相贾耽因与王叔文、韦执谊政见不合，称病撂挑子回家了。革新集团日益孤立。

艰危之际，改革派内部出现裂痕。有个叫羊士谔的人指责革新运动，王叔文要杀他，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气得不得了。其实韦执谊的用意，是为了缓解改革者与众多朝官的紧张。韦执谊派人向王叔文解释说：“我并不是违背约定，只是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但王叔文不能容忍，甚至想杀掉韦执谊。王、韦交恶，决策中心和执行系统脱节，也给宦官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缝隙。

此际，韦执谊的老丈人杜黄裳倒是出了个主意，让韦执宜率百官主动请太子监国。细一想，杜黄裳可谓老谋深算。但是韦执谊不但拒绝了这个提议，还把老丈人训了一通。其实，韦执谊失算了，如果这样做，可能还有机会在李纯那里多少争取一点空间，至少日后反攻倒算也不会过甚。

就在韦皋奏请顺宗让位的同时，王叔文母亲病危。按规矩，他要离职照顾母亲尽孝。王叔文感到大事不妙。他临行之前，开了个豪华宴会，请诸位学士、李忠言，以及仇家俱文珍、刘光琦等共饮，企图缓和关系，但话不投机，宴会不欢而散。

六月二十日，王叔文因母亲去世被迫离职守丧，决策指挥中心事实上瓦解。

王慌了，走马灯似的到宦官那里说情，谋求让王叔文回来复职，当然吃了闭门羹。王大为恐惧，急火攻心，一时竟中风躺倒，失去了活动能力。

宦官的清算

七月二十八日，顺宗在宦官及藩镇持续压迫下，被迫同意太子监国。二十九日，把军国政事全部交给太子处理。八月四日，顺宗下诏禅让，宣布将这一年改年号为永贞，自称太上皇，决定九日太子正式登基。

离李纯正式即位还差3天，宦官就急得不行了，开始清算。

八月六日，诏书下，贬王叔文为渝州（重庆）司户（辅佐官员）。王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辅佐官员）。这一天，顺宗还是名义上的皇帝，顺宗怎么能下诏书痛贬王叔文和王呢？这说明顺宗已完全被宦官掌控。

王本来就中风了，在万念俱灰中，挣扎着到贬所，没几天就病死了。

八月九日，27岁的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

十一月，贬韦执谊为崖州（广东琼山）司马，韩泰为虔州（江西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湖南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广东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湖南郴州）司马，是为“八司马”。

其实，宪宗在九月份曾颁布一个诏书，除韦执谊暂时未动之外，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被贬到外地任刺史。但朝官们都说贬得太轻，于是加重处分，到十一月，刘、柳等人再加上韦执谊共8人都贬为司马，再降一级。韦执谊为什么比二王贬得晚呢？一是朝廷知道他平常与王叔文意见不合，二是他的岳父杜黄裳深受宪宗赏识担任了宰相，因此处理稍宽。

当时，改革派的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在家，吕温出使吐蕃未回，逃过一劫。

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日，顺宗李诵去世，终年46岁。他实际只当了6个多月皇帝。这一年，宪宗下诏命令54岁的王叔文自杀。永贞革新彻底失败。

有关顺宗的死因，众说纷纭。当时一位作家李谅写了一篇传奇《辛公平上仙》，影射皇帝被宦官杀害，还描写了细节。顺宗死时，李谅就在京师，他的文章给这一历史事件留下了一种较为可信的解读。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和柳宗元的《寄许京兆孟容书》等文章，也暗示顺宗

生命终结于宦官之手。

韩愈的刻薄和白居易的厚道

舒芜为《韩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作序说："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躁急偏狭，无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别热衷利禄，无恬退之心。他的诗篇当中，经常贬低朋友，好为人师，攘斥异端，自居正学，就是偏狭的表现。他在诗中，一再公开地以富贵利禄教子，在儿子面前吹嘘自己的交游如何光显，就是热衷的表现。二者结合起来，更是利禄情深，恩仇念重，互为因果，愈扇愈烈。谁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贵，谁不尊敬他的学问文章，他对谁就会恨之入骨，永世不忘。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中，自然容易充满了怨毒之气，怨毒之极又自然通于杀气。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因建言被贬斥，这一段经历在他的诗中再三再四地说起，对于政敌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待到王叔文失败，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在内的八司马一时窜逐，韩愈这时便写出了幸灾乐祸、投井下石的《永贞行》……竟然把谋反罪名硬加到王叔文身上，用心太可怕了……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气质和精神状态上的庸俗性，总带有独断和专制主义的味道。"

舒芜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韩愈比刘禹锡、柳宗元早一年中进士，又自恃才高，到顺宗即位展开改革时，他因上书遭贬，仅官江陵府（湖北江陵）法曹参军（地方政府属员），而刘禹锡、柳宗元等新进却成为中央政府中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的明星。以韩愈的心性，对刘、柳等人怀有强烈的嫉妒心理，是理所当然的。

《永贞行》这首诗较长，内容涉及不同历史阶段，又用了很多偏僻字眼和古代典故，这里不再全文照引。让我们看一看韩愈在相关诗句中怎样评论永贞革新。

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

太皇指顺宗。韩愈做诗是在顺宗之子李纯登基之后，所以称顺宗为太皇。谅阴，守丧时住的房子。这里上溯说到德宗去世，顺宗刚继位的时候。古俗，帝王去世，不言政事。《论语·宪问》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一句，意思是殷高宗武丁守丧，3年不说话。韩愈说，那个时候德宗刚去世，顺宗守丧，不便发布政令，二王等小人利用这个间隙，耍弄手段窃取了国家大权。

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

韩愈说，二王刘柳是个谋私利的小集团，一旦窃取大权，正直的朝官就无计可施了。

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

这是讽刺改革者升官过快。夜里诏书下来，早晨已经当上官了，不管资历够不够，飞速提拔一点障碍也没有。大白天公然接受贿赂，名贵的宝珠堆满了黄金的盘子（“火齐”即宝珠）。韩愈批评改革者谋官神速，有些夸大。另据史料载，除了王收过贿赂外，其他人没听说有这方面的问题。

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

这是说，西汉帅哥董贤因为年轻貌美，被喜欢同性恋的汉哀帝宠爱，才22岁就当上了三公之一的大司马，哀帝甚至提议把皇帝的位子让给董贤。哀帝去世，董贤恐惧地自杀了，现在还有谁为董贤可惜？南北朝时北方武将侯景，率兵投降梁朝之后犯上作乱，杀死梁朝皇帝，通过加九锡等方式，自己即位做了皇帝，最后身死非命，侯景的篡位行径令人哀叹。国家积累了深厚的功德，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岂容此等小人篡夺？

显然，韩愈诬称二王刘柳是董贤、侯景一类篡谋大位的“现行反革命”，巨奸大恶。韩诗如此刻薄，连一些古人都看不过去。清代大学者何焯评论韩愈这首诗时说：王叔文欲夺宦官兵权，这件事不能因为讨厌王叔文这个人而否定。“九锡”、“天位”等用语，实在太过分，简直要把“谋反”的帽子扣到二王刘柳头上。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五“唐顺宗”一节中说：“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

“二王八司马”惨败，韩愈墙倒众人推一通之后，多少找回了平衡，再加上宪宗即位，韩愈受重视，心里好过多了。所以，柳宗元去世之后，韩愈写了一篇《柳子厚墓志铭》，虽然文中对永贞革新仍然语含讥刺，但对柳宗元的人品、才学和成就作出了比较实际的评价。

相比之下，刘禹锡的另一位朋友白居易态度则不同。他目睹韦执谊从宰相高位贬为崖州司马，觉得当大臣的一点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不禁悲从中来，写了一首非常伤感的诗《寄隐者》：

卖药向都城，行憩青门树。

道逢驰驿者，色有非常惧。

亲族走相送，欲别不敢住。

私怪问道旁，何人复何故？

云是右丞相，当国握枢务。

禄厚食万钱，恩深三日顾。

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

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

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

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

诗的开篇假借一个卖药者的目光，描写韦执谊贬官离开都城，家族亲友一路相送，想挽留又不敢留的凄惨情景。卖药者向旁人打听，知道这就是宰相韦执谊。韦执谊昨天还以宰相身份在延英殿和皇上问答，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今天却一下子贬到那么远的边陲生死未卜。从古至今，当大臣的受宠与倒霉，就在早晚一瞬间。看看这些悲剧，不如早早到山里隐居，与白云相伴，倒是能够保全身家性命。

白居易和韩愈都反对朝廷弊政，但是对于力图改变弊政的永贞革新，却持有相反立场。

我们从白居易的诗歌看到了诗人对改革者的同情与哀悼。这首诗虽然态度消极了一点，但映射出人性的光辉，蕴含着批评皇权的进步思想。这样的内容，在韩愈杀气腾腾的《永贞行》里是找不到的。另外，韩愈还写了《顺宗实录》，添油加醋，捏造事实，对永贞革新横加诬蔑，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大都据此立说，使“二王八司马”成了千古罪人。

柳宗元被贬之后，曾写《行路难》一诗反驳韩愈等人的不实之词。刘禹锡临终前也曾撰写《子刘子自传》，为永贞革新进行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他们都认为自己立身行事，问心无愧。

“八司马”的归宿

“八司马”后来境遇不尽相同。

韦执谊贬到崖州，受当地刺史李甲照顾，参与辅佐地方发展。韦执谊慢慢适应了从高峰到谷底的命运，在崖州兴教育才，垦殖种养，颇有口碑。他主持修建的水利设施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一代名相偏居7年，最后病逝于崖州，年仅48岁。

柳宗元贬官10年，于元和十年（815）受命回到长安。他原以为可以入朝做事，没料到再度遭到诽谤，又被分派到当时的荒远之地，任柳州（广西柳州）刺史。由于心情抑郁，工作劳累，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819）病逝于柳州，只活了47岁。

刘禹锡与柳宗元同一年回到长安，再度分派到边远之地。一开始，刘禹锡被任命为播州（贵州遵义）刺史。刘禹锡有80多岁老母，在当时交通工具极为落后的情况下跋涉这么远，恐怕就一去无回了。柳宗元提出与刘禹锡对换，自己到播州，刘禹锡到柳州。幸好当时御史中丞裴度向宪宗说情，最后刘禹锡改派为连州（广东连县）刺史。刘禹锡熬到了宪宗去世，在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时期，他先后担任夔州（四川奉节）刺史、和州（安徽和县）刺史、集贤殿学士（皇室图书馆官员）、苏州（江苏苏州）刺史、汝州（河南临汝）刺史、同州（陕西大荔）刺史和太子宾客（太子的侍从和顾问）等职务。会昌二年（842），刘禹锡病逝于洛阳，享年71岁。刘禹锡虽没有被朝廷大用，但晚年与白居易、裴度等知友同在洛阳居住，诗歌唱和，名满天下，还算潇洒。

凌准贬为连州司马不久，双目失明，元和三年（809）病逝于连州。

韩泰、韩晔、陈谏3人也与刘、柳一起，贬官10年之后回到长安，又被分派到边远之地。

“八司马”中最富实际才干的韩泰为漳州（福建漳州）刺史。后来调任郴州（湖南郴州）刺史、睦州（浙江建德）刺史、湖州（浙江湖州）刺史、常州（江苏常州）刺史。一说病逝于常州任上。

韩晔为汀州（福建长汀）刺史，后调任永州（湖南永州）刺史，病逝于永州任上。

陈谏为封州（广东封川）刺史，后调任循州（广东惠州）刺史、道州（湖南道县）刺史、通州（四川达县）刺史，卒于通州。

“八司马”当中，名望不高的程异后来转运。由于吏部尚书（中央组

织部长）李巽援引，程异贬职3年多之后调回朝廷，参与经济领导工作，后任御史中丞（监察部长）、盐铁转运使（负责全国物资运输的部长级官员），并于宪宗元和十三年（818）九月一度出任宰相，第二年四月去世。

教训何在

永贞革新有哪些教训呢？

一、时运不济。顺宗由于身体羸弱，实际当皇帝才半年多。就在这几个月里，也是重病在身，口不能言。总发动机停转，改革产品当然下线。

二、权力基础脆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长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盘根错节。改革者只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人，有笔无剑。两相对比，一个是大树，一个是浮萍。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不可一世。这种狂热不但引发了普遍的妒嫉和敌意，而且也无法冷静驾驭复杂政局，处理多方面牵扯关联。何况二王依靠的是一位只有几个月政治生命的皇帝，根本不是善于玩弄阴谋的宦官和充满杀气的藩镇的对手。改革者的权力如同图画山岳，一戳就破，基础太脆弱了。

三、“休克疗法”操作太急。德宗积弊已深，企图采用“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短短几个月就焕然一新，很难奏效。只有循序渐进，方为上策。但二王刘柳以百米跑速度接连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欲速而不达。

四、涉嫌腐败。改革集团未能逃脱人性弱点。二王得势时，门庭若市，连两人住宅附近的饼店都住满了要求谒见的人，饼店也趁机抬高价格。王专门做了一个收藏礼金的大木柜，夫妇两人在大柜子上睡觉，享受金钱快感。革新集团在运动中提拔朋友和熟人，也实有其事，不免授人以柄。

五、内讧。改革深入之后，王叔文与韦执谊产生不同意见。围绕如何处理窦群、刘辟、羊士谔等人，争论激烈，最后导致内部分裂，削弱了改革力量。

六、不善于妥协。对立双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之中，不能自拔。韦执谊在最后关头也拒绝了与新皇帝宪宗妥协的余地，实为遗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表明，掌握妥协的艺术十分重要，改革亦是如此。

据史学家漆侠考证，“二王八司马”实际执政只有146天。这146天，电光石火，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启示和教训，成为绵延千年的一个沉痛话题。

范仲淹：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多年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广为人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成为激励志士仁人的千古名句。但范仲淹的主要事业并不是写散文，而是北宋中期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贫困生范仲淹

入夜，尖利的北风裹挟着旋转的雪花，掠过山东淄州连绵深山，扑向一座古庙。在这座名为醴泉寺的古庙里，一间破败的僧舍内，昏黄的烛光，在墙上映出两个晃动的黑色身影。恐怖的夜幕展开了黑色的垂天羽翼，要攫住这世界上可怜的人们。

然而，僧舍里，一个19岁的青年，似乎把这一切置之度外。此刻，他正和一个同伴在炭火的余温中读着《易经》。不时，青年抬起头来，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向同伴提出一个问题，两个人就着风声讨论起来，互不相让。

这个青年就是后来的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

范仲淹是个苦孩子。两岁丧父，母亲改嫁到朱家，范仲淹也改姓朱，取名朱说。孩子渐渐长大，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后，流着泪下决心苦读，以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

庙里粮食不够吃，范仲淹每天煮点米粥，等锅里的粥凝冻成块，用刀划成4块，早晚各取两块。然后，醋汁加盐，拌少许切碎的韭菜，就着粥吃下去。

这样的日子过了3年，范仲淹又告别母亲，远赴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求学。连小额贷款也拿不到的范仲淹，在异乡接着过起了食粥苦读的日子。整整5年，睡觉时没有解开衣服。

清贫的生活，使范仲淹与中下层社会联系在一起。这个烙印，日后也体现在他的政治选择当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27岁的范仲淹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中进士之后，才恢复范姓，改名范仲淹，把母亲接过来住。

宋仁宗决心改革

总的来说，宋仁宗赵祯在1022年登基之后，还不算坏皇帝，可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最大压力，来自陕甘宁一带逐渐强盛的西夏。宝元三年（1040）初至庆历二年（1042）九月，西夏先后在延安、宁夏隆德、宁夏固原对北宋发动3次大规模入侵。3次大战，北宋均遭惨败，不但损兵折将，丧失地盘，还忍气吞声签订“城下之盟”，每年向西夏大量“赠送”银绢，央求西夏别再动手。

北邻辽国也趁火打劫，派人索要土地。北宋只好又增加对辽进贡的银两。一时间，北宋君臣信心大挫，一片低迷。官员们纷纷指责朝廷任人唯亲，将领无能，军队腐败严重，士兵缺乏训练等等，搞得宋仁宗焦头烂额。

内部情况也很堵心。庆历三年（1043）五月，宋夏战事还未完结，北宋军队中有个叫王伦的小卒子宣布反对大宋。令人震惊的是，这个二愣子一站出来，顷刻间汇成千军万马，闹哄哄从山东的临沂向北打到益都，然后南下江苏连云港、淮安，一直打到扬州，好不威风。仁宗调动大量军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安徽和县将王伦打败。其他揭竿而起的亡命之徒如张海、郭邈，也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更令人惊骇的是，这些叛兵所到之处，各州县领导班子不是作鸟兽散，就是忙不迭办好酒肉出门迎接，恭请叛军住进州县政府大院，提供完善服务。有的甚至主动打开本地武器库，加强叛军装备。

这些乱子，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吏治腐败无能到了何等地步，内外交困的仁宗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考虑改革了。此际，他想起了范仲淹。

此时范仲淹已经50出头，几上几下，历尽坎坷。但由于他清正廉洁，精明干练，宽容大度，博今通古，担任地方官政声卓著，尤其是在陕西前线率领军队遏制了西夏攻势，声望越来越高。每逢范仲淹因直言被贬一次，当时的人就说“光”一次；第三次贬，则被称为“尤光”。此时，范仲淹占据了全国道德制高点。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诸多官员称他是圣人，盼他出来执政有如大旱之盼甘霖。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天下翘首以望太平”。

基于舆情，仁宗对范仲淹也寄予厚望。庆历三年（1043）八月，提拔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富弼、韩琦为枢密副史（全军副统帅）。九月，多次召见范仲淹、富弼、韩琦，要他们尽力筹划国事，拿

出除旧布新的改革章程，不要有任何顾虑。月底，仁宗特地打开天章阁再次召见他们。天章阁是保存皇帝手稿的禁地，以前从未在此接见大臣，可谓礼遇空前。在天章阁，焦急的仁宗赐他们坐在自己对面，迫不及待地站起来，亲手将纸笔递交给这几位，催促他们写出方案。过了几天，仁宗又亲笔写下手诏，催他们快办。

本来范仲淹还有些犹豫，但皇上的信任已达极致，还有什么可说的？几天之后，他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交仁宗。在这个奏折中，范仲淹说出一个真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范仲淹这个奏折在中国改革史大大有名，哪10件事呢？

一是改变文官3年一迁、武官5年一迁的制度。过去重年资轻本事，文官3年武官5年，没错就升。范仲淹要求打破年资制，着重看政绩，把才能和功劳放在第一位，鼓励破格升迁。为了惩治庸碌不作为，规定在京文官延长到5年才考核。

二是改变贵族子弟不经考试，即可直接当官的"门荫"制度。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说这是造成官员过多过滥、素质下降的主要原因，必须痛加纠正。

三是改变过去以做诗和背经文取士的科举考试内容，改为考策论。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实际情况出考题，让考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四是严格选拔地方官。考察他们的德才政绩，罢免年老、多病、贪污、不才的官员。

五是鉴于各地领导干部待遇极低，为了防止贪污，按干部级别给予多少不等的"职田"，让他们种点粮菜，改善生活，保持廉洁。

六是每年秋收后各地必须督导州县开河渠、修堤坝，搞农田水利建设。

七是招募5万民兵，三季务农，冬天训练，有事时打仗。

八是裁并州县，减少政府设置，减少干部数量，减轻农民负担。

九是过去皇帝在祭祀或过节时表态要减少农民税费，事后就忘了。这种情况要改。朝廷有大赦、减免税费等恩惠，一定要督促检查，落到实处。

十是朝廷要十分重视法令，克服朝令夕改、前后矛盾、令而不行的顽症。

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极为高兴。经研究，除第七条军事建议之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说“庆历新政”。

十条的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跑官买官的太多

宋代冗官太多，历史有名。当官的路子五花八门。科举考试当然最正宗，除此之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人人谋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首先，宋代科举取士名额出奇的多。就取士人数来看，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可谓空前绝后。官员数量当然大大增加。但是，科举出身还算公正合理，更多的问题出在“门荫”制度上。

“门荫”又称“恩荫”、“荫补”，就是俗话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皇帝宗室子弟以及皇帝的老婆系统封王封官，是历朝通例，且不细表。

仁宗时期的特色，是中高级干部子女和亲属世袭当官愈演愈烈。汉朝唐朝当官也有世袭，但只能子孙世袭。北宋开国以来，渐渐扩大世袭范围，中高级干部的子孙、亲戚、随从甚至门人，都可以不经考试推荐当官。每逢重大庆典、祭祀等时刻，为显示皇恩浩荡，皇帝会当场大批量批准干部子女或亲属、门人当官。

这自然是跑官的好时机，谁也不会放过，老早就找路子把自己的子女、亲属名单递上去，在皇帝那里排个位子。由于跑官的人太多要搞平衡，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多多益善。比如每隔3年一次的郊外祭祀，仪式结束的时候，往往一次批准上千干部子弟当官，这还算是少的。有的干部子孙还是吃奶的孩子，也封了官。官员们发牢骚说，这么多人不考试就当官，干脆就别考进士了。

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一个担任翰林学士职务以上的官员，任职过了20年的，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达20人之多，仍不满足，还要奏请亲属再任京官，实在是滥竽充数到极点了。据统计，北宋时期，每年靠“门荫”当官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人数，可称为“门荫”集团。

除此之外，还有“纳粟”，即买官。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慢慢成了制度，越来越多。

以上因素叠加起来，自然冗官太多，素质下降。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调研时发现，当地第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

了，要两个人搀扶着办公。3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也已经70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总理）的名字都不知道。欧阳修给仁宗写报告说：陛下想一想，这样的干部，能够治理好地方吗？

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比如在皇帝生日、南郊祭祀等特殊时段，不再实行集中“荫补”。长子以外的子孙必须年满15岁，子侄年满20岁，才有“荫补”资格，而取得“荫补”资格之后，必须通过礼部考试，合格才能为官。

这种制度创新，激励了干部子弟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为北宋官场输入了活力。但是，断了官路的人岂肯善罢甘休？由一些已退未退的大官僚带头，不断向仁宗恳求恢复旧制，用各种理由向仁宗施加压力，仁宗心里着实添了不少烦躁。

范仲淹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3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3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这一来，深得京师人心，可得罪了大太监。这些宦官夜里做梦都在咒骂范、富、韩三人，并且在仁宗耳边吹风。

同时，范仲淹派王鼎、杨、王绰三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分庸吏贪官。

范仲淹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

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地方吏治有了起色，但一些丢了乌纱帽的地方官把王鼎三人称为三虎，恨得咬牙切齿，向仁宗哭诉。

一旦动真格的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监察御史（监察官）梁坚就上书弹劾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军区副司令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为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

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不惜辞职，起来为他俩辩护。但对方也以辞职要挟，有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监察官）也闹辞职，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经批评仁宗好吃好喝，言词有点夸大，闹得仁宗很是不快。这会儿，仁宗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二人贬官。

再就是栽赃诬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欧阳修等人弹劾贬官，对范仲淹、欧阳修等十分痛恨。老夏喜欢书法，精于字形字体的研究，他还培养身边一个丫环也迷上了这一道。庆历四年（1044），他唆使这个丫环模仿名士石介的笔迹，渐渐以假乱真。石介是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和诗赋议论朝政，十分大胆。

老夏真够黑的，竟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写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夏竦把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举报。仁宗看了这封信，不太相信，可内心也起了嘀咕。

激进的欧阳修

特殊利益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搞非法组织。

当朝宰相贾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大官僚以及王拱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谏官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推荐的人，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他们一党的，竭力保护张扬；不是他们一党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

这一告，触到了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第三年（963）九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坚持这一条，决不让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

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1044）四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仁宗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以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直抒胸臆，一不作、二不休，在四月份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

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就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这是直接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线挑战。

不少古文选本称赞说，这篇文章气度从容不迫，逻辑清晰严密，是一篇说理的范文。文学上的一篇好文章，有时在政治发展上却起了负面作用，《朋党论》是一个例子。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于庆历新政，等于自杀。

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是决不承认自己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于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这一年六月，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

十一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

庆历五年（1045）正月，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地区当一把手。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宰相杜衍的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贬官到安徽滁州。

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只一年多就失败了。要等到20几年之后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

后来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在这一点上，仁宗不如他的孙子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

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会中道失落。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无愧地做到了。不过，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志士仁人，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毕在庆历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算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亮点。

与范仲淹改革大体同时，欧洲文艺复兴已经悄然萌芽。

1085年，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第一个选举执政官的城市，这就是比萨。从此开始，意大利全境逐渐由各城市分治。英国史学家昆廷·斯金纳在他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开头就说：这些城市如此向往自由，以至于自己转变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些城市几乎每年更换执政官，以保证执政官们的权利欲望得到控制，并使人民的自由得到维护。

而此时，孱弱的北宋，在皇权绝对统治下，一再拒绝根本的改革，正向灭亡的终点摇晃着行进。

王安石在哪里摔了跟头

明朝冯梦龙的小说集《警世通言》，有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描写王安石：

先朝一个宰相，他在下位之时，也着实有名有誉的。后来大权在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饮恨而终。假若有名誉的时节，一个瞌睡死去不醒，人还千惜万惜，道国家没福，恁般一个好人，未能大用，不尽其才，却也留名后世。及至万口唾骂，就死也迟了。这倒是多活了几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谁？在哪一个朝代？这朝代不近不远，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间，一个首相，姓王名安石，临川人也。

王安石到底什么罪呢？囫囵吞枣，语焉不详。这篇小说，源出于南宋流行话本《拗相公》。王安石在南宋被彻底否定，成为箭靶人物。杭州大街小巷说书的受主流文化影响，“愤青”齐上阵，使用语言暴力，把王安石说得猪狗不如，一直影响到明末冯梦龙。

直到清朝嘉庆九年（1804），一位叫蔡上翔的知识分子，在88岁高龄完成《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为王安石做了些辩护。1908年，梁启超著《王荆公》，干脆为王安石全面翻案。他礼赞王安石说：

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水），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墙），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激动地宣布：夏商周三代之后，王安石是唯一完人。还说王安石走在欧美前面，最先发明社会主义，是全球社会主义的老祖宗。

梁启超开了端，20世纪上半叶，赞誉王安石不断加码。“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王安石更被抬到天上，有如登上莲花宝座，瑞气千条，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批评王安石的意见，则被说成是“秋蝉和蟋蟀的悲鸣”。2007年3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十一世纪的王安石》一书，说王安石要把中国引向一个新的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轨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论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是高升九霄云中，都未免过头。

改革开放以来，有学者对王安石变法的方向提出质疑。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语出惊人，说王安石变法是搞“文化大革命”。他在1988年10月说：“‘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历史上有过，如王安石变法。”（《炎黄春秋》2006年7月号，李锐著《陆定一

党事国是漫谈录》一文）

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安石变法呢？王安石变法有小功，也有大过。过是什么？下文自有表述。不过，这里要说一句的是，如果今天还说王安石指引了“新的轨道”，那就不只是11世纪王安石的悲剧了，而且是21世纪中国改革的悲剧。这样说是夸大其词吗？

宋神宗头疼

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或改革，大都是由于形势急迫，没办法维持下去，才被迫搞起来的。

1067年，19岁的赵顼（1048～1085）登基当家，是为宋神宗。年轻的皇帝正面临此种窘态，北宋的危机实在已经酝酿很久了。

他的上一任，英宗赵曙在位3年多（1064～1067）就去世，没什么可多说的。

早在更上一任，仁宗赵祯当政40年（1022～1063）间，日子就不好过了。耳根子很软的仁宗一度下决心于庆历三年（1043）重用范仲淹，启动改革。这是北宋第一次大改革。范仲淹淘汰冗官，重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奇大。仁宗遇到大大小小的路障，无奈刹车，终致无所建树，抱残守缺，把烂摊子扔给后人。

北宋的毛病，最突出的是两种。

一是冗官太多。我们知道，北宋管辖领土比明清小很多，可是，科举取士（录取进士等）的名额却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这就够组织部门安排的了。更成问题的是“门荫”制度，中高级官员的子女和亲属不经考试即可当官。有的官员还没结婚，未来的儿子已经定下了官职。有的怀抱中的婴儿，已经被指派为科长、处长。范仲淹当初企图改一改这个弊政，终因得罪人太多而失败。结果是大家都能想象的，官僚机构叠床架屋，日益膨胀，消耗及贪污自然激增。

二是军队扩编严重。为了缓解失业压力，镇压农民起义，抵抗西夏及辽国侵犯，北宋政府每逢荒年，把成千上万的流民纳入禁军（中央正规军）和厢军（地方治安部队）。开国70多年，军队增加6倍，在仁宗时期达到125万人。

这两项开支加起来不得了。其实，北宋的财力物力比唐朝雄厚，但是，比唐朝多得多的赋税收入，却被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吞噬殆尽。北宋仅军费开支一项，就占政府每年全部财政收入5/6。难怪神宗叹道：“穷吾国者兵也！”

国家财政陷入困境。早在仁宗庆历年间就入不敷出，每年亏空300万缗以上，到英宗时期每年亏空更高达1570万缗。

怎么办呢？加重税收。豪强地主隐瞒大量田地少交税，日子自然好过，可苦了老百姓了。宋代沿袭唐代杨炎的两税法征收田赋，但税收比

唐代重得多。再说，唐以后的五代时期，各地割据政权无法无天，大量增添杂税，宋代也都继承下来。

牛活着要交税，牛死了也要交税，一家人分居要交税，穿鞋也要交税，千奇百怪，不一而足。朱熹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具备。"（《朱子语类》卷110）除了交税之外，农民还要服杂役，撂下农田，帮官家做各种杂活。

走投无路的农民揭竿而起。从仁宗到神宗这三代，各地群体性事件越烧越旺，用欧阳修的话来说就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欧阳修《再论置兵御贼札子》）连首都汴京（开封），都出现了"寇盗充斥，劫掠公行"的动荡局面。

按说北宋有这么多军队，战斗力应该很强，可事实恰正相反。为什么呢？

原来，宋太祖赵匡胤靠兵变得江山。开国之后，为了防止兵变，对军队施加了诸多限制。

一是将领没有军权。枢密院相当于国防部，首长都是文人，还说得过去。但作战部队一线指挥员也由文人担任，就有问题。北宋精锐的禁军大多集中在京师，地方则是老弱厢军。遇到战争，禁军出征，中央临时委派文人担任统帅，有时由太监担任统帅，就是很少让军人任统帅，实际负责作战的将领也都是临时委派。将领不认识士兵，士兵不认识将领，各自心里都没数。"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再加上部队频繁换防，一年一调，这叫"更戍"，弊病就更加严重了。

在皇帝看来，这样做的好处是，大伙都不熟，没法勾结搞兵变。但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这样的军队跟乌合之众差不多。打起仗来，朝廷又一百个不放心，甚至从首都发来阵图，让前线军队按首都临时绘制的阵图打，导致部队"勇敢无所奋，智谋无所施"，很难取胜是必然的。

其次，宋军缺乏训练，武器装备落后。站不成行，行不成列，听说打仗，吓得要死。盔甲质量低劣，骑兵无法披甲上马，射出的箭一二十步就落了地。以至于西夏军队一听说宋军来战，"皆举手相贺"。

三是军队经商赚钱，全无斗志。文官武将都忙着赚钱，占用许多士兵为其经营私人买卖。陕西一带的禁军中有画匠、工匠、乐工等各种手艺人，往往五七百人都被将领私人占有，做各种活计赚钱，士兵成了将军赚钱的私人奴隶。一些文官和权贵之家也是如此，大量占有士兵当奴仆使用。

到年轻的神宗上台时，马军一营原额为200骑，仅剩几十骑；步军一营原额500人，实额仅200人。

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先看宋与辽。自太宗赵匡义于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两次与辽国作战失败之后，接任的真宗和仁宗毫无办法，只有不断向辽国进贡银两，以屈辱换苟安。

再看宋与西夏。仁宗时期，西部的夏国屡次侵扰北宋，挑战宋军。宝元三年（1040）的延州（延安）之战、好水川（宁夏隆德）之战，康定元年（1041）的定川（宁夏固原）之战，庆历二年（1042）的渭州（甘肃平凉）之战，连续三场大仗，宋军接连惨败。朝廷除了示弱没别的路可走，只好每年向西夏大量“赠送”银绢，偷生一时。

至此，北宋积贫积弱的颓势似已无可挽回。面对如此现状，神宗怎能不头疼？

年轻的神宗颇想有点作为。登基之前，他穿上全副盔甲去见他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问道：“娘娘，我穿这副盔甲好不？”

变法，变法

危机重重，有头脑的士大夫当然也看出来了。

王安石变法前20多年，范仲淹一度实施的庆历新政，就是试图解决积贫积弱问题的一次尝试。

有意思的是，范仲淹虽然失败下台，朝内外变法吁求却并未因受打击而低沉下去，随着危机不断加深和神宗上台，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事情，大概只有在宋朝才能发生。

宋朝崇文抑武，知识分子受尊重。古今知识分子有一个共性，就是以批判现实为己任，宋代知识分子亦然。

北宋的可爱之处在于，知识分子批判现实，大致能够充分表达，这要归功于北宋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这就为改革再度兴起创造了条件。什么是改革？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批判现实。

举个例子。范仲淹在任时曾提拔了一个名叫李觏的知识分子，李先生后来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人物。

李觏担任太学直讲（相当于教授），一直痛骂当下，鼓吹变法，与范仲淹一唱一和。胡适在《记李觏的学说》一文中说，李觏是“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是王安石的先导”。

李觏竟公开反对孟子说的“王何必曰利”。他不怕挨骂，坦率地说：“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其实这是很实际的看法。李觏对北宋样样不满，范仲淹下台，李觏并未避风头下海经商，而是照样批判现实，他的学生邓润甫还直接参加了王安石变法。从这里看，北宋对改革一直还是宽容的，接受幅度很大。

但李觏提出要抑制市场和商人，却是有问题的。不幸的是，这一条也被王安石实践了。

大文豪苏轼在仁宗执政最后几年，也一直在各种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发言，写文章要求深化改革。他给仁宗上折子，猛烈指责社会贫富分化，批评当时“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他要求国家一号人物带头节俭，主张裁减冗兵。

在地方治理的实践中，个把良知未泯的官员也自发采取一些措施，探索减轻弊政。

众所周知，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秋粮已经吃完，夏粮还

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这个时候，有钱的富户借钱借粮给农民，秋粮收获之后加息偿还，当然是高利贷。假如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

仁宗末年担任陕西转运使（省长级大员）的李参，尝试由官家借粮贷款给农民，谷熟之后偿还，既减少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威胁，也更换了政府仓库的存粮。后来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参考陕西的经验制定的。但是陕西的贷粮贷款不收利息，王安石就不然了。

另外，压在农民头上无尽无休的各类杂役，特别是“衙前役”（直接给政府帮忙干杂活），也给民众造成很大滋扰。江南个别官员采用变通办法筹措资金，出钱雇人干杂活，免除了农民的“衙前役”，成为王安石免役法的雏形。

最关键的，是需要一位皇帝坚定支持变法，统领全盘，神宗上台，满足了这个条件。

当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差不多，因循守常的势力一直据守高端。20多年前在庆历新政中充当改革先锋的老明星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长时间坐稳高位，日渐保守起来。

当踌躇满志的神宗欲行变法，找宰相富弼商量的时候，却兜头被泼了一头冷水。老资格的富弼教训小皇帝说：“陛下即位之始，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富弼要神宗老老实实待着，这正应了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讥刺宋朝的一句话：“宋帝国的立国精神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过一日算一日，将就一天算一天。”

叹了一口气的神宗没办法，把眼光从元老重臣身上移开，看中了声誉鹊起的王安石。

千古三怪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是中国史上一个极为奇特的人物。

传下来最早的一幅王安石画像，是他退休之后，名画家李公麟为他画的“著帽束带”像。画中的王安石戴着一顶类似得克萨斯州牛仔帽那样的圆檐黑帽，鹅蛋形长脸，细长眼睛，人中和下唇都留着胡子，下巴上稀松一绺长髯，表情严肃，还算和善，看不出极端执拗的性格。当然，中国古代肖像画毛病多多，主要是千人一面，你很难把李白和苏轼区别出来，画清朝人只多一条辫子而已。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江西临川）人，后被封为荆国公，所以又称王荆公。王安石很早就出了名，个性倔强，放荡不羁，伴随他的各种传说，把他描绘成了一个不近人情的神话式人物。

南宋朱弁著《曲洧旧闻》，说王安石一天到晚读书思考，至于生活方面的事情，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会。当了官还穿着脏衣服，像囚犯一样乱蓬蓬的头，却夜以继日大讲诗书。要知道，在讲究礼仪的宋朝上层，这样不修边幅的乞丐形象，是令人不能接受的。这是王安石的一怪。

当时的名士苏洵见了王安石一面就嗤之以鼻，专门写了一篇《辩奸论》痛骂王安石。文章说，洗脸换衣是人之常情，违背人之常情，穿着破衣烂衫，吃着猪狗之食，蓬头垢面大谈诗书，以博取脱俗的名声，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狡诈，属于那种阴贼险狠大奸大恶之辈。也有人说，这篇文章是仇恨王安石的邵伯温伪托苏洵之名写的。但奇怪的是，尽管如此，当时的人还是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人们对于大才子的出格行为，往往能够宽容。就好像今天的人，虽然对于男女之间朝三暮四持批判态度，可是对于一些名人如张曼玉频繁的情变，却津津乐道一样。

朱弁还说，有一次，王安石一位朋友和王安石夫人聊天，夫人抱怨说不知道王安石喜欢吃什么。这个问题很怪，你是夫人，怎么不知道呢？这也连带地反映出王安石的奇怪。那位朋友说，他喜欢吃鹿肉。何以见得？原来那天中午吃饭时，他亲见王安石把一盘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夫人问：那盘鹿肉放在哪？回答说放在王安石眼前。夫人说，那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第二天吃饭，大家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结果王安石一筷子也没动，只是把放得最近的一盘菜吃得干干净净。饭后问起，王安石根本不知道有一盘鹿肉丝。

当然，这并不特别奇怪。当下大红大紫的易中天，只会看书写作演讲，家里一切都靠夫人，夫人不在，连洗衣机都不会开。人的精力有限，大凡能在某一领域获得突出成就的人，不免时时刻刻精神高度集中，有取必有舍。

王安石的夫人是胖太太，为了讨好丈夫，偷偷给丈夫买了一个小妾，晚上临睡，才让这个小妾前往王安石寝室，要给他来个“惊喜”。这在当时是一件正常的事，哪个高官没有二奶呢？不要说是当时，就是到了清朝，又何尝不如此？何况，这件事是王安石夫人主动所为，所以断然不会有中纪委打电话来“约谈”，也不会有家庭分裂之忧。但王安石见到这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吃了一惊，问她是谁，想干什么？女子只好如实道出来意。王安石盘问起来，原来这个女子的丈夫做生意亏了本，将妻子卖到王家还债。王安石听了，让女子到别的房子休息。第二天，叫手下人找到该女子的丈夫，让他把妻子领回去，不用退钱。这是王安石的第二怪。当然，这一怪，让人肃然起敬。

另外，就是王安石犟得很，一旦下了决心，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民间传说他是拗相公，倒也符合实际。这些传言，表明了王安石的激情强度。

王家并非名门巨宦。王安石的父亲王益22岁中进士，在江南任过20几年地方官，兴利除弊，颇有政声。一是他不肯逼穷人交税，二是曾有一年时间没有打一个人的板子，三是敢于与横行不法的顶头上司周旋恶斗。王安石的母亲吴夫人也不一般，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著文称赞吴夫人“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

王安石的勤奋博学以及“平天下”的抱负，显然有家风熏陶。

庆历二年（1042），53岁的范仲淹正积极筹划出台改革，21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淮南（江苏扬州）签判（副职），开始实际政治生活。

王安石“每读书达旦不寐”，快天亮了，胡乱闭会儿眼睛，也不脱衣服，接着就上班去了，脸也顾不上洗。他的上司，当时的扬州知州（一把手）韩琦怀疑他夜生活喝酒找女人过度，不好明说，就劝他多下功夫读书，他听了，也不为自己辩解。后来，韩琦承认自己误会了王安石，反过来猛夸王安石，王安石还是不理会，你说这个人怪不怪？王安石在扬州这段期间有个收获，写成了理论著作《淮南杂说》，在思想界初露锋芒。

庆历七年（1047），范仲淹改革已经失败，离生命终点还有5年。

26岁的王安石改任鄞县（宁波鄞县）知县，任职3年。他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改革实验。任职第二年，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下令把仓库里的存粮借贷给农民，约定秋收之后加利息偿还，这是后来青苗法的个人经验。

鄞县任满，王安石在地方和中央官场转了一圈，积累了从政经验，也体验了官场弊端。让我们看看他的履历表。

先是调到舒州（安徽潜山）做通判（副职），任满上调都城汴京，任群牧判官（主管养马的助理），当时的顶头上司群牧使就是赫赫有名的包拯包青天，王安石和后来的政敌司马光同时在包拯手下当判官。以后王安石调任提点开封府诸县镇公事（主管首都郊区的副职）。

嘉二年（1057），又先后任常州（江苏常州）知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江苏江西一带负责公安工作的副省长）。

嘉三年（1058）调进中央，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副职）。三司是帝国最高财政机构，下面管着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盐铁管冶金、茶税、盐税等，度支管全国财政，户部管户口、酒税等。度支判官一职，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

但王安石并不留恋中央机关，他觉得京城办公室政治太复杂，展不开拳脚，屡次上书要求外放。他的态度，让众多官员大跌眼镜，觉得十分怪异，放着中央的捷径不走，跑到偏远的外地干什么呢？

此时的王安石文学成就已经闻名遐迩。当时的文学大师欧阳修对王安石赞不绝口，在赠给王安石的诗中，把他比为李白和韩愈。这本来是很大的恭维，但王安石不买账。他在酬答诗中说，他的理想是成为孔孟，而不是“文人”。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虽有若干佳作，但总的来说，他的文章比诗歌更好。不论写诗作文，他都强调“有补于世”，讲究实用。他的《游褒禅山记》是一篇短短的游记，在文中，用了一半篇幅探讨成功学的哲理。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写作力求紧贴政治或社会实际问题。

这一年，王安石终于憋不住了，跳将出来，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轰动朝廷。

王安石说，宋王朝面临着四大危机：农民起义、外患威胁、财政困难和风气衰败。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度措施不对头，必须变法。

他呼吁减少诗赋之类的“无补之学”，培养实用干部。他要求提高中下层官员过低的工资，以减少令人头疼的腐败。他指责科举制度产生不了务实的人才，建议采用从下到上层层推荐的办法物色能人。他提出要建立有效的考核机制考评干部，官员的调动不能太频繁，以免业务生疏。

王安石说，变法的关键是皇帝要坚定，不能半途而废。这显然暗指庆历新政。

他警告说，如果再不改革，宋王朝有可能被农民起义推翻。

这篇文章重点是吏治和教育，虽然也提了几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但全文很少论及经济问题，此为王安石阶段性思考的成果。后来王安石变法内容，与该文侧重点有很大不同。

老迈的仁宗虽然没有回应这个建议，但他对王安石相当不错，提拔王安石担任了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高级官员）。这个职务，是很多官员借以快速上升乃至成为宰相的重要阶梯，但王安石也并不以为意，毫不珍惜，还是要走，这又让诸多官员难以理解。这是王安石的第三怪。

一种解释是，王安石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物，他觉得仁宗并不是真正值得辅佐的皇帝。

嘉八年（1063），仁宗去世，王安石母亲也在这一年去世，他离开京城前往金陵（南京）葬母，完事之后索性不回京城了，就留在金陵讲学，对儒家经典提出了系统而独到的见解，成为北宋经学的一个代表人物。郭沫若说，王安石研究学问的方法，与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不同，他注意到文字学，著有《字说》22卷（后来被人毁掉），功夫更为扎实。另外就是他的研究与变法实际相结合，讲究创新。

冯友兰说，同庆历新政的人物相比，王安石把范仲淹与李觏两个人融合在了一起。“一身而二任焉”，既有李觏的理论，又有范仲淹的实践。

此时王安石名动朝野，已经成为各方瞩目的热点：

“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可以必致太平。”（韩琦《安阳集》）

“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埋没）。”（《元城语录》卷上）

“窃（我）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

退，识与不识，咸（都）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恩泽）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

连反对派、著名诗人黄庭坚也说：“予（我）常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跋王荆公禅简》）

在越来越热的氛围中，王安石长达20年一次次谢绝到中央当官的美意，等于一次又一次为他涂上神秘的色彩，吊足众人胃口。闹到后来，从皇帝到百官，无不渴望一见王安石。

神宗登基之前，对王安石大名就如雷贯耳。上台刚几个月，神宗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南京地区一把手），过半年又改命他为翰林学士（皇帝秘书、顾问），调进中央。

熙宁元年（1068）四月，神宗召见王安石，“一见奇之”。王安石与神宗倾心长谈之后，也觉得终于遇到“明君”，君臣二人一拍即合。王安石的变法激情猛烈燃烧，回家之后立即撰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扎子》上奏。

在这篇文献中，王安石陈述了北宋自太祖开国以来五朝施政得失，抨击了“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他说，不论是吏治、军事，还是经济，帝国都存在严重问题。百年来之所以没发生动乱，是碰巧老天帮忙，不然早就出事了。王安石在文中极力强调变法的急迫性，说眼下正是大有作为的好时机。

这番话正中神宗下怀，此后神宗又多次召见王安石，神宗老老实实地承认，他还年轻，在变法方面没什么道道，要多向王安石讨教。

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三年（1070）又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从此展开了长达16年（1069～1085）轰轰烈烈的变法，史称“熙宁变法”。

争论最大的三个法

现在我们要看一看王安石变法的真面目了。

王安石一直很敬重范仲淹，他一共写过37篇祭文，以《祭范颖州仲淹文》篇幅最长，花的功夫最大。他称颂范仲淹说：“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他说自己就是追随范仲淹的后来者之一。

聪明的王安石，吸取了范仲淹从政改入手陷入被动的教训，他的变法是从经济即“理财”切入的。

王安石理财，重点是贯彻神宗最关心的“富国强兵”。当然，王安石多次说过，他推动变法，是为了“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凡此皆以为民”。

但是，明眼人不难看出，“富国强兵”的目标与“为民”的愿望，二者侧重点有很大差别。后来，在变法过程中果然发生偏差，“为民”不过成了一个空洞的说辞。

熙宁二年（1069）二月，在原有的三司上面，新设了一个叫做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机构，相当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主持变法，出台新章，统管全国经济。这个新机构主管盐铁、度支、户部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第二年，新机构撤销，职权分别划到户部、工部等，由户部开始主管全国财政。

新机构由枢密使（国防部长）陈升之和王安石领衔，不用说，实际大权操在王安石手里，具体主事的是王安石启用的变法派副帅吕惠卿和变法派骨干章。

郭沫若说，秦汉以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黎东方说，熙宁变法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自变法时起一直争论到今天，做不出定论。

让我们浏览一下“最具诱惑力”的王安石变法都变了些什么。首先看看争论最大的三个法。

一、均输法。熙宁二年（1069）七月颁布。

京师每年需求物资如海。过去朝廷在六路（省）设转运使，为皇室和京师采购物品，并负责运到京师，这就是“输”。但各路官吏无法了解京师的需求变化，也没有全盘调度各路物资的权力，只是机械地在本地按定额采购上贡，致使丰年物价贱不能多买，歉收物价贵又必须办足。

货物运到京师，常因不合需求，削价抛售，朝廷内外所需，又要另行搜刮。每逢京师有什么特殊需求，各路官员就增加税收，进行采购，各地商人趁机抬价，结果农民负担加重。

均输法改了旧章程，由朝廷专设发运使这一官职，统一采购，并大大增加发运使的权力，让他总管东南各路税赋收入，有权调运各路物资和资金，在物产丰裕、价格便宜的地方就近购买，也可以把剩余物资卖到物价高的地方赚钱。王安石拨出500万贯（每贯1000文）钱和300万石（一石等于十斗）米，作为采购周转经费。均输法把地方供奉变成了中央采购。

这个法的初衷之一，是把商人把持的“轻重敛散之权”收归政府，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发运使衙门成了巨无霸式的国营采购和销售垄断机构，其弊病更甚于民间商人。史载，发运使曾经把大量大米运往米贵的地方赚钱，销售时“比市价增及一倍”，这就增加了民众的负担。

官方的采购价格常常扭曲，不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白吃白拿，就是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在均输法实施过程中，官员大肆索取回扣，不是贵的不买，不给回扣不买，以至于拨付的周转经费连本也很难收回，其间产生无数腐败行为，总之是严重干扰市场正常运行。这些弊病，当时苏轼等人就指出来了。均输法实行两年就无声无息了。

二、青苗法。熙宁二年（1069）九月颁行，这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法。

这个法规定，把过去备荒用的常平仓、广惠仓（政府储备粮库）的粮食拿出来作本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贷粮食或现款给农民，按每户财产的不同状况规定贷款数额，富的多贷一点，穷的少贷一点。最多的每次贷15贯，最少的一贯五百。不管贷多贷少，都要在半年之后偿还，加利息20%。每年贷两次，利息总计则为40%。这是政府代替富人向农民发放抵押贷款，但实际上，其用意很明显，是为了增加政府的“青苗利息钱”收入。

官僚机构在全国范围强硬推行青苗法产生诸多弊病。

首先，年息40%并不低。各地山高皇帝远，执行的时候还擅自加息。当时全国地方官当中，真正能做到公字当头执政为民、扑下身子为老百姓着想的有几个人？有名目来了，还不借机捞一把？打着改革旗号多收钱，人们都很熟悉。

当时宿州（安徽宿县）发青苗贷款，官府将库存的一等绿豆每斗折价为75文，二等72文，“比时价高大”，就是说，贷给农民的时候比市价

贵。通常状态下，新粮大批上市的时候，价格会低落一些。两相比较，青苗贷款折价越高，农民还贷压力越大。陕西农民在初春向官府借贷一石陈米，还贷时要新的一等小麦一石八斗七升，“取利约近一倍”，也就是说利息高达百分之百。

不少官府放青苗钱时，开饭桌请借钱人吃喝，有的甚至“令妓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为何如此？是北宋地方官要办公共食堂或促进大众娱乐吗？不是，官吏们坑老百姓花样繁多。比如放给你的时候是陈旧的霉粮，收回的时候须是新粮；再比如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回的时候却故意压秤。

其次是手续繁杂。过去向富人借贷，双方讲好就行了，现在要填写申请，等待审批，还贷手续也很啰，跟官僚部门打交道，向来如此。农民不识字，每道手续都求情托人，额外花费不少。而且贷款和还款数额完全由官吏来写，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农民只有吃亏。

第三，王安石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摊派。富裕农户不需要借青苗钱，也强迫他贷款。为什么？政府要赚利息。一等富裕户贷款数额相当于五等穷人的15倍，利息也是15倍。所以各地大搞“抑配”（强迫贷款），实际上是强迫富人出利息钱，搞得鸡飞狗跳。也有的上等户愿意借贷，他拿过来之后，又寻找时机放贷，利息更高。

贷款之后，如果发生天灾，青苗变成死苗怎么办呢？那不管，反正你得还利息。于是，差役们四处抓人，往死里打，逼迫农民卖地卖儿女，惨不忍睹。不幸的是，变法开始之后，水灾、旱灾、蝗灾不止，各地地方官成了虎豹豺狼。不但穷人倒大霉，诸多富人也成了官府猎杀目标，不是破产就是逃亡。

实施青苗法，政府获厚利。以熙宁六年（1073）为例，政府得到青苗利息达292万贯。研究宋代经济史的学者漆侠说：“为数是颇为可观的”（漆侠《王安石变法》）。可见，满足“国用”，才是青苗法的根本意图。

近来有伍立杨撰文《从王安石到尤努斯》（《民主与科学》2006年3月号），比较青苗法和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文章说，王安石先前在一个基层单位搞小额贷款还算顺利，原因在于空间小，可以施展腾挪。后来宰制全国，上下游离，官僚机构的弊端就非他能够控制了。而尤努斯成功的要点，却在于行政不干预，至少不成为障碍，依日常经验和实际情况从容操作。他们路数相似，性质却完全不同。

近年来，茅于轼和汤敏等经济学家在山西农村试验搞小额贷款成功，也是民间操作。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中评论青苗法，有一段话说得好："封建官僚的长技是欺下瞒上，阳奉阴违。无论什么良法美意，一经过他们的手就变质了。青苗法的变质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地方上的官僚们把放债作为他们的一种任务。国家放债的钱一到他们手里，他们就向老百姓摊派，不需要借钱的人也要借钱，使这些人白出利息，王安石也知道这些官僚是靠不住的，他有自己'陶冶'人才的办法，但那是来不及的。"

三、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三月颁布，这也是争议很大的一个法。

富商操纵行会和物价，有损平民利益，市易法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提出来的。

王安石又是靠行政力量一刀切管死，"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

市易法主要内容是，京城设立市易司（先名市易务，后改名。各城市都设立市易司，京城遂改名为都市易司），朝廷拨100万贯作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统一由市易司划定。商人向市易司抵押自己的财产，即可以20%的年息，赊购市易司仓库里储存的商品，到各地出售。

这样，政府自身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推行的结果，京城人声鼎沸，都说市易司"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了"。它的营销范围任意扩展，连水果、芝麻都垄断过来买卖，演变成最大投机商。他们收购的重点，当然是紧俏商品和畅销货，哪里顾得上滞销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利润指标，并且从中渔利。看看我们的生活经验吧，近十几年来，为什么很多地方官热衷于商品房建设，而不热心建设廉租房呢？就政府的角色而言，它应该主要搞廉租房才对。

官方大规模彻底垄断经商，结果是最大程度破坏市场，漆侠说王安石"狠狠打击了……商人资本"，把民间利益抢到自己口袋里。

熙宁九年（1076），市易司收取息钱和市例钱133万贯。熙宁十年（1077），收息钱和市例钱153万贯。这两个数字，分别相当于这两年全国夏秋两税总收入的30%左右，敛钱规模着实吓人。

北宋的GDP，并未有科技创新促进飞速提升，全国财富分配，官多

必然民少。学者邓广铭说：“市易法实施的结果，不能不算是卓有成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四章）市易法确实增加了国库收入，民间可就倒霉了。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以大大加重集权的办法搞经济，干扰和破坏了市场形态，就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选择来说，王安石变法产生了严重而持久的负面效应。

全面出击

除了以上三个法之外，王安石迎着高分贝反对声逆流而上，推出全面变法的系列措施，企图将北宋彻底“旧貌换新颜”。其魄力之大，涉及之广，令人咋舌。为了避免沉闷，我们把王安石的其他变法措施分为两部分介绍，下面先看看经济方面还有哪些招数。

四、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颁行。

各州县需要修建水利工程的，小者自行解决，大者奏报朝廷实施。凡提出合理建议或出钱募工兴建的，政府给予奖励。

五、免役法。熙宁四年（1071）十月实行。

北宋乡村农户，按财产情况分为五等，一等最富，五等最穷。

宋朝的差役，指的是乡村基层政权的跑腿马仔，一般由上三等户轮流充当。

有的人当差，胡作非为敲诈勒索，觉得是肥差；有的人当差，抛荒耕地赔钱破产，觉得太痛苦，王安石举出后者的例子，说这个办法必须改革。

怎么改呢？改无偿当差为用钱雇人，这就是免役法。按理，要向那些应该服役而现在免役的人收钱。既然服差役是上三等人家的事，就应当向上三等征收役钱，不应向四、五等户征收。

但在实际上，是不分上等下等，“等第均出”，向全体农户收钱，这就有点不讲理了。怎么收呢？各地情况不一。或者以家产为标准，每一贯家产征收10文钱——注意，家产多少是由官吏来算账确认的，这里就有很大出入；或者按每户每年上交税收的百分比来征收。原来不需要服役的官家、寺庙等，也按财产情况分别出钱，称为助役钱。各州县雇劳役的资金总额经计算后，摊派到各户征收。

这个办法也使政府收入大增。熙宁九年（1076），政府收入役钱1000多万贯，雇役支出640万贯，剩余近400万。收入大于支出这么多，证明了征收差役钱的目的，不是“为民”，而是为了富国。这个免役法给贫穷农民平添了一道赋税，应该说是害民的。

六、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1072）八月颁行。

大地主隐瞒田亩逃避税收，始终是北宋一大问题。以全国耕地而言，真宗时有524万顷，经过开荒，到后来仁宗后期反而缩至228万顷，

显系隐瞒多多。

方田均税法旨在丈量土地，清查漏税，均定田税。主要方法是，各县以千步长宽（约合41顷66亩）为一方，作为丈量单位，每年农闲丈量所有土地，登记造册，逐级上报，按土壤质量分为五等，确定税额，如实征收。但是，清查各地隐瞒的田，却由各地地主负责，这就不能不打折扣了。

七、免行法。熙宁六年（1073）八月颁布。

有人把这个法算在市易法里头，但实际上两个法的性质并不相同，这个法透出的信息很有趣，值得单独说一下。

北宋宫廷所需物资，还有一种供应办法，就是通过“科配（摊派）制度”，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商铺强行购买。一旦某种货物缺货，就惨了，商铺以几倍或几十倍的价格高价收购，然后仍以低价供应宫廷。

各商家对此制度早就头疼不已。熙宁六年，变法热热闹闹之际，汴京的肉食品行会也鼓起勇气要求改革了。他们派了代表跟官府商议，今后由肉业行会向官府定期交纳一定数额的资金，叫做“免行役钱”，以此作为官府购肉的价格补贴。官府收了钱，随行就市自行购买，肉行不再直接向官府低价供应。

王安石批准了这个提议。此后，在交纳免役钱之后，免除了商铺对官府的低价供应。

这个法给人的印象深刻之处在于，政府竟然如此强权，如此不讲道理欺负商户，最后达成的协议也非常可笑：政府要买东西，先到商家手里搜一大笔钱，然后爱到哪里买就去买，这就算改革了，而且双方都觉得适度。

强兵和科举新政

八、保甲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实施。

十家为一小保，设保长。十小保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保长。一家有两个男丁以上的，抽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组织起来武装训练，维护治安。

同保内有犯法的，知情不报要连坐。发现来历不明的人，不举报也要惩罚。保甲法主要是为了压制农民聚众起义，扩大兵源。学者王曾瑜说，自商鞅的连坐法，到王安石的保甲法，最后到蒋介石的保甲法，完全一脉相承。任何一个公正的史学家，是不会为这种反动的血腥的法令辩解的。

九、保马法。熙宁五年（1072）五月实行。

政府动员民间养马。民众愿意养马的，政府给一两匹，或发钱让养马户自购。养马户减收赋税，或发补助。养马户不能虐待马，如骑马走三百里路要受罚，马的肥瘦国家要检查，马死要赔偿。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政府集中养马的巨额费用，获得更多战马对付西夏骑兵。学者许倬云说："送马给百姓养，官府常常看有没有养好，结果也变成负担。"

十、军器监法。熙宁六年（1073）八月实行。

政府建设新的兵工厂，录用擅长武器制造的人改良和制造武器，这项改革使北宋武器质量大为提高。

十一、将兵法。熙宁七年（1074）颁行。

针对以前禁军实行更戍以及将领和士兵互相不认识的弊端，废除更戍法，重新划分军区，要求将领和指挥常驻军中，负责训练和打仗。还裁减年龄50岁以上的老兵，归并军营，全国共设92将（军队单位，每将大约3000人）。京师附近设37将抵御辽和契丹，西北设42将对付西夏，还有13将对付国内叛乱。兵多的设正将、副将，兵少的只设单将，有的部队设指挥。

十二、三舍法。熙宁四年（1071）十月颁布。

在太学（最高学府）中设立三舍。学生初入学住外舍，名额2000左右，反对变法的学生一律开除。

2000人经过考试选拔200人，由外舍进入内舍。再经考试，选100人进入上舍。

上舍学生优秀的，不用考试直接授官。王安石创造了一种便于操作的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途径，以后南宋太学继续实行三舍法并不断完善。除了改革太学之外，还新建了武学（国防大学）、律学（政法大学）和医学（医科大学）。

十三、科举新法。熙宁四年（1071）二月颁布。

过去科举考试有两大宗：一、以诗赋考取进士；二、以默写和解释经文考取“明经”科，这是自隋朝开始的一种科举考试科目，出身等同于进士科。

新法规定，进士考试取消诗赋，考试内容改为经义大意和时事政论相结合。同时废除明经科考试，过去学习明经的一律改考进士。

有学者指出，诗赋取士固然背离时代要求，可经义取士也好不到哪里去。自宋以降，历朝都实行经义取士，成为统治者厉行文化专制的法宝。

十四、“三经新义”。熙宁八年（1075）实行。

这是王安石掌控意识形态的举措。

三经指《诗经》、《尚书》、《周礼》。

前两经由王安石的儿子王和吕惠卿撰写新的解释，《周礼》由王安石亲自诠释，一共写成《诗义》、《书义》、《周礼义》三本书。三种书统称“三经新义”，确定为全国学子必读教材，科举考试也一律以“三经新义”的内容为标准答案。在科举考试中，“经义不合王安石，则有司不敢取”。

“三经新义”再加上王安石另一部著作《字说》，当时叫新学，实际上形成了“王安石思想”。

所有不符合王安石思想的其他儒家流派，对不起，均为歪理邪说。王安石这样做，是要树立他的绝对权威。王曾瑜说，这是禁锢思想自由的反动措施。

以上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大致内容。

恶斗与撕裂

随着新法陆续颁布，各方博弈日渐惨烈，最后导致朝廷撕裂，甚至波及南宋的命运。

就王安石在世时的情况来看，大的斗争可分为两波。

先看第一波。

熙宁二年（1069）初春，变法开始。参知政事唐介反对新法，常与王安石争论。唐介看到神宗总护着王安石，气急攻心，竟至恶疮发作而死。

当时朝官们给五位宰相和副宰相编了一句顺口溜："生老病死苦"。

"生"指王安石，生气勃勃锐意新法；"老"指宰相曾公亮，因年老精力不济，搞模糊哲学；"病"指宰相富弼，反对新法，称病不上班；"死"指唐介；"苦"指参知政事赵，每见一个新法出台，就叫苦数十次。

这五个字，活生生体现出当时高层领导对变法的心态。

六月，御史中丞（监察部长）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说："误天下苍生，必此人也。"神宗立即退回奏折，吕诲只得请求离开京城。

均输法颁布不久，知谏院事（高级监察官员）范纯仁（范仲淹之子）上书说，王安石乱变法度，威胁民众生存，要求罢免王安石。神宗把范纯仁贬到成都地区当一把手。

九月，青苗法颁布过程中，翰林学士司马光在神宗面前同吕惠卿展开激烈争论。司马光坚决反对青苗法，神宗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意见。

十月，三朝旧臣宰相富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求罢相，神宗随后把陈升之补为宰相。

熙宁三年（1070）二月，韩琦在河北安抚使（河北东南地区军事负责人）任上上书批评青苗法，击中了青苗法要害。他说："兴利之臣（捞钱的官）纷纷四出。条文虽禁止抑配（强迫贷款），但倘不抑配，上户（富人）必然不愿借，下户则借时甚易，还时甚难，将来必有同保均赔之弊（同一保甲的人都赔）。"

同时，在青州（山东益都）任地方官的欧阳修，以及富弼，都上书反对青苗法。

当时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状况：在朝中，反对新法的人无法立足，出外当地方官，而新法要靠地方官落实，他们就在地方上阻挠新法。

神宗看到韩琦奏折，感慨不已。他说：“开始觉得青苗法是利民的，未曾想害民如此。”于是下令暂停青苗法。王安石见状，称病不出。神宗犹豫几天又恢复青苗法，请王安石上班。

由于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都是口碑甚佳的元老，并且是庆历年间的改革派，他们的行动，带起一大批官员阻挠新法。一度主张改革的苏轼也请求外放，同改革派划清界限。御史中丞吕公著上书质问说：“难道这些贤哲都变成小人了吗？”吕公著立即被罢职外放。

此时，朝廷中盛传王安石向神宗提出了“三不足”的口号，即“天变不足畏（害怕），祖宗不足法（效法），人言不足恤（忧虑）”。传播者的意图，是凸显王安石惊世骇俗大逆不道，进而孤立王安石。当然，这三句话引起朝官普遍质疑，当时主持翰林院考试的司马光，还以这三句话出了一道考题，要求考生做一篇时政论文，驳斥“三不足”。这个考题在送审时被神宗压住，要求另出其他考题。

其实，王安石并没有明确而集中地向神宗提出过“三不足”这样的语句，但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的确分别表述过这三句话的意思。保守派的集中概括，恰好是王安石的写照，体现了王安石的政治哲学。

神宗压下了司马光的考题，询问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回答：“不闻。”但是王安石接着就引经据典，证明“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于古有据，鼓励神宗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变法。至于“天变不足畏”这句话，王安石没有直接肯定，这是考虑到朝廷上下的氛围，留有余地。实际上，王安石说过类似的话。

司马光反对新法未果，请求离开京师到洛阳担任一个闲官，以便集中精力完成策划已久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获神宗批准。

应该感谢历史，给了司马光十几年落寞的空闲，让他不问世事，尽全力完成这部震烁古今的历史名著。不然的话，我们今天该有多大遗憾？

此际，宰相曾公亮和参知政事赵也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相继辞职。

不仅朝官指责新法，京师的商人也向朝廷告状说，实行市易法之后，市易司为了赚钱，垄断货源，哄抬物价。市易司卖什么什么就贵，“卖梳朴，梳朴贵；卖芝麻，芝麻贵”。枢密使文彦博则上书说，市易司连水果买卖都要垄断，“分取牙利”，意思是连很小的利都要剥夺。

神宗后院也起了火。他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和生母高太后，听说民间最苦青苗法，加入战团，流着眼泪对神宗说王安石乱天下，建议让王安石“出之于外”。神宗的两个弟弟也劝神宗废掉新法。

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提拔的一个叫郑侠的城门监守官，绘制了一幅《流民图》，进呈神宗。郑侠说，他负责看守城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卖儿卖女，拆屋砍树，流离失所，充塞道路，实在看不下去，于是把这些图景绘制下来，请皇帝圣览，停止害民之法。

神宗看了《流民图》，为之凄然，再度下诏暂停青苗法，导致王安石坚决请求辞职。神宗再三挽留无效，同年四月批准王安石出任江宁府知府。

这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王安石推荐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延续改革。

恐怖的内讧

再看第二波。

出乎意料的是，王安石一离开，改革派就闹起了内讧。韩绛、吕惠卿、邓绾等人争权夺利，不可开交。

吕惠卿一伙为了长期独揽大权，竟在神宗面前诬告王安石背着皇帝搞阴谋，甚至指使人把王安石牵连到一个谋反大案中，企图一举坐死王安石，使王安石永远不能复起。

吕惠卿等人的行径令人发指，他们也是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为何相煎如此之急？看来，变法的光环掩不住人性的黑暗。这些人为了攫取利益，阴狠贼毒，背信弃义，连做人的底线都丢得干干净净，自然会影响到新法的公正。这一点，很值得今天的改革者深思。后世有人批评王安石书生意气，有眼无珠，用人不当，是恰切的。

另一些变法派官员如曾布、魏继宗等人为了争权，也彼此竞相告发，说主持市易司的吕嘉问等人垄断市场，“贱买贵卖”，“多多收息以干赏”，“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综合各方面因素判断，这些话基本上是实情。

变法阵营闹得如此不可收拾，神宗只好在熙宁八年（1075）二月再度启用王安石。王安石恢复宰相职位之后，吕惠卿向富商“借钱”以低价在苏州大量购买良田的腐败行径遭到追究，章则因勾结吕惠卿而出朝，韩绛的宰相一职也罢免了。

但是，对王安石的另一重大打击接踵而来。他的爱子兼事业助手王与吕惠卿恶斗，私下搞小动作，企图置吕于死地的不光彩手段曝了光。王失去了神宗的信任，愤懑之极，疽发而死，王安石悲痛万分。

身处逆境的吕惠卿困兽犹斗，把王安石早先写给他的私信呈送给神宗，有的信上注明“千万不要让皇上知道”等密语。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渐渐冷淡了。

日益消沉的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再度辞职，回到江宁隐居。

王安石退居江宁之后，神宗继续主持改革，还是做了一点事情。主要是改革了北宋混乱的官制，加强了军事训练。但他又扩大了国家专卖范围，继续从民间敛钱，纯属短期行为。

元丰年间，神宗两次对西夏开战，遭到惨败，心情抑郁一病不起，

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去世，熙宁变法到此结束。他的儿子赵煦继承皇位时还不满10岁，是为宋哲宗。

神宗去世之际，司马光由洛阳返回京城参加皇帝葬礼，京城百姓在街头拦住司马光说：“请先生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皇帝，救救百姓吧！”司马光感到恐惧不安，坚决返回洛阳。

这时，神宗的母亲高太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召回司马光主持中央工作。反对新法的人物重新上台，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相继出任宰相，新法全部废除。其实，新法中有一部分还是可以继续改进实施的。司马光虽然写了《资治通鉴》，对于政治操作还是不甚明了，国家哪经得起这样的大折腾？

神宗去世的第二年，即元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在悲愤中辞世，时年66岁。

王安石去世前两年，害了一场大病。病愈之后，他把自己的房产“半山园”和田产都捐给佛寺，另在秦淮河畔租了一个小院居住，一直到去世。当时有人感慨地说，身为宰相，却住在这样的寒舍里，那些大搞豪华装修的官员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王安石去世之后，司马光提出建议，“朝廷宜优加厚礼”，没搞批倒批臭，堪称古君子之风。朝廷委派文豪苏轼写了一篇悼词，称王安石“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倒也符合实际。邓广铭说，这几句“全是赞扬，不含贬义。”

王安石去世之后5个月，司马光也去世了，时年68岁。

悲剧所在

短短十几年，神宗和王安石实施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变法，无疑操之太急。就变法效果来看，则是问题很多。

经过一番变法，朝廷财富急剧增加，要新建52座仓库来存放王安石敛财所得的钱粮绸绢。北宋财政收支扭亏为盈。

熙宁年间，各地兴修水利设施1万多处，灌溉农田36万多亩。其中江苏、浙江一带兴修水利最多，达1980处，灌溉农田10.4万亩。各地还开发了不少荒地和淤田，仅滹沱河两岸就得田1万顷。这些农田水利建设，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王安石变法之前就开始的，不应该完全算到王安石的头上。

在军事上，为了斩断西夏“右臂”，熙宁五年（1072）和六年（1073），王安石力挺王韶率领军队，在甘肃、青海一带攻击吐蕃，获取五州，史称熙河之役。这是北宋少见的对外作战的胜利。实际上，这是对弱小敌手的小胜，王韶攻占的地盘，不过是甘肃省的一个小角。

以上这些，可以算作王安石变法的成果。

但是，当宋军形成对西夏的包围态势，于神宗元丰四年（1081）和五年（1082）两次进攻西夏时，却两遭惨败，军队伤亡60万人，损失极重。强兵目标并未实现。

王安石的最大问题，是依靠加重集权和政府包办的方法解决财政困境，不可抑制地走上了剥夺民间财富的路径，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从王安石采用的一些措施中，看得出唐朝刘晏的影子。但是，两人相比，刘晏的市场因素更多一点，王安石则偏好集权。国库倒一时充盈了，民众却叫苦不迭。王安石说自己的本意是“摧抑兼并，均济贫乏”，也就是打击强势阶层，扶助弱势群体。但各种政策到了官员手中，发生大规模扭曲，结果是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却更加弱势。郑侠的《流民图》，就是一个注解。

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斗争，本质上是政策性分歧。

变法派好大喜功，为了富国强兵，既掠夺上等户的利益，也加剧盘剥下等户，全面得罪。反变法派因循守常，既保护上等户利益，也反对给穷人增加负担。两派各有长短。

随着矛盾加深，两派产生很多私人仇隙，相互报复，导致高层斗争

愈演愈烈，直至不可收拾。有人说，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泰斗级人物因变法决裂，形同水火，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到后来，两派完全丧失了理性与伦理的约束，各自向着黑暗的深渊跌落，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

神宗的母亲高太后执政9年铲除新法之后，19岁的哲宗亲政，又来个180度大转弯，恢复新法。王安石一派的章担任宰相，提出要把司马光的坟墓掘开，鞭尸暴骨，同时残酷打击反变法派的官员及其子女。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赵佶即位（徽宗），由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仇恨新法，第三次180度大转弯，下诏恢复司马光原职，并把变法派全部赶出朝廷。向太后执政一年病逝之后，徽宗重用早年的变法派蔡京，第四次180度大转弯，把司马光、苏轼等120人定为奸党，由徽宗亲自书写奸党名字刻在石碑上，立于朝廷大门外，算是铁案，永远不能翻。后来更演变为闹剧，蔡京把一部分不属于自己死党的变法派如章也列入打击对象，将反变法派和部分变法派定为邪党，共309人，名字刻在石碑上。就这样，每折腾一次，北宋的元气就衰竭一次，直到病入膏肓，这都是后话了。

王安石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可惜他这个愿望最后也未能实现。学者叶檀撰文说，王安石理财，短期满足了国库所需，但它所产生的弊病，则造成了更为深远的负面作用。从历史上看，政府高度垄断所得越多，对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

王安石就是在这里跌的跤，也就是说，这是王安石变法真正的悲剧所在。

以今天中国的发展来看，30年来取得突出成就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从小岗村包产到户开启的进程来看，在于政府逐步退出，渐渐放松对经济的严厉管制，选择市场经济的大方向。这就使民众能够挣脱束缚，也使社会上蕴藏的活力得以迸发，从而创造出增长的奇迹。这个方向，与王安石致力的途径正好是相反的。

今天又回到了南宋吗？

近来，有学者著文，对质疑王安石的声音表示忧虑，说现在历史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南宋初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上”。

南宋知识界批评王安石，说王安石“趋利而不知义”、“尽黜先儒之说”、“聚敛害民”、“剥民兴利”。

现在有学者批评王安石，说王安石“运用政权力量排斥一般兼并而自为兼并”，“经济政策上的倒退，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强权干预”，“扩大了国家赢利性经营规模，官营经济体系发达，对民间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王安石的经济措施，摧抑兼并效果不大，倒是大大加重了“贫乏”者的经济负担。

两种批评的出发点和实质是不一样的。

当今学者提出的质疑，是从“政府应该干什么”或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样一种视角出发，重新评估王安石变法。

纵观历史，对于中国来说，减少集权垄断，增进民间经济活力，尤为重要。因为无论是汉代盐铁专卖，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是依靠政府集权，官办官营，其后果往往是窒息民营，剥夺民财。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传统，不利于调动全社会经济创造的积极性。明清以来，经济渐渐陷入积贫积弱状态，与缺乏民间活力密切相关。

王安石变法，进一步加重经济集权，从而严重压抑了社会活力。学者叶坦在《大变法》一书中说，王安石变法有一些积极内容，但从整体上看，则是一次强化专制集权的事件。不仅在政治上更专制，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也强化了专制，以保甲法加强了对百姓的管制，把一个本来已经有可能走向开放和民主的社会体制，又逆转回去了。

南宋理学家批评王安石，重点是斥责王安石着眼功利，不合儒家正宗。这与今天批评王安石搞命令经济、国家垄断、强化专制，在内涵上有根本区别。

或问，这是不是以今天的认识标准来要求古人呢？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评论王安石，都是从自己的时代立论，表达不同时代的认知与探求。

20世纪上半叶，一提起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就是国有化，就是否定市场经济，就是平均主义。梁启超就是这样理解社会主义的，他

在1906年写了《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这篇文章，文章中说：“新社会之经济组织如何？以简单之语说明之，亦曰：国家自为地主自为资本家，而国民皆为劳动者而已，即一切生产事业，皆由国独占。”所以梁启超赞扬高度经济集权，说王安石是社会主义的老祖宗。

与其说梁启超是以1908年的标准“要求”王安石，倒不如说他是以1908年所能获取的思想视野重新评估王安石。从这种评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思想界1908年的境况。今天我们评论王安石，与1908年对王安石的礼赞有所不同，这并不表明今天的思考又倒退回了南宋。恰相反，它表明今天的认知，比起梁启超的时代，又向前走了一步。

王安石时代的西欧

王安石生活在11世纪东方，当时西欧情况如何？

当时的西欧，基督教会势力强大。

与中国儒家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是，西欧教会以及大土地所有者也蔑视商业，这是农耕社会的共同特点，西欧当时也是农耕社会。

当时的教会认为，商业利润是一件罪恶的事情，是拯救灵魂的障碍。一部宗教著作的名言就是："商人难以取悦上帝。"

因为商人吸引劳动力离开土地，而大土地所有者以农为生，所以大土地所有者也本能地反对商人。

中世纪欧洲也曾有过"义利之辩"。教会认为提升道德与追求赢利互相敌对，绝对不能相容，所以千方百计反对利润和利息。

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皮朗在《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一书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一位叫做圣·格腊耳的主教，在罗马买了一件主教袍。他离开罗马，在帕维亚这个地方遇到一群威尼斯商人。主教把自己买的教袍拿出来给商人们看，并介绍他买这件教袍花了多少钱。

这些商人一听，称赞他很上算。原来，这件教袍，在君士坦丁堡要花更多的钱才能买到。

格腊耳听了，不但不高兴，而且很气愤。气愤什么呢？他觉得少花钱买了这件教袍，是不道德的，是欺骗了卖主。他立即把差额寄给了罗马的服装商，不愿意贪便宜而犯贪婪的罪过。

看看当时一些银行家去世时的遗嘱吧。这些遗嘱大都写明，应该对穷人进行赔偿，并把部分财产捐献给教会，这样就可以在最后审判时得到赦免。这不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银行家生前受到的压力吗？

但是，与王安石不同的是，西欧的教会和大土地所有者虽然持有这种观念，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强制性法律压制和剥夺民间商业。

在中世纪的西欧，城市经商是自由的。皮朗说，从10世纪到13世纪，各地诸侯也好，驻节的主教也好，市政管理者也好，"从来不曾在控制商业活动方面做过任何尝试，我们也决计找不到什么可以叫做经济政策的迹象"。当时西欧各国政府和地方王侯都保护商人，设立路警，打击匪徒，努力把商人吸引到自己的国家，增加税收。

当然，在战争发生的时候，逮捕敌方商人的事时有发生。但是皮朗告诉我们，这些措施不会持续下去，“一旦和平恢复，也就一切如常了。以夺取对方市场或是侵占对方产业的做法来打垮敌人，这种想法当时是没有的”。

“商人就像基督教香客一样，受到他们所经过的地区的诸侯特殊保护，公共安全保障着商人。”在整个11世纪到13世纪，西欧“安全的感觉在加强，一种特别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劳动的精神状态逐渐确立起来了”。

正由于此，11世纪到12世纪，西欧出现了商业复兴。

让我们就青苗法的贷款问题做个比较。

当时西欧，民间银行很普遍，贷款成为日常行为，保险业开始起步，信用票据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贷款如能按时偿还，一般利息为10%。

国王、主教、官员和贵族缺钱用，都到民间金融机构贷款，有地位的富人出面担保。1160年，一个叫卡德的商人就把一大笔款贷给英国国王及若干贵族。历史资料表明，这些贷款一般是能够偿还的。大体上看，西欧各地统治者尊重民间商业规则，并且按照民间商业规则活动，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样，摧毁民间规则，直接采用残酷的手段大规模搜刮老百姓、富人以及商人。

由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西欧经济日渐繁荣。皮朗说，11世纪时，许多商人赚了大钱，从领主那里购买免税的权利。“在许多城市里，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培育，得益于这些富人的经费。这些富人的合作组织，形成一种市政机构。”在圣奥梅尔，商人和企业主公会自行出钱修建街道，修筑城墙。在其他一些地方，商人用利润建立了许多民间金融机构，自由地从事资本活动，西欧的自由市场经济就这样慢慢发育起来。

也许当时北宋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欧，但是放在时间长程来看，按照专制经济的路子搞下去，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最后会越搞越穷，这是许多国家的经验反复证明了的，也是20世纪东欧和西欧的经济对比证明了的，这就更加突出了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当然，王安石之所以如此，与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局限有关，对此应该有一个综合性理解，但是却不能因此而赞赏王安石的路径选择。

正如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7年出版的《动荡年代：新世界中的冒险》一书所说：正是由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拥抱自由市场”，才走上了高速发展之路。不管大国还是小国，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功，都将依赖于该国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所能达到的程度。

至于陆定一提出的“王安石搞‘文化大革命’”究系何指，有人说是指新法刺激了民间的动乱；也有人说是指变法导致北宋和南宋高层的激烈斗争，其残酷程度有如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可惜的是，陆定一有关王安石变法的谈话过于简约，而他又已经去世，只能等待陆老遗文的发掘，或是知情人出来介绍了。

张居正的清凉界

张居正的美学

张居正就像时下香港与上海的高级白领一样，很在意穿着。

每天上班之前，他都要往身上抹点香脂，所到之处飘散着一股淡淡的清香。他每天都换一套衣服，他的衣服讲究质地与颜色，既光鲜悦目，又符合首席宰相身份，看上去精致高雅。他又素爱整洁，家居以及办公室条贯井然，清洁光亮。这和北宋宰相王安石不修边幅、蓬头垢面的个性，恰好相反。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去世。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从北京回湖北江陵（湖北荆州）老家安葬父亲。他坐的是一个超豪华的大轿子，轿子前部是起居室，后部是卧室，起居室和卧室两侧还有回廊，各有一个书童焚香挥扇，以便在旅行途中享受芬芳，这真称得上十足的哀艳了。顺便说一句，这个大轿子要用32名轿夫抬杠。

据学者刘志琴测算，张居正居丧期间每月收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1.5万元左右，显然不够用。张居正并不拒绝财富，事实上也有很多关于他纳贿的传言。

张居正家中悬挂着一副黄金制作的对联："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立山为岳四方颂。"张居正别号太岳，此联嵌入一个"岳"字，隐喻张居正乃巍巍高山，受四方颂扬，与"万国仰大明"并论。这是马屁精进献的礼物，张居正把玩欣赏，十分自得。至于他的老家大兴土木，兴建超级豪华府第，更不在话下。这与唐代名相刘晏家中只有"杂书两车，粮食数斗"，亦不可同日而语。

不必苛责张居正。晚明商业繁荣，消费高涨，讲究奢华，比唐宋的经济条件要好。稍晚于张居正的复社要人吴昌时，家里桌椅四周环列梅花百盆，水仙百盆，按季节随时更换，读书聊天置身花丛之中，好不惬意。吴昌时还养着大批姬妾艺人，在家中就能演出全本《牡丹亭》。稍早于张居正的权相严嵩，获罪抄家时获得的财宝清单，足足印成一本书。张居正被抄家时，他的财富只相当于严嵩的1/20。原本想通过抄张家获得一大笔财富的神宗，不免失望。

"文化大革命"中，早已长眠地下的张居正还是不得安宁。红卫兵比神宗还过分，竟然掘开他的坟墓，结果发现这位权倾天下的宰相陪葬很少。小说《张居正》的作者熊召政说："墓很坚固，用锹铲之类的工具无法挖开，便有人开来推土机，终将墓室摧毁。掩封了近380年的棺材显露

出来。红卫兵们一拥而上，掀开棺盖，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这结果让红卫兵们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

从张居正的生活习性，不难发现他有一种严整的美学观，他的施政风格也带有这种烙印，这就是讲究精细，讲究严密，信奉完美主义，不容任何混乱的现象存在，不容任何嘈杂的噪音干扰，更不容任何人为的路障阻拦。

铜墙铁壁：北部边防的黄金时光

宋、明两朝，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一直是王朝心腹大患，最后这两个朝代都终结在北方入侵者手中。张居正去世62年之后，明朝也倒在清军入关的铁蹄之下。

从明初到张居正时代，北方的鞑靼（蒙古人游牧部落总称之一，另有瓦剌）一直威胁着明王朝的生存。其中，最令明朝头疼的是鞑靼各部落中最强悍的土默特部落酋长俺答。俺答骁勇善战，每年都攻破长城，进犯内地。嘉靖二十八年（1549），俺答的骑兵前锋直抵大同、永宁（北京延庆），大掠而去。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大军攻陷古北口，包围北京，北京宣布戒严。嘉靖四十二年（1563），俺答的儿子辛爱率大军攻占北京东郊顺义，烧杀抢掠。俺答的刀口，已经伸到了皇帝的脖子上，朝廷上下惊恐万状，士农工商朝不保夕，北京城再次宣布戒严，侥幸没有被攻破。

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当然是大臣的第一重任，出身于下层军人家庭的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

隆庆元年（1567），43岁的张居正升为礼部（主管礼乐教化）右侍郎（相当于副部长）、东阁大学士（明初大学士仅为皇帝顾问、秘书，明中叶之后权力逐渐扩大），进入内阁，成为宰相之一。

当时北部的防御，一是有明代修建的长城，再就是9个军镇：辽东镇（辽宁辽阳）、蓟州镇（河北迁西）、宣府镇（河北宣化）、大同镇（山西大同）、榆林镇（陕西榆林）、宁夏镇（宁夏银川）、甘肃镇（甘肃张掖）、太原镇（山西太原）、固原镇（宁夏固原）。当时称这九镇为“九边”、“九塞”。张居正写诗说“神游九塞”，就指这九镇，用今天的话说是9个军区，均驻守重兵。

九镇当中，西部河套一带的榆林、宁夏、甘肃、固原4个镇，敌方势力较弱，不是重点。太原镇在内地较深，也还安定。最吃重的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四镇，这是北京的左右两翼，拱卫国家中心，十分紧要。

在张居正时代，更吃紧的是蓟州，这里离北京最近，俺答大军多次突破蓟州防卫，直袭北京。等到张居正解决了俺答问题之后，战事逐渐东移，辽东遂成为晚明边防的重中之重，那是后话了。

这一年讨论边防问题，张居正出面奏请调名将谭纶、戚继光主办蓟

州练兵，得到首席宰相徐阶支持，顺利通过。

隆庆二年（1568），朝廷任命谭纶为右佥都御史（部长级监察官员）、兵部（国防部）左侍郎（副部长）、总督蓟、辽、保定（河北保定）军务。任命戚继光为总理蓟州、昌平（北京北部郊区）、保定三镇练兵事宜，这三个镇的总兵官都归戚继光指挥。

谭纶是南方抗倭名将，曾先后领导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等将领，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歼灭倭寇，战功赫赫，升为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戚继光是有名的平定倭乱的将军，他率领的戚家军能征惯战，光耀史册。

隆庆三年（1569），徐阶下台，高拱担任首席宰相。张居正又得到高拱全力支持，掌握了管理军务和外交的权力，成为实际主持边务的宰相。

这里要说一句的是，从隆庆元年（1567）到六年（1572），先后担任首席宰相的徐阶和高拱陷入激烈内斗之中，好不容易进入内阁的张居正尽量低调，与两边都保持等距离，得以保全。边防事务是隆庆年间唯一没有受到权力斗争干扰的国家要务，所以张居正能够全力以赴，施展作为。

明代以文制武，军人地位日益低落。总兵官是军区司令，已经是最上层的将领了，当他们到兵部领公文的时候，都要长跪，简直丢尽了脸。各地总兵官的指挥权，受地方巡抚以及朝廷派到军中的御史钳制，用兵打仗往往不能做主，不是贻误战机就是被迫盲动，常常导致失败。

张居正深知其弊，经过力争，为谭纶、戚继光争取到了独立指挥权，不受地方官掣肘。此举激起地方巡抚和驻军御史一片反对。他们还说，任命戚继光为总理，是在三镇总兵官头上多加了一道“缀疣”，于体制不合。张居正努力斡旋，终于将反对的声音压制下去，使谭纶和戚继光能够摆脱诸多束缚，一展雄才，这是张居正对明朝军事体制的一项突破。

戚继光率领的浙江籍军队来到蓟州列阵，遇到大雨倾盆。原来的守军队伍立即散了，而戚家军从早到晚任凭风吹雨打，“植立不动”，北军无不折服，这才知道什么是严整的军纪。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指挥明军与鞑靼另一部落朵颐部交手，大败酋长董狐狸，明军军威大振。

为了加强蓟州防御，戚继光提出一个建议：从山海关到昌平修筑1000多座烽火台，驻军平时在台下种田，一遇敌情，以烽火为号，首尾相助，群起抗击。

由于工程花费较大，许多官员反对，张居正排除众议鼎力支持，经过两年多施工，终于在1000公里的防线上筑起1000多座烽火台，同时对原有的长城城墙加高加固。

戚继光本来就威名远播，现在又加上如此周密的防备，鞑靼各部落心寒胆怯。戚继光镇守蓟州16年，京师北边安安静静，这是戚继光的大功，也是张居正的大功。

再说西边宣府、大同方面。

真是老天相助，一件偶然发生的桃色事件，在张居正巧妙处理之下，竟使凶狠毒辣的俺答放下屠刀，“兵器销为日月光”，与明朝化干戈为玉帛了。

事发在隆庆四年（1570），事件的女主角是一个名叫三娘子的女子。三娘子美色绝伦，万人追爱，这朵鲜花当然落在权势人家的手里。俺答的孙子，一个名叫把汉那吉的小伙子娶了三娘子。

事情本来应该到此结束，谁知俺答也喜欢上了三娘子，爱得魂不守舍，遂从孙子手里抢了三娘子做为自己的姬妾。更糟糕的是，这个三娘子其实是俺答的外孙女。当时俺答部落尚未开化，近亲结婚难以避免，但外孙女投入外祖父怀里谈情说爱，毕竟太离谱。把汉那吉实在受不了这奇耻大辱，在谋士劝说下，率领几个亲信，脱离鞑靼，偷偷跑到大同，投奔了明朝宣大总督（宣府、大同地区的军政一把手）王崇古。

事件发生之后，前线一部分将士主张杀掉把汉那吉，以泄多年来俺答入侵之愤。朝廷诸多官员吸取以前类似事件的教训，认为这是一个诈降阴谋，主张不受降。

王崇古与大同巡抚（大同行政一把手）方逢时还算明白人，没有草率从事，安置了把汉那吉之后赶快向朝廷请示。他们的意见是交换人质，用把汉那吉换回多年来帮俺答侵犯内地的汉人内奸赵全等人，加以处置，以儆效尤。王、方认为，把汉那吉是俺答的老妻从小带大的王储，俺答一定会来索要。

张居正对情况作出全面分析之后，指出此事“于边事大有关系”，主张抓住机会，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理。他在高拱支持下，主张受降。他指示王崇古说：“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要求王崇古谨慎处理，严加保护，并授予把汉那吉一个指挥使（中级军官）的官职，赏大红丝织服装一套。

张居正说，如果俺答索要孙子并表示不再进犯，那就可以结盟，封爵朝贡。如果俺答今后背盟，再兴问罪之师，正义在我，胜算良多。如

果俺答一时没有遣送赵全，也可以将把汉那吉送归，以示怀柔。俺答如果没有真正和解的诚意，即使交还赵全，也还会再犯。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是否交换人质，而在于俺答有没有和解的诚意。

果然，俺答受到家族谴责之后，恼羞后悔，亲率10万大军越过边界直指大同。他的打算是，一旦发现明朝官员杀了把汉那吉，就血战一场。王崇古派人谈判，说你的孙子受到礼遇，结结实实，活得挺好。俺答派人前往察看，把汉那吉正穿着华贵的衣裳骑马取乐。俺答得到意外的惊喜，说："我再也不打仗了！"

赵全眼看蒙汉和解大势已成，写了一封信给方逢时，表示悔过。明朝方面把这封信给了俺答，结果是俺答把赵全等人交还给明朝，领回了孙子。

张居正趁热打铁，授意王崇古向朝廷提出"封贡通市"的建议。在朝廷辩论中，张居正在高拱支持下，驳斥了一些朝官诬蔑王崇古、方逢时"通敌"的谰言，力劝皇帝批准。隆庆五年（1571），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受封的鞑靼首领达61人。双方又约定了每年向明朝进贡的马匹数量和交换物品，决定开展互利贸易。

在整个事件的进展过程中，张居正抓得很紧很细。他不但平息各种汹汹议论，调和内阁意见，指示每一个步骤如何进行，而且连赐给俺答的丝绸缎子，也一件一件都要亲自看过，要"美好经用"才行，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张居正追求完美的政治美学。

其实，北方的马匹、牛羊和南方的粮食、布匹等等，都是双方急切需要，不通过战争而通过贸易解决相互需求，对双方而言都是成本最低的。开市3年，官市和民间交易的牲畜3万头。贸易兴旺起来之后，吸引大批商人北上，也促进了塞外经济发展，边境出现了物阜民安的景象，不仅造福明代，也使后来的清朝受惠。从此，蒙汉之间的和平，延续200多年一直到清末。清末魏源说，这一和约，"为本朝（清朝）开二百年之太平"。这是张居正在隆庆年间的最大成就，也是穆宗政绩的最大亮点。

这里要提一提穆宗。在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当中，穆宗是一个罕见的好玩的人。当皇帝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他上朝的时候，一句话不说，任凭大臣们如何辩驳，他也不张嘴。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3年过去了，直到当了4年皇帝，他还是一句话不说，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哑巴。官员们上书要求他说话，他就是不说。但他还算一个宽厚的人，有的御史上书猛烈指责他的各种问题，他只是不理，或者批示说你不了解情况，就算完了。要是这种事发生在他的父亲嘉靖身上，那些大胆的臣子就要吃廷杖了。更重要的是，穆宗在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

上颇有建树，他制定了“华夷一家”、“胡越一体”、“并包兼育”的民族政策，对高拱、张居正的所作所为也大力支持，这是张居正成功的重要条件。

北面的问题解决了，战事中心东移，辽东又逐渐成为吃重之地。从万历四年（1576）起，张居正的目光集中到辽东方面。正像信任谭纶、戚继光一样，他放手重用辽东巡抚张学颜、辽东总兵李成梁。

这里的北方，面对的是鞑靼的土蛮（察哈尔）部落。早在嘉靖皇帝后期，凶残的土蛮就多次大举入侵，明朝三员守边大将先后战死。

李成梁自隆庆元年（1567）以副总兵官职务参加辽东防卫战，屡建奇功，先后取得10次大捷，威震辽东，成为一代名将。“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隆庆四年（1570），张居正奏请朝廷提拔他为总兵官。万历七年（1579），加封李成梁为宁远伯。张居正起草给李成梁封爵的圣旨时说，李成梁战功卓著，“加以显秩（崇高的官位或爵位），良不为过”。截至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去世，辽东始终如铜墙铁壁一般。

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即张居正去世9年之后，由于李成梁失去像张居正这样精细的完美主义者指导和约束，贵极而骄，屡犯错误，遭弹劾去职。此后，明朝八易辽东主帅，辽东还是守不住，不得已再启用76岁的李成梁镇守8年，辽东又守稳了。

哪个年代没有名将？南宋岳飞、明末袁崇焕都是，关键是看你怎么把握和使用，这就牵涉到大局意识、胸怀气量、识人悟性和创新精神。张居正与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的关系，启示良多。

由于张居正悉心经营边防，指挥有度，用人得当，北部边疆在二三十年内一度竟出现了南强北弱的有利态势，北部边疆固若金汤。“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这实在是稀罕难得的局面。

金三角铸成一代权相

如果说隆庆年间开头几年是徐阶与高拱恶斗，张居正可以避避风头尽力于边防的话，那么在徐阶倒台，高拱又赶走了内阁其他对手之后，张居正可就躲不开了。

张居正23岁考中进士踏入政界，先后在翰林院（皇室的智囊和秘书班子）、国子监（国立最高学府）以及皇储所在的裕王府担任过小官和中级官员。在这个过程中，徐阶曾提拔张居正，是张的恩师；而张居正在国子监担任副手之际，高拱是国子监祭酒（一把手），两人也合作得很好。这是张居正早期与徐、高二位领导能够保持等距离的重要因素。

张居正在隆庆元年（1567）进入内阁，当时大学士（宰相）共6人：徐阶（首席宰相）、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

身材矮小的白面书生徐阶足智多谋，政声卓著，资历很深。他曾多方保护敢说话的海瑞，再加上他扳倒了横行20多年的权相严嵩，更是众望所归，在朝中势力很大。高拱精明强干，是明代一流能吏，毛病是心高气傲，蛮横专断。嘉靖皇帝于1566年去世，裕王朱载登基成为穆宗（年号隆庆）。高拱曾长期担任新皇帝的老师，自然有恃无恐。

导致徐、高关系恶化的重大事件之一，是嘉靖遗诏的起草。嘉靖皇帝弥留之际，徐阶受命代为起草遗诏。徐阶与高拱不和，于是在起草时避开高拱及其他内阁大臣，单独与张居正商量筹划。

嘉靖皇帝自36岁起迷恋道教，追求长生不老，长期在深宫修道炼丹，竟至几十年不上朝，贻误国事，造成了极大混乱。

身为首席宰相的徐阶对此一直很痛心，他想利用起草遗诏的机会除旧布新，改弦更张。因此，这份遗诏，是以嘉靖的口气宣布自己的错误，等于替嘉靖写了一份检讨。比如，在遗诏中，嘉靖回顾自己执政的问题时说，“过求长生，遂致奸人趁机诳惑”，“朝讲之仪久废”（不理朝政），“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这实际上变成了一份“罪己诏”。遗诏还说，凡过去因为提意见而遭惩处的官员，一律平反。

万幸的是，嘉靖皇帝临终之际，点头接受了这份遗诏，真应了一句古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就为即将开始的隆庆新政作了铺垫。

这样重大的举措，竟然把高拱排除在外，自视极高的高拱自然深为不满。

徐、高矛盾逐渐激化之后，一些企图讨好徐阶的给事中（监察官

员）上书弹劾高拱，说高拱在先帝病危时忙于自己搬家的私事。高拱大怒，他的同乡、宰相郭朴要求惩办上书的给事中，结果遭到更多言官雪片般的猛烈攻击。

高拱和郭朴待不下去了，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和九月，两人相继被迫辞职。

高拱下台之后，有些亲高拱的官员不服，出面弹劾徐阶，说嘉靖皇帝那些荒唐行为，身为宰相的徐阶也逃不了责任。此时徐阶的形势也不妙，由于他不断劝阻刚上台的穆宗不要太贪玩，引起新皇帝不满。隆庆二年（1568）初，徐阶也被迫辞职下台，由李春芳接任首席宰相。

隆庆三年（1569）底，在太监陈洪、孟冲援引之下，穆宗又召回了他的老师高拱，让高拱担任宰相并兼吏部（中央组织部）尚书（部长）。此时的内阁大学士，除原有的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之外，又增添了赵贞吉。

高拱一朝复职就展开大规模报复，对于经徐阶之手平反昭雪的官员，竟一律恢复原判，重新收入狱中。高拱还迫害当初弹劾他的监察官员，有的给事中竟活活吓死了，这就毁了穆宗登基之初平反冤狱的新气象。刚入内阁的赵贞吉不同意这么干，他上书说，这样报复和打击言官不行，结果得罪高拱，罢官回家。

就在这一年，礼部尚书殷士儋补充入阁担任宰相。老殷一上来就跟不可一世的高拱发生冲突，两人竟然在朝中动手打了起来，结果当然是老殷走人。

窝窝囊囊的陈以勤见状，自知不是对手，在隆庆四年（1570）七月辞职。首席宰相李春芳因为阻挡高拱进一步报复徐阶，和高拱产生矛盾，也知趣地提出辞职，在隆庆五年（1571）获准回家。高拱坐上了首席宰相宝座。从隆庆四年（1570）到隆庆五年（1571），高拱一连赶走了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殷士儋4位大学士，威权赫赫，朝官不敢仰视。内阁只剩下高拱、张居正。到隆庆六年，内阁又增加了高仪。

高拱整人整到死，他不放过退休回家的徐阶。高先生在朝中造舆论说，徐阶利用起草遗诏的机会抹黑先帝嘉靖的高大形象，罪可当斩。他又调动纪律检查和刑事司法部门严查徐阶家人的腐败。结果，徐阶的3个儿子全部被逮捕，徐家的巨额田产也充了公。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恩师徐阶的惨境，暗中活动，留下了徐阶的幼子革职为民，另两个儿子充军，算是勉强保全了徐阶的晚年。

张居正的所作所为，高拱立即得到密报。早先徐阶起草遗诏时单独

与张居正密商的旧疮，又在高拱身上隐隐作痛了。张居正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处境，马上就要被收拾。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改变了张居正的命运。

这就是当了6年皇帝的穆宗在隆庆六年去世，年仅36岁。

对于高拱来说，最大的后台消失，他的政治生命出现了变数。在皇权专制时期，深宫泛起小波，朝廷就是大浪。

高拱一时顾不上张居正了，他将注意力转向了深宫大内。反正张居正是个下属，多留几天也没什么打紧，到时候干掉他还不是易如反掌？。

高拱有一个对头，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

明朝太监有24个衙门，包括司礼监、御用监、尚膳监等十二监和钟鼓司、宝钞司、惜薪司等四司，还有兵杖局、巾帽局、内织染局等八局。其中，司礼监是首席衙门，权势最高，不仅总管内廷数万太监所有事务，而且干涉朝政。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

明朝是以批复文件体现权力意志的。臣子事事写成奏本向皇帝汇报，得到批复之后按旨执行，帝国机器就这样运转。

这些奏本本来应当由皇帝本人阅读并作出批复，但明中叶以后皇帝懒惰贪玩，根本不看。皇帝的意图或某些奏本送到内阁，由内阁大学士斟酌之后，模拟皇帝的口气，草拟出文件初稿或奏本的批旨，再送皇帝阅处。大学士的模拟草稿用墨写在纸上，这叫票拟。按说皇帝有票拟作参考，已省不少事，只要用朱笔在票拟上写几个红字，就发生效力，这道程序叫批朱。但皇帝连批朱也懒得做，把批朱的事交给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代替皇帝写批示。批朱写完了，再交给司礼监掌印太监审核，然后盖上大印。

票拟和批朱两件事中，批朱更重要。如果说大学士是皇帝的秘书，那么司礼监则是皇帝的机要秘书，黄宗羲的话是冲这一点说的。《明史·职官志》说：“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宰相权力）转归之寺人（太监）。”这当然是一种变态的制度。

司礼监中的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掌印太监是“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核查）”，相比起来，掌印太监更重要。

冯保这个人聪慧敏捷，写得一手好字，皇帝称他为“大写字”。冯保在嘉靖皇帝时就担任秉笔太监，隆庆初年，还兼管东厂（直属皇帝的特

务机构，负责侦办官员），权势很大。

但心高气傲的高拱仗着穆宗做后台，偏偏不买他的账。

隆庆末年，掌印太监出现空缺，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谁知高拱却推荐了同乡、御用监太监陈洪。陈洪出事之后，高拱又推荐尚膳监太监孟冲担任掌印太监，高拱和冯保就这样结了仇。于是，冯保开始暗中与张居正接触，两人达成了互相支持的意向。因为冯保和高拱闹翻，需要另一位外廷宰相的支持；而张居正要想干事，也需要大内有冯保这样一位人物策应。一场新的恶斗开张。

从隆庆六年五月庚戌穆宗去世，到六月初十10岁的朱翊钧继位为神宗（年号万历），有半个月间隙。在这段时间里，冯保拼命活动。他的目标，是赶走孟冲，自己出任掌印太监。冯保不但有皇后支持，而且由于他经常抱着幼年的朱翊钧玩耍，与小皇帝也很亲热。

神宗一即位，皇帝手谕立即传到内阁，其中有一条是引用穆宗的遗诏，任命冯保为掌印太监。高拱一看就知道这不是穆宗的意思，因为他跟穆宗太熟了。这位首席宰相跳了起来，指着传旨的太监说："这是谁的主意？皇帝还小呢，一切都是你们干的，早晚把你们赶走！"

高拱立即发动诸多言官火速给皇帝上书，指责冯保伪造和假传圣旨。伪造圣旨可是大罪，这表明双方彻底摊牌，非来个你死我活不可。

六月十六日，神宗召集大臣开会，会上由冯保宣布圣旨：罢免高拱的宰相职务，不许在京停留，立即回老家！

被兜头一盆冷水泼得肝胆俱裂的高拱，只好雇了一辆牛车，仓皇出京，后面还有押送的军警追赶，真是狼狈万分。

聪明的张居正，在这个激烈火拼的过程中，请了病假回避。等他十九日上朝的时候，高拱已经出京3天，而另一宰相高仪也于4天之后病故。这样，朝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个顾命大臣，再加上他在大内的关系，自然成为首席宰相。

鉴于高拱败于深宫内廷的教训，张居正小心地维系着与冯保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陈太后和李太后。陈太后是穆宗的正宫皇后，李太后原为穆宗贵妃，是朱翊钧生母，朱翊钧登基之后也封为太后。陈太后无子，为人本分，与世无争，视朱翊钧为己出，可以略去不论。李太后饱读诗书，有思想，有决断，教子极严。最重要的是，她非常欣赏张居正，把小皇帝的教育和天下大事一心托付给张居正。张居正当然是尽职

尽责，让李太后十分满意。当小皇帝不听话的时候，李太后每每是一句话："一会儿告诉张先生，看你怎么办？"小皇帝立刻老实了。

就这样，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结成了一个黄金三角，从内廷到外廷，一气打通，张居正有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最佳机会。他后来取得的政绩，都离不开李太后和冯保鼎力协助。最难得是冯保，明代大太监如王振、刘谨、魏忠贤等，作恶多端，误国害民，独冯保始终如一支持张居正改革，实为罕见。这是历代改革者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际遇，张居正独得之。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是张居正仕途中吉星高照的光彩阶段。

问责风暴和驿递改革

嘉靖长期不理朝政，穆宗时期内阁混斗，朝廷纲纪废弛，一片软、懒、散。张居正掌权之后，第一要务就是要“振纪纲”。

早在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就曾经向穆宗呈递《陈政事疏》，提出六点建议：一、省议论（不争论）；二、振纪纲（加强法纪）；三、重诏令（贯彻政令）；四、核名实（去除虚假和水分）；五、固邦本（理顺财政恢复元气）；六、饬武备（加强军备）。

这六条虽算不上重大理论创新，倒也挺实际。但在隆庆年间，六条只做到了一条，即“饬武备”。现在张居正当了家，他要逐步实行这些“富国强兵”的主张了。

头一件事，就是提出考成法，不许官员瞎混。万历元年（1573）六月，他给神宗上了一个奏折，题目叫做《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披露了中央和各地官员成天公文旅行不办实事的弊状，要求建立一套新的问责制，追究落实情况。神宗立即批准照办。

明朝中央政府的体制，在行政方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二品）、左右侍郎（从二品）。在监察方面，除了都察院系统之外，还有专门监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谏官名称）系统。六科指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分别对应着六部，监察六部及其各司局是否违纪违法。六科设置了都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从七品）、给事中（从七品）等官员。

别看给事中只有七品官级，但他们单独对皇帝负责，秘密举报，杀伤力极大。所以，在明代官僚体制中，固然是大官统帅小官，可是小官亦能牵制大官。

从明初到明中叶很长一段时间，六部和六科都单独对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内阁只是皇帝的顾问秘书处，权力并不大。张居正通过神宗授权实施考成法，改变了这种情况，实现了内阁总其成，扩大了内阁权力，使中央政府进一步理顺了体制，朝着建立责任制内阁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具体做法是，要求六部把要办的公事一条一条登记造册，一式三份：一本留部，一本送六科监察，再一本交内阁查考。

张居正规定，由内阁牵头，一件一件研究，根据事情轻重缓急，限令各部和各地按期完成。每月考核，逐年总结，完成之后一一注销，如

有欺瞒不实之处，经监察官员查出，必定严办。然后根据考核结果，评定官员政绩，决定升降。

这样一来，张居正通过控制六科督察权，控制了六部，又通过六部控制地方。从地方到中央的官员，一层层都由内阁控制。

后来有一个叫刘台的官员在万历四年（1576）弹劾张居正说：“张居正实施考成法之后，地方官办事不力有六部纠正，六部办事不力有六科纠正，六科隐瞒则由内阁纠正。过去的祖宗成法，由翰林组成的内阁，相当于中央政策研究室，只是提供思路，预备顾问而已。张居正创造了考成法这么个玩意儿，结果把六部六科都制住了，各部各科官员的命运都被内阁掌握，难道祖宗的法度是这样的吗？”刘台说得一点不错。

这个新的体制建立起来之后，对于畅通政令，进一步启动经济改革发挥了极大作用。

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决心整顿破烂得不像样子的驿站了。

明代从北京到各地的交通干线都有驿站，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周转制度。驿站里有马有驴有差役，水驿站有船有船夫。驿站还有食堂，为路过的人准备餐饮。马驴船只都来自民间，草料和设备来自民间，马夫船夫也来自民间，而且自备食物，官员使用驿站免费。交通干线附近的老百姓，要出钱出牲口出船只出力气维持驿站，苦不堪言。

明初使用驿站规定非常严密，非军国大事一概不准使用，老百姓的痛苦还少一点。到了后来纪纲废弛，中央兵部和各地官员随意发放通行证送人情，一张通行证终身使用，辗转相赠，循环使用。

为数众多的官员及其子女亲戚乃至下属仆人，不论公事私事，都无偿使用驿站。诸多官员还任意抬高规格，有的到站之后索要差役二三百人、车轿一二十乘、扛物八九十台，浩浩荡荡，作威作福。有的在驿站勒索钱财，不给钱就打马，甚至割掉马耳朵，对差役拳打脚踢。有的谎称丢失物品，向驿站索赔，不一而足。

这种状况愈演愈烈，时人称驿站“最为民害”。各地驿站的差役不堪忍受纷纷逃亡，嘉靖时期有的地方到了十驿九空的地步。

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颁布新的政令，规定：一、非军国大事一概不准使用驿站，官员调动、赴任、进京以及奔丧等，一律不得使用。二、只向过客提供粮菜油炭，不许置办酒席，不许送礼，也不许抬高规格。三、实行通行证实名制，严禁转借。自起点至目的地都要一站一站核对，再由上级查核，之后注销。发现冒领造假，一律严办。

这就侵犯了全国成千上万权势人物的既得利益，是一件得罪面很广的事。众多官员用驿站用惯了，一纸命令哪里刹得住？为了贯彻政令，张居正自己带头做起。他的儿子回江陵参加考试，自行雇车。他的弟弟病重回老家，保定巡抚发给了一张通行证，被张居正退还。

万历五年（1577），甘肃巡抚侯东莱之子擅自使用驿站被举报，虽然侯东莱是能干的边疆大臣，但张居正也忍痛将侯东莱之子革职。

孔子第六十四代传人孔尚贤每年进京朝觐，携带家人随从及物品甚众，沿途驿站骚扰不堪。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将孔家每年一次的朝觐改为3年一次。他的理由是：圣人之后，更应该带头体恤人民。

大批官员由于在使用驿站的问题上违背规定，受到降职、革职处分，全国为之一震。

万历八年（1580），神宗派皇亲到武当山求神祈子，沿途也不敢使用驿站，由此可见张居正的政令一竿子插到底的威力。这一良政，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可惜的是，驿递新政到张居正死后又废弛了。原因在于，神宗的权力不受制约，率性胡来，再度重演嘉靖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的闹剧，结果一切政纪都荒废了，营私的官员哪里肯放过驿站的便宜？世间已无张居正，于是上下心照不宣，照旧无节制地使用驿站。到了崇祯时期，驿站烂得不行，正经事都耽误了，这才又想起张居正。

清查土地，推行一条鞭法

近年来，由于解决“三农”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任务的“重中之重”，所以唐代杨晏提出的两税法、明代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清初的“黄宗羲定律”，一时成为社会各界热议话题，一条鞭法也成了张居正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一条鞭法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一旦寻根究底起来，就发现大多数人顾左右而言他，不得要领，大约只是随风附议而已。这种风气，显然不利于获得真知。

关于杨晏的两税法，本书《唐代中叶的双星陨落》一文已作了介绍。至于“黄宗羲定律”，提出这一定律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已发表多篇文章，不再赘述，剩下是一条鞭法。既然一条鞭法已经成为张居正改革的代表作，就需要详细探讨一下。不过，古代经济问题常常很枯燥，这里的表述尽量通俗现代一点，以增加阅读兴味。

先后翻读十几种史料，许多史料对于一条鞭法的解释，十分简略，语焉不详，有些史料也是让人如坠云中。我在这里综合各种史料，还原一条鞭法原貌，以飨读者，并求正于方家。

但在谈论一条鞭法之前，首先要说一说张居正清查丈量土地一事，因为这是贯彻一条鞭法的基础。

清丈土地，等于今天的经济普查。不过，张居正进行的清丈，风险很大，看两个数字便知分晓。

一个是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应该交纳赋税的田地有850.76万顷。

再看另一个数字。据《明史·食货志》、《续通考》和《续通典》载，经过100多年垦荒与发展，到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田地面积反而缩减到422.8万顷（《明会典》作622.8万顷）。

显然，大量土地被隐瞒了，这当然是皇亲国戚、勋臣豪强以及各地官员搞的鬼，这些权势者吞并了土地不纳税。

在明代，皇室、亲王、贵戚、元老重臣分封得到的土地享有免赋税、免差役的特权，虽然除此之外的私有土地均须交税，但明中叶以后法纪废弛，这些豪强持续兼并土地，就是不交税，你奈他何？

在职官员也享受特权，除家属一律免去徭役之外，明末一品大员可免税1万亩，按级递减，最末的生员也免80亩的税。结果是，在共同利益面前，官员和豪强沆瀣一气，彼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贪我也贪，谁

也甭说谁。所以，到了明中叶，统计人口数字的黄册和统计田亩数字的鱼鳞册，大都是假的。

这当然就造成“公室（政府税收）日贫”，“私家日富”。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提出清丈全国田地，次年正式实行。

结果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豪强勾结官吏拼死抵制。正如张居正所说：“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诸家，殊为未便。”事情闹到吓人的地步，迫使张居正不得不激励各地巡抚“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清丈中一个规定就是，凡是功臣之家，除朝廷赏赐的公田之外，其他田地一律尽数报官，照章纳税。张居正要求各地官员：“丈田均粮，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宦官、军民，据法奏来重处。”在从严处置了一些亲王、官吏之后，万历九年（1581）清丈完毕，总计701.39万顷，比弘治时期多出300万顷。

尽管有一些官员在丈量中改用小弓（丈量工具），以求田多，邀功获赏，但清丈大体上还是成功的。《明通鉴》略带夸张地说，清丈土地之后，“豪滑不得欺隐，里甲（负责收税的基层头头）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额外多征的钱粮）。”

清丈田地为实施一条鞭法创造了条件。

一条鞭法是中国赋税徭役史和中国财政史上的一件大事。要想弄清楚它的意义，先要了解一下明代赋税徭役的情况。

明代的农业税叫赋税，或称田赋，这是对应着地来说的。明朝是农业经济，赋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

除了赋税，农民还要服徭役，即无偿劳役，这是对应着人来说的。朝廷认定老百姓有替国家服劳役的义务。

先说赋税。

明代沿袭唐代两税法，八月之前收夏税，第二年二月之前收秋粮。明朝开国洪武初年（1368年），两税是实物税，一般夏税交小麦，秋粮交稻米。

然而没过几年，政府扩大征收范围，下令农民在米麦之外，按田亩比例，交纳一定数量的丝、麻、棉。这样，丝、麻、棉作为附属交纳物，成为新的项目。

政府还规定，如果不交丝、麻、棉，可以改交一定数量的绢、麻布和棉布。这样，绢、麻布和棉布作为顶替物，成为新的项目。

当时，米麦叫做本色，其他顶替物叫折色。随着时间推移，这样一项一项加下去，加了100多年，到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据《明会典》统计，各地本色、折色和削尖脑袋想出来的税收名目多到四五十项。就好像在2006年我国免除农业税之前，各地农业税费名目繁多一样。

当时赋税还有官田、民田的区别。凡属于公家的叫官田，也租给农民种，收税比民田重。《明史·食货志》说："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均为当时计量单位），民田减二升。重租田（转手）八升五合五勺。"民田中最差的地块，收税三合一勺。这里规定的税收就比较杂乱，给官员豪强上下其手提供了许多空子。

当初朱元璋打天下攻到苏州时，遭到张士诚强烈抵抗，朱元璋为了报复，破城之后大大加重苏州一带的赋税。地方官拍马屁兼贪污，又擅自加重，相当于其他地方赋税的两三倍。

这就够乱的了，再加上长期以来土地兼并、产权混乱，开荒不报，以及暗中把官田改为民田，把好田说成坏田，甚至连地带人躲入皇亲勋贵豪强之家以避税等等，更是混乱不堪，一团糊涂账。

当时是谁来收税呢？明初规定，设粮长这个民间职务，负责收粮、运粮。以1万石粮食产量为一个粮区，每个粮区推选两个富裕的主儿当正副粮长。粮长负责催税收税，收上来还要负责押运，甚至负责运到京师。久而久之，粮长里边产生了不少腐败分子。他们或者贪污税收，或者把自己应缴的税摊到管区民众头上缴纳，或者避强欺弱，专拣老实的农民往死里整。还有些粮长本身性格懦弱，收不上来税，只好自己破产交齐。另外，收粮运粮的过程中，要打点各方权势部门和人物，所费奇多。当时一个县里办一次收粮运粮的事，就有上百个中人之家破产，"害莫大焉"。

再说徭役。

明代规定，年十六成丁，成丁服役，六十而免。

明代徭役有3种：一是里甲，二是均徭，三是杂泛。

里甲。以相邻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选人口多、收成多的十户为里长。还剩下一百户，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十户为一甲，再选甲首一人。每一年，由里长一人和甲首一人率领一甲之户服劳役。这拨人在这一年里叫做"当年"，即当年轮值的意思。就这样，10年一周按顺序大轮回。干什么呢？催缴税粮，传达命令等等。每10年重新统计户口，编定里甲。

均徭。按家产以及人口多少抽人服徭役。家境好人口多的应当多服，家境差人口单薄的应当少服，所以叫做均徭。均徭又分力差和银差两种。保安、巡夜、押运、做饭、挑夫、看仓库、当服务员等等活计，需要亲身前往服役，所以叫做力差（出力当差）。另外，供给官府、学校和公有部门柴火、马匹、盘缠、纸张、厨料等等，都要由民众白送，或者交钱替代，因此叫做银差（出钱代差）。这些差事，也是按照里甲编定的顺序，10年一次轮回，但与服里甲的时间错开。

杂泛（杂役）。除里甲、均徭之外，还有很多不定时的临时杂事，如修路、运输、修河道之类。

以上3种徭役，以均徭的力差和银差为主体，所以很多著作谈到明代徭役的时候简化从事，说明代徭役分为力差和银差两种。

关于出人服徭役的办法，明初规定，田一顷，出丁一人。张家有一顷田好说，王家不够一顷怎么办？那么与李家赵家凑一凑，凑够了一顷，出丁一人，三家自己商量出谁，徭役是与土地紧密相连的。

规定是规定，后来全乱了。原因当然极其复杂，比如人口增减流失未能及时统计或故意统计不实；比如官吏与里长勾结，收受贿赂，不按人口及田亩真实情况抽丁；比如豪强大户以种种理由逃避重役（修河道之类），人不敢问；再比如到了嘉靖时期，许多力差都演变成银差，但官府收了银之后，仍然变着法子让你服力役，结果是既交钱又出力，导致“无名供应之费，不时科敛之需，日日烦扰，其苦万状”。

除了上述赋税徭役之外，还有岁贡（各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土特产）。有的地方把岁贡计入赋税，有的地方是另行摊派。明代初年，一个地方进贡约计十几种，到明中叶竟增加到1000种。像朝廷太医院药材每年就需要20多万斤，至于绫罗绸缎更是翻番索求永无止境。

如上所述，苛捐杂税和徭役真是林林总总、名目繁多、乱上加乱。

于是，改革的呼声出来了，这就是一条鞭法，或者称为一条编。总之是把眼花缭乱的项目化繁为简，总编为一条，所以称为一条编。“鞭”是“编”的假借或俗称，叫惯了，就成了一条鞭。

最早是宣宗宣德五年（1430），浙江巡抚（中央监察部门派出的地方大员）周忱和苏州知府（一把手）况钟提议，打破官田、民田税收混乱的状况，将官田一律按民田标准收税。被户部（财政部）否定。

据顾炎武《日知录》载，嘉靖二十六年（1547），嘉兴（浙江嘉兴）知府（地方行政一把手）赵瀛也提出建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江南有的地方就悄悄按这个办法干了。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一个叫庞尚鹏的浙江巡按御史（中央监察部门派出的地方大员）在管区推行一条鞭法。他的创新是，一个县所有的徭役，完全由政府花钱雇人完成，停止征派农民无偿服役。钱从哪里来？庞尚鹏定出一个上户、中户、下户的新标准，以此重新划分交税等级。丁和粮都多的，算上户；一般有丁有粮的，算中户；有丁无粮的，算下户。先把一个县雇用劳动力发工资的总钱数计算出来，然后按照一定比例，把所需资金摊派到上户、中户、下户的交税额中，一起收缴。这样，自明初开始实行的按里甲服役的办法，完全废除了。

后来又有海瑞、刘光济、周如斗等官员，在南京、江西、福建等地先后推行类似措施，一条鞭法在南方各地实践中慢慢成型。

一条鞭法并不是张居正的发明，但他对此极为关注。他研究了南方各地的经验，在万历四年（1576）下令，先在湖广地区试点一条鞭法，取得成效之后，再向全国推行。

在这个过程中，身为首席宰相的张居正，展开了大量工作，因为有些部门和官员反对一条鞭法。比如户部尚书葛守礼就说，一些地方在推行一条鞭法的过程中，官吏确定税额时收受贿赂，“弊端百出”。张居正承认有些弊病，但总的来说，是一个很大进步。他在给一位官员的信中说：“一条编之法，近亦有称其不便者，然仆（我）以为，行法在人，又贵因地（因地制宜），此法在南方颇便，既与民宜（方便），因之可也，但须得良有司（负责任的官员）行之耳。”（《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到万历九年（1581），在张居正大力推动下，朝廷颁旨在全国实施一条鞭法，一条鞭法遂成为通行的法制。

根据《明史·食货志》、《续通考》和《明神宗实录》卷220等著作相关记载，万历年间一条鞭法的要点是：

一、把各州县的赋税、徭役、岁贡等种种项目统一编排起来，总为一项征收（收银子）。过去赋税和徭役分别征派，现在合并征收。这样就化繁为简，使地方很难再乱出税费新花样。

二、徭役方面，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3种。其中，里甲按户派，征银差时叫户银。均徭和杂泛按丁派，征银差时叫丁银。现在取消户银，并且把均徭和杂泛中的部分差役转入地亩承当（以每亩地出粮再折算成银子顶替），这叫做“量地计丁”，即派差役时，不光是盯着人头了，也把地作为替代因素。具体办法是，或丁六粮四（派在人丁身上的徭役占六成，由地亩出粮顶替占四成），或丁四粮六，或丁粮各半。这

方面的变化，表明开始由对人税转入对物税，这是一个大趋势。

三、无论赋税还是徭役，一律改为征银（一说在苏州、杭州、嘉兴地区继续征收本色粮食供朝廷食用，其余一概征收折色银），以货币代替了实物和徭役。过去徭役有力差和银差，现在取消力差，都改为银差，这叫“一概征银”，或“计亩征银”。实物税改为货币税了。

四、过去征收粮食由民间自己征收押送（即上面提到的粮长制、里甲制等），现在改为官收官解（押送），即把银子交给政府，由政府去开支，购买粮食，雇人服役。这一改，也避免了各地粮长贪污作弊等种种弊端。

一条鞭法的改革，简化了赋税徭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它的主旨是多占田者多交税（计亩征银），使赋税徭役的负担趋向合理，为以后清朝实行“摊丁入地”制度打下了基础。

一条鞭法的改革还有利于一部分人摆脱徭役束缚，获得人身自由。农民增加了打工的机会，经商的人对此更是欢迎。

“计亩征银”是实行货币税，比唐代两税法又前进一步，更加贴近现代税制。但是，唐代两税法有固定的全国征收总额，即以大历十四年（779）收入总额为准，分派到各地执行，后来执行过程中虽有增加，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一条鞭法没有确定全国征收总额，这就给各地预留了“出口为是”的横派机会。这个问题直到清朝初年实行“摊丁入地”（又称“地丁合一”）税制才获得解决，康熙五十二年（1713）规定，依康熙五十年（1711）各地所报人丁数作为丁税的固定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但是，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农民的实际负担并没有减轻，特别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方，白银极为紧缺，因此导致了种种惨状，成为明末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

史载，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之后，各地贯彻情况仍然有较大出入，有的地方仅仅把徭役项目合而为一；有的地方仅仅将赋税的项目合而为一，或者把徭役的一小部分算到赋税里边。各地征收管制办法也多有不同，有的地方表面说是一条鞭法，暗中还是实行粮长、里甲制度。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一条鞭法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赋役制度改革。没有张居正推动，这一项改革是无法在全国实施的。

最近，山东郓城出土一块明代万历年间的石碑。石碑镌刻的文字说，县衙门临时修房子所用的资金和劳役，都是向农民征收和摊派的。石碑记载的事情是在推行一条鞭法之后，这说明，一条鞭法在执行过程

中走了样。古往今来，地方官员搞形式主义蒙骗中央政府的事，实在屡见不鲜。

改革者的专制

柏杨曾感叹：当明朝发明了诏狱和廷杖时，英国却早在明朝建立100多年前就颁布了《大宪章》，限制王权，保障人权。

张居正也没有逃脱明朝专制的局限，这方面最突出的事情，是在他的操纵下，万历七年（1579）正月下诏毁掉全国书院，约64处。他的理由是反对空谈，反对以讲学为名牟利。他在《答郑藩伯》这封信中说：“若今之谈学者，则利而已矣，乌足道哉！”

张居正的确是一个集中力量干大事、不尚争论、讲究实际的政治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书院，固然不足挂齿。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其实，早在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就砍杀教育。明朝学制，各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明初规定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宣德年间又有所增加。张居正下令整顿学政，规定：“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砍了一半。在实际执行中，“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这就太过分了。这一劣政，使张居正广受批评。

明朝一向有办书院的传统，上自达官贵人，下到布衣诸生，到处开办书院，召集学生门徒讲学。讲学的内容，或是先秦经典，或是宋明理学，或是阳明学说，或是评论时事。最著名的像万历三十二年（1604），罢官回家的顾宪成和他的弟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等人，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另外像崇祯六年（1633），张溥、张采等人在苏州成立复社，切磋学问，批评权臣，有2000多青年学子参加。

各地书院最让当局头疼的是议论朝政，这当然对独裁专制十分不利。因此，明代围绕书院问题多次发生激烈斗争。明代比宋代特别是北宋要专制得多，对书院也多次禁毁。嘉靖十六年（1537）、十七年（1538）就曾下令毁掉书院。

即以著名的东林书院和复社的遭遇来看，到熹宗天启五年（1625），东林书院批评权奸的讲学活动引起大太监魏忠贤等人仇视，下诏毁掉天下书院。魏忠贤还罗织罪名，向全国公布了一个309人的《东林党人榜》，通缉追捕，致使一大批正直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惨遭杀害，当东厂派人来到高攀龙家中时，高攀龙投水自杀。至于复社成员，后来有的被魏忠贤余党迫害致死，有的抗清殉难，清朝顺治九年（1652），复社被政府取缔。

在张居正时代，讲学诸子中最著名的是江西人何心隐（本名梁汝元）与福建人李贽。这两位学者都是王阳明学说的传人，先后在湖北孝感和麻城讲学。他们学问精深，特别是李贽，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思想家。这二位在讲学中讥讽宋明理学，挑战传统社会秩序，评论当朝时事，被保守派视为“非圣无法”的异见分子。

早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43岁的何心隐去北京访友时曾见过张居正，当时35岁的张居正还是翰林学士，二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张居正当政之后，何心隐和李贽在讲学和著作中对张居正都有批评，尤其何心隐，更是直言不讳，指责张居正压制思想自由，迫害“异端”，打击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

当代学者侯外庐说何心隐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战士”，葛兆光则说何心隐“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各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也对何心隐给予了很高评价。但张居正不这样看。

万历四年（1576），何心隐被通缉，罪名是聚集门徒，扰乱时政。万历七年（1579），何心隐被南安（江西大余）把总（低级军官）朱心学抓获，解往武汉，被湖广（武汉地区）巡抚王之垣下令在监狱中用乱棍打死。何心隐在死之前对王之垣说：“公（你）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

李贽虽然曾经称赞张居正是“宰相之杰”，但也就何心隐之死撰文揭露张居正。李贽说：武昌数万民众看到街头贴出的何心隐罪行告示，都为何心隐喊冤，这是人心所向。杀何心隐的人，是为了讨好张居正，大家都知道是张居正授意地方逮捕和杀害了何心隐。

当代学者容肇祖说，杀何心隐的人，知道张居正的心思，是想以此拍张居正的马屁。

张居正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说：“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谈）废业。”何心隐为了办书院讲学，耗尽家财也不顾惜，当然为张居正所不容，何况他与张居正在思想上冲突已久。王阳明说：心念一动，即是行了。老百姓心念一动当然不行，但像张居正这样权势遮天的人，心念一动，当然就行，无数的人就会奔走起来，愿为前驱。打死何心隐当然用不着张居正亲自动手，然而张居正却要为此承担责任。

张居正曾经拟定重用人才的文件，其中说：“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这就是说，凡是有“异端”思想的，文章再好也不录用。

张居正与王安石一样，都是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者，都不如春秋时期的子产。张居正追杀有不同意见的人，显然比王安石更恶劣，更严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改革者的悲剧。

入大火如入清凉界

入大火如入清凉界，这是张居正独特的政治哲学。

大火，能把人烧焦；清凉界，能使人心静如怡。这看似截然对立的两种境遇，在张居正那里却圆融无碍，完全打通。外在的“色”（物质环境），完全服从于内心的“空”。内心能够从任意一种角度调整客体的意义。

张居正有哲学家的天才和透彻，熊十力说他深深得力于《周易》和《华严经》。华严宗讲宇宙万般境界，都可以即出即入，互涉互入，哪怕是极端对立的法相（一切事物及意识），也能够统一于空寂之中。所以，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能够相融相通。

另一位学者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一书中则说：“综观江陵生平言行，尊主威，振纪纲，明赏罚，核名实，讲富强，重近代，孤立一身，任劳任怨，纯是法家路数。”实际上，张居正是杂糅儒、法、佛、道，兼而用之。

张居正曾多次表达他的出世思想。“仆（我）少耽沉寂，每有出世之想，不意中道（中途）为时所羁绁（羁绊）。”这样的表述，在他的文集中所在多有，不能说这是撒谎骗人。他长期在风口浪尖讨生活，难免会作如是想。美学家朱光潜的一句话，可能符合张居正的实际，这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张居正的《与李中溪书》等文章，的确闪烁着这样一种灵性与悟性。他说：“居正以退食之余，犹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以是知山寺幽栖，风尘寓迹，虽趋舍不同，静噪殊途，其致一也。”

在张居正那里，大火就是清凉界。他是以这样的气概，这样的穿透精神，这样的悟性根基，投身于“一身万死”的事业。

请看他的口头禅：“别无他常，但性耐烦耳！”；他的两句偈语：“愿意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

从这些自慰、自励和自解当中，难道还体验不到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吗？他时时处于大火之中，又无所逃避，所以只有借助佛教，实现超越。

他不但以赫赫威势弹压群臣，强力推进改革，而且还以道德之师自命，与皇室展开激烈博弈。

隆庆三年（1569），好游无度的穆宗向户部索要30万两银子，张居正以军费吃紧为由反对，穆宗只得减少为10万两。

隆庆六年（1578），大太监要求购置珠宝，张居正严词拒绝，说是国库不足，应该停购。

张居正对待年幼的神宗，就像一个严厉的小学教师对待学生一样。有一次，神宗背诵《论语》的时候，把“色勃如也”背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严斥道：“应当读‘勃’！”吓得神宗赶快纠正。

神宗登基之后，李太后的父亲李伟筹备自己的墓葬，要求朝廷拨给资金，神宗下旨从优从厚。张居正认为只能参照旧例，不能乱来，拒绝了额外支出，李太后只得默默接受了。

神宗又援引旧例，要给李太后的叔叔封官，张居正查阅档案，发现旧例已经作废，于是驳回。

万历五年（1577），神宗下旨翻修两位太后居住的宫殿。张居正说不必要，两宫落成才两年，开支“省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

神宗下旨要大修武英殿。张居正说，该殿大体完好，花费10余万两银子经营皇帝不常到的地方，没什么益处。

万历六年（1578），神宗向掌管宫廷膳食的光禄寺索要10万两银子。张居正说库存有限，下不为例。一个月之后，神宗又说缺钱，让工部铸钱进用。张居正说，铸钱“非以进供上用者也”，拒绝了神宗的要求，神宗只得收回成命。

熊十力在《与友人论张江陵》一文中说，张居正“对皇帝抗颜（严正驳斥），以师自居。皇帝称以先生，非唯不敢名之（神宗不但不敢叫张居正的名字），亦且不敢字之（而且不敢直接称呼张居正的字）”。

又说，张居正“执法之严，自汉以还二千余年间，未有如是者也”，“自皇帝、皇太后以及中贵（皇宫贵人）皆绳之以法，不许遁于法外”。“彼（张居正）盖欲置皇帝于纯粹无为之地，而以宰相总揽全国政权。”

在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中，任何人敢于这样做，必然后患无穷。

渐渐长大的神宗对此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张居正不仅要面对不满的官员弹劾，而且要一天比一天更精心地提防来自神宗的冷眼。

张居正执政成效是非常显著的。隆庆末年财政入不敷出，赤字超过财政额度的1/3。到张居正去世的万历十年（1582），国家存粮可支10年，积银400万两。张居正还全力支持“中国近500年来最杰出的治河人

物”潘季驯，力排众议，运用合流筑堤、以水冲沙的办法，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明末的黄河水患，使“淮扬之间，欢声雷动”，保障了运河畅通，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

然而，那些利益受损的诸多官员，眼睛却被利益的偏见迷住了，他们日思夜想的，只是如何报复张居正。

万历四年（1526），言官刘台就弹劾张居正，说张居正“威福自己，目无朝廷”。

万历五年（1527）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江陵病故，依当时礼制，张居正应辞官回家服丧27个月，丧期服满之后恢复原职叫“起复”。如果皇帝命令官员在丧期中照旧任职，叫“夺情起复”。此时，张居正的改革正当关键时刻，他当然不情愿辞官回家，再加上神宗不批准他守丧，于是就夺情起复了。

十月初五，天空出现彗星，这个天象，给了张居正的政敌一个口实。5个大臣以此为据，要求张居正辞职回老家，以“消弭天变”。神宗大怒，以残酷的杖刑对付这5个人，张居正也没有为他们求情，算是暂时把反对的声音压了下去。但是，痛骂张居正“贪图功利、如同禽兽”的舆论，却慢慢洇开，形成了对张居正极其不利的舆论环境。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因病去世，时年58岁。

张居正去世之后，20岁的神宗去掉了头上的紧箍咒，积之既久的愤懑爆发出来。同年十二月，神宗垂涎冯保的财产，下令抄了冯保的家，并把他贬到南京。诸多官员看风转舵，纷纷上书弹劾张居正，贪财的神宗也思量着没收张居正家的“重宝”。

万历十一年（1583），神宗剥夺了张居正的官衔和勋级，下令抄张居正的家。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不胜拷打，被逼自杀。张居正的弟弟张居易和次子张嗣修充军边远之地。

神宗的诏书颠倒黑白，说张居正“专权乱政，罔主负恩，谋国不忠”。当时还在世的海瑞（1514～1585）愤激地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此后，当国的大学士张四维、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等人，先后废除了张居正的驿递改革措施以及考成法，一切与张居正反其道而行之。于是上下松懈，张居正的新政灰飞烟灭。正如《万里野获编》所说，张居正“身后一败涂地”。

一直到神宗的孙子熹宗天启二年（1622），国势危殆，才由当初弹

劾过张居正的东林党领袖邹元标带头奏请，恢复了张居正被革去的功名。熹宗去世，他的弟弟崇祯继位，崇祯十三年恢复了张敬修的生前功名。

张居正的改革被否定之后，明朝陷入“纲纪废弛”的颓败境地，每况愈下，直到崇祯年间，终于崩溃。

否定改革的皇朝，将会失去生机，最后一定是这个下场。

洋务运动的是与非

我们可能越来越接近洋务运动的真相了。

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又称“同光新政”（同治到光绪年间的新政），或“自强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造反风起云涌。在清政府摇摇欲坠之际，体制内一些有远见、有能力的高级干部，主张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新式工业，培养新型人才，训练新式军队，以拯救垂危，追求富强，所以史称“新政”或“自强”。

但是，你随便问一个中年人，对晚清洋务运动有何印象？多半的回答是：买办、卖国、镇压人民起义。

这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僵化历史观打下的印记。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认为，洋务运动的后果，一是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二是加深了人民的灾难，三是加深了满汉统治阶级的裂痕。各种教科书和文艺作品就此互相克隆，结果正如学者李时岳所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办洋务就是买办化、卖国主义。”

范文澜的“三加深”还是客气的，更有些著作斥责洋务运动是“反动的、卖国的、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李时岳、夏东元等相继发表著作，为纠正僵化历史观做了努力。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起到1919年止，总计80年，洋务运动占了将近一半时间。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近代工业起步，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在中国工业化步入中期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第一次工业化所做的艰辛努力。

内外交困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老大帝国日益衰落。

鸦片输入中国数量激增，清政府军费开支直线上升，再加上赔偿列强的费用，只好向民间加紧搜刮。

当时的国内形势，用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的话来说，第一是“银价太昂，钱粮难纳”。农民打下粮食、织出粗布卖不了几个银子，赋税交不齐，结果是“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

第二是“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兵匪勾结，勒索财物。稍有不从，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系之”。如果不服勒索，就指你为盗匪，烧你的房子。又强迫老百姓自己去捉“盗贼”，捉来“盗贼”，还要向老百姓索取关押费、转押费，真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是最疏之亲，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

第三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

如此黑暗，如此摧残，怎能不出事呢？

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短短两年，太平军席卷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六省，军队从1万多人扩张到20多万人。清军精锐部队八旗、绿营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太平军于1853年1月攻下武昌，3月占领南京并在南京建都，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太平天国成为与清朝政府对峙的政权。

1853年到1854年，太平军兵分两路出击。一路往北打，一度攻入河南、山西和天津郊区，给清政府造成巨大威胁；另一路沿长江陆续攻占安庆、武昌、镇江、扬州，打垮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

在山东、河南一带起义的捻军也响应太平军，在安徽蒙城建立“大汉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

清朝统治摇摇欲坠。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值清军与各地起义军激战之际，外患又来了。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1858年，英法海军北上占领天津，扬言进攻北京。俄国、美国军舰也开

进天津大沽。清政府哪敢怠慢？在6月先后与俄、美、英、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10个通商口岸，英法等国来内地自由传教，外国商船可来往长江口，降低中国关税，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中国分别向英国、法国赔偿400万两和200万两银子等等。

同年5月，清政府特使在俄国武力威压下，被迫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又规定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往来，别国船只不得航行。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说：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除了分占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1860年，英法两国以修改《天津条约》为借口，继续以武力打压清政府。8月，英法联军攻陷天津。9月，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河北承德）。10月，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当月分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规定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割让九龙“归英属香港界内”，准许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购买田产，赔偿英法的费用各增加到800万两白银。11月，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4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割让给俄国。后来俄国通过勘界谈判，在中国西北又强占了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俄国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大获利者，总计侵占中国144万平方公里土地。

1861年8月22日，在丧权辱国的羞辱和惊慌恐惧之中，咸丰病死热河。

咸丰尸骨未寒，27岁的慈禧就与30岁的恭亲王奕勾结起来，发动政变，把咸丰临死前钦定的8个“赞襄政务大臣”（辅佐政务大臣）中的载垣、端华、肃顺3人杀掉，废黜另外5人，夺取了最高统治权。

“汉奸”魏源

晚清真是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天生具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切身感受着“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喋血饮恨，痛彻心肺。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国交手之后，先进中国人得出的共同结论就是向对手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长处，抵御西方侵略。

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广州查禁鸦片，他在实战中体验到英国的船坚炮利，提出了“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口号，并付诸实践。他从美国购买“吉塞皮克号”商船，改装为战舰，配备英国造大炮34门，这是中国从西方引进的第一艘近代军舰。

林则徐在广州期间，组织人翻译了《四洲志》（英文书名《世界地理大全》）。1841年7月，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被贬官的林则徐把《四洲志》交给著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魏源，希望他以此为基础，编写一部世界历史地理书。魏源于1842年完成《海国图志》60卷，后经补充，1852年扩编为100卷，近90万字。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发展了林则徐的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个有名的口号，并对这一主张作了理论阐述。

《海国图志》全面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如英国议会制度，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等。魏源从道德上赞赏美国制度，他说华盛顿“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乎三代之遗意”。他又介绍英国专利制度：“能出一奇物，得专利三十年，他人学做有禁。”

《海国图志》以12卷篇幅详细介绍了“夷之长技”，如轮船、洋炮、炸弹、炮台、水雷的原理、制作和用法。该书《筹海篇》提出了“制夷”的战略与策略。

魏源还说，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像俄国彼得大帝一样，从各方面学习西方技艺，包括引进西方技术，建立船厂和军火制造业，积极发展对外贸易，鼓励民间经济，以便将来在市场竞争方面力争“制夷”。

魏源可犯了大忌。中国传统的认知是什么呢？“居天地之中者曰中

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宋代石介《中国论》）

古代先民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周边国家和民族分别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都是没受过礼仪熏陶的落后民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华尊夷卑”的观念，而且根深蒂固。鸦片战争之前沿用的一些世界地图，把中国画得很大，汪洋大海却绘得很小。乾隆十二年奉旨编修的《清朝文献通考》，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国正好位于大地正中央。

魏源却告诉人们，天是圆的，地也是圆的，中国并不在世界正中央，而是在亚细亚东南，是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中的一个。在魏源笔下，“夷狄”竟然是繁荣昌盛、交通便利、制造精美、重视教育、政治民主的文明之国，民众读书识字，生活比中国富裕得多。这还了得？这不是否定了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尊夷卑”说了吗？大批保守人士群起而攻之，甚至上书朝廷，指控魏源等人“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轻信夷书，铺张扬厉”，“一意为泰西生势，轻重失伦，尤伤国体”。简直就是汉奸！

当然，一些“开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并未因此被吓倒。曾任闽浙（福建浙江）总督（最高军政长官）的徐继畬著《瀛寰志略》，于1848年刻印问世，共10卷，14万字，收图42幅，包括东西半球全图和各洲各国分图。徐继畬下了一番去伪存真的大功夫，该书地图最准确，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水平。这部地理书以图为纲，介绍了各主要国家的情况。

徐先生说美国：“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他说英国：“帆樯云集，百货流通，富饶遂为西国之最”，“不止贸易一国一地，乃与天下万国通商”，所造轮船，行止自如，“其铁炮熔铸精凝，内外滑泽，进退左右，拽之以绳，极其灵便。”

除了林、魏、徐3人，还有广东人梁章冉于1848年著《海国四说》，详细介绍美英两国情况。安徽人姚莹于1845年著《康纪行》，探讨了英、俄等国的情况。

随着洋务运动兴起，国人要求打开国门，了解外面世界，《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大量重印，几乎“家置一编”，对洋务派、维新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投身洋务运动的著名知识分子王韬在《〈瀛寰志略〉跋》一文中说：近来谈海外掌故者，以《瀛寰志略》、《海国图志》为优，此诚当

今有用之书，有利于国人登高望远。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两书始。

马桶VS.洋炮

一场波及全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除了思想启蒙之外，当然还有急迫的现实原因，这就是战争的刺激。

先看中外战争。

清军与洋人交手屡吃大亏。令清廷震惊的是，洋人依靠船坚炮利，往往以很少兵力，就能击溃上万乃至数万清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当然，清军失败，还有腐败愚昧等原因，但是西方军队船坚炮利，确是制胜重要因素。

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仅数千人及舰船40余艘，就攻陷浙江定海、宁波、镇海、江苏镇江，还拿下了广州、上海。在战争中，守卫广州的清朝名将杨芳，竟下令搜集民间马桶，放在几个木筏上，飘向洋面，以保卫海边炮台。杨芳把这叫“以邪制邪”，结果当然无效。当时就有人写诗讽刺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两国仅十几艘军舰，就攻占了天津。1860年，英法联军仅万把人，再度攻占天津，甚至攻占了帝国首都北京。清军骁将僧格林沁的骑兵，挥舞马刀在天津附近与英法联军的枪炮激战，岂是对手？

双方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使清朝官员谈洋色变。曾任直隶（含河北、河南、山东地区）总督、钦差大臣的琦善就曾经说：“夷船不来则已，夷船若来，则天津海口断不能守。”

太平天国后期，当湘军节节胜利之时，湘军将领胡林翼在长江边上突然看到西方轮船在江水中逆流而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当即“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这个情景，生动地说明了清朝官员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面前的惊恐。

再看国内战争。

太平军也了解洋枪洋炮的厉害，大量购买西方军火。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载，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野炮705门，火药484桶，子弹1.8万发。

1862年，李秀成率大军解救天京之围，以炮火轰击湘军：“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事后，曾国藩的弟弟、湘军将领曾国荃写信给郭嵩焘（曾任皇室秘书、广东巡抚），介绍太平军武器情况：“贼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打垒

内，洋枪队多至两万杆。”

内外战争压力，逼着清廷迈开洋务步伐。

李鸿章在1862年率领淮军来到上海，刚与外国军队接触，就做出了判断：“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他推崇洋人“战守攻具，天下无敌”，遂“坚意要学西人”，力主“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

向西方购置军火的事，当然早就陆续进行了。从1862年起，清政府还聘请西方军官训练清军。在此前后，又有“借师助剿”。先是1860年5月，上海、江浙一带官绅慑于太平军威力，出钱请西方军队保护地方，攻击太平军，这就有了英国人华尔的洋枪队。华尔死后，英国派戈登前来扩充这支军队，改编为“常胜军”，另外还有法国人控制的“常捷军”等。这些外国军事组织后来被李鸿章、左宗棠解散。

1863年，清政府向英国购买了一支由7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以便从水路进攻天京。因其司令为英国军官阿斯本，故名“阿斯本舰队”。英国想借机控制整个中国海军，迫使清政府同意让英国人出任清朝海军大臣，让阿斯本出任清朝海军总司令，引起双方争执，最终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出面，前后共花了160多万两银子，将这支舰队遣散，而清政府却一无所得。

以上事实说明，洋务运动的兴起，确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相关，不容回避；但是洋务运动发展起来之后，取得划时代进步，也不能否认。

农民起义反抗腐败暴政固然可歌可泣，但太平天国本身也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李时岳指出：“农民不能创建新社会”，这是对当时实事求是的评价。近来史学界就此展开诸多研究，不再赘述。

总之，洋务派镇压农民起义，手上沾满鲜血，是刽子手；但他们努力推进工业化，与顽固派展开一波又一波激烈斗争，艰难推动中国进步，又成为改革者。这就是历史的迂回和曲折。如果以为改革者必须全身透明、毫无瑕疵，那并不是事实发生了错误，而是我们自己的观念近乎幼稚。对于复杂的历史，采取非黑即白的情绪化或片面的态度，是很难接近历史的真相的。

1861：洋务引擎开转

在内忧外患之中，切盼自强的清政府于1861年1月20日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被任命为首席总理大臣，这是洋务运动开张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夏东元说，总理衙门是适应改革开放需要而诞生的最高政权机构。总理衙门的成立，表明以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为中心的自强新政成为国策。总理衙门成为洋务运动强有力的引擎。

有人说总理衙门是外交部，不准确。总理衙门权力要大得多，它是按照最高枢要机构军机处的级别建构的，奕本人就是议政王（最高议政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管外交，管“通商”，管海关，还管各路军事事务，简直是个巨无霸，实际上它渐渐代替了军机处。当时西方媒介就曾发表评论说，总理衙门“及时地发展成帝国政府的内阁”。

奕支持慈禧发动政变，颇受后世诟病，但是话分两头，他冲破顽固派堡垒，积极推进洋务运动，实在贡献不小。

就在这一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是洋务运动起步的又一标志。这个军械所是湘军攻陷安庆之后，于1861年秋冬之际筹建的。

创办这个军械所，是为了独立自主地开发兵器，抵制洋人利用军火贸易过分渔利。

安庆军械所是一个综合性兵工厂，主要生产子弹、大炮和轮船。曾国藩为这个工厂聘请的徐寿和华衡芳是自学有成的科学家，两人合著的《抛物线说》于1860年出版，比国外同类专著《圆锥曲线说》中译本早6年。

1862年，经过徐、华两人和工人努力拼搏，军械所研制成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以火蒸水汽”，“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曾国藩看了非常激动，当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安庆军械所的第二个成就是建造了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1862年底，这艘长约10米的小火轮在安庆江面试航5公里。曾国藩坐在船头上亲自督看，事后得意地说：“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矣！”

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诞生，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它表明中国进入了机器制造时代，中国近代工业由此肇始。军械所的劳动

力，成为第一批接受工资付酬的工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就此在中国开端。

洋务运动的另一重要事件，是在总理衙门支持下，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同治元年）6月开馆。洋务运动深入到教育领域，教育改革开锣。

京师同文馆聘请外籍教师，教授英文、法文和俄文。学习内容还有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翻译技能。

当时国际交涉日繁，急需通晓英法语言的人才，京师同文馆正是为此而设。一些学者指出，奕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培养新型知识分子的干部队伍，改变官吏陈旧的知识结构。没想到，同文馆却引起一场风波，下文再表。

同文馆的学生来源，是在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慧”的十几岁少年，当时共挑选了20名。生源局限于八旗子弟，满族贵族企图垄断新式人才的培养途径。

这一企图被李鸿章打破了。

时任江苏巡抚（省长）的李鸿章奏请在上海设立类似学馆，获得批准，上海广方言馆于1863年3月开馆。

王韬说，该馆“教以西国之文字语言，兼课以算学，三阅月一行考核，拔其优者充博士弟子员，或在通商衙门司理翻译，承办洋务”。才能出众的，由巡抚推荐，进京考察，授以官职。

至于学生来源，则是“选近郡年十四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小官也可以入馆学习。“近郡”就是附近地区，这里没有强调八旗，是李鸿章有意打破满族禁区，为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青少年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继上海之后，广州方言馆于1864年7月开馆。

洋务派和顽固派

搞洋务是个新事物，随着洋务运动起步，顽固势力猛扑过来，给洋务派扣上“破坏国家安全”的大帽子，千方百计加以阻挡。围绕着洋务问题的争论，官员们逐渐分化为两大派别：洋务派和顽固派。

凡主张向洋人学习，赞成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称为洋务派。采取相反态度的，则为顽固派。当时有人说顽固派“深闭固拒，尊己而抑人，事变既来，茫昧昏蒙，束手无措”。

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有奕、大学士（总理级高官）桂良、户部左侍郎（财政部副部长）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有湘军统帅曾国藩、左宗棠和淮军统帅李鸿章以及张之洞等人。另外，在京师和地方都有少数支持洋务运动的官员和改革派知识分子。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洋务运动的重大业绩几乎处处留下了他的身影。梁启超著《李鸿章传》说：“吾敬李鸿章之才……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

顽固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有大学士倭仁、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朝廷各部门有众多官员附和顽固派，地方上则有大批保守的地方官、士绅和八股书生。

顽固派人多势大，他们泥古不化，抽取古代经典为教条，咒骂改革，阻挠洋务。

当时报刊生动地描述顽固派：“一闻修造铁路、电报，则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

幸亏奕协助慈禧政变立了首功，成为慈禧心腹人物，才不至于被顽固派弹劾下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员，虽然屡遭清廷疑忌，但因他们剿灭太平天国立了“大功”，朝廷诸多事项不得不依靠他们，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因为这些缘故，洋务运动才得以进展，取得重要成效。

洋务派和顽固派爆发的第一次大冲突，由同文馆引起。

1866年底，奕根据郭嵩焘提议，建议朝廷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馆、算学馆，扩大学习西方的范围。另外，为了提升学生入学前的文化程度，提高学习效率，建议招收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出身的年轻人才入馆学习。这本来是很可嘉许的措施，却遭到顽固派猛烈攻击。在顽固派看来，教小孩子学外语已属汉奸行为，再招科举出身的人

去学天文算学这些“奇技淫巧”，岂不是要“以夷变夏”吗？

监察御史（中级监察官员）张盛藻首先发难。他上书说，叫科举出身的人改学天文算学，是用发财之道引诱士人，让他们“重名利而轻气节”。

朝廷没有理睬张盛藻，其他顽固派官员上前助阵，提出三点非议：一、轮船买就是了，洋炮买就是了，为什么要花老大功夫去学这些东西？二、“师法西人为耻”。三、“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

有的顽固派甚至指使人散发万言书攻击洋务，并在街上贴出讥刺同文馆的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

奕在朝廷辩论中批驳顽固派说，买是“权宜之计”，而学习制造则是“永远之谋”。

关于耻辱问题，奕说，最耻辱的是不如别人。连日本尚知发愤学习，独中国因循守旧，不思振作，这不是最大的耻辱吗？“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那就会永远不如别人，耻辱的帽子也就永远戴在头上了。奕的批驳很有见识。

最后，顽固派的“王牌”——全国理学权威、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于1867年3月上书指责同文馆。他的理由是：“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还说：“夷人吾仇也”，“师事夷人”，即为“事仇”，其罪大矣。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奕痛斥倭仁说，当今之势，正需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能实现自强，以抵御西方侵略，他请倭仁举出国内“精其术者”。慈禧也责令倭仁举荐精通天文算学的人才。

其实，倭仁不过是陈词滥调空说大话，这是古今中外顽固派写文章谈问题的一贯手法。他到哪里去找精通西方科技知识的人才？倭仁一看慈禧支持奕，苗头不对，赶快转向说：“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同文馆一役，洋务派取得胜利。这种恶斗，一直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而慈禧的态度，却不时发生游移，一左一右。因为她认为倭仁等人是忠君爱国的，可以用来牵制洋务派。

夏东元说：“以倭仁为代表的一派人是要中国永远落后下去，以奕为代表的一派人是要使中国变落后为先进。”（夏东元《洋务运动史》）诚

哉斯言。

军事工业四大骄子

军火贸易很坑人。

“买一颗从英国炮船上偷来的很普通的十二磅炮弹要费三十两银子，买一万粒最坏的铜帽也要十九两银子。”（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253页）

热兵器弹药消耗很大，军费难以负荷。怎么办？只有想办法自己造。江南制造总局、马尾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应运而生。

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集资4万两银子在上海收购了一家外国机器厂。此时，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受曾国藩之命赴美购置的新式机器运抵上海，再加上李鸿章经营的苏州炮局的两个车间，三者合在一起，建成当时规模最大的机器厂，是为江南制造总局。厂址选在城南黄浦江畔高昌庙镇，即今江南造船厂旧址。

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企业，规模庞大，有16个分厂，最多时雇用2000多工人。从上海海关关税每年拨50万至60万两银子维持运转。1868年建造成第一艘木壳轮船，定名惠吉号，长约60米，宽9米，每小时航行19公里。浦江试航，轰动上海。曾国藩登舟视察，高兴异常，说：“中国自强或基于此。”

江南制造总局生产了大量机器。1867～1904年，总计生产工作母机117台，起重机84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抽水机77台，轧钢机5台，其他各种机器135台，零件及工具110万件。又制造第一个炼钢炉，中国第一炉钢就是这个炼钢炉于1891年炼出来的。江南制造总局筹建的炼钢厂，最多时每年炼出2059吨钢。

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讽刺江南制造总局贪污腐败。平心而论，哪个时代的企业没有腐败呢？我们今天见的还少吗？当时中国机器制造是一张白纸，应当承认，江南制造总局对于推动中国工业技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最主要的是造枪炮。江南制造总局不断仿造英美步枪大炮，武装湘军淮军。到19世纪90年代，每天能生产子弹9万发。

1868年，李鸿章将上海广方言馆迁入江南制造总局，建立了翻译馆，第一年译出《汽机问答》等科技著作4种。到1907年，共翻译159种西方图书，内容包括人文、科学、工程、军事等各个方面。

马尾船政局。这家官办船厂是由当时担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于1866年在福州马尾山创建的。不久，左宗棠被调往甘肃、新疆平定回族起义，他推荐林则徐的女婿、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在沈葆桢苦心经营下，到1874年，建成了一个以造船为中心的大型兵工企业，有13个分厂，先后聘用80几个法国人担任监督、帮办、工程师、教师。企业经费由福建海关关税和福建茶税拨付，每年大概70万两银子。

1869年，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排水量1370吨，比日本在1862年仿造的蒸汽船“千代田”号排水量大10倍。到1905年，船政局建造军舰和商船各40艘。1887年，第一艘钢甲船“平远”号下水。1876年，有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参观了船政局，一时激动，过分地奉承了主人：“中国的工程师……英文说得相当好。船的引擎情况良好，什么东西看来都干净，事事都认真有条理。”“最近造的一只船……引擎及一切部件，在建筑过程中，未曾有任何外国人的帮忙。”船政局所生产的产品，“技艺与最后的细工，可以和我们英国自己的机械工厂的任何产品相媲美而无愧色。”（《田凫浩航行记》，《洋务运动》八，370～373页）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刚起步的船政局，还不能和老牌造船大国英国相比。马尾造的船马力小，载重少，船速慢，炮位不多，缺陷不少。这些船主要用来装备福建海军。

为了尽早掌握西方技术，船政局建立了福州船政学堂，招收学生，先后派出3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1875年，沈葆桢获准开采与马尾一水之隔的台湾基隆煤矿，满足了船政局的能源需求。

金陵机器局。1865年，李鸿章升任两江（两江包括江苏、安徽和江西地区。清朝江苏和安徽两省同属江南省）总督，将苏州炮局剩余的一部分迁至总督府所在地南京，在雨花台附近创办金陵机器局。

金陵机器局主要生产大炮、子弹、水雷，规模比江南制造总局小得多，每年需经费11万两。李鸿章重用英国人马格里管理金陵机器局。马格里曾帮助李鸿章成功采购外国设备，但他是一名军医，造机器并非内行，在管理中出了不少毛病。1875年，金陵机器局为大沽炮台制造的大炮在演习中接连发生爆炸，损坏了信誉。

天津机器制造局。这家企业是在奕䜣授意下，由清廷贵族、通商大臣崇厚创办。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清政府在这一年6月派崇厚出使法国。9月，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天津机器局的大权从崇厚转入李鸿章之手。天津机器局每年需经费30万两左右，由天津海关、烟台海关拨付税款支持。

天津机器局主要生产大炮、炮弹、子弹和水雷，也负责维修武器。除此之外，还承修轮船，生产挖河机器船。在武器生产中，“以洋火药铜帽为大宗”。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天津机器局向各地供应的军火“较往年多至数倍”，日产子弹2.6万颗。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决定加快海军建设，天津机器局又上马制造军舰、鱼雷艇等。1893年，从英国进口全套新式机器设备，建起一个炼钢厂，制造新式火炮，天津机器局成为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的一个大型兵工企业。但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天津机器局遭到毁灭性破坏。

精明的李鸿章，把大型国有新式工业企业牢牢抓在自己手中，扩充淮军势力。当时江南、马尾、金陵、天津这四大骄子，李鸿章实有其三。

除了这4个企业之外，各地还先后建立了山东机器局、兰州机器制造局等。一时间，新式兵工厂风起云涌，成为工业化的带头人。

民用工业五大亮点

有论者说，轮船航运、电线电报、纺织工业与煤铁开采，是洋务派开创的四大民用工业。但铁路对于中国的意义实在重要，铁路也是在洋务运动中诞生的，它的生育过程充满风险曲折，这正表明了铁路的分量。所以这里把铁路也加上去，成为五大亮点。

轮船招商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逐渐沦于外商之手，洋务派心有不甘。为了夺回航运权，在李鸿章主持下，清政府于1873年批准成立轮船招商公局，不久改为招商局。开始为官办，半年没成效，改为商办，后又经李鸿章定位为官督商办。自改为商办起，客运和货运业务迅速发展，不断盈利。1885年，李鸿章的重要幕僚、洋务派大将盛宣怀主持轮船局，担任督办。盛宣怀接手7年，轮船局的资本从200万两增加到2000多万两，扩大10倍。

1877年，轮船局购并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接着与实力强大的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展开竞争。太古、怡和为了挤垮轮船局，在长江航线极力跌价，但轮船局依靠官民支持挺了下来，迫使太古、怡和坐下来谈判，于1878年签订了3家同价运输合同。

不久，销价竞争又起。轮船局把太古公司总买办郑观应挖过来，谈判实力大增，迫使两家英国公司在1883年再度签订同价合同。轮船局在3家合同中取得较多生意额度，占了上风，股票大涨，每股160两银子。

1890年，销价竞争再起，轮船局利用两家英国公司的矛盾，在利润连续下降的情况下咬牙不打退堂鼓。结果，太古公司濒临大额亏损，挺不住了，只好于1893年第三次签订同价合同。轮船局股票从1890年每股50两一度攀升至每股200两。

电线电报业的创办与发展。尽管洋务派沈葆桢等人自1870年起就多次要求架设电线，但在顽固派抵制之下，清政府置之不理。不仅自己不架电线，也不许外国人架电线。理由是：假如让洋人架设电线，地隔千里之遥，中国文件尚未到达，外国就先知道了消息。

1874年，李鸿章据理力争说，日本今年侵犯台湾之际，我方写信调兵，动作过慢，吃了大亏。清政府逐渐改变态度，1880年10月，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中国近代电讯业就此诞生。先在津沽架设电线，继而在1881年建津沪电线，1882年建沪粤电线，中外共同使用。

其实，早在1878年，担任福建巡抚的洋务派骨干丁日昌就在台湾尝

试办了一个电报学堂，并在基隆架设电线开通电报，这是中国人架设和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天高皇帝远，台湾这些偷偷摸摸的小动作没有引起清廷的关注。

从1881年起，清廷批准在天津正式开设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人才。上海、南京等地也陆续办了电报学堂，电报业务在各地先后开展起来。为了维护电线电报主权，洋务派力主收回外国人在中国陆地架设的电线，并规定海底电线不准在中国上岸，为此与英国、丹麦、美国、俄国电线电报公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取得成功。

纺织工业创新。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输入中国纺织品大增，成为中国最大宗进口物品。洋布价格只有土布的1/3，中国手工纺织业受到沉重打击。

洋务派知识分子、实业家郑观应说，禁止洋布是不可能的，唯一办法是我们自己也搞洋布厂。

在洋务运动中，近代纺织企业艰难发轫。

先是陕甘（陕西、甘肃）总督左宗棠的部下赖长在兰州创办兰州织呢局，1880年建成投产，但是到1883年被迫停产。个中原因，一是当地原料粗杂，产品质量差；二是西北交通落后，呢子运到内地费用昂贵；三是织呢局官办，冗员充斥，效率很低。不过，左宗棠在当时极为落后的西北建设纺织厂，亦为早期开发大西北的壮举。

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几经波折，于1889年12月建成。郑观应、马建忠先后总其事，为官督商办。该厂产品质量与进口洋布差不多，年产24万匹，相当于进口洋布的1/80，“少分洋商之利”。不幸的是，1893年一场大火，工厂焚毁。洋务派愈挫愈奋，李鸿章委派盛宣怀挂帅，在原址筹办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9月新厂投产，第二年另开4个分厂，堪称神速。但开工不久，中日战争爆发，投资者信心跌落。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外国获得在中国从事工业制造的权力，洋商纷纷到上海开设纺织厂，再加上棉花价格猛涨，华盛难以支持，于1991年变卖，最后竟然是由盛宣怀买下了自己一手经营的厂子，改名为集成纺织公司。产权不明的官督商办企业就此改制，成为私营企业。

19世纪90年代初，张之洞在武汉开设织布、纺纱和缫丝企业。其中官办的湖北织布官局1892年竣工。1893年～1990年，该厂生产原色布33万匹，棉纱13.5万匹。因为是官办，成本很高，产品积压和销售不畅的情况屡屡发生。由于当时纱销量日增，张之洞于1897年又建成湖北纺纱官局。

煤矿开采和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英美等国一直觊觎中国煤矿，要求在台湾、华北、江苏等地投资开采，均遭清政府拒绝。19世纪80年代中期，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多次建议自己开挖煤炭，并痛斥了“挖煤会破坏风水”的顽固派谬论。曾、李、沈的意见，最终获得总理衙门大力支持。

从1875年起，先后在河北磁县、台湾基隆、安徽贵池、河北唐山、湖北荆门、大冶等地开办煤矿，是为中国机器采煤之始。最成功的当属唐山附近的开平煤矿，1882年年产3.6万吨，1889年增至24.7万吨。这个矿是商办，讲求效率和节约，始终保持了活力。

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较为复杂，比煤炭开采晚了5年。从1881年起，先后开办河北承德铜矿、山东招远金矿、云南铜矿、黑龙江漠河金矿、吉林珲春银矿、湖北大冶铁矿等。这些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规模小，成功的不多。其中张之洞于1893年建成的湖北汉阳铁厂，称为“东亚第一”，但最终因连续亏本，不得不于1896年另行招商承办。盛宣怀、郑观应接手商办之后，汉阳铁厂才逐渐走上正轨。

筹建铁路。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出资修建了0.5公里长的一小段铁路，车厢不是由机车牵引，而靠人推。修这条铁路是为了开风气，但立即被清政府官员下令拆掉了。

今天看来，当初反对修铁路的理由很奇怪。顽固派说，一旦修了铁路，外国人很容易进入中国内地，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了。又说，修铁路破坏风水，“行之必犯众怒”。还说，修了铁路，内地的利益就会被外国人用铁路这个吸管吸走，民众生计就破坏了。

19世纪60年代，就修不修铁路的问题，清政府曾有3次大讨论。这3次讨论主要是针对外国人在中国修铁路的请求。讨论结果，绝大多数官员坚决反对外国人投资修铁路。沈葆桢则主张自己修铁路，他说：“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体制外的王韬则大声疾呼修建铁路：“渴望豪杰之士及早而自握此一变之道！”

他们都不如后来李鸿章讲得明确。李鸿章说：中国“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者，察其要领，固由兵器兵船讲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故……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强。”（《复醇邸论铁路》）这句话倒很能体现洋务派主旨，就是不触及制度，单以工具理性立论。张之洞后来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为此意，不过是一个更概括的纲领性表述。

19世纪70年代，政府的脑袋有点转过弯子来了，但只限于允许在隔

海的台湾修铁路。1876年6月，英国人以修公路为名，偷偷修建了上海至吴淞15公里铁路。7月14日，火车碾死一个中国人，被迫停驶。李鸿章以铁路必须由中国自己修筑为理由，以28.5万两白银买下铁路并加以拆除，将设备运到台湾交给丁日昌，在台修建铁路。1876年秋，台湾基隆矿区修筑了一条铁轨。车厢不用机车牵引，利用海岸坡度，从矿井滑行至海边，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轨。丁日昌趁机上书建议在台湾修筑铁路，获朝廷批准，后因经费困难，未能实施。

到了19世纪80年代，又有3次大辩论，辩论的议题变成了要不要自己建铁路。顽固派张家骧、刘锡鸿、徐致祥、文海等人极力反对修铁路。他们的理由是："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铁路一开，开门揖盗"，"关山尽失其险"；"小民失业者不可胜计，往往铤而走险为捻匪"。

淮军将领刘铭传以及李鸿章对这些冬烘之见一一予以驳斥。1885年夏天，左宗棠临终之际留下遗折，也力主修建铁路。

此时光绪已登基多年，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权倾一时，幸运的是，他坚决支持建造铁路。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奕出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曾纪泽为帮办大臣，铁路事务划归海军衙门主管，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

其实，早在1881年，在奕暗中支持下，为解决开平矿务局运输需要，就修建了唐山至胥各庄11公里铁路，此为中国正式有铁路的开始。开始是机车牵引，但顽固派说火车行驶会震动皇陵，只许用骡马拖拽，把火车变为马车，后来经过力争，重新使用机车。

1886年，在奕支持下，开平铁路公司成立，将铁路延伸到天津大沽。1888年全线竣工，李鸿章第一次坐火车从天津直抵唐山。

随着洋务派为庆贺光绪婚礼而在北京修建的3.5公里铁路竣工，以及建议修建天津至北京通州的铁路，1889年1月又爆发了一场大斗争。顽固派大批人马上阵，呼天抢地，齐声反对在京城修建铁路，他们说，边陲之地修建铁路还可以试行，京城万万不能建铁路，以免"门户大开"。

清政府将两种看法下发各地总督、巡抚，征求意见。

多数地方大员支持继续修建铁路，也同意修建津通路。时任两广（广东、广西）总督的张之洞提出新的意见，奏请缓办津通路，改修卢汉路（卢沟桥至汉口），以开发中国腹地。奕认为这个建议"别开生面"。同年8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清朝湖北、湖南两省同属湖广省）总督，坐镇武汉，筹办卢汉路。

但是，由于俄、日企图侵占东北的危机日益显明，总理衙门于1990年决定缓建卢汉路，先在东北修筑铁路，以加强东北防御，卢汉路的修筑暂时拖了下来。

首派留学生

洋务教育最突出的创新之举，是派留学生。由此发端，留学生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独有的特殊景观，至今方兴未艾，蔚为大观。

与其让洋人在中国主持种种科技生产事业，不如派人直接去西方学习本领，这样才能把西学西技真正拿到自己手里，这就是派留学生的初衷。

在出洋留学的问题上，容闳昌于先，丁日昌促于中，曾国藩成于后。

容闳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系统教育的人。1868年初，他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建议派遣留学生，“以为国家储蓄人才”，丁日昌大为赞许。丁日昌为此活动了两年，最终找到了知音，就是曾国藩。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上折奏请，得到总理衙门支持。李鸿章说这是“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1872年夏秋之际，第一批留美学童从上海乘轮船赴美，至1875年最后一批上路，前后共4批，120人，年龄为12～20岁。其中有从香港招来的少年詹天佑。可悲的是，顽固派说学生久居美国，“必至全失其爱国之心”，于1881年将留学生全部撤回。黄遵宪《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一诗凄然唱道：“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

1873年，沈葆桢又提议派学生去欧洲学习，这一次主要从马尾船政局所设的学堂中选拔学生，前往英法两国。好事多磨，1877年才成行。到1885年，共分3批派留学生78人，这一次是完成了学业回国，没有中途撤回。留学生中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有刘步蟾、萨镇冰、严复等。

洋务派对国内教育也进行改造，举办各类实业学堂。第一个电报学堂是丁日昌在1875年担任福建巡抚时在福州设立的，天津电报学堂数第二。广州实学馆于1881年开张，学习外语及西方科学技术知识。1893年，张之洞在武昌创设自强学堂，学习外语、数学、商务、化学。此外，轮船招商局开办了驾驶学堂，福建设立了福州电气学塾，吉林设立表正书院，台湾设立西学堂，天津设立天津西医学堂，一时风起云涌。

近代军事院校也于此时起步。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规模最大，张之洞在1887年设立的广东水路师学堂名噪一时。此后还有南京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等。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昭雪

浙江余杭县一个豆腐店伙计葛品连，1872年娶毕秀姑为妻。秀姑貌美，穿绿衣系白围裙，绰号“小白菜”。夫妇租了举人杨乃武的一间屋子，成为邻居。日久，葛怀疑其妻与杨乃武有染，但无实据。后来葛品连忽于1873年暴病身亡，葛母向余杭县指控秀姑谋杀亲夫。县令草草验尸，断为中毒丧命，刑求秀姑，秀姑不堪忍受，伪供与杨乃武合谋杀夫。尽管杨乃武不承认，余杭县仍将验尸结果上报杭州府，杭州府对杨乃武施加酷刑，杨屈认买砒霜作案。杭州府又报浙江省，拟定将秀姑凌迟处死，杨乃武斩首。

1872年创刊的上海《申报》紧追此案，发现甚多疑点。当此案由杭州府报到省里将成铁案时，《申报》连续报道了此案可疑之处，对官员滥施酷刑痛加揭露，引起广泛关注，一时街谈巷议，舆论汹汹。清政府指派浙江学政（负责文化教育的省级高官）胡瑞澜复审。胡复审之后，仍确认定罪“并无出入”，意图保全浙江官员。《申报》又公开揭露胡审此案“刑讯至六昼夜”，激起社会公愤。浙江籍京官联名上书，要求将此案交刑部复查，移棺京师。验尸结果，葛品连确系病亡，而非中毒，历时3年大案终得大白。浙江巡抚及其他涉案的官员一律严重处分。

此案昭雪，表明了初起的报界力量。《申报》还发表诸多支持洋务的文章，如1874年的《论开煤矿》、《论电线》、《火轮车为富国之举》，并且提出了“移风俗、新制度、改科举”等政治改革的主张。上海除《申报》外，还有1861年创办的《上海新报》，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等，以上为西方人在中国投资的报纸。1873年，汉口创办《昭文新报》。1874年，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两份报纸是国人自办。《循环日报》的主笔王韬奋力鼓吹洋务和改革，成为名闻遐迩的改革派政论家。19世纪80年代，办报大热，各种报纸开始风行。洋务派认为，要改革，必须兴办报业。当时的报纸，力主言论自由，揭露社会黑暗，呼吁学习西方，要求全面改革，成为洋务派的舆论力量。报业的诞生与勃兴，是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侧面。

建设近代海军

清朝以前有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显然不算海军。两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坚船利炮教训了清朝统治者，建设海军的提议慢慢摆上日程。

1868年，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划分三洋”。内容是，制造中型炮艇30艘和3艘“大兵轮”，分为3路。一部分炮艇和一艘大兵轮驻天津，设北洋舰队司令部；另一部分炮艇和一艘大兵轮驻吴淞口，设中洋舰队司令部；第三部分炮艇和一艘大兵轮驻台湾，设南洋舰队司令部。三洋连成一气，半年联袂演习一次。这个提议对于海军建设是一个框架性突破。

1874年，日本军队借口琉球渔民被杀，乘军舰侵略台湾，给了清政府很大震动。虽然事后通过外交途径和赔款解决，但朝廷上下一致认识到：“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

1875年，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制造和购买铁甲舰，对付日本。另设一支福建海军，掌握在闽浙总督和福建船政大臣手中。正规的海军建设从这一年开始。

从1875年到1884年中法战争之前这10年，清政府购买军舰14艘，自造军舰14艘，连同原有舰船，海军粗具规模。其中，李鸿章控制的北洋海军14艘，曾国荃控制的南洋海军18艘，福建海军11艘。

1884年6月，中法海战爆发。8月，法国远东舰队攻入闽江口，消灭福建海军全部军舰，摧毁了马尾船政局，这是海军一大挫折。此前，沈葆桢已经升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并于1879年病逝于南京。沈葆桢没有看到他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马尾船政局毁于一旦，算是躲过这一剧痛。

清政府追究责任，整顿海军，成立海军衙门，奕为总理，庆亲王奕、李鸿章为会办，实权仍操在李鸿章手中。政府决定集中力量办好一支舰队——北洋海军。

到1888年，北洋海军初步成军，共有25艘军舰。5艘自己制造，其余花巨资从国外购买。军舰中包括定远、镇远等铁甲舰和致远、靖远等快速巡洋舰。编制采用英国章法，聘请英国和德国教官训练军队。李鸿章还打算再行扩张，但由于海军军费被慈禧挪用修建颐和园，无法再添置装备。海军军费每年400万两，修建颐和园花掉2000万两，海军衙门

实际上成了修建颐和园的工程指挥部。

北洋海军成军之后，经过明治维新国力日益强大的日本于1894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在战争中，由于清政府体制性腐败病入膏肓，再加上指挥不当，以及海军内部的派系矛盾，致使北洋海军一朝覆灭。

北洋海军覆灭，是洋务运动的最大悲剧，过去常有人据此否定整个洋务运动。其实，如上所述，近40年的洋务运动，对于推动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起步，居功至伟，彪炳史册，是抹杀不了的。

从更深一层来看，北洋海军的悲剧表明，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最后连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有鉴于此，甲午战败之后，光绪皇帝及戊戌变法诸君子吸取洋务运动的教训，下决心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企图从制度变革入手，改变大清帝国的积弱病态，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国有还是民营

清政府以及洋务派一些大员的毛病，是死抱着国有制。

比较突出的是张之洞。1899年，他担任湖广总督，开始筹办汉阳铁厂，竟声明“非为牟利起见”。不“牟利”，自然就不重视价值规律，不按市场规则办事。他把经营企业的明星盛宣怀请来协助，盛宣怀主张招股商办，张之洞说什么也不同意，坚决主张官本官办。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样可以把厂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任意处置。

首先在选址上出了问题。张之洞决意把工厂设在武汉，煤和矿石均须逆流而上长途运输，费时费资。盛宣怀建议设在黄石，煤矿、锰矿都在近处，自然能够节约，张之洞就是不听。其次，进口炼钢炉，糊里糊涂买错了型号，炼出来的钢容易脆裂。第三，把一大堆完全不懂钢铁生产的候补知县之类派到工厂当头，大小领导岗位都由官员充任，恶斗成风，营私舞弊，贪污浪费，上演官场全武行。结果效益奇低，亏损巨大。

盛宣怀曾经这样概括张之洞的“企业管理”：“香帅（张之洞）躬亲细务，忽而细心，锱铢必较；忽而大度，浪掷万金。忽而急如星火，立刻责成；忽而置若罔闻，延搁数月。一切用人用款皆躬亲其权。”（钟天纬《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六年十月十二日）

其他如云南铜矿，也犯这个毛病，导致失败。一个叫锡珍的人给军机处上的折子，指陈矿务成败，颇能击中要害。他说：“历年试办开矿，率少成效，何也？盖由官办不由商办也。事经官办，积习难除。縻费既多，亏挪不免。或兼摄他务，不能专一，派员经理，漫不经心，何能持久？”

他对办矿务提出的建议是：“招商集股，发票收银，官不过问，但将清册具报，如何付利，如何归本，较若画一，不得参差。有舞弊者，官为惩治。盈之与亏，商自任之。必能辛苦经营，众擎易举。如是，庶可以工榷算，致精良，节浮费，审实效，亦公私两便之道也。”

他警告说：“官独专其事权，则弊多而利少。故不如令商任其事而考其成，以期有利无弊，风气亦可以渐开矣。”（光绪十年军机处《矿物档》一）

李鸿章是个明白人。官督民办的轮船招商局赚了钱，一些官员红了眼，一再要求收归国有。李鸿章生前对此坚决抵制，在总理衙门支持

下，总算维持了官督商办，算是带着“红帽子”经营。李鸿章去世之后，轮船招商局被袁世凯收回官办，连连亏损，不得不卖掉几个码头。光绪、慈禧去世，袁世凯一度下台，盛宣怀经过力争，才将轮船招商局又改为商办。

清政府垮台的近因之一，就与“国有”相关。先是清政府批准粤汉、川汉铁路民办，入股民众甚多。然而，到1911年5月，先前一直力挺民办的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部长），当了官，立场发生180度大转弯。他代表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老百姓痛恨政府说话不算话，设套圈钱，群起反对。“保路运动”于是兴起，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几个月之后，清政府就呜呼哀哉了。

菜市口喋血：光绪的“罪与罚”

“腥气凝新鬼”

近日，北京菜市口报国寺旧货市场修缮一新，成为南城最热的景点之一。每逢星期四，前来“淘宝”的人熙熙攘攘。游客们的眼球，都被不断增值的文物牢牢吸住，没有人顾得上瞥一眼树丛间一个默然的石碑。

我走进寺门，接连向几位摆摊的摊主打听百年纪念碑，都摇摇头。踱进院内一个展览馆，向馆内年轻工作人员询问，也毫无头绪。无奈，挤进人群，搜寻再三，终于在寺院深处的东侧树丛间找到了它。这就是宣武区人民政府1998年立的戊戌变法百年纪念碑。

在四周喧闹的讨价还价声中，孤寂的碑文向偶遇的寻觅者静静诉说：“光绪帝于戊戌年即公元1898年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推行新政，戊戌变法肇始，前后历经103天，史称百日维新。顽固势力竭力反对，阴谋扼杀改革。是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缉捕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惨遭杀害，变法归于失败。”

就在这古老的报国寺门口，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万人空巷的围观中，开刀问斩，英勇就义。正是：“此地复何地？头颅古累累。碧血沁入土，腥气凝新鬼。市人竟言笑，谁知我心悲？”

谭嗣同等6人，从北京西长安街六部口的刑部押往菜市口法场的时候，途经宣武门箭楼吊桥。吊桥西侧立着一块石碑，上书“后悔迟”3个大字。谭嗣同后悔了吗？没有。在变法危殆之际，他曾经有3次机会，可以从菜市口边缘全身而退，但是他都拒绝了。

他在刑部监狱中写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在法场上，谭嗣同面对监斩的保守派大员刚毅和凶残的刽子手，朗声说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此等英烈，震烁古今，诚谓气壮山河。

转石效应

戊戌变法并非几个书生纸上推演的“策划”，也不是毫无铺垫的空穴来风，它是清朝自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推进洋务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

洋务运动又称“同光新政”（同治到光绪年间的新政）、“自强运动”，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办中国早期工业，吸收西方的设备、技术、管理、人才，推动经济改革。一时间，制造局、招商局、电报局等破土而出；开矿山、造枪炮、修铁路成为最时髦的新兴产业。

洋务运动虽然是从发展经济着手，但它给中国打开了一扇新的大窗，引起的变化自然波及方方面面。随着洋务运动兴起，“天赋人权”、“物竞天择”、“君民共主”等西方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第一次传进我们这个古国，在知识分子心里开始发酵。

梁启超曾经说，洋务运动是戊戌维新的先导。

聪明的严复在1896年2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时，也点破了这一点。即所谓：“一思变甲，即需变乙，至欲变乙，又需变丙。”由经济体制改革出发，最后一定会牵涉行政体制、法律体制、政治体制改革。

史学家余英时说，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浪潮就会冲击到法律和政治领域。这就是余英时提出的“转石效应”。

1894年7月到1895年3月，清朝军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俄国又取得在东北占地筑路的特权，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湾，东三省完全被俄国掌控。国势的衰败和国人的强烈不满，成了戊戌变法的助燃剂。

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怎么是这样一个结果呢？主张维新的志士仁人通过反省得出结论：仅强调学习“船坚炮利”远远不够，结果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严复），必须在洋务运动基础上进行全面改革，尤其是制度变革。

1895年5月2日，正是甲午战败的国耻之际，在京参加进士考试的康有为、梁启超挺身而出，率1000多名举人上书朝廷，要求变法，揭开戊戌变法序幕。这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朝廷征举

的知识分子，后人以“公车”作为各地举人进京考进士的代称）。

上书递到都察院。都察院说《马关条约》已批准，无可挽回，拒绝接受。但上书的内容不胫而走，犹如一块巨石投进湖水，产生了激烈的震荡和冲击。

上书第二天，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予工部（负责重大工程营建）主事（相当于处级）。5月和6月，康有为写了上皇帝第三书和第四书（早先有两次上书，光绪未看到），第三书终于抵达御案。光绪立即命令抄送慈禧、军机处和各地督抚。

当时，维新人士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年轻而又开明，变革思想十分强烈的光绪皇帝载（1871～1908）身上。

维新派有一个重要的参照——此前展开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1868～1898），年轻的明治天皇顺应潮流，加以促进，是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个因素，在中国政界和学界发挥了很大的示范效应。

改革派领袖人物黄遵宪在他的《日本杂事诗》序言中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他专门写诗颂扬明治维新，下面加注说：“伟矣哉，中兴之功也。”

康有为更是极力鼓动效法明治维新。当时中日处于敌对状态，但康有为主张“以强敌为师资”。他编写了《日本变政考》一书，书中说：“我朝变法，但鉴于日本，一切已足。”然后把这本书进呈给光绪。康有为每次上书都强调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变法。

孙中山也用明治维新鼓舞人们的斗志。他说：“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

“大事还是我办”

然而，中国国情却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情大不相同。

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仇视对外开放，极力维护落后的德川幕府体制，立场十分保守。1866年，孝明天皇去世。他的独子，16岁的睦仁继位，是为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开明而且富有进取心，更重要的是，他头上并没有一个太上皇念紧箍咒。当时，日本改革者铲除幕府势力幸运地获得初步成功，朝廷大权实际掌握在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改革派手中，史称这是日本的“运气”。

清朝就不然了。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说：

皇上（光绪帝）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慈禧）之手。

光绪皇帝已经就位了，慈禧太后仍然越俎代庖，包揽一切。没有任何政治名分的慈禧如此越权，根据什么呢？

史学家孟森曾引《朝鲜实录》的记载，描述过清朝的不成文的“家法”。

嘉庆元年（1796），朝鲜使臣李秉模出使中国，在圆明园受到乾隆皇帝接见。当时嘉庆皇帝已经登基，年迈的乾隆称为太上皇。李秉模向朝鲜国王报告乾隆接见时的情景说：

太上皇使阁老和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

乾隆帝的“大事还是我办”这句话最为传神，一语道破了当时清朝权力结构的实质。慈禧垄断大权，就是根据这一政治文化传统。

当然，在慈禧之前，清朝并无“母后垂帘听政”的先例。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河北承德）去世，慈禧（时为咸丰贵妃）生的皇子载淳继位，是为同治皇帝。

咸丰去世前夕，亲自指定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大学士肃顺（宰相）等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处理政务），辅佐6岁的同治。谁知咸丰刚去世，27岁的慈禧就勾结恭亲王等一班人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了载垣、端华和肃顺，并将剩余5人免去赞襄政务大臣职务。挟此余威，慈禧拉住为人忠厚老实的25岁的慈安太后（咸丰的正宫皇

后，无子）当幌子，悍然实行双人垂帘听政，实际大权当然在慈禧手里，满朝文武谁也不敢抗议。从此，慈禧自造了“母后垂帘”的“家法”。后来慈安得“急症”去世，慈禧更是大权独揽。

1874年，同治皇帝病逝。同治无子，慈禧指定3岁半的载（咸丰皇帝的侄子、慈禧胞妹的亲生儿子）继承皇位，是为光绪皇帝。慈禧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便于自己长期垂帘听政。光绪这个小皇帝是在慈禧严酷的威压虐待之下成长起来的，其境遇至为悲惨，犹如奴隶。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记太监寇连材的回忆说：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光绪）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这段话说得很生动。慈禧心狠手辣，权谋甚深。她知道时间对光绪有利，早晚一天光绪会执政，所以从小就对之施以威压，使光绪早早吓破了胆，以有利于驾驭。

1887年，慈禧主持光绪选择妻子（皇后）的仪式。慈禧想让光绪娶她的侄女——长着一张大长脸又有麻子的那拉氏（即后来的隆裕皇后）为妻，把那拉氏排在5个候选人的第一位。慈禧指着5个女人对光绪说：“皇帝喜欢谁，请自选，中意谁就把如意授给谁。”

光绪说：“这件大事应该由皇爸爸（慈禧）做主，我不能做主。”

慈禧假装大方，也许要测测光绪是不是真听话，坚持让光绪自选。

可是，当18岁的光绪实在受不了第一名，要把如意授给另一人时，慈禧大叫：“皇帝！”并且朝那拉氏努努嘴。光绪一下子醒过来，不得已把如意授给慈禧的侄女。

孟森还写过一篇文章，描写1903年光绪在火车上伺候慈禧吃饭的情景：

太后在车中，停车进膳。皇上同桌，侍食于下，后妃立侍于后……太后下箸（筷子），皇上亦下箸……太后箸止，（光绪）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机械之相应。想宫中无日不然，难乎其为日用饮食矣。

假如弗洛伊德凑巧看到这奇异的进餐，他一定认为这是一幅万分恐怖的场景。从这个画面中，他或许能够得出令人惊异的心理分析结果。

在这种状况下苟且偷生的光绪，没有被逼疯，已属万幸，这说明他

是一位具有非同寻常的坚强性格的青年。

茅海建著《戊戌变法史事考》说，光绪自17岁亲政（这个年龄倒是和明治天皇继位时间差不多），每一个决定都要向慈禧报告。小事事后报告，大事事前请示。总之，一切都需经过慈禧同意方可。光绪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没有实际权力。

维新派诸人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位皇帝身上，岂不是要落空？

光绪和拉斯科尔尼科夫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个人意志受到抑制的时候，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反抗意识也在增长，而且每时每刻都在与外来的抑制搏斗，左冲右突，总要寻找突破口发泄出来。聪明而敏感的人尤其如此，不然怎么活得下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作《罪与罚》的主角，是一位由于环境压迫而患上抑郁症的年轻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心理特征，与光绪颇有几分相像。

请看拉斯科尔尼科夫——“他那年轻人的敏感是很强烈的”，“他苦思焦虑，忧闷不乐，情绪紧张，以至于精疲力竭。”“他对所遇到的一切人和周围一切事物都发生了反感，一种无限的，几乎是生理上的、顽强的、愤怒的、憎恨的反感。他觉得，他所遇到的一切人都是可恶的，他们的脸、他们的举止和他们的行动都是叫人讨厌的。”

光绪正是这样一种心境。

光绪身体一直不好。中外医生给他诊断，都指出他焦虑、头痛、耳鸣、头晕、疲惫。这正是精神抑郁的表征。

抑郁症是怎样产生的？传统的精神分析学注重从童年经历挖掘根源，而新的精神分析学更加关注后天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和个人环境。

不幸的是，这两个因素，在光绪身上都具备了。精神分析学特别重视“焦虑”状态。所谓焦虑，是指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产生的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不得不拼命追求爱，或是追求事业的成功，以此获得安全和自信。

戊戌变法时，光绪27岁。这个岁数，正是富于理想，激情洋溢，要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光；也是血气方刚，容易冲动，富有逆反心理的年龄段。应该说，变法给光绪提供了一个情绪的突破口——他不愿意做崇祯那样的亡国之君，也不甘心看到中国被列强欺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光绪力主抗战，而当时的慈禧则全身心沉浸在庆祝自己60大寿的盛宴中，无暇他顾。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刺激了光绪变法的决心——为了国家强盛而变法，这是堂堂正正、能够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既能说服自己克服恐惧，又能在道德方面占据制高点，达致一种崇高美和撼动人心的悲剧效果。

换句话说，只有变法，才能在公私两面给光绪提供背叛慈禧的契

机。

正因如此，一向对慈禧万分恐惧的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内心深处的火山突然爆发，竟然对慈禧展开反击，不惜触犯满洲贵族的“天条”，舍身试“法”。

华裔史学家黎东方撰文说，光绪是中国历史上最苦命的皇帝之一，从进宫到囚禁，几乎没有一天不向慈禧长跪。然而，在变法的短短100天之内，这个曾经的窝囊废，一变而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悲剧色彩的正面英雄。当然，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苦闷抑郁之极，失去自制，用斧头杀死了高利贷者伊凡诺夫娜和她的妹妹。拉斯科尔尼科夫最后进了监狱，这是拉氏的“罪与罚”。

光绪在变法中反击慈禧，然后被长期囚禁，这是光绪的“罪与罚”。

剃刀边缘103天

1898年1月，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光绪，提出变法大纲：一、召集群臣，宣誓变法。二、设“上书所”，广开天下言路，鼓励士民向朝廷建言。三、设制度局，拟定改革方案。

这个建议的第三条是要害。虽然表面上并不张扬，但一切算计都隐藏其中，如果当真实现，不啻是一个制度性突破，并且将会成为政治改革的指挥中心。也正是这一条，让眼光犀利的慈禧忐忑不安，后来竟成为光绪与慈禧撕破脸的引爆点之一。

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经慈禧批准，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这个诏书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改革文献，值得一览：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张变法自强。尔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奋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这份诏书内容的特点是以改革为主，适当照顾保守势力，比如“以圣贤义理之学”作为根本等等。有人说，这些措辞表现了“改良派的软弱性”，或者“体现了光绪内心的巨大矛盾”。我倒是觉得，这是光绪考虑到慈禧的制约以及保守的国情，做出的策略性让步。

这个诏书落实了康有为建议的第一条“宣誓变法”。

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共计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6月16日，即颁布诏书之后第五天，光绪召见康有为。在颐和园仁寿殿灰暗的光线中，康有为滔滔不绝，盛赞日本年轻的明治天皇推动维新是“重起天地，再造日月”，“气象维新，举国奋跃”。光绪听了十分振奋，他决心“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变法维新。

不久，光绪授康有为、张元济为总理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章京上行走（章京，从满语音译来的名词，原为官员之意，后来成

为专用官名，是秘书类官员。行走，有实习、虚职之意）。7月3日，赐梁启超六品衔（清官员分九品，正一品最高），负责办理译书局。

这边布局，那边也动手。变法诏书颁布第四天，慈禧就命令光绪将支持变法的大学士（总理级大臣）翁同撤职。翁同长期担任光绪的老师，与光绪情同父子。翁氏具有丰富的学识和政治经验，曾力排万难主持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平反。他一直鼓励光绪变法，并把康有为引荐给光绪。翁同一去，光绪受到巨大打击。

慈禧的动作不只于此。同一天，她还任命自己的宠臣荣禄为直隶（河北）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控制京师地区。同时规定，所有新授二品以上大臣都要向慈禧谢恩。维新派得到起草诏书的权力，而保守派掌握了军政实权。

在百日维新中，前后发布变法命令110多道。

除旧方面：一、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改考策论（对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议）。二、各省书院祠庙改为学堂。三、裁减绿营（清军中以汉人为主的步兵），使官兵产生失业恐慌。四、裁减京内外闲散、重叠的衙门和官员，引起官场震动。五、准许满族旗人自谋生计，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两百多年过惯寄生生活的满人，突然陷入危境。

布新方面：一、办学堂。首先筹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二、派遣留学生出国。三、创设中国银行、矿物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各地设商务局、丝茶公司等，提倡实业，广办邮政，兴修铁路，允许私人办兵工厂。四、奖励新著作、新发明。五、设立译书局，提倡学习西学，翻译外国书籍。六、准许自由开设报馆，报纸一律免税。七、准许自由组织各种学会。八、广开言路，官民都可以上书言事，严禁阻挡。九、兴办农会、商会。十、编制国家预算，公布收入与支出，按月公开发表。

史学家范文澜说：“短期内给予人民相当充分的民权自由是维新运动的最大成绩。”

这自然引起保守势力的阻抗。其实，上述变法内容，比起后来慈禧推动的宪政改革要温和得多，比如光绪仅仅下旨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而后来慈禧则干脆废除了科举。

但在戊戌变法时，就连改八股为策论也如捅了马蜂窝。光绪谕旨下达后，北京一片混乱。许多八股人士觉得突然失去了向上爬的拐棍，极为恼怒。有人甚至怀揣匕首，准备行刺康有为。

浙江学政（负责全省教育和考试的官员）陈学上书恐吓光绪说：“自制义取士以来，父师以是教，子弟以是率。一旦猝改，子弟无所师承，士心为之涣散。近日民情浮动，借端生事，不一而足。若此等无业之士，簧鼓煽惑，下愚之民，摇动附和，势必酿为不测之祸。”

光绪大怒，立即下令陈学离职回京，不许他再当学政，同时颁布上谕，声称要严惩阻碍新政的人，勉强将这股风压了下去。

光绪极重视广开言路，多次要求各地大小官员上述言事，要他们“各抒说论，以备采择”。光绪还鼓励老百姓上书，由都察院转递，并指示都察院，不许“稍有阻格”。后来光绪了解到都察院在呈递上书时屡做手脚，于是下令废除了“先行抄录，再为呈递”的老规矩，要求“士民上书，原封进呈，毋用拆看”，“随到随递，不准稽压”。幸亏当时文盲多，上书的人很少，若在今天，显然受不了。

光绪这一措施，落实了康有为提出的第二条建议。结果是，“举国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各种纸张的上书都有，每天有几十封。光绪黎明即起，日落还在读。有的上书对皇帝不大尊敬，光绪“览之欣笑，亦不加责怪”。这就打破了“小民有冤，呼号莫达”的局面，出现了几千年皇权专制社会从未有过的宽松的政治氛围。

不过，因为上书问题，光绪与保守派发生了始料不及的激烈冲突。

惊心动魄白刃战

戊戌变法是光绪力主的改革，光环没有加在慈禧头上。所以，慈禧虽然迫于形势同意变法，但心存嫉恨，不能容忍光绪独占鳌头。再说当时还没有发生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陷入绝境被迫启动宪政改革的情势，所以在戊戌之际，慈禧的倒退表现得最为突出。

维新派中的王照比较聪明，他看出了个中奥妙。一开头他就主张捧慈禧，说上书先给慈禧看，让慈禧有点面子。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均反对王照的意见，结果历次上书都只以光绪为对象，没有把当家人慈禧放在眼里。康、梁等人认为抓住一个皇帝就可以了。

维新派还有一个失策，就是不应把游移在新旧两边、内心倾向维新的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免职。光绪对李鸿章在对日谈判中的退让十分愤恨，9月6日突然下旨免去李的总理衙门大臣之职。李鸿章在晚清政局中是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应该是光绪争取拉拢的对象，起码应该先把他稳住。李鸿章虽然是慈禧宠臣，但他也曾要求加入改革派机构强学会，被康、梁拒绝。光绪撤李鸿章的职，被慈禧看作是光绪向她挑战，徒然又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自变法一开始，顽固派人物和利益受损的贵族、官员就一个接一个跑到颐和园，在慈禧面前告状，请求慈禧制止光绪的改革。

慈禧说：你们所说的难道我没看见吗？他铁了心要这样干，这也是他早就策划好了的，我怎能不知道？不过我现在先不动声色。

这些风声，光绪当然耳闻，但他箭在弦上，一不做、二不休。

8月底，光绪下令撤销光禄寺（负责祭祀宴请事务）、太仆寺（负责养马）、太常寺（负责礼乐、祭祀事务）、鸿胪寺（负责朝廷礼仪、宴请事务）、大理寺（负责审核刑部的案子）、詹事府（辅导太子读书）、通政使司（接受上书）等衙门，还撤销了湖北、广东、云南3省巡抚。这些衙门与地方官的事权，与其他衙门及地方官的事权互相交叉重叠，冗员充斥，效率低下，理当改革。这些事项是报请慈禧批准的。

但是，9月4日和5日发生的事件，就是光绪向慈禧的挑战了。

4日这一天，因礼部尚书（礼部负责文教、宗教等事务，尚书相当于部长）怀塔布、许应（清朝衙门负责人为一满一汉）等人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光绪一怒之下，将怀塔布、许应以及礼部左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署右侍郎曾广汉等6大臣“即行

革职”，并表彰和提拔王照。上文提到，光绪十分气愤阻挠上书，这一次大发作其来有自，但处分决定过重，表明光绪在激怒之下，欠缺深谋。

5日，光绪任命礼部新的6名负责人，并且授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皇帝机要办公中枢）章京，批阅官吏奏折，起草诏书。4人虽然仅任命为章京，可当时谁都知道，这4个章京名小实大，含金量奇高，有人甚至认为他们是“真宰相”。

这两天的重大人事安排，是光绪自行决定，没有请示慈禧。因阻挠一个部员上书，竟将6个大臣革职，而且还提拔4个著名维新派人士进入最高枢要机构，这无疑是摆脱慈禧控制、否定慈禧权力的重大行动，这就点燃了慈禧发动政变的导火索。

那么，政变的燃爆点是什么呢？过去很多人认为是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此说为：9月14日，光绪觉察局势严重，遂交杨锐带出密诏，向康有为求救。16日，光绪接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笼络袁。18日深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请他带兵杀荣禄，攻打颐和园，诛后党，保护皇上。袁世凯许诺赞成。20日，光绪再次接见袁世凯，加以鼓励。当晚，袁世凯赶回天津，将维新派密谋向荣禄报告，荣禄立即报告慈禧。据此，慈禧于21日（农历八月初六）上午发动政变，将光绪软禁，并假借光绪口吻向全国发布诏书说，是光绪再三恳请慈禧训政。自此日起，慈禧坐殿办公，百日维新结束。

近来，一些史学家对当时每天的事件进程进行仔细考证，对此提出质疑并出示新说，指出由于当时时间过于紧迫，交通及通讯手段落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及荣禄再报告慈禧，实际发生在政变之后。还有，就是光绪对谭嗣同活动袁世凯一事其实并不知情。袁的告密，自然大大加剧了政变激烈程度，导致光绪及维新派陷入更大困境，但慈禧发动政变，则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呢？大致有三条。

一是在发动政变前的9月14日，光绪与慈禧就是否开设懋勤殿（设立一个新的议政中心）一事发生争吵。光绪、康有为等一直企图在体制外建立一个新的议政机构，主要由赞成维新的人士组成，即康有为上书第三条提出的制度局。后来光绪为了减少阻力，从清朝开国传统中吸取经验，改了一个说法，称为开设懋勤殿。慈禧及保守派一眼就看出，这个建议的实质是要架空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另搞一个决策中心。这当然比罢免礼部六大臣要厉害得多，意味着光绪要夺取大权。慈禧对光绪提出了极为严厉的警告。

经考证，光绪在14日面见慈禧之后，15日给杨锐发出密诏。密诏说：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朽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密诏中反复出现的“议政”一词，就是指开懋勤殿，而最核心的一句是“朕位且不能保”。光绪过去从没有对臣下说过这样的话，这说明形势危到了极点。我们可以想象光绪在14日见到慈禧之后，围绕“议政”问题的争论之激烈。慈禧已经忍无可忍。

二是9月18日，慈禧看到御史（监察官员）杨崇伊及其他人的重要奏折。杨要求慈禧立即训政，理由除了指光绪纵容康有为、孙中山之外，一个最具现实威胁性的是说康有为等正在运动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的重要角色伊藤博文担任光绪的改革顾问，加以重用。奏折说：“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当时北京政界盛传此言，汹汹然信以为真。慈禧对此十分惊惧，决定于19日从颐和园回城，在20日监督光绪会见伊藤博文的情况。其实，光绪20日接见“自行游历”的伊藤博文才持续15分钟，问了问日本改革的一些情况，并未委以什么重任。

话说回来，维新派有些人的确在底下运作此事，希望伊藤博文留在光绪身边；但是光绪并没有这样的计划，而保守派又将此事放大到耸人听闻的地步，使慈禧惊恐万分。

三是慈禧发现，虽然她多次令光绪驱逐康有为出京，但光绪并未贯彻，康有为还留在北京。慈禧对此最为警惕，她认为康有为对光绪最有影响力，所以最仇恨康有为，并认为康有为正在与光绪策划不可告人的阴谋。

就当时情况来看，自光绪决定罢免六大臣并提拔谭嗣同等人之后，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已绷得过紧，稍有刺激便会折断。这以后发生的三件事，使慈禧怒不可遏，觉得光绪大大越界，必须紧急制止，因此在21日发动了政变。

21日政变当天，下旨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康有为之弟），第三天逮捕谭嗣同。慈禧给康有为定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假如慈禧此时已得到荣禄密报，知道康、谭等策动袁世凯杀荣禄、围攻颐和

园的话，一定会宣布这一大罪状，而不会避重就轻，替康有为遮掩。再有，也绝不会留出时间让谭嗣同逃跑。由此判断，慈禧是在政变之后（一说为政变第二天），才得到荣禄告密。

慈禧迫害名单

慈禧从不同方面大肆清算改革，共展开三波反击。

先看第一波。

9月21日下旨通缉康有为、康广仁，并将御史（监察官员）宋伯鲁革职；23日和24日，先后在北京逮捕谭嗣同（34岁，军机章京）、杨锐（42岁，军机章京）、刘光第（40岁，军机章京）、杨深秀（50岁，监察御史）、康广仁（32岁，无官职，协助其兄改革）、林旭（24岁，军机章京）、张荫桓（62岁，户部左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当时负责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徐致靖（54岁，礼部右侍郎）等8人。

28日，慈禧得到荣禄告密之后，以“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等罪名，下旨将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林旭6人“即行处斩”，不审而诛，史称“六君子”。29日，下旨将张荫桓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900年被斩于新疆）。徐致靖“永远监禁”。

再看第二波。

六君子被杀之后，清廷暂停了几天迫害和杀戮。从10月4日起，慈禧又开始清算。

首先整顿大内。4日，她亲自审讯，将亲近光绪和珍妃的太监杨瑞珍、杨长文、张得明、戴恩如4人残酷地当场“杖毙”，罪名是“干预国政”、“串通是非”，活活打死之后“抛入万人坑”。另10名同情光绪的太监分别处以“重责二百板、永远枷号”和“板责一百、枷号二年”的残酷刑罚。

10月8日，将光绪软禁在中南海瀛台，将瀛台所有建筑的门全部“堵砌”，并将孤岛瀛台通往对岸的桥板撤掉，派出大量人员看管。珍妃则被施以杖刑，禁锢在中南海淑清院。4年前（1894年），慈禧就曾抓住珍妃的一个过错，处死珍妃手下的太监，并命太监李莲英对珍妃进行“杖责”，有的史书还说是脱光了珍妃的衣服打棍子，果其如此，当是对皇妃前所未有的羞辱。慈禧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打击光绪。珍妃是光绪的最爱，慈禧对珍妃实施毒辣手段，乃至后来处死珍妃，给光绪造成了无法言表的精神刺激。

慈禧还同时对朝臣继续痛下杀手。自10月4日起，将李端、陈宝箴、陈三立、江标、熊希龄、王锡蕃、李岳瑞、张元济、王照、文廷式等人革职，“永不叙用”。后又陆续革职几十人。

除六君子之外，这些维新志士，在今人心中，恐怕已经“身名俱沉”。为追思改革百年之悲，特对部分革职者做一简介。

李端（1833～1907），贵阳人，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光绪于9月4日罢免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大臣，5日任命李端为新的礼部尚书。李端1896年曾上《请推广学校折》，首次倡议设立京师大学堂（即今北大）。李端还将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并向光绪推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革职发配新疆两年后赦还，回贵阳办学。

陈宝箴（1831～1900），江西修水人。1895年任湖南巡抚（湖南第一把手），与按察使（负责法律、监察的副省级官员）黄遵宪、学政江标在湖南力行新政，办时务学堂，引进梁启超、谭嗣同讲学，是清末地方大员中力主变法的风云人物。革职后回老家隐居。1900年，慈禧下旨令陈宝箴自杀。

陈三立（1853～1937），陈宝箴之子，著名诗人，吏部（相当于中央组织部）主事。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协助父亲在湖南推行新政，革职后陪父亲隐居。后与人合办铁路公司。1911年时反对武昌起义。以后日趋保守。1928年，徐悲鸿为陈三立画像。其子陈寅恪、陈衡恪分别为著名史学家、画家。

熊希龄（1870～1937），湖南凤凰县人，翰林院庶吉士（皇帝顾问机构的中低级官员），协助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任时务学堂总理。民国成立后进入政界，历任财政总长、国务总理。后辞职专心于社会事业，创办香山慈幼院并投身抗日救亡。毛泽东说：“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周恩来说：“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第一流人才。”

张元济（1867～1959），原籍浙江海盐，出生于广东，总理衙门章京。被光绪破格召见，陈述意见。张元济曾建议设“议政局”总揽大权进行政治改革。革职后下海主持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出版业奠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曾接见张元济，询问当年光绪召见的情景。

王照（1859～1933），天津人，礼部主事。上书请求光绪访问日本，了解明治维新成功之道，被怀塔布阻挠。光绪怒罢怀塔布等六大臣，赏王照三品顶戴，导致斗争白热化，王照陷入漩涡中心。政变之后，王照逃往日本。他在日本受日文假名启发，研究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回国，推广汉语拼音。

黄遵宪（1848～1905），广东梅州人。黄遵宪自30岁至47岁，先后担任驻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外交官，写出名著《日本国志》和

《日本杂事诗》。1896年，在上海参与组织强学会，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同年被光绪任命为湖南按察使，与陈宝箴等协力新政，使湖南风气大变，被保守势力嫉恨。1898年7月被任命为驻日本公使。他从湖南启程到上海，见京师形势不妙，滞留上海不肯进京。10月8日，清廷密电两江总督（总管江西、江苏、安徽三省军民政务的大员。清初江苏和安徽同属江南省，因称两江总督）刘坤一，将黄遵宪秘密看管。黄遵宪被软禁，中外震动，日本展开救援，保住了他的性命。

以上两波，均为人事方面的报复。除人事之外，还展开了政策面的清算，是为第三波。

自政变之日起，一个月左右，慈禧把光绪裁撤的机构一一恢复，查封了《时务报》，取消官民上书权，把被撤职的官员一概复职，又撤销农工商总局，科举考试也恢复旧制采用八股文。总之，一一复辟，只有京师大学堂保留了下来。

慈禧特别痛恨自由的新闻界。10月9日，清廷发布上谕说：

前经降旨将官报、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著各该督抚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由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人心。

由此可见慈禧的倒行逆施。慈禧万万没想到的是，两年多之后，由于一系列内忧外患的逼迫，她竟然自掌嘴巴，不得不重新走上戊戌变法的道路，企图挽救大清。但是，由于一再错过良机，终于导致大清覆灭。

慈禧为何没有废掉光绪

清史学家萧一山说，慈禧发动政变当天，大骂光绪，并赐光绪毒酒，让光绪自杀。亏得在场的一些王公大臣长跪不起，请求慈禧息怒。慈禧才勉强答应把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日后算账。

既然慈禧如此仇恨光绪，为什么没有废掉光绪的帝位呢？

一个原因来自内部。据晚清《国闻备乘》等载，慈禧再度走到执政前台之后，的确想废掉光绪。政变第五天（9月25日），慈禧就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散布光绪病重消息。同时，慈禧还不断找人谈话，说要为同治皇帝立嗣，即立继承人。

同治是咸丰与慈禧所生的儿子，19岁去世，没有子女。光绪是同治的堂弟，在光绪继承皇位之际，先履行一个手续，即把光绪过继给早已去世的咸丰为子，再继皇帝位，这也可以说是为咸丰立了一次嗣。现在慈禧又宣称要给同治立嗣了。可当初给咸丰立嗣，是因同治皇帝去世了。眼下年轻的光绪活着并且还是皇帝，立什么嗣呢？

慈禧释放的信息就是要废掉光绪。假如选一个人过继给早已去世的同治为子，那么新人当了皇帝继承的江山并非来自光绪，而是直接继承同治。

这点花招，大家心领神会。立即有几个马屁精上书，请求赶快办这个事（“速行废立”）。

然而，发动政变的重臣、慈禧最为倚重的心腹荣禄不同意废掉光绪。

话说开来，时代毕竟不同于秦皇汉武了。当时国内林立的报刊，绝大部分支持维新，反对慈禧。光绪在百日维新时期的7月26日和8月9日曾发布上谕，要求报纸报道和发表言论，不用考虑朝廷的意见，“不必意存忌讳”，还鼓励报纸要勇敢揭露时弊，“不必拘牵忌讳”，得到全国报人热烈欢呼。朝廷斗争每天见诸报端，令慈禧及保守派十分恼怒。

慈禧政变之后，全国新闻界群起反抗。报人被迫转入租界或把报纸冠以外资名头，继续办报，揭露慈禧倒行逆施。比如天津《国闻报》自政变第六天（9月27日）起，连续跟踪报道谭嗣同拒绝出国、被捕及被杀的消息，及时悼念维新志士。有英国背景的上海《新闻报》10月19日刊出逃到香港的康有为来信，揭露慈禧迫害光绪内幕，迭经传抄转载，引起全国轰动，民心完全倒向光绪。清廷大员向英国人交涉，要求关闭

《新闻报》，被英国人拒绝。另一家在上海发行的日本背景的《亚东时报》于11月15日以大号字刊出专版，哀悼被杀的维新人物，批评慈禧，还发表了刚刚逃走的梁启超从日本寄来的长诗《去国行》。新闻界这些抗争，也是戊戌变法的启蒙成果。后来不久，四川民众抗议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家家都供起了光绪牌位以抵制慈禧，说明当时民心所向。

荣禄身处这样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中，产生了顾虑，不愿意在天下人面前背负废掉光绪的恶名。他向慈禧提出建议说，朝廷全靠各地支持才能运作，不妨私下征求各地大员的意见，看看再说。慈禧同意，遂以荣禄名义密电各地负责人，说是太后将拜谒太庙，为光绪择后，询问各地意见。话虽很隐讳，但各地大员心知肚明，意识到这是慈禧要废光绪。

此时一位重要的封疆大吏，两江总督刘坤一站出来不同意废掉光绪。刘坤一约湖广总督（总管湖北、湖南两省军民政务的大员，因明朝时湖北、湖南两省同属湖广省，故名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署名上奏，回复荣禄。张之洞签名之后又害怕了，追回奏折删去自己名字。刘坤一不怕，挺身独上奏折，说不论是为国为公，都不能废黜光绪。

老谋深算的荣禄拿到刘坤一回复，先没声张，他要再搞一点筹码。他知道慈禧信算命，就派人到慈禧笃信的前门关帝庙抽签，又派人到地安门一个叫赵瞎子的算命先生那里求卦。慈禧也经常派人到赵瞎子那里占卜吉凶。过了些天，慈禧问各地反应如何，荣禄先把签和卦拿出来给慈禧。签和卦的大意都是不可妄动，一动不如一静。慈禧不说话了。又过两天，荣禄把刘坤一的回复呈上。慈禧一看，当然明白这也是荣禄的意思，就把这件事暂时放下了，反正光绪羁押在瀛台，掀不起什么浪来。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不愿意废掉光绪的亲王也发挥了作用，拖延了慈禧的企图。

第二个原因来自外部。百日维新期间，西方各国都支持光绪。慈禧发动政变，各国以各种方式表示反对，弄得慈禧惴惴不安。

政变第四天（9月24日），各国驻华使馆听说改革派大臣张荫桓被捕，立即展开营救。当天晚上，英国使馆官员和日本驻华公使就到李鸿章寓所，就此事向李施加压力，希望从宽发落。第二天下达的上谕就暂时留住了张荫桓的生命，指示刑部“暂行看管，听后谕旨”。

在援救张荫桓的同时，日本政府对梁启超也施以援手。政变当天（9月21日），梁启超跑到日本使馆，在使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陪同梁启超乘火车前往天津。从25日到26日，郑永昌等人与前来搜捕维新党人的清军苦苦周旋，想办法将梁启超送到停在塘沽的日本军舰“大岛”号上，梁启超得以脱身，前往日本。

康有为于9月20日逃出北京抵天津，乘船往上海。清军警密布吴淞口码头，“逐船搜查必获”。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见状，提前在海上拦住“重庆”号轮船，找到康有为，将其转移到英国军舰“埃斯克”号上，康有为遂换乘英国轮船往香港，不久后前往日本。

10月9日，清廷在上海软禁黄遵宪。10日，日本驻华使馆就向总理衙门递交正式照会，对黄遵宪的命运表示深切关注。此时，倾向改革的刘坤一也向总理衙门报告说，黄遵宪被软禁后，在上海的英国人和日本人纷纷声言：“朝事若不公，必当干预。”清廷最恐惧的就是列强干预，于是让步，撤销软禁，只将黄遵宪革职，让他回家休息。

至于光绪本人，更是西方关注的主要目标，各国尽力阻止慈禧废掉光绪的企图。

政变发生之后，京城纷纷传说光绪已经被害，而各国使节又见不到光绪本人。10月6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奉本国政府指示，前往总理衙门，询问光绪是否平安。此时的北京，正巧刚发生一次偶然冲突，部分外国人在冲突中受伤，俄、德、英三国士兵以此为借口，准备进驻北京。清廷非常恐惧各国行动，于是答复林权助说，关于光绪被杀或自杀的消息纯属谣传。林权助提出要求，希望慈禧温和处理事件。

10月7日，三国士兵进入北京，清廷格外谨慎起来。英、法、德三国驻华官员纷纷向总理衙门表示关心光绪的身体健康。15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提出，找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总理衙门被迫同意。18日，法国驻华使馆医生前往中南海为光绪看病。毫无疑问，这是慈禧本人迫于压力亲自批准的，目的是安抚各国公使。

10月22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结束休假到京。24日，他与总理衙门会谈时提出要求会见光绪，并代表日本天皇向光绪授勋。当然，这只是个借口，目的是充分表达对光绪的支持。结果，慈禧被迫于11月5日和光绪一道，在中南海仪鸾殿会见了矢野文雄，互赠了珍贵的礼物，光绪也接受了勋章。这是在戊戌政变之后，光绪第一次正式接见外国公使，慈禧废掉光绪的如意算盘遇到重大阻碍。在此之后，由西班牙驻华公使带头，各国又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将董福成率领的清军主力部队撤出河北，清廷被迫答应了各国要求，这对慈禧也十分不利。

但是慈禧心头之恨未解。过了一年，1899年12月，她不顾各方反对，悍然用光绪名义发布诏书，立了保守派贵族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为“大阿哥”，即同治的嗣子，准备时机成熟再行废立。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坚决抵制。由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牵头，章太炎、蔡元培、唐才常等1200多人联合签名，打电报给总理衙门说，社会各界迫切希望仍然由

光绪“力疾临御”，即坚守皇帝岗位，否则，“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弄得慈禧又怕又恨。

光绪自学政治学博士？

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北京再次被列强军队占领，慈禧狼狈出逃，《辛丑条约》签订，大清覆灭在即，她才痛切感到，不学习西方就无法救亡图存，而戊戌变法之后采取的倒退措施，则导致了大灾难。

在西方压力下，走投无路的慈禧处死、罢黜了一批保守派大员。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出逃途中，以光绪名义颁布诏书，准备变法。她要求官员参考中西政治，提出变法建议。

1901年10月，慈禧从西安回北京途中，颁旨废除了载漪之子的“大阿哥”名号。到达北京第二天，下旨追升珍妃为贵妃（珍妃是她一年前仓皇逃跑时命太监推到井里处死的）。这些举动，意在缓解与光绪的关系。但是，光绪仍然继续处于囚禁之中，没有人身自由。慈禧把统治大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不容光绪半点染指。

此后慈禧亲自推动宪政，形势一下子扭转过来，人人“咸与维新”，生怕别人说自己是保守的了。凡是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的新政，慈禧都依样画葫芦推行，甚至于更为激进。她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并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空前突破。

然而，囚禁中的光绪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善。这是因为，慈禧非常担心自己死在光绪前面，所以对光绪的迫害并未停止。迭遭惨重打击的光绪，在珍妃被处死之后，精神已经接近崩溃了。太监们甚至怀疑光绪有精神失常的征象——他经常陷入深度忧郁状态。光绪过去是急脾气的人，现在像个木头人一样，不说也不动。太监给光绪剃完头，请示按摩不？光绪照例摇摇头。下属向他行礼时，他连眼皮也不抬，怔怔地想心事。太监们伺候完了，都赶紧离开。

当时在京的美国传教士何德兰有机会进宫。何德兰的妻子说：“我们每次在宫里时，皇上都陪着太后，不是在她身边，而是落后几步。她坐下后，他总是离开几步在后面站着，除非她叫他坐下，否则从不敢坐。他面容清秀而高雅，穿着深色的长衫。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与阿谀奉承的太监、聪明伶俐的妃子和珠光宝气的太后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没有一个大臣在他面前磕着头压低声音颤颤抖抖地说话，惯于奉承讨好的太监到他面前也从不跪下。”“我第一次见过光绪皇帝之后，他那双可怜而深沉的大眼睛在我面前有好几天久久不去。”（《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中华书局，2004年）

不久前，学者叶晓青在中国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两份光绪在1908年初的读书单。别小看了这两份读书单。这几页薄薄的纸张，相隔百年，为我们架设了一座通往光绪灵魂的桥梁，使我们从中得以窥见，一个处于超重压力之下的艰难的生命，一个正在走向人生终点的38岁的改革者，一个被迫害得几乎失常的忧郁症患者，他的内心深处究竟最关注什么。

第一份是1908年1月29日，光绪朱批点名索要的购书单，由内务府办理，共40种。

其中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治一般》、《孟德斯鸠法意》、《政治讲义》、《法学通论》、《政治学》、《民法原论》、《宪法论》、《行政法泛论》、《日本警察讲义录》、《日本监狱法详解》、《万国国力比较》、《列国政治异同考》、《欧洲最近政治史》、《欧洲财政史》、《经济通论》、《日俄战纪》、《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英国宪法论》、《欧美政教起源》、《最新战法学》、《万国舆图》、《理财新义》、《国债论》、《政治泛论》、《日本预备立宪》等，有政治官报局出版的《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统计释例》、《日本宪政略论》等。

第二份是3月1日开出的。早先，光绪阅读《政治一般》这本书时，发现此书的目录与内容不符，于是亲自抄出该书所有目录，要求内务府查询这个目录标示的内容到底出自何书。光绪抄下的这份目录很长，这里不再照录，总之是几乎包括了世界各主要国家自古以来全部历史。如第一编古代史就有“幼法拉的河边诸国之兴亡、希腊国民概论、希腊人移住斯巴达勃兴”等诸多内容，一直到第三编近代史的“三十年战争、英吉利之革命、欧洲人之文明及其殖民事业”等。另外，光绪还索要《万国史纲》、《帝国主义》、《高等学堂中国史》、《西洋历史教科书》、《欧洲新政史》下册、《英华大字典》、《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华英进阶全集》、《和文汉译读本》。

按照这两份书单，内务府尽力将能够搜求到的书都进呈了。关于《政治一般》这本书的问题，商务印书馆答复说付印时搞错了，“系西洋历史目录误订在《政治一般》书内”。

1908年的商务印书馆，正由当初“革职永不叙用”的张元济主持。光绪是否知道，他需要的这些书，正是百日维新时他接见过的张元济主持出版的呢？历史开了个玩笑。张元济1949年回忆说，他在担任总理衙门章京的时候，光绪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那个时候这件事就由他来办理，“由我取来送进去”。两位改革失意者，都没有忘记启蒙的使命。

《政治一般》这本书，光绪不但看过，还一字不漏地抄下了误订的目录，千方百计搜寻来读。这不但说明光绪做学问十分认真，而且也说明，在政治生命和生理生命都接近完结的时候，光绪的政治抱负仍然没有泯灭。他仍然心存一丝幻想，那就是有朝一日运用自己的现代政治学识，为这个落后的古国鞠躬尽瘁。因此，从这个书单上，我们读出了一个爱国者的灵魂。

光绪的学习内容，比起今天申请考试政治学博士的课程如何？恐怕要大大超过了。

与此同时，光绪还努力学习英文。据《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载，光绪每天学习英文至少一小时。“皇上天资颖悟，忆力绝强，故进步急速，惟发音不甚清晰耳。诵习未久，即能读普通教科书中之短篇故事，且能默书，亦无差误。皇上之英文书法，异常秀丽，临摹古体与装饰品用之英字，尤称佳妙。”慈禧听说，也想凑热闹学学英文，刚学了两课，就学不下去了，此后也决不谈及此事。

能够如此广泛地搜集和研究西方政治学著作，奋力学习和钻研英文，在清朝统治者当中仅此一例。看看光绪这份书单和他每天下功夫“啃”英文，无疑大大拉近了我们和这位年轻皇帝之间的精神距离。

“希望之星陨落”

然而，天不假年。1908年11月14日，正当立宪运动的关键时刻，光绪撒手人寰，绝尘而去。第二天，慈禧去世。

38岁的光绪为何恰好在74岁的慈禧去世前一天病逝？传闻甚多，至今仍是一个谜。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1898年，谭嗣同在湖南担任南学会会长的时候，有一位来自湖南岳麓书院的年轻学生参加了南学会，谭嗣同曾与这位学生谈话。这个学生就是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后来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教师和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在他的《达化斋日记》中记录了谭嗣同与他的谈话。年轻的毛泽东对谭嗣同也十分钦佩。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曾详读《伦理学原理》，他为该书所写的批语中，即有类似谭嗣同的《仁学》所使用的哲学语言。

正如戊戌变法百年纪念碑碑文所说：“戊戌变法实开中国近代改革之先河，冲击封建桎梏，刷新风气，启示后人，功不可没。”

有关这次变法的讨论和争议，从清末至今持续不衰。

章太炎分析戊戌变法时说，就慈禧和顽固派贵族的立场来看，绝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到汉族人手中。变法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好处，但却不利于大清贵族独家统治。因此，无论变法给中国带来多大好处，都不能为此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代价。“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

余英时说，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需乞援于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政治改革？他只是清朝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分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戊戌变法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喜剧色彩的悲剧。

更多的史学家则认为，光绪沉不住气，缺乏政治经验。年龄优势在他这一边，最佳选择是暂时隐瞒真实意图，在慈禧允许范围内小改小革，等慈禧去世，再行大计。

台湾学者张灏说，戊戌变法是中国传统政治秩序解体的起点，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开端，也是近现代政治史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内地有些学者从“革命与改良是对立的”这

种判断出发，批评戊戌变法是“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表现了改良主义的软弱性”等等。这种贬低戊戌变法的倾向，在1967年3月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达到高峰。戚本禹这篇文章矛头是对着刘少奇来的，但话题则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电影《清宫秘史》说起。《清宫秘史》描写了戊戌变法和光绪的命运，戚文不分青红皂白给这部电影扣上“卖国主义”的大帽子，致使社会上对戊戌变法的评价降到了最低点。

随着史学界逐渐告别极“左”思潮，对戊戌变法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余英时在1998年撰文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世界趋势：“最近20年来，‘革命’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退潮，渐进的‘改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戊戌变法的重大意义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首肯。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孔祥吉称光绪是当时中国的“希望之星”。他在1991年发表的《光绪帝载》一文中说，1908年11月14日光绪病逝，“紫禁城上空的一颗希望之星陨落了”。文章引用了一家英国报纸1908年11月15日对光绪的高度评价：“如果这位已故皇帝所推行的改革获得成功，中国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的确，尽管光绪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他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探索现代化改革的一位伟大的先行者。他的一生波澜，至今仍然给予中国人诸多启示。

中国首次宪政始末记

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

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

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

天语煌煌，奠我家邦，强哉我种黄。

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

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四千年旧历史开幕。

英雄数巨子之东之西，劳瘁不辞，终将病国医。

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

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

搜人才，备顾问，一时大陆风云奋。

勖哉诸君，振刷精神，铸我中国魂。

辛苦十年磨一剑，得此大纪念。

圣明天子居九重，忽然呼吸通。

古维扬，新学界，侧闻立宪同罗拜。

听我此歌，毋再蹉跎，前途幸福多。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仿行立宪，这可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未有过的大事，自然举国同庆。这首歌词，就是扬州学子当月赶写的《欢迎立宪歌》。当然，热心的不只扬州。据上海《申报》1906年10月2日报道说：“凡通都大邑，僻壤遐衢，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

保定教育界开会时，师生同呼：“立宪万岁！”高唱当地文化人谱写的《庆贺立宪歌》两遍。最热烈的要数上海，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高悬龙旗庆贺。9月16日，上海各界千余人联合召开庆贺会，马相伯、郑孝胥作讲演，欢声雷动，会后演出名剧。11月25日，北京各学堂师生万余人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庆贺立宪典礼。

由于宣布实行立宪，连大家历来反感的慈禧，也获得了原谅。11月25日（农历十月十日）是慈禧71岁生日，以往人们根本不搭理，今年不一样了。《京话实报》1906年第53号报道说：“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

喜欢欢的庆贺大典。”

艰难起步

其实，立宪的要求早就提出来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是早期铺垫，这些著作都颂扬了英国的议会和选举制度。

第一个正式要求实行议会制度的是《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他在1884年上书清廷："请开国会"。同年10月，两广（广东、广西）总督（最高军政长官）张树声在遗折中奏请开设议院。这以后，王韬、汤寿潜、陈炽等人也提出同样的主张。不过，他们没有提出制定宪法。

所谓君主立宪，是指西方国家的君主权力受到宪法制约，不能拍脑瓜乱来。这里的关键是制定宪法，仅有国会而没宪法，君主仍然可以把国会灭了。

还有，早期提出开国会的志士仁人，没有把国会视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只是把议会当作一个咨询机构。这些人是从"上下相通、集思广益"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对议会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1895年，郑观应进了一步，他明确提出"开国会、定宪法"。

据康有为自述，他提出立宪始于1897年。康有为经常说大话，但这个说法大体可信。他在1898年1月写成《上清帝第五书》进呈光绪，其中说："自此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在给光绪的《日本变政考》中还说，三权分立是最好的国体："泰西之强，在其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

当时，康有为把中国的事情想得简单了，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若诏旨一下，天下雷动，士气奋跃，海内耸望……如是则庶政尽举，民心知戴。"中国政治改革的事情这么复杂，怎可能光绪一声令下，立马"换新天"？

结果，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残酷迫害维新人士，废除新法，全面复旧，立宪的提议更是胎死腹中，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逃往日本。

1899年，当怒不可遏的慈禧企图废掉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为皇帝时，经元善、章太炎、唐才常等1000多人联名在上海发电报给清廷，支持光绪顶住慈禧，坚决不退位，把慈禧气得七窍生烟。

西方列强也出面反对说，"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一些西方国家驻京公使还说："以后不认中国有新皇帝。"慈禧、载漪恨不能把外国

人立刻斩尽杀绝，但又毫无办法，只得暂时留住光绪，让载漪之子屈居为“大阿哥”（皇储），伺机而动。

1900年，义和团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但又盲目排外。载漪等人以为机会来了，利用义和团搜捕康、梁等戊戌变法人士，进一步煽动排外。当时义和团就喊出了“康有为、梁启超回国谢罪”的口号。载漪还伪造了一份洋人照会，照会中要求慈禧把政权还给光绪。慈禧看了勃然大怒，孤注一掷，于6月19日下令向各国“宣战”，限各国公使24小时离京。八国联军于8月15日攻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急忙向西安方向逃跑。她的虚骄之气丧失殆尽，其狼狈之态，比1860年她随咸丰逃往热河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急令李鸿章及庆亲王奕与列强议和，讨论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后来签订的《辛丑条约》。

这就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以及利用义和团的后果，她脸面丢尽，无法向国人交代，也无词以对光绪，为了笼络人心，慈禧不得不接过维新的旗帜。

19世纪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开张。1901年1月29日，在仓皇出逃途中，慈禧以光绪名义颁布诏书说，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度。她命令高级官员参考中西政治，提出改革建议。4月，清廷成立政务处，审查各大臣的建议，草拟改革章程。10月2日，慈禧特颁懿旨，向世人表明“变法自强”的决心。11月7日，再降懿旨，废除载漪之子的“大阿哥”名号。1902年初，慈禧回京，宣布与光绪同时听政。

慈禧痛斥载漪等顽固派误国，顽固派或自杀或被杀或被监禁，势力大减，“人人欲避顽固之名”，再也无人敢声言“坚持祖宗成法”了。

1901年6月，驻日大使李盛铎遵旨上书说：“查各国变法，无不首重宪纲，以为立国基础。惟国体、政体有所谓君主、民主之分，但其变迁沿改，百折千回，必归依于立宪而后底定。”应“近鉴日本之勃兴，远惩俄国之扰乱，毅然决然，首先颁布立宪之意，明定国是”。翰林院编修（皇帝顾问）赵炳麟、两广总督陶模也先后上书请求起草宪法，设立议院。由于这些建议冲击了朝政根本，未被慈禧采纳。

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提出的一些技术性建议，比如把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增设商部，设立商会，裁撤一些臃肿机构如詹事府，裁减绿营，停止捐钱买官，设立铁路公司，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办理巡警，各府州县设大中小学堂，选派留学生等等，倒是符合慈禧意图。这些建议于1901年到1904年先后推行实施，被称为“新政”。

其实这些办法是洋务派和维新派早就提出或是推行的，“新政”并不

新。尽管如此，比起戊戌政变之后的倒行逆施，还是缓慢进步了。

更重要的是，此时，君主立宪的提法，在社会舆论和高级官员当中可以公开讨论，而不至于被视为“罪大恶极”了，这是一个重要突破。

康有为、梁启超和英敛之

逃到海外的康有为不改初衷，坚持君主立宪。他仆仆奔走于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向外国人和华侨说，光绪是一位通晓大义的明君。在康的鼓动下，1899年7月20日，“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亦称“保皇会”，在加拿大成立，宗旨是力挺光绪，逼迫慈禧归政光绪，实行立宪。

义和团运动期间，康有为指挥唐才常在湖南、湖北、安徽组织自立军发动武装起义“勤王”（保卫光绪），事泄失败，唐才常等人于1900年8月在武汉被张之洞逮捕处死。康有为从此“不复再言兵事矣”。

宣传君主立宪的功劳首推梁启超。梁启超确实是个深入浅出的大家，几句话就把复杂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1901年6月7日，他在《清议报》发表《立宪法议》。文章说：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种政体，“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

他说，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是由各国不同的文化历史情况形成的，但都是民众当家做主。宪法“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君主、官员、人民必须“共守”。三种政体相比，君主立宪最理想。因为民主立宪斗争太激烈，而君主专制则是“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中国也要“归于立宪”，任何人都挡不住，若真有爱国之心，就应当早日实行君主立宪。

中国能不能马上实行立宪呢？梁启超说不行，“要等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他的建议是：一、颁布诏书宣布立宪；二、派大臣出国考察；三、起草宪法；四、公布宪法草稿，全民讨论；五、经过5年或10年，改定宪法；六、自下诏之日起，20年完成立宪。

梁启超还在日本主办了《新民丛报》，发表各种人撰写的立宪文章。

当时，立宪与革命尚未分家，君主立宪也是留学生救国方案之一。在日留学生办的《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杂志都支持立宪。“激进者求革命，温和者主立宪。”

在国内，站在鼓动立宪前端的，是满族人英敛之（英若诚之父、英达之祖）于1902年6月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英敛之得法国人帮助，放言无忌，《大公报》创刊没几天就要求慈禧归政。1903年8月18

日（农历六月二十八日）是光绪32岁生日，该报在头版刊出大字口号："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宪法早立，国祚绵长。"

其他如《中外日报》、《政艺丛报》等等，也几乎天天谈立宪，介绍各国君主立宪制度，要求起草宪法，召开国会。至于官民两界，更有不少人直接上书清廷要求立宪。

到1903年，君主立宪在国内已成主流思潮，在国内和海外华人当中勃然兴起。从此，主张君主立宪的被称为立宪派，取代了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

1903年6月，上海各界人士召开会议，康有为的门徒龙泽厚在会上提议："向清廷请愿立宪。"

潮流高涨

1904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在辽宁发生武装冲突。2月10日，双方宣战。

毫无疑义，这是一场罪恶的战争，腐败无能的清廷毫无办法，只好袖手旁观，并宣布无论谁胜，东三省仍为中国所有。

但是，围绕这场战争，中国国内却起了一场化学反应，促进了立宪运动走向高涨。

对于日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厮杀，立宪派无不感到耻辱和愤怒。但同时，由于日本是黄种人的立宪小国，俄国是白种人的专制大国，所以中国士大夫的心理又围绕这场战争发生了微妙变化。

日俄宣战第三天，《中外日报》就发表文章说：过去，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言论已经深入人心，这场战争如果日本胜利，或许将提供新的“公例”，即“国家强弱之分，不由种而由于制”。意思是说，黄种人只要制度好，也能胜过白种人。

战争的进行，刺激了国内关于是否实行立宪的大争论。

守旧派说：俄大日小，日必败。

立宪派说：日本虽小，但实行立宪之后“蓬蓬勃勃”，“俄国虽大，而腐败之气与我国相等”，“俄乃专制国”，“俄必败”。

守旧派又说：日本把权力下放给民众，兵临战场，“必各顾其命”；而俄国权操在上，令出必行，俄胜日败可以立决。

立宪派说：民权乃天赋之权，“故立宪国民每至战阵，各以保守天权为务，生死不计也！”“岂彼专制之国专以军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而语耶？”

百年前我国立宪派人士的率真、执著，实为可爱。

按照今天某些“愤青”的看法，希望日本人获胜，岂不是百分之百的汉奸吗？非也。应该说，立宪派期望日本胜利，并不是出于对这场战争的支持，而是企图以此打破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论调，证明立宪胜于专制的世界“公例”，促进立宪，抵御外辱。

立宪派担心，一旦俄国胜利，清政府将会更加相信专制的威力，拒绝政治改革，而民众也就会更加失落。实际上，清廷暗中已经准备俄国胜利之后实行亲俄路线，向俄国做出更大让步。

5月初，俄国太平洋舰队在旅顺受到重创，俄舰7艘沉没。俄国陆军的鸭绿江防线也被日军突破。

5月5日，立宪派在《中外日报》发表文章说：“若中国，则黄种之专制国矣。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

8月，日俄两军在辽阳决战10天，俄军大败。

12月，日军包围旅顺，俄军投降，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沙皇尼古拉哪里甘心？先后命令俄西部的波罗的海舰队组成第二和第三太平洋舰队，驶往东亚，支援俄军。

1905年1月，日俄两军又在沈阳决战20天，俄军大败。

4月，俄国第二、第三太平洋舰队在越南海面会合北上，在对马海峡被日本海军截击。俄舰共38艘，21艘被击沉，7艘被日军俘获，仅10艘逃往海参崴。俄军大败，中国大震。

《东方杂志》立即做出反应。该杂志的临时增刊发表《立宪纪闻》一文说：“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俄国人民乃群起而为立宪之争，吾国士夫亦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

日俄战争正在进行，英军就于1904年7月侵占西藏江孜，8月攻占拉萨，强迫西藏当局签订《拉萨条约》，清政府不予承认。8月，德国军舰驶入鄱阳湖，提出无理要求。9月，美国索取榆林、延安两地采矿权。法国则要求取得上海至绍兴的内河航行权。1905年，俄国在对日作战的同时，还出兵侵犯新疆的伊犁等地。

面对列强瓜分，出路何在？立宪派说，欲救中国，只有改为立宪政体。立宪之后，中国将会像日本那样日渐强盛起来，自然能够抵御外患。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不是也被迫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吗？

这一年，中国周遭立宪呼声此起彼伏。在西面，阿富汗知识分子发起了君主立宪的“少年阿富汗运动”。在北面，俄国彼得堡立宪声势高涨，神父和工人向沙皇请愿，要求立宪，在冬宫广场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死500人，各地民众大规模上街抗议。沙皇尼古拉无奈之下，发表“十月宣言”，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批准成立国会。在南面，印度民众发起全国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无疑，这样的大气候，助长了中国的立宪声势。

除了外患之外，清廷另一个“心腹大患”也日渐突起。1905年9月，孙中山到日本，把兴中会和华兴会及其他多个组织合并为中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副总理，创办《民报》，大张旗鼓鼓吹革命。

什么是革命？反清志士陶成章在1904年撰写的《新中国军政府檄文》说：“革命就是造反。”

同盟会誓约即为16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成立之后，到武昌起义之前，共组织了11次武装起义，虽然均遭失败，但给清政府造成了很大威胁。

立宪派说，革命动机可以理解，但是暴力革命一起，将大乱数十年，毁灭无数财产，伤亡无数性命，现在立宪时机已然成熟，不如大家一齐努力，逼迫清廷实行立宪。

怎样消除革命呢？立宪派对朝廷说，只有尽快开设议院，让人民参政，革命的劲头自然弱下去了。

1906年，慈禧在召对中曾经问张之洞，如何平息排满革命，张之洞说：“只须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

在外患和革命两大压力之下，立宪成了救国的不二法门。《东方杂志》1905年第11期有一篇文章说：“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立宪派与革命派激辩

正当国内立宪风潮不断高涨之际，以海外华人媒体为主，却掀起了一场立宪还是革命的激辩。

从1902年起，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就发生了。

1905年，革命派创办《民报》，使这个争论更如烈火烹油一般，哔哔剥剥轰天爆响。

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革命派的《民报》两军对垒，双方大将出场，一直战到1907年才接近尾声。

这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火花迸射的精彩篇章。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传统意识形态妖魔化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给他们扣上了"散布对封建统治者的幻想"、"麻痹群众斗志"、"污蔑革命暴力"、"反对革命"的大帽子，致使立宪派长期不得抬头，今天是洗雪这些恶名的时候了。

辩论是从康有为1902年春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始的，此文题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革命派猛烈反击，最著名的是章太炎于1903年5月撰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上海《苏报》6月29日发表此文，第二天，章太炎被捕。再过一天，因撰写《革命军》得罪清廷的邹容自投监狱，与章太炎共患难，著名的《苏报》案发生。

大辩论的焦点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是民族问题，即要不要排满。

康有为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满洲、蒙古，皆吾同种"，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因此不应把排满作为政治运动的首要任务。问题在于专制，而不在于民族界限，通过立宪解决了专制问题，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问题自然可以解决。

立宪派追溯历史说，满族的祖先是肃慎人，是大禹的后人。周武王灭商之后，肃慎就来祝贺，献上特制的箭。周武王以礼相待，把箭分给异姓诸侯。西周、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人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后来自汉至隋，肃慎改了三次名，仍然遣使入贡。唐朝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派人担任长史。元朝和明朝也在黑龙江设立行政和军事机构。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最近之非革命论》等多篇文章说，满洲人在入关前为中国之臣民。明朝末年，满族军队利用关内的混乱“谋篡夺而获成功”，不能说是灭亡了中国。革命派掀起排满运动，“力言种族革命”，专以满洲为敌，是走上岔路，妨碍了政治改革。

康有为说：“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他还举出许多例子，如“军机除荣禄外，王文韶、鹿传霖、瞿鸿三相，皆汉人也”。说明清廷正在改变歧视汉人的政策。

他还说：“君而无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实推其意，不过为起兵动众借口耳！”“试观数年以来，推翻新政，禁报馆，捕党人，停学堂，止译书，其暴横之举，与前百年欧洲诸国之压制其民相等。今不二三年，已废八股、弓刀、漕运，开学堂，译西书，派游学，满汉通婚矣。风潮所卷，正反相承，其后不能复止。皇上（光绪）而能复辟，故能维新自强，已与民权。”（《答南北美洲诸华商书》）

总之，立宪派不同意以满族为打击目标，主张不分满汉，全力以赴推进君主立宪。

革命派方面，则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坚持首先排满，恢复汉人天下。

章太炎说，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

章太炎说，由于满人夺得政权之后歧视和欺凌汉人，所以“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而不是只恨满族贵族统治者。他说，康有为和满族人“甘与同壤”，真是毫无人心。

章太炎说，即使像支持变法的载（光绪）这样的人，也是“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猪）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在这场辩论中，高擎民族主义大旗，声泪俱下讨伐异族的先锋，是你可能想不到的一个人物——汪精卫。

22岁的汪精卫时在日本，自《民报》于1905年创刊起，他就在该报发表《民族的国民》、《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等系列文章，力驳“满汉同化论”，痛斥立宪派，态度激烈之极。

一向好冲动的汪精卫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民族的国民》

说："满洲与我，族类不同……真若风马牛之不相及……彼以犬羊贱种，入据九鼎……对于我民族，则实为亡国灭种之寇仇，誓当枕戈泣血，以求一洗。""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地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地也，民族主义之目的地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地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乃国民梦之不觉，日言排满，一闻满政府欲立宪，则崭然喜，是以政治思想扣灭种族思想也。岂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偿，而徒以种族供人鱼肉耶？呜呼，种此祸者谁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之妖言惑众也！"

汪精卫甚至在该文中提出了"一族一国"的彻底驱除异族的政治主张，他说："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

正如学者袁伟时所说，《民报》的基调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重要区别，是《民报》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用《民报》另一重要理论家朱执信的话来说就是："夫满洲人之非我国人也，吾辈已熟论之。"孙中山也在1897年公开声明说："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占据着的。"

袁伟时说，这种情绪高涨的直接后果就是，革命派没有把公民的自由权利摆到应有的位置，而启蒙运动的根本诉求恰恰是人的觉醒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从这一点来看，立宪派倒是克制了情绪化的冲动，理性思考，贡献良多。其实，康有为和梁启超，多年来遭清廷通缉，有家不能回，怎能不痛恨清廷？

革命派以民族主义压倒了自由民主，压倒了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启蒙。

怪不得辛亥革命刚一成功，1912年2月15日，南京政府诸位要人得悉清帝颁布《退位诏》第三天，就爬上紫金山祭奠明太祖朱元璋，祭文中说：清帝"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推翻帝制，全赖明太祖朱元璋在上天保佑。

大辩论的第二个焦点是立宪与革命之争。

康有为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书》一文中说，统计欧洲16国，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其余十余国，都是通过立宪解决问题，"无有行革命者"。康有为说，法国搞大革命，动乱80年，死人数百万。那些搞革命起家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就变成皇帝和君主，重新大搞镇压，剥夺民主和自由。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万里地方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五千年国俗之旧"，一旦想通过暴力革命"直

入民主之世界”，那就如同台高三丈，没有台阶，而想一步登上去；河流宽广，不用舟船，而想一跃而过，那必然会掉到台下，堕入河中，导致新的专制。

他说，民主是最终境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分三步走：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虽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祸乱，必无成功，则亦可不必矣。”

“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中国而言，革命是个什么情况呢？康有为说，那就如同李自成打进北京，黄巢攻破长安，刘邦、项羽占据关中一样，“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加以枪炮之烈，非如古者刀矛也。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

另外，康有为担心，一旦革命风暴刮起来，中国极有可能陷入四分五裂。

1902年1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释革》一文。他说，日本明治维新，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明治以前为一天地，明治以后为一天地”，变化之大，犹如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变化。但维新之后，天皇在表面上仍然“安富尊荣，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立宪体制不是很好吗？

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长文《开明专制论》。梁先生当然认为非专制政体最好，但是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开明专制做起。开明专制，指一种温和的专制，即在专制条件下，把关注民生、照顾全体民众利益作为施政目标。梁启超认为，开明专制是实现君主立宪的预备。当然，和君主立宪相比，开明专制是一种倒退，表明了梁启超内心的犹豫和矛盾。

值得深思的是，梁启超在文章中提出，就中国国情来看，实行暴力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

康、梁一致认为，以中国国家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贫穷，风俗之保守，如果搞起暴力来，一定是多少年大动乱。收拾动乱之人，一定得有极大的本领和权术谋略，这样的人，为了掌控动乱政局，驾驭各方力量，也不得不实行专制。

梁启超说，如果闹起革命来，社会大众由于“社会险象层见叠出，民无宁岁，终不得不举其政治上之自由，更委诸一人之手”，结果还是专制。

康、梁给革命开出的公式就是：“革命—动乱—专制”。

康、梁给立宪开出的公式则是：“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

宪”。

如果发动暴力革命，表面上进行时间很短，实际上将倒退回长期专制。在这个过程中，将反复造成大动乱、大破坏、大牺牲。这是法国模式。

立宪所需时间较长，实际上却是不断进步向上，最终实现民主。没有大动乱，没有大破坏，也没有大牺牲。这是英国模式和日本模式。

所以，从长程来比较，立宪倒是能够较快地引导中国进入民主体制。

革命派当然不买账，汪精卫、朱执信、章太炎等群起而攻之。

革命派说，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要把时间耽误在过渡时期？不如进行一次大破坏，一步到位实行民主共和。革命派说，所谓过渡，就是“滞乎中流”，何不一下子登上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

孙中山还用火车打了个比方。他说，比如中国过去没有火车，近来才开始兴建。假如按照立宪派的渐进主张，中国应当先学习建造英美几十年以前的旧东西，然后渐渐更换新的东西，很长时间之后再建造新式火车，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总之，立宪派主张渐进改革，革命派主张暴力革命。当时有没有渐进改革的条件呢？有。连革命派汪精卫都说：“满政府欲立宪”。今天回顾起来，渐进改革无疑损失更小，更符合中国国情。

激辩结果，双方都声称自己获胜。

慈禧政治生涯的高峰

慈禧晚年立宪新政该如何评价？历来颇有争议。

长时间以来，颇有些著作指责立宪新政是个“骗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出版社出版）还说：“以慈禧为首的统治者是最腐朽、最保守、最反动的政治集团。他们敌视任何的进步与改良，拒绝一切可能的革新……就是这伙专制暴戾的统治者，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后，也扯起了推行‘新政’的破旗。此后10年间，‘预备立宪’成了清朝政府欺骗人民，抵制革命的一项重要的反动政策。”

字里行间洋溢大批判激情，但平心静气而论，这种上纲上线有失公允。慈禧固然作恶多端，她在1901年到1904年实行的“新政”，也没有越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范围，这是事实。但是从1905年开始启动的宪政步伐，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新局，为中国日后改革也提供了可资思考的借鉴，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有人说，这不过是慈禧受到挫折之后的无奈之举。但我们看看世界各国政治史的记载，受到挫折不思悔改，直至晚年硬撑到底的，真不知道有多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学者杨天石说，晚清新政比戊戌变法的突破要大得多，诚哉斯言。

到1905年8月，清朝8位总督中已经有5位上书奏请立宪，这5位总督顺应改革潮流，不怕做出头鸟，诚可嘉许。袁世凯见状，改变了反对立宪的立场，上书要求“考求各国宪法，变通实行”。军机大臣瞿鸿禨始终对立宪很感兴趣，成了立宪的促进派。

慈禧经过反复考虑，于1905年7月15日发布谕旨，决定派出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标志清政府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转变极其痛苦，然而又是巨大进步。从此，中国政治体制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拉开了序幕。

不幸的是，1905年9月24日，正当北京火车站冠盖纷纭欢声如潮，人们载歌载舞欢送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出国考察之际，突有革命党人吴樾引爆自杀式炸弹，施行袭击，死伤十余人，绍英受重伤，载泽受轻伤。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爆炸，反映出革命党人对其他反专制的力量非常不宽容。其实，革命党人汪精卫早就散布一种担心：如果立宪取

得成功，那么革命党夺取权力的希望就要落空，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破坏立宪。

爆炸并没有炸退清政府实行立宪的决心，由戴鸿慈、端方和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组成的新的考察团，于同年12月和1906年1月分两批成行，分别前往日、美、英、法、德等国，于1906年7月回国。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回国之后，他们呈递了请求立宪的密折，并编写出《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等书。

慈禧思考了载泽等人的密折，经过7次召见和一系列御前讨论之后，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又说“民智未开”，不能“操切从事”，需要从“官制入手……次第更新……以预备立宪之基础”。这话倒也没有什么错。百年后的今天，不是还有很多人认为民主的条件不够成熟吗？

用今天的话说，这道上谕确定了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

侯宜杰先生说得中肯：过去慈禧把君主立宪视为大逆不道，残酷镇压，如今的上谕却承认中国政治制度不行，宣布“仿行宪政”。这对一向虚骄守旧的清政府来说，如果没有诚意和决心，是决然办不到的。虽然这是被迫的，但公开承认这一点，则表明了执政者意识到，要想在全球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必须抛弃专制制度，向先进的民主制度学习。就此而论，这决不是仅仅为了欺骗人民蓄意玩弄的一场骗局。

上谕一颁布，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张灯结彩的庆祝局面，可谓深得人心。

9月4日《南方报》称赞这个上谕是“诚古今未有之盛举”。

9月16日《申报》说各界民众“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

9月18日《时报》刊载了马相伯的演说词。他说，我中国以四五千年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天昏地暗，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

从当时社会各界的反应来看，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是慈禧一生政治生涯的高峰，也是对戊戌变法的最大突破，在中国历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预备立宪的进程千头万绪，艰巨复杂，清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切实的

工作。仅举其荦荦大者，以供一览：

一是1905年11月设立考察政治馆，后于1907年改为宪政编查馆。该馆先后负责起草《结社集会律》（政治团体法）、《报律》（新闻法）等重要法律，颁布执行。准许国民政治结社，但对报刊禁忌较多。

二是1905年9月采纳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建议，决定从下一年废除科举，把青少年从四书五经当中解放出来。

三是制定《新刑律》、《新民律》、《民事刑事诉讼法》，用西方大陆法系取代了实行2000年的中华法系，宣布司法独立，不受官员羁绊，实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是下令奉天（辽宁）和直隶（河北、河南、山东一带）试点地方自治，这是预备立宪的重要一环。1909年、1910年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规定各地选举产生议事会的办法，实行民主政治。辛亥革命前，许多省以下单位自治机构已经成立过半，据袁伟时考证，有些省如浙江已经有90%的城镇乡建立了议事会，加上法律和司法体制改革，三权分立在各地粗具雏形。

五是改革官制，原则是三权分立，议院一时难以成立，先从司法、行政着手，传统的六部被内阁制取代，另设集贤院等安置裁减官员。

六是全面启动宪政教育，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教育章程订立规章，培养相关人才。大量翻译西方宪政书籍，对于立宪派利用媒介大规模宣传和讨论宪政，也大体上听之任之。

七是消除满汉界限。1907年，清政府下令取消旗人特权，编入民籍。另外，官缺不分满汉，唯才是用，满汉官员晋升使用同一标准；统一满汉的礼制和刑法，满人不能特殊；准许满汉通婚。清政府已经认识到，各民族平等是实行宪政的一个前提，所以逐渐采取了“化除畛域（界限），共作国民”的系列措施。

这些成绩，不能以“骗局”二字一笔抹杀。

当然，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改革后设立的11个部13位大臣，7人为满族，5人为汉族，1人为蒙古族，满多于汉，不如过去的满汉各半，暴露出统治集团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对此，立宪派感到十分失望，群起反对。

1907年2月，又一极其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设立资政院。

20日颁布的上谕说："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任命溥伦、孙家鼎任资政院总裁，待时机成熟，将资政院改为上下议院，上议院钦选，下议院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10月，清廷要求各地在省会开设咨议局，研究和推进地方自治。

在这些上谕鼓舞下，各地促进立宪和地方自治的民众团体蜂拥而起，蔚为大观，犹如千百小型政党，推动立宪。

自1906年12月至1909年底，上海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吉林自治会、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贵州自治学社、贵州宪政党、湖北宪政筹备会、直隶宪政研究会、福建政与会等先后成立。

出版报刊书籍，开设学校和讲习所，举办各类活动，起草商法，创办公司，发展工商业，支持各地成立咨议局，督促立宪，推动地方自治，与列强势力周旋并维护所在地国家主权……这些团体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的中心关注点，还是实现宪政。

仿行宪政的上谕颁布之后，康有为极为兴奋，在1907年3月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则于1907年10月在东京组织了政闻社。被梁启超称为"谭嗣同式人物"的杨度，于1907年6月在东京组织宪政公会，并在国内各地都建立了分会，声势浩大。

杨度活动能量极大，对宪政的精髓理解颇深。他认为中国立宪的重点是成立国会，只有建立国会，才能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他发表文章和演讲，说召开国会乃"唯一救国方法"。至于人民开化程度够不够的问题，他认为，当以"中流社会"为标准。

1907年9月25日，杨度派出沈钧儒等代表赴京，把一份有1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都察院，首创和平请愿。

杨度开了头，各省宪政组织纷纷签名上书，派代表到京向清廷请愿，要求召开国会。各地媒介也发表请愿书的内容，愈煽愈烈，形成全国上书风潮。

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于1908年6月批准《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下令各省一年内办好此事。杨度则被吸纳到体制内，在这一年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宪政编查馆行走（四品官员）。从这时起，他逐渐改变态度，要求民众"不要过激"。

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将起草完毕的《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上奏。

《宪法大纲》确定国家采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对君主的权力保留甚多，对议院的权力限制过多。当然，这也比“朕即国家”要进步多了，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对立宪进程作了总体规划，每年该干什么，规定得清清楚楚，有进度，有要求，责任目标都很明确。有了这个清单，就使政府摆脱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变成心中有数。

当天，朝廷批准颁布这几个文件，并且下旨说：“自本年起，务在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慈禧还命令各级官员每6个月汇报一次筹备立宪的进展。

日本从发布诏令到召开国会，为期9年。清廷也模仿日本，宣布自1908年起，9年立宪，即过渡期为9年。

正当立宪筹备工作加紧之际，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去世。他留下的遗诏表明了这位年轻皇帝矢志不移追求民主的决心，令人钦佩。他说：立宪为其毕生之志，文武百官要“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

慈禧立即宣布，立溥仪为嗣皇帝，入承大统，由25岁的摄政王载沣（光绪异母弟）监国。第二天即15日，慈禧奄奄一息，临终前降旨说：国家大事均由摄政王裁定，必须请示隆裕太后（光绪皇后）懿旨的，由摄政王面请施行。就在这一天，慈禧去世。

光绪和慈禧年龄相差30多岁，恰好接连两天相继去世，而且是年轻的死在前面，自然引起诸多怀疑。坊间多传说光绪被慈禧害死，但无实据，成为千古疑案。

光绪和慈禧之死，是立宪运动的一个挫折。

没有他们的推动，政府不可能展开立宪步骤。

他们两人是凝聚政府力量的核心。先说慈禧。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员，多是慈禧提拔，这些人对慈禧深怀感恩图报之心。再加上慈禧老谋深算，阅历丰富，心狠手辣，党羽众多，诸大臣不敢造次，政令自然容易贯通。再说光绪。他是清末政治改革的代表人物，戊戌政变中惨遭整肃，深得海内外同情，不仅民心在他这一边，那些希望推动新政的官员也都站在他这一边，而且对他寄予厚望。

在清政府命如悬丝的最后时刻，慈禧和光绪难得地达成一致，共同推动立宪，这是立宪取得进展的至关重要的条件。两人谢世，无疑使朝廷丧失了轴心，导致人心涣散。

年轻的摄政王载沣虽然“生平喜读西书”，与立宪派有共同语言，但他不仅资望欠缺，而且能力平平，性格懦弱，缺乏定见，隆裕太后更是无能之辈。由这样两个人主持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显然负荷过重。

开天辟地的地方议会

载沣掌握大权之后，倒是忠于慈禧及光绪遗旨，对立宪抓得很紧。到1909年10月14日，慈禧和光绪去世近一年之际，全国22个行省除新疆之外，21个省都选出了咨议局即地方议会，这是老大中国几千年来头一回。

不足之处是对选民资格有些限制，把资本及不动产不足5000元的人排除在外等等。这在帝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初期并不鲜见，用不着大惊小怪。毕竟大局承认了议会必须由选举产生，承认了民权，有了这一条，坚冰就打破了。

21个省选出63个正副议长，地方著名清议人士及知名人士当选，如著名的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出任江苏咨议局议长。

各地咨议局诞生之后颇有作为。老百姓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贪官污吏横行，吉林、福建、山东的咨议局都通过了纠举和弹劾本地不法官吏的议案，令官员一百个不高兴。但咨议局的成立与运作是朝廷支持的，地方官无可奈何。分权制衡的最大受益者是老百姓，大家齐声叫好。广东、浙江、福建、湖北的咨议局先后通过了保护主权、收回权利、抵制列强的议案，表现了议员的爱国精神。各地咨议局还非常重视本地发展实业，重视改进司法以及改良社会习俗，纷纷在这些方面展开调研，起草议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咨议局，“所议事件咸能以‘为人民谋幸福’六字为宗旨”。

老大帝国的醒目变化，引起世界瞩目。

《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参观了山西和陕西两地咨议局之后兴奋异常。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一书，替我们收集了这位可爱的莫理循先生的一封珍贵信件《致瓦·姬乐尔》，有助于我们展开想象。

在信中，这位英国记者激动地说：“我高度评价在太原府和西安府看到的省咨议局。那里的会开得斯文有礼，大有可为。这是前进中的重要步骤，我曾经希望《泰晤士报》对此给予鼓励，因为这是各省的创举，从此有机会在公开的会议上发表他们的看法，谈论本省的各种需要。”“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代表们那样从容不迫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样有秩序地讨论议题”，“试办省咨议局显然是个成功”。

地方咨议局既然有声有色地活动起来了，下一步自然是地方自治。

中国太大，国家政治与各地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个人缺乏直接关系，也不可能人人参与。大国政治往往呈现出地方政治的特点，地方事务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害，自然吸引人关注。但自治对中国来说是隔膜了许久的事物，究竟怎样自治才能不脱离国家呢？这在今天也是不少人关心的事情。清政府规定，自治的范围包括：一、教育。二、卫生。三、道路工程。四、服务业。五、慈善事业。六、公益事业，如自来水、公车等。七、地方财政。

城、镇、乡都设立经由选举产生的议事会，主持地区自治事宜。从此，城乡民众得以选举代表，直接管理本地公共事务，与政府官吏形成抗衡，上级委派官吏垄断公共权力的局面开始打破，这是晚清立宪运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

四次大请愿

总的来说，清廷的立宪，还是推推动动，这也是各国民主历程的共有规律。为了督促尽快召开国会，尽速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导民众掀起了请愿活动的热潮，向清廷施加压力，其中大规模的请愿有四次。

第一次请愿。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断指血书。

1909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订新的条约，丧失种种权利，震动国内，士大夫奔走相告，愤叹之声，不绝于耳。社会各界请求迅速组织国会和责任内阁，凝聚民众力量抵御外辱。1900年10月，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就此事在各地奔走，广获赞同。各地咨议局决定在上海召开各地代表会议，商讨请愿事宜。

12月6日，湖南各界推选代表，决定8日赴沪。长沙修业学校教师徐特立闻讯，异常兴奋（徐特立数年后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师，他的学生中有毛泽东、田汉等著名人士）。8号这一天，徐特立在学校里谈到时局危机，激动万分，“乃觅刃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表达决心。在上海会议上，湖南代表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16个省的代表“众咸感泣，益思亟行”。

1910年1月14日，代表到京。16日，列队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一年之后召开国会。军机大臣接见了请愿代表，奕对代表们说，如今各国都实行宪政，我国断无不行之理。

载沣就此次请愿发布上谕说，现在各省咨议局都已经成立，明年国家资政院也要开幕，这是很大的进展。现在国民程度不整齐，如果仓促行事，反倒会增加不安。“行远者必求稳步，图大者不争近功”，等9年准备成熟，必定召开国会。第一次请愿未能成功。

第二次请愿。

代表岂能心甘？立宪派趁热打铁，在京师组织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徐特立的血书被印成红色传单，分送各地广为散发。直隶立宪派人士还把徐特立的故事编成新戏，在天津同乐舞台由著名演员演出，徐特立由此声名鹊起，成了全国敬仰的立宪英雄。鼓吹国会的宣传画雪片般出现在各地大街小巷，各地咨议局议员纷纷下乡演说激励民气。

京师所在的直隶地区最卖力，遵化中学仿照英法前例，提出“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天津商务总会也说，如国会不开，就不交印花税。热心

人士还广泛征集请开国会的签名，直隶地区签名的有2.5万多人。

海外也闻风而动。梁启超的政闻社与国内请愿活动密切联系，出谋划策，帮助立宪派报纸撰写文章。美国、澳大利亚的华侨纷纷选派代表回国参加请愿活动。汉口企业家带头资助请愿代表，希望代表“百折不回”。

据一项统计说，立宪派在全国共征集了30万人签名，请求速开国会。

1910年4月，在火爆的气氛中，国会请愿代表团在京成立。

6月16日，请愿代表前往都察院，递交各省及海外的10份请愿书。请愿书针对上次请愿遭到拒绝的理由，加以批驳，并且说，筹备事宜用1年就够了，为什么要浪费8年时间？东三省的请愿书说，东北在俄、日等列强侵夺之下，利权日亡，财力日竭，人心思变，实在等不了9年了。

载沣听到各地抗捐抗税的呼声，吓得要命。他说，由此可见人民资格不齐，如果提前召开国会，足增烦扰，他坚持要筹备9年，但他也反对顽固派要求镇压请愿活动的建议，说这样做会堵塞民众的希望。

27日，载沣签署的诏书颁布天下。诏书说，朝廷希望早日立宪，但“以我国幅员之广，近今财政之艰，屡值地方偏灾，兼虞匪徒滋事，皆与宪政前途不无阻碍”。诏书还说，资政院即将开院，可以培植议院的基础，民众应耐心等待，不要再请愿了。

二次请愿还是被拒绝了。

第三次请愿。

两次请愿虽失败，但代表们还是拒绝了暴力的选择，立宪派希望以和平方式，创造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和平民主之路。请愿代表团电告全国：“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总代表孙洪伊更表示：“国会一日不解决，则一日不再回乡。”

在日本的梁启超精神勃发，连续撰写《国会期限问题》、《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等一系列文章，批驳拒开国会的上谕。

此时又传出俄国将吞并蒙古、日本将吞并朝鲜的消息，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公愤。

10月7日，学生牛广生等17人面见请愿代表，表示愿意死在代表面前，为代表饯行。正在代表苦苦劝说之际，牛广生手持利刃从左腿上割下一块肉，另一学生赵振清割下右臂一块肉，在致代表书上涂抹血迹，各代表潸然泪下，表态请愿到底。

10月9日，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递交了请愿书。15日，军机大臣奕接见代表。22日，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的议案。与此同时，立宪派在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福建、四川、贵州、湖北、奉天等地先后组织了群众大游行，要求召开国会。

在举国一致的浩大声势中，清朝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即多数地方的都督、巡抚等大员也联合起来，不顾军机大臣的威胁，上书朝廷，请求早日召开国会。他们是：东三省总督锡良、鄂督瑞、粤督袁树勋、滇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

他们的联名奏折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

这些官员对立宪的要义理解得非常透彻，不亚于孟德斯鸠。他们的奏折说：

没有责任内阁和国会，“则主脑不立，宪政别无措手之方。缺一则辅车无依，阁、会均有逾辙之害。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砺，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为参考，历数载可望实行。”

“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均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光绪）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持之不决乎？”

这篇奏折立刻被报刊转载，时人称之为“中国立宪史第一宏文”。

面对种种压力，载沣召开多次会议之后，颁发上谕，决定立即起草宪法、议院法、国会议员选举法，确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比原定计划提前了3年。这是三次大请愿取得的成果。

第四次请愿。

张謇对于提前3年的结果非常满意。但东三省不满意，因为那里情形危迫，还要求再提前。1910年12月21日，东北请愿代表团来京，向资政院递交了请愿书。

载沣见状大怒，他说：“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

此际，东北学生已经前往天津串联，发起组织了全国学界同志会，推举温世霖为会长。情绪激烈的学生代表断指明誓，倡议罢课以促进国

会早日召开，北洋法政学堂学生李大钊就是学生代表之一。

12月20日，天津学生游行请愿，要求速开国会，遭军警驱散。并且天津当局将温世霖逮捕，发配新疆。保定、四川、湖北学生闻讯相继罢课支持天津学生，但都被当地顽固派镇压下去。第四次请愿失败。

四次请愿虽然大多受挫，但掀起宪政风潮，是一大贡献。在请愿运动推动下，又一批宪政团体如汉口宪政同志会、八旗宪政研究会、八旗宪政会、八旗期成公民会等先后成立。

温世霖发配之后，直隶各界集资白银1000两送给温世霖，供其沿途使用，北京学生也捐助银两给他。温世霖途经河南、陕西，均被视为上宾，受到盛大欢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宪政思想的普及程度。

资政院：首次制约中央政府

诞生于1910年9月23日的资政院，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国会的雏形。

资政院不是正式国会，它是原定9年立宪预备期内一个过渡性立法机构。也就是说，它是未来国会的一个预演。

可爱又可敬的是，资政院一成立，就以国会自命，上演了多场威武雄壮的活剧，在中国认真演习了一番权力制约，启示良多。

议员由官选（在各部委官员中选举，最后钦定）100人、民选（各地选举）100人组成。因新疆咨议局尚未成立，两名地方议员未选，为了人数相等，官选也减少两名，实际各98名。

资政院有什么权力呢？它有讨论和批准预算、结算、税收和公债的职权，由此可以监督政府。另外，一切新法律不经资政院表决不能成为法律；法律颁布之后不经资政院议决也不能修改，它有立法权。

资政院与军机处（政府）是平等的，没有隶属关系。资政院有问责权，有弹劾权，有审核各地督抚（督都与巡抚）与当地咨议局互持异议的权力，有核办各地督抚违背法律的权力。因此，它不是橡皮图章，不是聋子的耳朵，也不是专营拍马的虚设机构。

资政院有开会和休会制度，每年农历九月一日到十二月一日开会，议事未完，延长一个月，临时会议不得超过一个月，其他时间休会。议员到会人数超过2/3才能开会。议员表决过半数可以通过议案。资政院自行提案，需要30个议员以上提议方可，否则不能作为议案。

一般立宪国家的内阁对议会负责，当内阁与议会冲突时，不是解散议会，就是内阁辞职。但资政院与军机处冲突时，只能分别上奏，“恭候圣裁”，把君主摆在最高负责人地位，这是不符合立宪原则的。再有，立宪国家的议院实行两院制，个别一院制的国家，仅有民选议员，而无钦选议员，而资政院是混合起来的一院制，这都是中国的不足。

到了9月23日，资政院正式宣告成立时，皇室贵胄溥伦任总裁，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任副总裁。清廷原以为溥伦既是皇室，一定偏向军机处，其实不然，溥伦的心往往在民选议员这一边，载沣及军机处对此颇为头疼。

资政院于1910年10月开张的第一届会议通过3个重大议案，就惹得载沣以及军机处极为不满。

一个是速开国会案，要求尽快设立上下议院，不能再拖到1913年。

再一个是弹劾军机处案。起因是湖南巡抚发行公债，不交当地咨议局审议，直接上报中央度支部（财政部）获得批准。资政院认为这样做是侵夺权限，要求将公债事宜重新交还湖南咨议局审核。但是载沣却下旨说，既然度支部批准就算了，军机处也在这个谕旨上副署同意。资政院认为军机处“以命令变更法律”。

接着，会议期间又发生广西、云南两地财政、教育问题的处理纠纷，载沣和军机处仍然把一干事项交给行政官员处理，将资政院和地方咨议局撂在一边。议员大怒，一位黎姓议员在会上说：“我们与军机大臣势不两立！”弹劾军机处的议案就此通过。载沣及军机处所作所为，激起全国愤怒。“国中舆论哗然，咸以朝廷此旨，全反乎立宪之原则。”各地咨议局及新闻媒介一边倒支持资政院，弄得载沣及军机处十分被动。

第三个是赦免国事犯案。资政院既要求赦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要求赦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总之是赦免戊戌变法以来所有政治犯。然而，把握不住时局的载沣，在顽固势力阻挠以及刚下台的袁世凯暗中运动之下，不仅不批准赦免革命党，连康、梁也不能赦免，错过了实现妥协的历史时机。

至于其他议案，如政府1911年预算案，议员详细审核，迫使政府将预算额度从37635两减少了7790两，算是一个成功。

还有，修订结社集会律、新刑律、著作权律、昭雪戊戌六君子冤案、黑龙江移民案、地方学务章程及收回开平矿产、浙江铁路公司依照商律办理案、四川铁路公司亏损案等等，都是应兴应革的大事，资政院没有吃白饭。

最大的意义在于，一个真正发挥牵制作用的国会雏形诞生了。正与春秋时期子产支持舆论监督一样，这都是几千年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稀有的光亮。

自杀式爆炸：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

虽然混乱，但有生机。

在中国历史上，西晋八王之乱一类毫无理性的内斗太多太多，杀人如麻，血流漂杵，都是争权夺利，没有制度创新。晚清立宪，则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横向和纵向分权制衡的制度化新路，就其内涵的深刻性来说，实不亚于一场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号称革命的运动不少，如汤武革命、太平天国革命等等，但从制度变革的角度考察，能够和晚清立宪运动相比的还真不多。如果能够沿着宪政这一方向走下去，则我中华幸甚幸甚。

但是，万分遗憾的是，懦弱的载沣没有抓住天赐中华的良机。1910年到1911年，是清朝生命途程至为重要的关口，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新路已开，民心期盼，是生存还是毁灭？全看瞬间的抉择。

犹豫不决的载沣和守旧的决策层，在这万分关键的时刻，下了两着错棋，导致满盘皆输。这就是设立皇族内阁和宣布铁路国有。这两大政策出台，无疑是维护既得利益，舍不得撒手。对于清朝皇室来说，悲剧在于，这一点既得利益，维护了仅仅几个月，就因为丧失人心，点燃了家门口的导火索，从而导致全员覆灭。孰轻孰重呢？可惜载沣等人完全衡量不出来，等到大局骤变，再改口宣布放弃皇族内阁，为时已晚矣。

先看皇族内阁。

1911年，俄军进驻满洲里威吓清政府，英国派兵入侵云南，局势十分严重。4月27日，黄兴亲率同盟会成员在广州举行了黄花岗起义，震动南疆。

在这种局势下，立宪派力主早日组成责任内阁，绝不能拖下去了。连身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也召开大会，致电国内说：“促开国会，立责任内阁，切筹善后，以救危亡。”

1911年1月17日，清廷批准了立宪筹备方案，顺序是：1911年设立内阁，1912年颁布宪法，1913年开设议院。

1911年5月18日，内阁成立。总理大臣奕（皇族），协理大臣那桐（满族）、徐世昌（汉族），这3人都是军机处老臣。以下10个部大臣中，7个满族人（6个皇族），3个汉族人。

这样，内阁总计13名成员，9个满人，4个汉人。9个满人中，皇族又占7个，所以当时称之为皇族内阁。

这个组阁办法，完全违背了不准皇族充当国务大臣的立宪原则。

1911年5月25日《申报》刊出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的谈话，他说："揆之（比较）立宪国皇族不当责任之例，实不相符。""真正之改革尚须俟诸（等待）今后"。英国《泰晤士报》说得一针见血："此新内阁不过为旧日军机处之化名耳。彼辅弼（辅助）摄政王者，咸注意于满汉界限，而欲使满人操政界之优权，此诚愚不可及之思想。"

1911年5月18日《时报》报道说：内阁名单公布之后，"一般稍有知识者，无不绝望灰心于政府"。

5月10日《申报》说："人民之怨于国家者当益烈"，"恐内阁甫成立，而推翻之动机已伏矣。"

5月13日，全国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京开会，有议员发言说："若不以推倒现内阁为先决问题，则其余皆无讨论之价值。"这个意见获一致表决通过。过了二十几天，议员们让了一步，6月6日向都察院递奏折时，改为"皇族不宜充当内阁总理"，只要求总理一个人不是皇族，部长另行商议，够客气的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距离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只差120多天，大清朝廷的生命延续，已进入读秒阶段。

但内阁开会讨论时，以奕为首的顽固派和短视眼，不但不考虑一下清朝统治者的整体命运，做一点迁就和让步，反而给立宪派议员扣上了"违背立宪精神"的帽子，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可笑复可悲。他们说，议员不能干涉君主的用人权。

如果君主都保不住了，又该怎样呢？

隆裕太后也跟着说，联合会的请求，"决不可允"。

议员们随即写出向全国人民报告书，痛斥朝廷，指出现内阁推行的政策是亡国政策，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全国报刊群起响应，一边倒支持议员，纷纷刊登报告书，揭露朝廷横行不法。

立宪派对朝廷失望了，只好分道扬镳，进一步诉诸社会力量。在此前后，一大批政党组建成立，如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等。黄炎培、马叙伦、黄远庸、谭彦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活跃人物。

载沣、奕等人为了眼前利益，倒行逆施，丧失人心，丧失了历史机遇，大大增加了造反者的力量。

再看铁路国有。

早在1905年，湖北、湖南、广东3省民众就把粤汉铁路修筑权从美国人手中赎回。光绪发出上谕：“铁路准归商办”，不准借外资。同时决定，川汉铁路的成都至宜昌段，由四川承建。

1908年，张之洞担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认为民众无力修建，非借外资不可。1909年6月，他与汇丰银行等签订借款意向合同。10月，张之洞去世，由邮传部接办。同月，湖北咨议局成立，通过拒借外债的议案，上书邮传部，要求民间商办。当时担任邮传部尚书（部长）的徐世昌，在1910年3月批准湖北设立商办铁路公司，集资自办。

湖南咨议局决议说：“铁道借款，湘人决不承认”，并说湖南境内铁路完全可以自办，民众纷纷集股。5月，议员写血书呈递徐世昌，徐世昌体察民意，命令嘉奖湖南铁路公司。

1911年3月，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向美、英、法、德、俄、日借款。各国提出条件，要求将粤汉、川汉两铁路收归国有，然后签字。

这时，新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力主铁路收归国有，然后借外资修筑。盛宣怀过去是民办企业的高手明星，现在当了部长，屁股完全坐到官办一边。他不管先前光绪和最近邮传部几次明文决定，也不管几个省的商人及民众先期投下多少资金，更不管各省议员写了多少血书，反正就是一句话，收归国有，谁不听收拾谁。朝廷在5月9日下了一道上谕，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以前批准的民办，“一律取消”。至于政府为什么说话不算话？不管，不但如此，还来个彻底不讲理：“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清廷犯了时空错误，当下已经立宪多年，早不是雍正康熙金口玉言的时代了。矛盾一下子激化，各地保路运动兴起。

湖南民众上街示威，清廷竟命令湖南巡抚，找出头头，“照乱党办法，格杀勿论”。

湖北各界人士对铁路收归国有的问题认识不一致，动静不大。

广东齐声抗议，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军队镇压，保路领袖逃到香港。

四川最为激烈。各界人士痛斥盛宣怀“既夺我路，又夺我款”，6月，成立保路同志会，张澜为活跃人物。8月24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民众家中齐刷刷供奉光绪牌位，两边挂上条幅：“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焚香膜拜，有人给光绪穿上孝服，情绪万分紧张。

刚刚到任的总督赵尔丰见事不祥，上奏要求将借款问题交资政院议决，以缓解矛盾。清廷却命令严厉镇压，赵尔丰逮捕保路领袖蒲殿俊等人，成都民众手捧光绪牌位，涌向总督署，赵尔丰下令开枪，打死32人。同盟会和哥老会当即率领四川各地民众起义，大批同志军和民众向成都进发，革命风暴来了，清廷急忙命令端方带湖北新兵入川。

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部分官兵，利用保路运动的风潮和部分湖北新军入川的机会，发动武昌起义，革命派和立宪派联合起来在省咨议局成立军政府，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清朝统治的丧钟敲响了。

《十九信条》何不早出

当初，清军仅以区区几万骑兵，横扫偌大中国，锐不可当。老大明朝，虽拥有多得多的军队，亦无可奈何，何故？明朝晚期已经腐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民心涣散，军心涣散，难以凝聚，遂望风披靡，兵败如山倒。到1911年，清朝又重演这一幕。武昌新军起义，仅区区2000人，就老大中国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就是这2000人开了第一枪，整个清朝哗啦啦大厦倾倒，当初横扫中国的威风哪里去了？相信读者看了上面的故事，已经有了答案。

武昌起义之后，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贵州、上海、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四川等14省区宣布独立，大半个中国脱离清朝统治。

各省独立过程中，只有少数地方发生了零星战斗，各地督抚及清军将领，大都配合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要求，交出了政权。

载沣等人后悔了。1911年10月30日，他颁布了“罪己诏”。“罪己诏”承认，他执政3年以来，“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侵犯）宪章，路事（铁路事）蒙于佥壬（下属花言巧语），则动违舆论”，“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沸腾，人心动摇”，“此皆朕一人之咎也”。“此特布告天下，势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罢除。”这种承认错误的态度，应该给予肯定。

接着发出的上谕说，立即组织新的内阁，不再以皇亲国戚充当国务大臣。

为了挽救危局，载沣下旨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将赵尔丰交内阁议处，释放蒲殿俊。接着批准奕、那桐、徐世昌和大臣载泽、载洵、溥伦、善耆等辞职，这些贵族也不再恋战了。蒲殿俊刚一释放立即翻身，成了四川新政府的都督。

11月1日，载沣授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命其进京组织内阁。其实载沣恨透了袁世凯出卖光绪，但到此际也没办法了。另外，下令释放发配新疆的学生领袖温世霖。

此际，资政院正在举行第二届会议。在2日的会议上，资政院研究了新宪法的纲领，即重大信条十九条，获一致通过。当天，朝廷批准，立

刻将信条宣示天下，同时确定在26日宣誓太庙，以示隆重。

《十九信条》是中国政治史上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内容如下：

第一条 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 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第四条 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第五条 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

第六条 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 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有特别资格者公选之。

第八条 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 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

第十条 陆海军直接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

第十一条 不得以命令代替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 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媾和宣战不在国会开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

第十三条 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 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又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第十五条 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

第十六条 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第十七条 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 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颁布之。

第十九条 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细察《十九信条》，皇帝已无实权，徒留虚名，一切权力归国会。显然，这个信条仿照英国式议院政治，虚君共和。早先仿照日本的民主程度较低的宪法草案，已然废除。

有日本评论家评论说，“宪法信条则全然颠覆其国体，将树立极端民主主义，殆世界宪法史上稀有之英断也”，“直当渭之民主国也”。

5日，载沣批准资政院奏折，迅速制定议院法、选举法，一旦议员选定，即召开国会。准许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为政党，公开活动。6日，释放因刺杀载沣入狱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表明对革命党的让步。

但是，这一切都晚了。

学者侯宜杰说，《十九信条》如果在一年前宣布，哪怕是半年前宣布，也会得到立宪派的同声欢呼，现在为时已晚。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清王朝灭亡。然而，中国首次宪政始末，仍然能够给我们留下多方面思考空间。

参考文献

1、《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2、《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3、《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4、《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5、《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6、（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

7、（清）夏燮：《明通鉴》。中华书局，1959年版。

8、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9、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吕思勉：《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白话本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1、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3、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4、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6、《王安石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17、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8、刘志琴：《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19、宋峻等：《古代政治家传记》。中华书局，1988年版。

20、尚钺：《中国史纲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版。

21、许倬云：《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2、柏杨：《中国人史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23、陈苏镇、张帆主编：《中国古代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4、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25、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

26、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7、牟安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8、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

30、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31、王天有主编：《明朝十六帝》。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

32、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3、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

35、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6、左步清主编：《清代皇帝传略》。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

37、许倬云：《从历史看人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8、《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

39、《清朝野史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版。

40、李德征等：《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

41、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43、吉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史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44、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

45、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6、柏杨：《帝王之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47、苗枫林主编：《世界改革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8、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9、崔连仲等主编：《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0、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51、（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2、高文、屈光选注：《柳宗元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53、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54、汤志钧主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55、汤志钧主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

56、《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7、孙昌武选注：《韩愈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58、《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59、邓魁英、聂石樵选注：《杜甫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0、张晋藩、曾宪义：《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61、《儒法斗争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62、《法家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63、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4、雷颐：《被延误的现代化》。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

65、雷颐：《图中日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6、郑大华：《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7、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8、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69、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70、（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71、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72、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

73、童书业：《春秋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

74、周谷城：《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

75、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76、万国鼎等：《古代经济专题史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

77、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版。

78、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

79、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

80、王贞珉：《盐铁论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81：黄典诚：《诗经通译新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2、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3、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4、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85、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1—1984年版。

86、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7、林金树等：《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8、郭蕴静：《清代经济史简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

90、梁启超：《变法通议》。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

91、梁启超：《饮冰室政治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

92、梁启超：《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93、缪钺：《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

94、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年版。

95、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96、孙昌武：《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97、卞孝萱、吴汝煜：《刘禹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98、顾易生：《柳宗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99、吴文治：《柳宗元简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

100、钱基博：《韩愈志》。中国书店，1988年版。

101、张华盛：《欧阳修》。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2、陈新、杜维沫选注：《欧阳修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3、游彪：《宋代特殊群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04、杨宽：《先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5、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06、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107、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08、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1987年。

109、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10、郭沫若：《历史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1、赵子光、王金华：《明代宫廷》。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

112、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年版。

113、（明）吴伟业：《复社纪事》。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

114、熊十力：《与友人论张江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115、《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先秦—近代）。中华书局，1959—1964年版。

116、《张居正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7、（梁）萧统编、张启成等译注：《文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8、《先秦文》、《两汉文》、《魏晋南北朝文》、《唐文》、《宋辽金文》、《明文》、《元文》、《清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19、《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120、《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12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22、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3、樊树志：《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年版。

124、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25、（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6、孟森：《清史讲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7、（清）毕沅编著：《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拐点/马立诚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1

ISBN 978-7-213-03677-4

I.历…II.马…III.体制改革-研究-中国-古代IV.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6419号

书名 历史的拐点

作者 马立诚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周为军 李雯

特约编辑 曹红凯

责任校对 鞠朗

封面设计 尚书堂图书设计苑

印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250千

版次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3-03677-4

定价 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